二十世纪文库

权力的媒介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 煜 裘志康 译



华夏出版社

权力的媒介

HIJI WENKU ·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煜 裘志康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卫平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by
J.Herbert Altschull
Longman Inc. 1560 Broadway, New York, USA, 1984

权力的媒介
——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
黄　煜　裘志康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81千字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 册
ISBN 7-80053-226-7/Z·026
定价：6.35 元

西方新闻理论的新作

——写在《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前面

林　珊

美国丁·赫伯特·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权力的媒介》是1984年出版的较新的新闻传播学理论著作，现已由黄煜、裘志康二位同志译成中文，这是十分可喜的事。近年来，向我国新闻学界翻译介绍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著作屈指可数，我认为这本《权力的媒介》是称得上较有参考价值的一本著作。

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西方新闻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部较好的著作。本世纪60年代以来，批判学派作为一股学术思潮正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迅速崛起，影响日益增大。他们著书立说，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制度上进行理论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注重资本主义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情”，并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医治处方”；他们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各种正统的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坦率承认现存的弊病，并且加以揭露和批判，比起那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来说，他们独树一帜，重“破”轻“立”，尖锐有力，因而更加发人深省。它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深化、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消除弊病，重找出路，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反映在理论学术上的一个新的重要动向，它的出现和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新闻传播领域，美国传统经验学派战后逐渐主宰了西方学术论坛，“社会责任论”则成为指导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活动

的基本理论。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西欧一些国家的传播研究学异军突起，运用制度结构的宏观分析方法，对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展开了比较猛烈的批判。近年来，这股学术思潮迅猛发展，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也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媒介》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迄今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等等。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无疑对我国新闻传播界人士了解西方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很有裨益。

作者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跨入新闻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实习记者，以后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美联社驻费城、华盛顿的编辑、驻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首席记者，接着在纽约担任《纽约时报》、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后来主持全国广播公司西雅图广播电视台的工作并一度担任《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在这以后，攻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新闻学院。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使他对很多值得思考探讨的新闻理论问题能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提出一些看法。作者说，如果计算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时间的话，前后断断续续可说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由于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又攻读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所以，本书具有史论结合的特色；并且着重探讨了新闻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因而本书取名为《权力的媒介》。

本书分为四篇共十一章，在每一篇里作者都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第一篇共四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指美国）新闻媒介的生产、发展，最后怎样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探讨了新闻自由、新闻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新闻记者的作用

等理论问题。作者从"便士报"兴起后广告的发展，到了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所控制，从而得出结论：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篇共三章，作者在这三章中综合分析了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将世界的新闻媒介划分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每一章论述一种新闻模式及其特征和主要理论。作者认为美国传播学家韦尔伯·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对苏联新闻事业的分析是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因此，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并不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第三篇的三章，在全书中占重要地位，因为它在论述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新闻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诸如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新闻媒介的内容与财源的关系，以及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等问题。作者在论述中还展望了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前景。

第四篇即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作者将上述他提出的三种新闻模式形象地比作一部交响乐中的三个乐章，分别就这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根本问题存在的异同展开了比较研究，进而分别论述了它们的优缺点，最后得出了新闻学发展迄今为止的七项结论：

（1）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不过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

（2）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3）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

（4）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说，宣称他们为了人

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5）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

（6）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

（7）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

通观全书，在有些重要的新闻理论问题上，作者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观点，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说，是哪些问题呢？

第一，关于客观性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是长期以来西方新闻界当作"信条"来标榜的。作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剖析了所谓"客观性"的原则是怎样产生的，它适应了什么需要，是否能行之有效等等。

作者在追溯客观性的起源中谈到曾任美联社总经理达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极力鼓吹过客观性原则，他将客观性解释为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和公正，并说客观性新闻"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库珀的继任人韦斯·加拉格尔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实现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分清思想与情绪，事实与感觉。"也就是美国新闻学界曾流行过的说法："新闻(News)和意见(Views)分开。"

为什么要标榜客观性的原则？本书作者认为对客观性的推崇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为争取订户一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它们的竞争对手还有象路透社之类的外国大通讯社，在美国国内也还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的辛迪加新闻社。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标榜客观性才有利可图。所以，作者认为："政治上的中立就能取得商业上的赢利。"他指出，新闻媒介在坚持客观性的过程中，有时也发表一些有损于政界和工商界名流的东西，但是，这绝不能超越统治阶级所规定的范围，不能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作者分

析了麦卡锡时期美国新闻媒介所进行的宣传，得到的结论是，所谓客观性原则既可用作伸张正气，也可用来产生邪恶。在这两种情况下，新闻媒介实际上都是“强权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无真正的客观、独立可言。作者还尖锐地指出，70年代美国发生的“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介纷纷对尼克松及他的行政当局进行抨击，事实上，新闻媒介抨击的只是总统，而不是总统制。换句话说，没有触及权力的根基。

美国自19世纪以来所标榜的客观报道，是有政治用心的。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理论已逐渐在“解释性报道”的倡导声中受到批评。美国新闻学者曾指出：“客观”就是不加评价的写作，但是，这种排斥偏见和评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见美国《新闻学季刊》1980年夏季号）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又联系社会经济和政治对立加以剖析，他们的这些分析和见解，对于我们怎么更好地认识资产阶级长期所标榜的客观性，无疑是有益处的。

第二，关于新闻媒介的内容由谁决定的问题。

新闻媒介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等报道什么新闻？怎样报道？以及它们发表什么言论？这些问题究竟由谁作出决定的等等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书作者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新闻媒介的内容与财源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了新闻媒介与资金提供者的关系，认为这关系分别以下列四种形式表现出来：

1.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有些新闻媒介属于国营。

2.商业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新闻媒介的所有者或出版人往往就是广告商本身。

3.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

4.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要属于“官方形式”，新闻媒介为官方所有，它们宣传的内容是官方的目标和政策。市场经济（资

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属“商业形式”，其内容为商业利益服务。发展中国家则属“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又一次得出结论：所有新闻媒介都不可能真正地进行客观报道，都是受“利益集团”操纵来为其目的服务的。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媒介向这种价值体系提出挑战是罕见的。

新闻媒介的内容由什么决定？马列主义新闻学的回答历来是鲜明的，那就是毫不掩饰地认为，自阶级社会以来，新闻媒介无不具有阶级性，新闻媒介的内容自然也都取决于阶级的需要。传统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却总是以抽象的“公正需要”、“社会需要”来掩盖其阶级的需要。本书作者看到了新闻媒介的内容与新闻媒介的经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进而根据这种关系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尽管在分析上和观点上还有偏颇，但不能不承认这种探索途径较之传统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前进了许多。

第三，关于“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问题。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新闻学者最先倡导，然后流行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闻理论。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美国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作出的调查报告指出，新闻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然而一部分新闻媒介提供的服务脱离了社会需要，另一部分新闻媒介的内容甚至受到社会的谴责，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引起政府的控制。基于这种情况，该委员会提出，新闻媒介应承担社会责任。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学者施拉姆、彼得森、西伯特等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出版，成为阐述“社会责任理论”的代表作，一直受到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学界的推崇。从此，一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把“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奉为新闻媒介的“理想模式”。然而，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对于这种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首先，他认为“社会责任”一词语义含混，各种社会的人几乎都可以对它作出自己的解释。为此，作者还专门从

语义学角度探讨了“责任”一词在现代英语中的各种歧义，进而指出它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附带说一下，对新闻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作者常常另辟蹊径，首先从语义学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从而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其次，哈钦斯委员会曾要求新闻媒介尽到提供“非赢利性公众服务”的职责，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传播媒介提出“非赢利性”的要求，实在是荒谬可笑的，他说，“因为就连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版者，也不可能亏本出版报纸或刊物。”他举例说明在60年代反种族浪潮中，美国新闻媒介所作的宣传充分说明“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作者从这里作出断言：在处理种族问题的过程中，美国的“新闻媒介或以奴隶的形式，或以白人社会及其制度所产生的偏见，迎合了长期以来实行种族主义活动的社会利益。”所以，阿特休尔教授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责任理论”是一个“含义不清的理想模式”，它在实践中是无法兑现的，新闻媒介最终只是为统治者所利用的一种工具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向“社会责任理论”提出挑战的西方新闻学者，为数尚不多。阿特休尔教授在本书中对这种理论所作的分析和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不过他没有认识到这种理论和其它一些理论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否定“自由放任”，鼓吹“国家干预”等理论一样，都是适应国家垄断主义的需要并为之服务的。

除上述问题以外，作者还在本书中论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远比责任重要，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倡的“新闻自由不受外界控制、不受权力操纵”的看法进行了批评，他深刻地揭露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新闻界实际上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人们认为“新闻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无数新闻从业人员将此视作自己崇高的职业理想并毕生为之真诚地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从整体上说又是社会统治力量的一个代言机构，受到商业利润的支配。作者认为，在这个两难困

境中，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可言。作者的看法认为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离不开国家的新闻政策，区别只是在于名称和形式的不同，有些国家直接制定新闻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则通常以“协会”、“委员会”、“计划”等形式间接地规定政策。最后，作者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认为新闻自由必须铲除私利，如果为私人谋利的话，则一定丧失自由。

总起来看，全书资料丰富，观点也比较新颖。许多地方联系了自然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思想比较开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着眼于新闻媒介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闻媒介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剖析显然是有价值的。在批判一些传统的观点时，虽有失之偏颇或分析不足的问题，但有些见解仍是有启发性的。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和新闻理论进行了分析归类，提出了一家之见。但是，新闻媒介和新闻理论都具有阶级性，如果牵强地进行比较，显然会出现谬误。作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时，并没有进行恶意的攻击或谩骂，有些问题的研究对我们不无启迪，例如作者较为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出版自由思想，认为马克思提出实现出版自由不仅要消除外部的限制（即有形的书报检查制等）更要消除内部的限制（即深受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影响，追逐金钱，唯利是图，从而丧失了写作、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具有深刻意义。但是，对有些问题如列宁论报刊的三大作用等的解释则不尽正确。

此外，作者在写作上摒弃了理论著作惯用的演绎归纳、抽象论证等方法，而是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代的主要问题，分析和总结了新闻媒介的发展变化，批判了各种流行的传统见解。当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加上翻译不可能完全再现原作风貌，人们在阅读此书时不一定会习惯作者的论述方法，也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对此，我们可以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总之，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繁荣学术、研究借鉴、批判创新，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理论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1987年6月于北京

原 著 序

这部书的写作计划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整天写作此书，而是不断在积累经验进行回忆。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这些经验和回忆，还有文献研究、直接观察以及我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采访。

当我还在中学念书时就进入了新闻事业这块领地，成为实习记者时年仅18岁。我在离开生气勃勃的新闻工作岗位转而当一名教师和研究人员之前（起初经过一番反省），曾在众多的地方寻求"新闻"，包括华盛顿和西欧；并在许多"新闻煤介"中从事新闻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和杂志。虽然我在此后深入研究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分析能力，但有关新闻煤介的真实情况，却还是我在从事一名"职业"记者那些年里获得最多。其中有一段亲身经历可能最受启发。

那是1957年，我是美联社派驻西德首都波恩的首席记者。那时候，康拉德·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经过一次大选，刚好再度执政。由单独一个政党赢得联邦议院下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现在也仍然是）。9月15日夜间，我把选举的结果向各家晨报作了充分的报道。第二天上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几位领导人正在下院餐厅饮用咖啡，我便坐在一旁，因为我还得为次日的下午版报纸搞一篇连续报道，想捕捉他们的谈话加以引用。

我忽然发现这些议员的神情令人惊诧，他们严肃不语、若有所思，并没有象我所预料的那般对选举结果大喜过望。他们当然对其政党选举获胜感到高兴，但是却对这次胜利超出的程度表示担忧。他们对阿登纳的领导并不害怕，但它关系到大是大非问题。因为，没有多少年前，德国人民曾一度心甘情愿地追随着蛊惑人心的阿道夫·希特勒，听凭他摆布到任何地方。如今对于这些阀

闷不乐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来说，德国人民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或许还会照样不加思索地去紧跟一位领袖。

领悟到事态的这一变化使我高兴。于是，我便回到办公室为下午版的报纸写了一篇报道，导语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选举胜利，胜利如此彻底使他们感到担忧。据我所知，其他人决不会那样写。

半小时过后，连接纽约美联社总部与波恩分社的直线电传发来一份电文，实际上向我质问："谁为这篇报道提供了消息？"电文言外之意说明纽约编辑部那伙人对我不信任，好象我杜撰了这条消息。无论如何，这表明人们对于新闻的准确性很留心。纽约美联社的领导成员是由一些曾在德国工作过的人所组成，其中第一号人物就是后文将要论及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

于是，我顺从地作了答复，提供了消息来源者的姓名，其中一人便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当时他任经济部长，后来接替阿登纳当了总理，此人是该国最可靠的消息提供者。然而，纽约又发来一份电文要求我修改导语，去掉有关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担忧的第三段内容，把"新闻"放在报道的开端。尽管强人所难，我还是遵命作了修改。

但是，来去不断的电文通讯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又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文，指示说美国公众对这次选举最感兴趣的是它怎样迎合了美苏"冷战"斗争的需要，电文要我在报道中强调阿登纳的胜利等于共产党人的"失败"，因为共产党曾竭力掀起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其对立派社会民主党的运动。

不，我在给编辑部回电时告诉他们，这种判断纯属错误。实际上苏联希望阿登纳获胜，因为俄国人同真正的保守派打交道更显得轻松自如，俄国人可以攻击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而假如换了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那段时期，则会使苏联感到窘迫难堪，因为不管是苏联共产党还是西德社会民主党，究其家谱世系，都溯源于马克思，要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绝非易事（总是

难以周全）。我对纽约总社说，反对阿登纳的运动并不意味着要在选举中击败他，而是替他从反共产主义的德国人那里拉选票。

这场对话终于结束了。电传机那一边的人是掌权者，他们要我服从命令并写出宣扬阿登纳获胜挫败了共产党人企图的报道。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或者遵命，或者辞职。我的妻子和孩子极不赞成任何富于浪漫色彩的英雄行为，于是我只好违心地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采写。剩下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恳求他们不要把这篇发出的报道署上名字。我有点虚张声势地申明："去掉我的名字。"

这个事例说明了新闻在国际场合下的性质。它必然要按照"我们"对"他们"或"好人"对"坏人"的格式进行报道。"新闻"的实质是相互冲突，一个记者极难用灰色的笔调写出报道，甚至指出"我们"与"他们"一致的地方以及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也难乎其难。认为新闻具有某种独立的特征或曰报道只反应映事实本身的观点实属大错，正如同认为记者、编辑总能够超脱出来塑造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想法一样，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与"他们"的冲突犹如渗透在他们同胞中的情形那样，已被彻底地网罗到新闻记者的信仰体系中，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设想新闻记者们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用他人做不到的方法"客观"地反映周围世界的看法无异于相信逻辑上的谬误。

有些记者——在人们的预料中远不止一个——想方设法运用逻辑和分析的技巧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试图超越支配其他文化的冲突规范。在我写作此书的背后就隐含着尊重这些记者的想法。尽管我在书中对新闻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场，但我的意图并非谴责新闻事业或新闻机构本身。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大学教师和批评家，我毕生热衷于新闻事业，所以，读者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书中出现的批评观点。

冲突的情景一旦在国际场合成为最易被人识别的东西，那它

在新闻"报道"中就无处不在。难怪那些受指令的报道都是以一种冲突性的笔调进行叙述的。于是乎，它成了在所有场合下处理新闻的方法。因此，新闻一词变得令人费解，新闻媒介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本书中，新闻媒介与报刊[1]这两个词是通用的。在探讨电视及广播的新闻特性时，我几乎专门论述其新闻的职能而不是娱乐节目的创作。因此，书中提到的广播电视的新闻和报纸上的新闻指的是一个意思。

赫伯特·阿特休尔

---

① 报刊一词英语系"press"可以泛指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也可以作新闻界、报业、出版界、通讯社等多种解释。为方便或修辞需要，作者将其与大众媒介、传播工具、新闻媒介等混合使用。对此，译者根据书中上下文意思译成相应的汉语。——译注

目　录

第　一　篇

第一章

报刊的起源：早期媒介关系

最初的新闻工作者

人，只有用当今的目光才能审视过去。毕竟我们也只能凭借这一目光。对此，就连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也遇到同样的困惑。历史的记载必然要溶入时代谬误的阐释。我们关于报刊起源的观点，无疑囿于这种谬误之中。我们多半把最早的报刊设想成一种向“公众”提供“新闻”的工具。不过，要做到这点，就只好运用现代语词符号的意义对历史背景进行描述。假如确有其词，那它在某种程度上的含义也已和现在相距甚远。

正如苏格兰历史哲学家大卫·休谟①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观念是我们感觉的复制”的话，那么，我们关于报刊的观念则来源于我们的见闻与经验。或许在这句话里，关键词就是“我们”，因为始于1605年比利时的现代新闻事业已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假如代词“我们”指的是一个美国人，那么，他的感觉印象很可能来自于他对本国报纸、电视、新闻周刊的体验。但如果这个“我们”指的是一个捷克人，他的感觉就会得之于他所阅读的《红色权力报》或观看的电视节目。当然，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的感觉也来自于学校课堂的教育、早餐桌边的闲谈、街坊酒店的聊天。世上任何人的感觉印象均不出于这种方式。有人也许认为这一方式对于知识分子是个例外，然而休谟却不同意。事实上，他独行己见，坚持认为“要解释我们

① 大卫·休谟（1711.5—1776.8）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他认为关于实在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超越经验的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译注

精神活动的最终原因是不可能的。”自然，休谟的论断会受到质疑（尽管我们发现它完全能被接受），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心理现实我们确实很难产生争论，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眼睛来观察，通过大脑来思考，并在特定环境下训练我们的眼睛和大脑。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一种报刊是如何发展的。它究竟满足什么样的需要？“新闻”实际上又指什么？毫无疑问，在普遍识字以前，决不会存在“读者”，决不存在“新闻”或其他任何文字形式。那么，报刊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呢？

直到15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才出现活版铅字。在此之前，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只有大商贾和第一等级中的贵族与教士这两类人；实际上，最主要的是教士阶层。因为商人阶层增长缓慢，贵族则忙于战事和治国，而不是潜心于高雅深奥的学问。正是印刷术的发明（而不是别的）使历史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这期间，能够阅读的大众日益增多导致了思想的广泛传播，思想的广泛传播又推动了哲学与科技的变革。这些变革最终推翻了教士和贵族的统治，从而产生崭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制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闻事业从未与之分离，始终是这些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遗忘了这一简单的道理，就不可能理解新闻事业。

新闻事业始于何时？15世纪谷腾堡① 的印刷机器问世之时，新闻事业尚未成熟完美。事实上，有关争夺王位所发生的消息情报，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最早时期。莎士比亚笔下，对科里奥拉努斯② 和凯撒③ 时期古罗马的描写，就充满了通信员传递文字消息的故事。确实，“记者”在古罗马属于重要人物。西方世界的最初新闻媒介主要活动在于提供有关罗马帝国经济消息的

① 谷腾堡（约14世纪90年代—1468年）德国美因茨的一名金匠，以发明活字印刷术而著称于世。——译注

② 科里奥拉努斯是带有神话色彩的罗马英雄人物，据说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是莎士比亚戏剧本《科里奥拉努斯》的主人公。——译注

③ 凯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将军、皇帝。——译注

事实并非没有意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1]在论及传播过程时认为媒介就是信息。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可以说媒介就是经济。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媒介的美国经济将是什么面貌。或许政治性消息不一定对"公众"有用，但对"公众"来说，商业消息——提供有关商品的信息——则必不可少，因为个人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才能获悉商品市场的财物行情（事实上，思想市场也是这般）。

正是由于新闻媒介作为销售商品的一个渠道，它才以传播工具的面貌出现于世。它的作用一直不同于交通运输工具，也不同于世界贸易中的其它主要的通讯工具，但比起马车或铁路，新闻媒介更接近后者。古罗马时代，人们是以信的形式徒步传递新闻的。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目的是让他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汇报那儿的日常活动情况，特别是对省里生活有影响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情况。这些"记者"常常是一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知道可以将这些信件送往驻扎在其他省份的官员那儿，以捞取外快。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

省里的罗马人需要掌握必要的消息，以便开展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那些提供消息的记者是私家奴隶，他们经常从张贴在广场墙上的公报或新闻专页中筛选出所需要的东西。此后，许多人自视为雇佣的奴隶，也就是市场的俘虏。不错，今天的记者或许在为"新闻制造工厂"进行工作，但是，掌握财源的已不是业主或雇主了，而是记者们从未遇见的商人；对此，人们常常忽视它的存在。我们在后面将回到这个议题上进行讨论。

哈罗德·拉斯韦尔[2]认为，"监视环境"是任何社会必定要

---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7——1980.12）加拿大传播学理论家，其著作《人体延伸》和《媒介就是信息》等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译注

② 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2——1978.12）美国政治学家、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

进行的三项传播活动之一（其他还包括收集和传送新闻）。新闻并不是社会责任或愿望的一种产物，而是需要的一种产物。拉斯韦尔指出，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以保证其种的生存需要。当今之世，社会中盘踞高位的权势人物控制了四周环境，正是这些个人的具体形象代替了抽象的社会。然而，除非这些个人在其栖息的世上能够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常备不懈，否则他们无法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拉斯韦尔远见卓识，其意义难于夸张；他将抽象的"新闻媒介的责任"置于恰当地位，也就是说，它要服从生存的需求。换言之，"新闻媒介的责任"只是那些掌权者为了控制他们的环境用来掩饰其赤裸裸的权力而涂上的一层智力美容膏。按照拉斯韦尔的分类，环境监视是用来揭示"对社会团体及其他内在组成部分的价值观产生影响的威胁与良机"。正如常言所云，新闻就是力量，或者更明确一点，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显而易见，掌权者必须知晓影响其价值观的威胁与良机；运用新闻传播手段避开威胁，护守良机——换句话说，新闻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机构。

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各省权贵便发现了派遣记者去罗马的益处——为他们审视观察，充当耳目。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笔杆子，因为这些统治者的经济命脉和权力基础都与此息息相关。自那以来，监视环境的性质以种种形式持续下来。罗马帝国灭亡后的社会结构较帝国的简略单一，在此后千余年间，它的新闻采集体制的建立也比帝国时期偶然任意得多。即使是印刷媒介的到来，也未能产生现代类型的新闻事业；直至19世纪大众市场的崛起，现代新闻事业（或称大众媒介）才真正开始形成。从此以后，新闻媒介始终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为避开威胁、护守良机而监视环境。

然而，直到印刷媒介的出现，最初"读众"的产生才成为可能。文字材料再也不必用手工费力地抄写，教士再也不能享有千

年之久的书写消息的垄断权利。结果，今天的教会就注定要大权旁落。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大多数人已能获取各种消息，但不应据此推论从朱利乌斯·凯撒在罗马灭亡直至谷腾堡在美因茨[1]胜利的15个世纪期间，新闻消息就没有在一定的范围内传递。实际上，新闻媒介早已被确认为维护政权、控制社会的一个工具。早期媒介的三种关系[2]可以视同为一。在那1500年里，新闻媒介作为一个工具或机构，为三个不同的掌权阶级效劳。在每一次效劳中，新闻流通的作用都是对潜在的威胁及早发出警报，并对潜在的良机作出类似某种股票行情的预测通报。

印刷文字之前的新闻媒介第一次作为一种传播机构为君王政客以及伴随城镇与行会发展起来的市镇政治领导人效力。甚至于在罗马帝国兴起之前，统治者之间就已存在新闻的流通，但当时的传播者是传令官和送信人，他们直接向统治者提供报道，然后在城镇房屋的公共通告栏里，公布精心选出的“新闻”。除此之外，群众便再也得不到别的“新闻”。

扮演精神领袖兼教育家角色的教会牧师是新闻流通的第二个群体。僧侣和主教在更多的情况下，把他们收到的消息概略地告诉不识字的政治家们，这样，他们通过垄断阅读技巧便能影响政治决策，随意更改校园里传扔的新闻，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牧师还把持了高等学府教育大权；事实上，宗教改革之前欧洲所有的主要大学均由罗马教会创办。当然，随着教育的普及，教会的直接控制变得日益困难了。

随着城镇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富翁阔佬趁机脱颖而出，于是作为社会控制和攫取权力的手段的新闻又发展到第三个群体——商贸与富豪之中。16世纪之际，富格尔商行自家经营的新闻机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联社）生意兴隆。在这之前的整整两

---

① 美因茨现为西德的一个城市。——译注

② 早期媒介的三种关系即：监视、收集、传递三种功能。——译注

个世纪以来，大钱商创办的新闻采集制度不断扩展。当时的世界贸易首都威尼斯成了最早的新闻中心，对此，人们不会感到有何惊讶。对于威尼斯商人来说，获悉其货船的地点以及所携带的珠宝香料的价值至关重要。“加塞塔”①这个词就是意大利早年出版的不定期单页新闻纸使用的名称。毫不奇怪，它来源于威尼斯的一种小硬币。因此报刊与商业世界的联系，犹如雨从天降那般自然。

“新闻纸”直接译自意大利语，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它们的编纂就已广为人知。威尼斯地方官署下令收集有关新闻，并把它递送给驻各国的大使、领事、船长以及相互提供新闻的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们可以在威尼斯城内搞到新闻的手抄件，并把它用到做生意上面。偶尔，这些商人也会将新闻纸用新闻信的形式寄给国外的亲朋好友和熟识同行。十六、七世纪直至18世纪，新闻信传递的现象不仅在整个欧洲而且也在美洲殖民地相当普遍，新闻事业获得长足发展。结果，新闻在公众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并溶入了政治性消息。

那些有创业精神的威尼斯人象古罗马的同仁一样，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到16世纪中叶，一个真正的“手抄新闻”行会在威尼斯发展起来。他们在横贯大运河的里亚尔托桥上出售新闻纸，任何过路人只要掏钱就能够购到新闻，其内容有船只的启程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现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在罗马帝国时代，抄抄写写的人通称“特写作者”和“新闻记者”。有两个教皇竟然不顾一切地禁止这类写作活动，如果违反他们的禁令，结果不是鞭打火烙就是判为囚奴。然而，这套威胁手段对后来的记者已无济于事。新闻采集与传播的活动不断扩展，遍布欧洲，走向世界。但

① 加塞塔(gazetta)最早系威尼斯一种小硬币，十五六世纪的时候，威尼斯人要阅读有关新闻报道，需付一个“加塞塔”，后来这个词就指代了当时人们对报刊一类东西的称呼，并沿用至今。——译注

是，新闻信仰仍然只在达官贵人、名流绅士范围中流传。直到19世纪，才形成现代大众化的新闻事业。

然而，宗教改革运动与日益壮大的印刷业汇合一体，注定了中世纪社会制度的灭亡：大小君主纷纷倒台，罗马教会的无限权力也不复存在。人们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道，印刷媒介只有到了现成有利可图的时候，才可能把新教领导人关于罗马教会暴行的消息轻易、迅速地传递给广大公众，至少传递给公众中的知识分子，以便通过他们运用自身的劝导力量促使群众支持他们的事业。实际上，虽然他们当中能够阅读写作的人比例很小，但他们在传播新闻过程中的影响却很大；这便激起了群众和知识分子要求获得直接新闻的更大欲望，而不是要求获得由经教会处理过的新闻。但是，新闻到底指什么呢？

自主原则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公众对新闻有着巨大的需求，实际上，人们在"渴望新闻"。世界各地的人民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观看电视、饶有兴趣地获悉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这点，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然而，单凭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世界上的公众曾经积极关心有关公共事务的准确新闻。有一个论点认为，新闻媒介的正当作用就是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准确新闻，因为这是公众的愿望，但是，这一论点决不能仅仅靠对新闻的需要或兴趣得到证实。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新闻内容指什么？所以，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所需所欲的新闻究竟是有关复杂的公共问题或生死攸关的事件，还是有关幽默故事或区区闲言碎语？

人类总是需要并企图获得有关存亡发展的消息情报。早在谷腾堡印刷媒介产生之前，从美国西部、非洲平原、中欧森林直至中东沙漠，这些地区运用原始手段进行传播交流，提供了有关敌军出动、动物受惊、雷雨降临等消息。这类消息对所有接受消息的人

来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实上，这类"新闻"在传统社会中对生存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一个社会处于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时，该社会就必然要限制它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只有在商业活动发展到跳出邻居街坊之后，要求获悉反映外界情况的新闻的读者才应运而生。毫无疑问，遥远异地的最早消息是商业性的。最先"渴求新闻"的是贵族、教士及商人。印刷媒介兴起之前，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为政治、经济权贵们提供有益的消息。

中世纪末期的标志是缓慢而痛苦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开始向皇亲国戚发起挑战，要求公正地分享权力。自从14世纪，他们在佛兰德①发动的一次重大挑战遭到挫败之后，商人、工匠和政治叛逆者转而求助于印刷页码点燃革命火焰，此火焰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熊熊燃烧，燎原一片。随即而来的是令人震颤的科技进步、以及不断上升的识字率。当更多的人能够阅读的时候，他们便迫切要求更多的新闻。于是第一份"报纸"应运而生。定期刊物在17世纪前期，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各地。然而，如果设想这些刊物都能被大众获得，或者它们对公众问题更为关注，那么这将是一个误解。报刊的形成发展与最终推翻黑暗中世纪制度的意识高涨相吻合，但是，如果那些东西迎合群众的话，也不会持续好几个世纪(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十七八世纪，大众化报刊在整个欧洲及美洲新大陆出现，定期刊物开始发挥四种作用，在很多场合下，四种作用交替出现。这些刊物毫无例外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监视环境、避开威胁、护守良机的一支强大力量。长期惯于书面交流的教会牧师在新近问世的大众化周刊中找到了一条传播教义的途径；船主和经商者则窥察到了报刊作为一种迅速提供市场信息工具的有益之处；政治上的统治人物和那些正在兴起的正统势力的挑战者也都求助于印刷文字，将它作为宣传各自政治信仰的工具。人们逐渐认识到报

① 佛兰德，中世纪欧洲一个伯爵领地，包括现在的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地区。——译注

刊还是一种教育人民的工具。可以说，牧师、商人以及政治上的统治者都企求运用报刊对公众进行教育，对他们来说，教育意味着向公众进行宣传。于是，统治者利用新闻传播赢得大众的做法，第一次变得意义重大。

为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早期欧洲和美洲殖民地印刷媒介的内容分为四类：(1)宗教教义；(2)商业事务；(3)政治信念；(4)大众教育。新闻媒介在这四种情况中，都是为完成某种特定目的而发挥一种工具的作用。

十七八世纪的定期刊物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截然不同。最早可以称得上报纸的出版物只出现在19世纪中期；其诞生地，确切些说，是纽约市。"报纸"这个词的最初发端已模糊不清，难以考证，然而，它明显来源于古代"日报"这个词，当然，这个词在词源上也是"报纸"这个词的原型。"记者"这个词一开始是作为"作者"或"信使"[①]的同义语似乎在17世纪首先出现于英国。当这些词指希腊众神的使者时表明，记者是受权履行其业主代理人的职责，他的作用是传递消息。

历史学家通常确认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出现在1605年安特卫普[②]；一般认为英国的第一份报纸是1622年由一个叫纳撒尼尔·巴特印刷的《每周新闻》，这个刊物以及德国、瑞典、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同类刊物不同于那时期出现的定期出版发行印刷的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他们并没有印刷我们今天所见的"新闻"。当然，如今新闻的概念是具有某种新东西，它是法语和德语"新闻"一词的同义词。早期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个词来源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此说尽管漏洞百出，但似乎一直被人沿用。不过，1640年流传的一首打油诗却表明"新闻"这个词早年的拼写是"newes"。[③]小诗道：

---

① "信使"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指赫耳墨斯神，他是宙斯和迈亚生的儿子，其主要职责是传达关于众神尤其是宙斯的各种消息。—— 译注

② 安特卫普是现比利时港口城市。—— 译注

③ 新闻这词的现在拼法为"news"—— 译注

欲问新闻(Newes)何处来，

口里信里相相传，

东南西北处处来。

早期英国出版物仿效威尼斯创立的式样，自称为"新闻信"印刷商完全运用了新的印刷工艺四处传递消息。许多17世纪的作家从事这种新闻小册子的写作。其中，影响新闻界思想体系或信念习俗方面最为突出的是约翰·米尔顿。他在1644年发表的《阿雷奥帕吉蒂卡》①的小册子中，以铿锵有力的警句，阐述了出版自由的观点。事实上，米尔顿关于"自主原则"的主张作为自由报业体系的道义辩护已经历了三个多世纪之久，这种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言自明，为人熟悉。我们将会看到，米尔顿的格言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被赋予不同的诠释，我们还将看到，由于不同的原因，它在新兴国家里也有不同的理解。

在《阿雷奥帕吉蒂卡》中，米尔顿用确切明了的语言叙述了经常为人引用的自主原则：

>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谬误"交手"吧，谁看见过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一败涂地呢？
>
> 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上帝之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抗真理的花招。只要让真理有施展的余地，而不要在睡着了的时候把她捆住就行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思想已经萌芽，尽管这个专门的复合词直到1919年才出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② 的笔下。但是"真理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

① 《阿雷奥帕吉蒂卡》又译为《论出版自由》《爱理俄巴格斯法庭成员》。——译注

②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美国著名法学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连续担任大法官达30年，以主张司法克制而闻名。他常被人称为"伟大的异议者"。——译注

终将战胜谬误"的思想到18世纪米尔顿追随者那里激起了一系列伟大的试验，他们起草了美国人权法案和美国宪法，两者都把自主原则编纂成条，赋予合法的地位，使它成为神圣的经典，至少在美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然而，这项原则不仅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发展中国家哲学家的坚决反对，而且也确实受到某些离经叛道的西方思想家，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① 的反对。密尔告诫道："真理往往战胜迫害的论断只是滑稽可笑的谬误之一，它经过长期传颂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它被所有的经验所驳倒。"

虽然自主原则来自于英国的思想，并在英国的哲学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只有在美国，这项原则才得到推崇（其前提是只有发现真理才能这样）。

当年美国革命时期，这项原则被杰斐逊② 和麦迪逊③ 鼓吹过，后来，它经过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和布兰代斯④ 的补充加工日臻完善；到了今天，新闻从业人员与教学人员又合力把它推向鼎盛峰巅。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不承认美国宪法是信条的地方，这项原则并不被视作崇高的道德顶峰。相反，它扮演了一种语义欺骗的角色，其目的恰恰是在肮脏的商品交换市场上获取金钱。

有必要注意两位英国作家的重要作用，尽管当今世界并不熟

---

①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他是英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詹姆斯密尔的长子，是功利主义学说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功利主义》等书。——译注

②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译注

③ 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译注

④ 布兰代斯（1856——1941）美国律师，1961年至1939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注

悉他俩的名字，但按照克林顿·罗西特的说法，他俩的作品从政治角度来讲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流传最广，引述最多，评价最高的"。罗西特所指的这两个人就是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从1720年开始，他俩在十多年里以笔名"加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伦敦的报刊上。加图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政治家兼作家，他赤胆忠心，以顽强反抗凯撒大帝而著称于世。特伦查德和戈登的文章冠以《加图通信》的名义在美洲殖民地流传。文章赞扬了人们后来所知的"新闻的自由流通"的观点，歌颂了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宣告要为此同生死、共命运。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只要一个人不用它来危害和支配别人就行。"于是，在米尔顿与《加图通信》撰写者思想的指引下，美国人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出版自由视为神圣。

毫无疑问，启蒙时代激起人们发表振奋人心的言论和文字，热情歌颂表达自由以及不受限制的新闻流通自由。但是，问题仍然是：什么样的新闻？为了什么目的？人们徒劳地寻求那些试图用言论自由来动摇社会信仰体系根基的拥护者。同样是这个米尔顿，一方面对书报实行检查表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本人就是一名书报检查官，对那些发表他不能容忍的主张的人进行镇压。加图①则提出，一旦言论自由损害了他人权利，就要对它加以限制。至于这些权利是由哪些东西所构成，他却只字未提。假定法官的权利可以侵犯，但是当行使这些权利损害其生活幸福时，难道这位耿耿于怀的法官还会甘心情愿吗？同样也是这个杰弗逊，一面把报刊的地位抬得比政府还高，一面又强烈要求对那些肆无忌惮刊登某些东西的报纸进行控告。

显然，言论自由一旦取得了荣耀的地位，人们就不会再去讨论并同意关于新闻是什么的公认见解，也不会赋予"言论自由"确切的含义了。美国革命家无疑要按照他们的意愿谋求获得揭露英国

---

① 这个加图指特伦查德和戈登两人。——译注

主子罪行的言论和写作的特许权，但他们却不太情愿把同样的权利给予保守派的支持者。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行为固然得到了宽恕，然而任何鼓动人们起来反对现存经济制度或既定道德准则的言论自由则不容许存在。事实上，查尔斯·比尔德[①]后来断言美国宪法是一部捍卫开国元勋财产占有的保守的产物。比尔德的分析显然言辞偏颇，但他提出开国元勋设法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决不鼓励人们去自由表达革命的经济学说这一论点，却谁也否定不了。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论及这些开国元勋的主张并探讨那些新闻史上根深蒂固的神话的起源。

那些在其哲学著作中表达了崇高理想的人，一旦真的按这些原则进行生活的话，他就会陷于孤寂或入不敷出的困境之中，新闻史如同其他任何领域一样，也打上了虚伪欺诈的烙印。例如，细想一下托马斯·戈登的情况，这位热情洋溢的《加图通信》合作者，象他的搭档约翰·特伦查德一样，是一个不知足的辉格党政治家，他竭力把《伦敦新闻报》当作论坛，痛斥1719年的罗伯特·沃波尔[②]领导的托利党政陷入了财政危机，并且还附带想推翻沃波尔政权。《加图通信》激情昂扬地歌颂了出版自由，然而，当沃波尔政权觉察到大难临头时，便于1722年拿钱买通了《伦敦新闻报》的出版商。为此，戈登和特伦查德遭到解雇，此后一段时期里，他们在另一家《不列颠新闻报》上陆续撰写《加图通信》。但是，当特伦查德死后不久，致力于实现出版自由的戈登却甘愿接受沃波尔的诱惑拉拢。从此他撰写的文章，对过去曾鞭挞过的同一个政府，表示支持拥护。

---

① 查尔斯·比尔德（1874.11——1848.9）美国历史学家，因从经济角度阐述美国制度的发展而享有盛名。《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年）是他历史观的纲领。——译注

② 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英国辉格党领袖，曾两度出任财政大臣（1715——1717，1721——1742），第二次任财政大臣时成为英国政府实际领导人。——译注

沃波尔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仅仅封给戈登一个酒类许可督察官职务。正如一个对戈登并无多少好感的同行尖锐指出的那样：至少会有一个政治作家通过运用他的才华设法取得金钱。

托马斯·戈登的故事异常生动地说明了新闻媒介的本质特征。新闻记者并不是超然独立的人物，他像在古罗马竞技场若干的奴隶们那样从事写作，理当付给其报酬并决定其工作条件者的代言人。一旦那些人察觉到他对当局构成了威胁，或者按拉斯韦尔的说法触动了他们的"价值地位"，那么，他们就要以强力迫使他改弦更张。虽然例外情况时有出现，但是，不安分守己的新闻记者的力量终究有限。美国热衷于新闻自由的人士可能不太注意戈登的叛徒角色，但盎格鲁一撒克逊新闻界的批评家却对日益增长的赞成新闻自由流通的思想体系这一内容不以为然。

不管加图的现实生活如何，有一点毫无疑问，就是戈登和特伦查德的著作文章都受到当时渴求运用报刊反抗英国殖民主的美国殖民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戈登在《加图通信》第100封答复特伦查德的信中写道：

> 如果不允许他们（人们）互相传播观点和成就的话，那么世界必然要很快遭受野蛮、异端、不公、暴政的蹂躏，必然要变得愚昧无知、昏庸至极。除了奴隶般地屈从于强权统治之外，人们将对政府的职能一无所知。

在欧洲大陆，类似《加图通信》笔下流淌出来的警句格言鲜为人知。在德国和法国，人们看不到编辑作家象英国那样，具有进行斗争以赢得在印刷文字中批评当局权利的传统。普鲁士和法国的统治者跟沃波尔和英国首领们及美洲殖民地的王室总督一样，坚决要求报刊明确地支持当局的行动。普法两国的新闻工作者直到激烈的法国革命时代来临之前，似乎还是俯首接受王室指令，丝毫未呈现出反抗的迹象。1740年，腓特烈大帝继承了普鲁士王位，他不仅要求普鲁士新闻工作者无条件地忠于他，而且竟然命令普鲁士报刊按照他的旨意为所欲为地撰写报道。腓特烈还创办了两份自己的报纸，并不定期地开设题为"普鲁士官员报"的专栏。

1935年，一份纳粹报纸写道，两个多世纪前，腓特烈亲自给报纸"规定了一个明确的任务……即教育西里西亚的人民为普鲁士国家效劳。"总之，深谙虚构妙用的腓特烈认识到报纸具有这样的重要性，既可以利用它施加压力于外敌，又可以让它推进政策于内政。

在法国，波旁王期奉行的新闻政策与沃波尔政权、腓特烈大帝及美洲殖民地总督推行的新闻政策并无二致。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时期，呼吁理性表达、言论自由的热情，最后必然吹响要求新闻自由的号角，米拉波伯爵①深受米尔顿思想的影响。1789年，他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法律的第一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踞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假如丧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在欢呼雅各宾派凯旋声中，保障出版自由的法令大量地被制定出来，期刊报纸雨后春笋似地遍布全国。大革命前的1788年，仅有四家报纸在巴黎登记出版，然而到了1790年，报纸的数目一下子增加到了355家！

如火如荼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这似乎是各地的普遍现象。到了1791年8月，那些宣告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都被修改订正，当时，制宪会议制订了一项法令，禁止"蓄意抵毁文职官员的正直清白或诽谤他们公正地履行职责。"此后，出版物遭到审查、封闭，编辑们被关进监狱，他们的报刊杂志纷纷破产夭折。拿破仑上台执政后，新闻媒介又一次沦为统治当局的喉舌。

拿破仑模仿腓特烈大帝的做法，把法国的报业变成了宣传机构。外国的政府和新闻界同行视拿破仑的报刊为政府的代言人，无法与他们自己国内的新闻实践相类比(这种现象极其普遍)。对此，梅特涅有一句著名评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30万大军。"那时候，法国对拿破仑军事胜利的报道极尽夸张歪曲之能事，以

① 米拉波(1749——1791年)法国演说家、革命家、政治家。——译注

至于法国公众在拿破仑垮台时，不仅仅惊慌失措，而且大为不解。事实上，纵观整个近代史，国内的新闻媒介不报道本国军事败绩的情况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以至于公众几乎对本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消息毫无心理准备。

下面，我们将考察新闻媒介信条中最持久、最突出的部分，那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第二章

神话的诞生：第一修正案，革命的机构

民主的假设

两个世纪以来，第一修正案巍然屹立，坚如磐石，犹如太阳照耀下的自由殿堂，映射出灿烂的希望之光，在遥远的自由山岳上冉冉升腾。世上男男女女以及他们栖息的国家满怀未曾应验的梦幻仙境，向着高山奋力攀登。为了登上峰巅，许多人奉献了生命，更多的人受尽鞭笃与牢狱的煎熬。

然而，这座山岳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遥远，相反，它近在咫尺，不难攀缘。它是创业先父馈赠的礼物，经过代代相传，已成为他们所渴望的美国之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是如此。当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时，印第安人、黑人、大多数妇女都未能享受出版物的自由表达权；同样，文盲和无法获得印刷刊物的人也被排斥在外。尽管这样，人们并不要求它必须吻合一致，因为第一修正案自始至今已渗透人心，以至于人们现在完全可以将它视为新闻信条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美国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犹如宗教那样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以至于美国人民把它颂扬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第一修正案法典的出版自由已经变为一个力争达到的理想目标。然而，并非每个地方都认为这种理想符合现实。在资本主义的欧洲，美国的新闻媒介常被看作唯利是图，而非纯洁高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和新兴国家中，人们极为怀疑新闻自由的"真实性"，因为这种报刊体系主要是由广告商提供大部

分资金，使业主唯利是图。对于美国那些被剥夺其公民权的人来说，这一信念并不是普遍的。例如，当马丁·路德·金宣扬"最终自由"的思想时表示，他期望黑人也能同白人一样登上自由的山岳。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新闻媒介在美国民主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并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奉若神明的第一修正案上来。为了正视美国社会中的新闻媒介，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它是美国制度中最可触摸、最为明显的东西之一；事实上，新闻媒介无处不在。据说普通市民每天看电视五至七小时。超级市场和杂货店、记帐商店和百货公司全都陈列着刊载人物新闻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收音机每天唤醒400万人，不管是街头巷尾还是汽车内外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一些美国人头带耳机，在大街和海边散步时也会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在光滑平坦的州际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司机不出数英里就会遇见广告牌。一个美国人能够得知"新闻"的地方实在是不计其数。我们有时听说美国人获得新闻的手段有些变态，如果确实这样，也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一个美国人，毋需费力去获悉旁人的生活情况。假如他的收音机或电视机、他的报纸或杂志未能给他传递信息的话，他的朋友和邻居会做到这一点。

总之，新闻遍地都有，不但处处可以发现，而且处处受到重视。要发现一位美国人说新闻对他没用，是极其困难的。谁能否认一个美国人具有被告知的权利呢？这点对理解美国生活中新闻媒介的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要。当然，新闻媒介在许多美国家庭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连了解情况的民意测验人员也不常见。但是，美国公众能够把新闻媒介与新闻，或通过新闻传播的新闻区分开来。新闻媒介本身可能会遭到蔑视，"新闻"却不然。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繁荣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

这种假设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实行统治。

在选举投票站里，倾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依据他们获得的各种消息作出投票决定，而那些消息则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对于民主制的生存必不可缺。进一步推断：民主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政府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此，对于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公民的新闻流通必然来自于自身也是自由的新闻媒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进一步详细探讨"新闻的自由流通"的概念，但现在它对我们认识美国人民（及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坚持自由民主基本假设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从宣称报刊自由的绝对重要性到断定自由报刊的权力只有一步之差。报刊的权力之争早于第一修正案的提出。中世纪教士和统治者以及所有西方国家的当权者都企图把报刊的威力置于自身控制之下，而自由的人民在思想上就预先假定了自由报刊的主权高于君主和主教。难怪新闻工作者这一行容易屈服于在宣扬任何权力时必须要产生的那种迷人的狂妄自大。

宣称新闻媒介具有权力的主张已经到处可见。梅特涅讲道，法国的印刷媒介只是为拿破仑而工作的一个机构，而20世纪的宣传家则依赖于广播电视进一步将它变为社会和政治的控制机构，同时广告商也仰仗一种"媒介的混合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以上这些无不说明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威力。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事实上，这种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现实的情况，即使偶尔根据充足，促使我们正视现实的话，我们也常常会（象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我们的情况也许与妇孺皆知的英国传说中那个不足为信的妇女的情况甚为相似。那个传说故事写道，伍斯特大教堂的一位教士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其妻之后，[illegible]了回答

如下："人来源于猿猴！天哪，怎么会这样呢。要真是这样，让我们祈祷吧，希望这个情况不要为更多的人知道。"

在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很难发现一个人准备为反对"新闻自由"进行争辩。尽管人们不时埋怨"新闻的弊病"，但人们几乎普遍相信新闻媒介在民主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假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新闻自由的赞成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礼仪上，而不是信仰上。调查研究表明，许多表示拥护新闻自由的人，实际上却无所作为。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希望新闻媒介反映的并非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图像，而是人们心里希望看到的那种图像。1960年的一项公布于众的研究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项研究里，密执安州的安·阿尔邦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大学是两所同类的高等学府，其成员均接受高等教育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公开表示坚决支持抽象宣言中赞成言论自由和其他的民主原则。90%以上的回答者拥护宣言，然而一但进入具体环境，这种拥护便立即化为乌有。举例来说，只有63%的人容忍某个人发表"反对教会和宗教"的言论，甚至仅有44%的人允许一名公认的共产党人发表赞扬共产主义的言论。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当关系到同意少数人观点的具体行为的情况时，"积极意义上的见解一致"并不存在，"即使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也不例外"。

研究结果证实了后来的调查所涉及的类似问题。即便如此，他们似乎并未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关注。显而易见，许多人嘴上信奉民主假设，实际上并不以为然，但事实上只有言行一致才意义重大。美国人异常坚定地恪守着民主假设的思想，或曰观念。这一假设实际上与寻求真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无比卓越的语言大师温斯顿·丘吉尔在描绘美苏两大军事巨头争夺强权的冷战状况时，称冷战是"人类思想之战"，或者用民主假设的语言来说，就是主张思想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与保守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之间的抗争。我们将在后面研究这场抗争中苏联方面的观点。

美国新闻界人士以及那些笃信民主假设的人经常会发现"观点的市场"这个恰当的比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追求真理要在大众的竞技场上公开进行，因此，这个词维妙维肖地说明了民主假设的思想。它的出处已不得而知，但古希腊的哲学家和耶稣都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亚里斯多德曾云："吾爱吾帅，吾更爱真理。"耶稣云："汝知真理，汝将自由")。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和耶稣实际上正是为了捍卫这一思想而丧失了生命。就现代民主理论特定范围而言，这个概念在米尔顿《阿雷奥帕吉蒂卡》一文中得到了最富有戏剧性的阐述。

但是，只有迂腐之人才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米尔顿反对书报审查的言论以及那些对克伦威尔和新教辨护者实施有限制的做法，因为米尔顿本人在克伦威尔当政期间就充当了克氏对"教皇思想"实行书报检查的官员①。对于米尔顿的言论来说，它的威力在于从道德正义方面大胆主张自由不羁地探求真理。民主假设在米尔顿的自主原则思想中根深蒂固。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制定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的法案中承认了这项原则，他在1779年的草案中宣称："真理是伟大的，如果任其自然，她终将得到传播，她是谬误天生而强大的敌手，无所畏惧地与之抗争搏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富于思考的杰斐逊又补充说道，一旦真理遭到了"人为干涉，其自身的武装遭到解除"，那自主的原则就会失败。

只有到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牢固建立之时，市场的主张才增加到自主原则之中。著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最清楚、最生动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指出：

当人们认识到岁月已经搅乱了许多互相抗争的信仰时，他们可能更加相信我们行为的基础，即最好通过思想自由交易的途径，实现自己最理想的愿望——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是让思想的力量在市场公开竞争中自动获取承认。真理是唯一的根基，在此之上人们才能有把握地去实现自己的理

① 据记载，米尔顿曾于1651年任英国书报检查官，半官方的《政治新闻》和《每日报道》就是由他负责审查。——译注

想，总之，这就是我们宪法的原理。

然而，在艾布拉姆斯对美国一案判决中，最高法院的多数人都不同意霍姆斯提出的观点。大家认为，判决五名俄国侨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了扇动叛乱罪是合乎宪法规定的，而霍姆斯则争辩道，根据思想表达自由的原则，即便是令人憎恶思想的表达，也是正当的，因此，这个判决是违宪的，这意味着米尔顿的自主原则注入在美国宪法中。此后，霍姆斯的观点不断出现在最高法院里并且构成了当今美国信条的一部分、保守派和自由派哲学的一部分。

主要的症结

从米尔顿到霍姆斯的道路是一条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信仰体系日益联系、不断溶合的道路。霍姆斯正确地指出，自主的原则或者市场的比喻是“我们宪法的原理”，因而不能加以怀疑。创业的父辈同时也是启蒙运动者，他们不仅笃信米尔顿关于真理力量的主张，而且也坚信米尔顿的理性战胜错误恶行的观点。尽管如此，人人应当享有的有关言论自由的各项权利和特权的思想不会立即变成一种普遍的观念。

事实上，英国的《权利法案》[1]是关于人权的最早的法典，美国《人权法案》的基本概念源出于此，然而这部法案仅仅承认国会议员享有言论自由权，广大平民百姓却不在此例。英国的法案规定“国会议员之选举，应当自由；关于在国会内演说及辩论之自由或国会内各项程序，在议院以外，不要任何法院或其他机关之弹劾或质询”。言下之意便是，无论口头的或印刷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是针对那些享有特权者，以及那些善于巧妙地运用这项权利的人。

美国的创业父辈在这方面的成就大大超越了英国的法案，这

① 《权利法案》是英国1689年颁布的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根本大法之一。——译注

不仅反映了殖民地的不同环境，而且也反映了启蒙运动哲学家传播的各种思想所产生的结果。培根、留卡尔以及其他有关科学探究和采用经验主义方法的人都给予赞同和支持；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其他坚信理性必胜的思想家（因为他们认为在政治决策中，人类的事务以及关系重大的多数人之事务，理性必然获胜）也给予了论证和肯定。因为一旦正义战胜谬误的挑战，那正义就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认识。事实上，多数人实行统治是米尔顿自主原则的一种延伸。所以，只有通过实行言论自由，人民才能获得真理，或正确地思考。因此，美国父辈们赞成出版自由的做法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早在《人权法案》之前，殖民地就已开始颂扬出版自由。1735年，在赫赫有名的约翰·彼得·曾格案件中，费城德高望众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以其杰出的雄辩口才指出，美国印刷人员有权利刊登揭露强权专制行径的消息，他们具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对于殖民地的社会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曾格是一个德国移民，中小印刷主，由于刊登了批评皇家总督的消息而被指控犯下煽动诽谤罪，在开庭审判他时，汉密尔顿强烈要求陪审团释放曾格。他在辩护结束时，慷慨激昂，声音宏亮，他的声音久久回荡于人世间。他说：

> 你们的正直行为不仅赢得 你们同胞的爱戴和尊敬，而且将 为每一个宁要自由、不要过奴役 生活的人所赞美和钦佩， 因为正是你们挫败了暴政的企图； 你们公平廉正的裁决奠定了一个崇高 的基础，保证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还有我们的邻舍所应该享有的那样东西，那造物主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自由——也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至少在世界的这些地区）实行专横强权的自由。

最后，曾格获得无罪裁决。自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这是作为正当抵抗诽谤罪名、发表在报刊上以文字说明真相而得到承认的第一个案件。尽管如此，曾格案例在当时还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半

相还需准备入狱坐牢。然而，种子毕竟播入泥土，激动人心的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场激动人心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在世界各地结束。

当然，我们不清楚汉密尔顿所说的"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横强权的自由"究竟有多大的范围。对于那些汉密尔顿确信是胡说八道的人来讲，这种权利就很可能遭到否定，正象米尔顿对他认为天主教在宣扬谬误时实行审查一样。总之，一旦将之运用于"世界其他地区"，汉密尔顿自身的言辞就会限制这种权利。爱国与排外就成了最早反映出版自由的一个内容，至今仍然如此。事实上，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绝对的言论自由。

此后年间，曾格案件引起了最广泛的争论，但它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由于印刷文字的自由表述而引起的第一次突出的争端。随着刊登人们意见的印刷媒介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日益普及之后，人类运用新的媒介物来维护自己发表意见的本能冲动也同样不断积聚。在曾格那些文章发表前的15年间，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就开始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今天已司空见惯的激烈论战。每当有权势人物牵扯于内——甚至可以说尤其当他们也被卷入争端时，报上就更加喜欢进行论战。《新英格兰报》于1721年创刊，由一群对在马萨诸塞居主宰地位的强大的加尔文教徒不屑一顾的人领导这张报纸。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兄长詹姆斯(当时本杰明还是他的学徒工)在内的这伙人大胆至极，竟蔑视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父子俩[①]并对他们赞成的减轻天花肆虐的接种方法提出了挑战，于是，引发了一场纷争。富兰克林的同伴约翰·切克利和威廉·道格拉斯在报上痛斥马瑟父子和接种计划，这样一来，《新英格兰报》就遭到整个波士顿殖民当局的猛烈抨击，这家报纸最终被迫偃旗息鼓，但它在当时为民主假设中要求美国报纸发个世纪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他人为了写下他们感知到的真

① 马瑟父子系当时马萨诸塞教会的首领人物。——译注

挥公开批评的作用奠定了基础。1721年的时候，在公开的印刷文字上抨击教会首领几乎还不能想象，但是，在回答马瑟父子的反驳时，富兰克林这样写道：

在宗教争论中，没有人比教会牧师自身更频繁地刊登同样的经文来攻击教义的了。因此，他们根本不能指责某人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左意见，几乎不能设想任何人会通过反对一名牧师不恰当的活动而阻挠这个牧师取得成就……即使把错误公布于众并随后当众揭露，也比私下盛传（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对教会或国家的制度造成的危害要小。因此，咒骂一个印刷人员刊登与众不同的见解无异于缺乏理智的不道德行为。

富兰克林指出，自由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争论必须公布于众；从根本上来说，真理与谬误的冲突过程应该在印刷媒介上公平地展开。虽然反映20世纪新闻事业特征的比喻是一个经济术语，即市场，而18世纪则是宗教性的，强调善和恶。但是从詹姆斯·富兰克林（附带说一句，他似乎并没有留下其他什么值得回味的作品）到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均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在美国历史上，詹姆斯·富兰克林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美国新闻事业的记载总是设法在报业名人祠里给他安排一个小小的适当位置。因为他毕竟蒙受了波士顿当局的指责，短时期的被捕入狱而丢失了工作良机，最后他被流放到普罗维登斯，在那里他试图重振旗鼓，再展波士顿的宏图，但是未能成功。

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同于他的兄长，他在新闻名人祠里占据了第一等的英雄席位，事实上，本杰明·富克兰林的言论在新闻事业早期神话年代里或许是被当时美国新闻人员称道得最响亮的。当然，应该恰当地指出本杰明·富克兰林远不止是一个作家或新闻工作者，他还是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商人。在波士顿，本杰明掌握了一些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重要法宝。他认为一个记者应当象他的兄长和同伴所做的那样，撰文批评政治、经济和宗教界的权力人物，但是如果他笔头稍微不慎，那么这种批评就会使他遭致流放、监禁、负债，甚至破产。所以富兰克林决

心使他的报纸在制度许可之内，为赢利而经营，谨慎地开展批评，不逾越权贵们所能容忍的限度。经过这样的一番努力，开始了他的无量前程：进入政界并因此被抬到一个美国新闻工作者所能享有的最受崇敬的席位上面。事实上，今天人们想起富兰克林的时候，几乎不再把他视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是把他视为创业先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第一个断言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提出了"真理的价格"问题，虽然他的措辞并不十分贴切，但他对触及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中存在的根本的两难困境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主要症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弊端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赢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前者带有大量宗教象征的意味，后者显然没有。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则对追逐商业赢利并不感到脸红。

富兰克林在他接办《宾夕法尼亚公报》后的第一期发表的个人声明里，在他的著名的《为印刷商辩护》一文中，象其兄一样，赞成对争论各方都予以报道的新闻伦理观，让读者自己决定对真理与谬误的取舍。富兰克林也注意到，假如他提供煽情性消息的话，还会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他认为不能自甘堕落，降低到最低的粗俗标准。他把办好报纸的要求强烈地寄托在编辑身上，这点与新闻信条所主张的每个自觉的新闻工作者负有重大责任的观点吻合一致。然而，作为商人的富兰克林进一步告诉读者他的报纸摒弃见长枯燥的东西，而是按照"……人的天性……要求的那样，提供愉快有益的娱乐享受"。他还指出，富兰克林的报纸不仅要为争论的各方服务，而且还应该优厚地酬劳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尽管真理是最崇高的召唤，但富兰克林仍然避免"刊登通常会触犯教会和政府的那类事情"。因为他不想效仿其兄入狱坐牢，所以并不直接抨击宾夕法尼亚当局。他也并未狂热地致力于实现伟大的原则，对富兰克林而言，出版自由无疑具有明显的限制。他无意发。起一场挑战去突破这些限制，进而导致同官员们的对抗。

如同《加图通信》的作者托马斯·戈登一样，富兰克林后来也进入官场，生活在他所拥护的权力基础中。事实上，富兰克林后来放弃了他的新闻工作者职业——热衷于政治家的职业，再也不是作为权势的批评家去高声呐喊了。毫无疑问，富兰克林笃信他也作为其中一分子的那个政治制度的正义美德，不愿挺身出来对该制度进行抨击。但是，人们也许可能想象得到，一旦有人就这些问题去问这位精明睿智、条分缕析的富兰克林，他也可能亲口承认，在殖民地时期发现一种消息能在其间自由流通的制度比寻找一名不愿掏钱做买卖的傻瓜还难。

多余的45字①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体现了一种革命思想，两百多年来，它使男男女女们坚信：除非自由含有表达意见之权（不论这种意见如何不受欢迎、令人憎恶或具有煽动性），否则便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它召唤着人们铲除实现这种自由的障碍。在这个进程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宣言超过任何一个新兴共和国宣布的主义，它在世界各地受到最广泛的拥戴。它为两个世纪来的每一次革命运动播火加薪。极而言之，恐怕连那些多余的45字的起草者们也不曾会想到他们起草的宣言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在维护言论自由这项权利时，毕竟毫无新的内容可言。后来所产生的

① 45字系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45个英文词，译成汉语的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译注

新东西只是宣言得到了广泛传播，以及普遍的奉承之风。

有关新闻媒介的伟大法典收录在第一修正案里，它用粗略、笼统、易于误解的词句宣告："国会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些语言主要出自詹姆斯·麦迪逊之笔，当时他在第一届国会中的工作是分析各州提出的成打议案以便将它们吸收进人权法案中。为了赢得1787年宪法获得批准，这些宪法制订者发现有必要通过一部正式的法案，使它成为一部不仅珍藏英国《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而且还荟萃18世纪充满睿智思想的建设性的法律条文。麦迪逊在最初草稿中关于新闻出版部分仿照了他自己的弗吉尼亚州宪法的提法，他起草的联邦人权法案的第三条是保证实行信教自由，第四条则宣布：

人民表达、书写或出版他们意见之权利不得遭到剥夺或损害；作为自由的巨大保障之一的出版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对草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麦迪逊准备把12条修正案送交各州。此后，国会批准了所有的12条并将之拿到各州进行审议，结果第一、第二条有关选举众议员的人数比例和国会议员在选举期间的薪俸不应改变的修正案没有被各州通过。第三条，也就是现在合并在一块的宗教自由、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以及为了调整不满而有权和平集会，获得了批准并构成了第一修正案。虽然后来的一些法学家认为这个修正案超出其他法案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十条修正法案中的第一条，但是，现在所定下的第一条实际上就是麦迪逊最初草案中的第三条。鉴于麦迪逊深深忧虑于当时13个殖民地中间存在的"宗派纷争"，我们可以假设他已经察觉到了作为一个工具的新闻媒介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被相互冲突的的派系所利用，这样就不会产生独裁政权。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文章中①，麦迪逊反复强调了热衷于党争的危险。他

① 《联邦党人》文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后，要由13个州的代表会议分别批准。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宪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象英国《权利法案》作者及十七八世纪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时刻警惕任何多数人掀起的党争可能造成的失控后果。麦迪逊写道，民主制度之所以往往夭折和狂暴，原因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或利益”在那里被大多数人所感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制止大多数人兴起的宗派活动如此之多。麦迪逊坚决认为，解决的方法在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那里，各种各样的宗派的存在有助于互相制约权力的滥用。最重要的宗派手段之一必定是新闻媒介，因此，报纸、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越多越好。他写道：

把范围扩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减少；换言之，即使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地采取行动。

几乎没有人比麦迪逊更迫切地维护民主假设中新闻媒介的中心地位了。在接受《人权法案》7年内，由于面临同法国开战的威胁，促使约翰·亚当斯总统确保国会通过了《惩治叛乱法》，此法对新闻工作者书写的东西可以加上诬蔑国家政治领导人的罪名，并用监禁进行恐吓。麦迪逊在充分意识到污辱漫骂和煽情报道将会引起报业胡作非为这一情况下，为了回击《惩治叛乱法》，他铿锵有力地论述了出版自由的重要意义：

凡事在恰当运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包容一定程度上的滥用，这种情形用以说明报纸最为确凿，因此，各州通过实践认定，在生长繁茂的果树上留有一些病枝害叶比一刀剪除它们对结出鲜美果实所造成的伤害来得更小。对于那些向新闻界明亮这一策略的人来说，这一策略所显示的智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它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无不是理性和人道压倒谬误和抑制它的结果。对于那些向同样的仁慈的消息提供明亮这一策略的人来说，这一策略的智慧同样不容怀疑，因为正是由于美国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使之走向了自由和独立国家的行列，并使其

因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联邦党人》便是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为争取新宪法批准在纽约报刊上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汇集。——译注

政治制度给人民带来吉祥如意和幸福美满。

麦迪逊提出的论点非同小可，对于我们后面考察新闻工作者、报界批评家、学者和平民百姓所理解的新闻媒介和新闻自由具有决定意义。民主的假设认为，新闻媒介可能会出现令人讨厌、恣意妄为、耸人听闻、甚至错误百出的现象，但是新闻自由却与美国社会的生存息息相关。当然这种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创业先辈也确实并未如此设想考虑，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而不是绝对主义者。他们甚至根本没想到“客观性”目标，因为在那个时代，新闻界的出版商或编辑还没有把其刊物当作传播善行或真理的工具，也不把它作为仅仅是各种观点的目录排列表。不但美国的创业者们而且包括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期望在大众印刷物中展开公开的讨论。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在公众印刷物上显然什么内容都不该剔除。然而从一开始，实际与理论就不相吻合。

同一个托马斯·杰斐逊，既写下了震撼天地的文字支持出版自由，又谴责新闻工作者是一帮造谣专家；至少有一次他提出应该使这批人为其所刊登的东西去蹲监狱。1787年，杰斐逊在担任美国总统职务数年前时写道：

民意是我们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宁愿选择后者。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这段语录如此动听，以至成了标准的范文被不断地复制出来，高悬于美国各家报社的墙上。但是，很少有几家报纸注意到杰斐逊数年后写下的另外一些文字。1803年，当时杰斐逊已担任总统，联邦党人报刊对他掀起了讽刺漫骂的围攻浪潮。这时，他又写道：

托利党人的报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甚至连闭目塞听者也对之一无所信。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况，假如可能的话，应当恢复报刊的信誉。假如致力去做，国家法律规定的限制足可以做到这点。因此，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对一些突出的冒犯者提出控告将有助于报刊诚实的恢复，

显而易见，第一修正案的革命精髓并没有完全被先辈中这位最著名的鼓吹自由的英雄所接受，至少在他权力达到顶峰时是这样的。对总统杰斐逊来说，报纸过度自由会造成“一种危险的情况”。他还认为，“客观性”即公正地提供某个争端的各方面，以便在一种“理性竞赛”中使真理获胜的新闻价值，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限制。那时，在第一修正案里有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组织的思想，所以杰斐逊一直认为联邦党人的报刊不能充当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人民群众接受了他确认的托利党报纸谎言的宣传之后，正陷入堕落的危险之中。

杰斐逊为难地发现，他所抽象保证的彻底的新闻自由同他认为必须在新兴国家中建设一种社会的实际想法发生了危险的冲突。两个世纪之后，非洲新兴国家鼓吹自由的思想家所面临的难题，竟如此明显地和当年杰斐逊的遭遇相类似，这就是当今的两难困境！然而，不管第一修正案的革命思想怎样不切实际，它还是成为当今世界制订实际政策的一般强大力量。不过，政府部门的自由鼓吹者仍旧感到这种革命思想不合时宜。人们必须牢记第一修正案的起草人均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自身就对民主政府可能走向极端而心存恐惧，他们认为百姓大众目不识丁、教养粗俗、智力低下，无法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与其说他们把一个普通人设想为权力的参与者，还不如说将其看作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地位、成为智力优等人的消费伙伴。依据他们的观点，新闻媒介的使命就是保证读者大众这一方完成合伙任务。如果它背离了这个目标，正象杰斐逊所说的那样，就会引起“一种危险的情况”。

对于那些赞同杰斐逊思想的报纸来说，那个革命宣言几乎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毕竟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写作并以此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自身也加入其间的政治进程的明智举动；另一方面，对于托利党人的报刊而言，支持杰斐逊的思想无异于社会的垮台，所以托利党人很大程度上打着言论自由的大旗推行他们的政治目标。事实上，整个新闻界都赞成这个革命的思想，不同

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言论自由所做的解释各不相同。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米尔顿也碰到类似的两难困境，他既拥护克伦威尔新教徒的言论自由，又支持对保王的天主教徒实行书报检查。因为按照米尔顿的看法，那些天主教徒的思想具有危险。直到今天，这种奇异的两难困境仍然存在，未能解决。

换一个角度讲，这些创业先辈期待新闻媒介能为他们的政治事业竭尽全力。那时的报纸代表社会精英发言讲话并让他们阅读浏览，因为那时的一份报纸要价六分，那些经常阅读书籍、小册子和报刊的人钱财都很充裕，支付这笔费用根本不成问题。因此，报纸表达精英们的思想主张便不足为奇。如果这些出版物被大众阅读，那么，可以设想他们必将受到新闻媒介所支持的那些主张和政治原则的影响。这样一来，新闻媒介就被视作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是改善并有益于社会的一个机构。

公正与爱的法律

在杰弗逊以及他的弗吉尼亚同乡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担任总统期间，法国大革命所激起的民主政府的伟大实验经历了荣辱盛衰，紧接着便是短暂的拿破仑帝国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法国各党派注视着第一修正案在世界上掀起的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运动的发展情况，在出版自由问题上展开了殊死搏斗。这种斗争在各方面都与英国的米尔顿和美国的杰斐逊所碰到的问题极为相象，即作为有益于社会的新闻自由的哲学抽象概念，如何使它在似乎有损于法律尊严的时候能被实际所接受？（当纳粹的报刊叫嚣要推翻政府时，这个问题同样折磨过立宪制的德国）。对此，让·巴蒂斯特·德·维莱尔（体弱多病的路易十八后来授予了他首相之权）作出了回答，他在1822年通过的《倾向法》中采取了一个措施，该措施与布莱克斯通在1769年《英国法释义》中提出的"有害倾向"的准则相仿（即"……对于一种有害倾向的任何危险或攻击性的写作所施行的惩罚是保持和平和良好秩序或政府及宗教之必

须，是保证公民自由的唯一坚固的基石所在……”）。此后，这种解释在1917年美国最高法院中取得了官方的地位。对于维莱尔来说，如果他不能说服其政治对手，即如他所说的“堵住他们嘴巴”的话，那么对于反对派报纸刊登的有关阻挠他立法计划或对王位统治继承权提出挑战之类的文章施以惩罚就成为必需。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其弟阿图瓦伯爵即位，为查理十世。维莱尔仍然担任首相，查理十世将绝大部分的政治决策大权交给他掌管。

但是，维莱尔的限制性法令未能奏效，不仅遭致反对派报刊的批评，而且也受到保王党报纸以及左的和右的政治敌手的非难，于是他便公开收买报纸，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这种行径并非异乎寻常。事实上，路易和查理在英国收买下的报纸要比在自己国内更好一些。一个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写道，伦敦三家主要刊物的通讯员就足以构成法国治安大臣的职务。只是到了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反保王党的力量才得到了杰斐逊老朋友马奎斯·德·拉法埃脱[1]对一个称之为“出版自由之友”的团体所提供的财源，因为这个组织策划政变以推翻国王。虽然后来密谋泄露，头领被抓，但由于拉法埃脱年事已高且退休隐居，故并未受到侵扰。正在蒙蒂塞洛安度晚年的杰斐逊听到试图对法国报刊施行检查的消息之后，提笔给拉法埃脱写下又一篇支持出版自由的激动人心的宣言。他提出，为了保持政府诚实与仁慈，“唯一可靠的就是出版自由，一旦允许自由表达，舆论的力量便不可抗拒。”这封信写于1823年，然而，仅仅在此一年之前，杰斐逊写信给拉法埃脱，对美国报刊的评价一落千丈，以至于他说他只阅读《里士满考察家报》，其它任何报纸都不可信。杰斐逊从来未能解决他对报刊的爱憎问题；同样，他也未能在言论自由和国家利益的选择中摆脱他的两难困境。

---

① 马奎斯·德·拉法埃脱(1757—1834)法国将军、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曾率领法军援助美国。——译注

在法国，尽管存在着《倾向法》，但报刊反对法国入侵西班牙的言论却引起了当局的批评。维莱尔甚至采纳更严厉的提案作为答复，它是由保守派首领、治安大臣查尔斯·伊格内斯·德·佩罗内伯爵于1826年12月在下院提出的。这个提案的措施对于君主政体来说，无异于一个最不幸的验证。人们批评佩罗内提出的这个措施，反对者称之为一个毁灭报刊的计划。但佩罗内振振有词地答复道：这是"一个公正与爱的法律"的表述。于是，它以带有典型高卢式的讽刺获得了命名。在反对这个议案的敌人中间，不仅有司汤达、夏多布列昂[①]和本杰明·贡斯当[②]，而且还包括声誉卓著的法兰西学院（该学院向来不介入任何纯粹的政治事务）。实际上，这个"公正与爱的法律"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法律，最终，它却大大加速了查理的倒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的结局。此外，这个法案的提出还引起了公众对有史以来有关新闻媒介本质以及它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作用问题的最为广泛的讨论。

在当时整整一个月里，下院几乎全神贯注于这场讨论，并且它还左右了法国首都的公众生活，这种情形近乎空前绝后。78个议员在辩论中发了言，其中32人赞成这个"公正与爱的法律"，46人则表示反对。这些发言不仅吸引了巴黎14家政治日刊的注意（其中只有两家支持法案），而且更引起广大公众的关心。满怀激情的人群每天聚集在议会外面嘲笑讽刺那些议员，并对那个强行征收所有印刷品印花税以及要求所有政治性稿件经由政府检查官审查批准的法案发狂积愤。

在反对公正与爱的法律的发言中，自由派的知识界首领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③]的演说倍受称誉，博得众采，他是法国历史上最具天才的雄辩家之一。在充满政治性的气氛中，他

---

① 夏多布列昂(1768—1848) 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② 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③ 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1763.6—1845.9) 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路易十八时期曾任新闻出版总监。——译注

的演说名扬四海，据说印成文字后的发行量竟达100万份。夸张一点说，鲁瓦耶—科拉尔的言辞足以使全国的神经瘫颤休克。100年之后，纪尧姆·德·贝蒂埃·德·萨维尼在文章中断定这篇演说是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雄辩辞之一"。鲁瓦耶—科拉尔在演说中用冷嘲热讽的语调宣称"这个法案试图去更正上帝犯下的错误，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初便准许人们逃离理智和自由，进入那邪恶与谬误丛生的尘世间。"当鲁瓦耶-科拉尔挖苦这个法案最终是要把人类"抬举到快乐无知的牲畜地步"时，下院肯定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指出，阻止人民在报上对专制暴政进行口诛笔伐的企图永远不能奏效，除非所有的工业，所有的农业、所有的交通运输、所有的活动都与书籍、小册子、报纸同归于尽，否则的话，镇压决不会成功。他用奚落的口吻对保王党人说道："如果你们手中的犁耙不能埋葬所有的文明，你们便无法征服我们。"

治安大臣佩罗内对此作出的答复别出心裁。他说，报刊无端地遭到攻击，按照否定论的观点，所有的社会机构统统都该销毁。他认为这种"为了自己私利而大兴问罪的行径无法容忍。"当人民愿意之际，一家报纸如果只是刊登他们痛苦不幸的文章，并指使公众违抗法律，政府对此怎能加以宽容？佩罗内声言，政府决不会允许国家的敌人畅所欲言，为所欲为。

有趣的是，自由论者托马斯·杰斐逊的讲话被那些站在书报检查官立场上的人摘引。杰斐逊逝世的1826年，这场争论刚开始不久，有人拿出了多年前他就任总统时写下的一封信，信中抨击了一些报刊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行径。有人引用此信来支持公正正与爱的法律所提出的限制。拉法埃脱惊愕地写信给麦迪逊询问关于杰斐逊的报道言辞是否真实可靠，麦迪逊沮丧地回复说确实如此，但又说这些言辞不能代表杰斐逊的真正信念。要了解引用杰斐逊的讲话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已不可能，但这并不会妨碍书报检查官的良苦用心，因为杰斐逊在法国深受推崇。总之，那个法案最后被下院以233票对134票批准通过。

然而，这是一次比鲁斯式的胜利[1]，因为公众不满的怒吼此起彼伏，贵族院（是他们将这个措施交付下院通过的）竟然允许法律草案不经投票就宣布失效。当贵族院休会之后，气急败坏的维莱尔当即发布命令，强行对法国的报刊进行检查。反对者纷纷上街示威抗议，紧接着六个月之后的大选中，保王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维莱尔于1828年辞职，查理本人也在1830年革命爆发两天之后，从权力宝座上跌落下来。佩罗内对此有着先见之明，他认为除非牵制报刊，否则此事必定发生。查理和他的首相朱尔·阿尔芒·德·波利尼亚克亲王把越来越多的束缚套在报刊、农民以及新兴的工商阶级身上，这就必然会加速他们末日的来临。后来佩罗内和波利尼亚克锒铛入狱，查理则被迫弃位流亡。

历史学家认为，在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过程中，报刊不仅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总的说来还尽了责任。例如A·J·塔德斯奇指出自由派报刊是"革命的首要发动者"。丹尼尔·雷德写的《新闻记者与法国六月革命》是英国那段时期里唯一成熟地探讨这个问题的一本书，他在书中认为报刊不仅在推翻王朝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且还指引着"历史现实"的方向。英国和法国的新闻工作者自豪地宣扬他们的权力，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肩上披上了捍卫自由勇士、滥用权力天敌的外罩。在另一个时间和场合，新闻媒介又会披上一件相似的外罩并且断言正是新闻媒介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拉下了马，将他的主要助手关进监狱，使他本人辞职下台。

以上这两种解释的含义说明：新闻媒介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一直成功地同根深蒂固的工业和政治势力的强权相抗衡。毋庸置疑，新闻媒介在1830年法国和1974年华盛顿的权力争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仅仅是一种因素而已，有些新闻媒介的确在两

---

[1] 比鲁斯式的胜利意为付出极大的牺牲而得到的胜利。比鲁斯系古希腊伊皮鲁斯的国王（公元前318—前272），在公元前280—前279时，打败了罗马军队，但牺牲极大。——译注

种场合中既站在老牌强权一边，又站在革命者一边。因此我们不妨更准确地说新闻媒介参与了权力斗争，革命的新闻媒介（它们是由商人、工匠、日益壮大的中层阶级以及他们在法庭、国会里有权有势的盟友提供经费、促进发展的）帮助了起义大业。戴维·平克尼指出，由于雷德把1830年波旁王朝垮台的原因集中归结于一个因素，因此，他对报刊作用的论断显得夸大其辞。平克尼注意到：革命所具有的“更为基本的根源”起始于查理疏远了下院的代表、未能奖赏有功的政治家等等，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推行抑制性税收的经济措施，当生活费用直线上升之时，它使商人农民感到了生存的威胁。

平克尼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法国历史进程在波旁复辟末期“很大程度上是否受新闻工作者的支配？”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新闻工作者在那场起义中所具有的特定影响无可非议。但是，他进一步补充道，无条件的肯定只会使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变得过于简单化。他指出，实际上如果没有新闻工作者，革命也照样会爆发（虽然不一定在1830年），这个结论用于分析1974年尼克松的倒台也同样适宜。

历史学家、主要是新闻工作者自身，在普遍承认新闻媒介的威力同时，口口声声地宣称正是新闻媒介推翻了查理十世与理查德·尼克松。当然，并没有人会否认1830年和1974年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以及他们对祛恶匡正负有的声誉。但是，历史学家常常被新闻界的解释所左右，有时只是在很窄的范围内阐述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们感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解释事件的“原因”。严肃清醒的深思熟虑使我们认识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查理十世和理查德·尼克松的敌人依据自己的权利变得强大有力，并且由于这两位首脑竭力公然反对第一修正案的革命思想，因而显然要遭到大多数新闻媒介的反对。于是，新闻工作者必定会充当反对派政治力量的自愿的同盟军。

查理倒台的三年之后，大西洋那边的纽约市发生了一件大事，它的悄然来临促使新闻媒介在社会事务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它的冲击力非同小可，远远超过了下院代表或革命巴黎之街的戏剧性场面。这一事件就是：首次出现了一份售价低廉的报纸，使全体人民实际上都能购买，它预示着“大众媒介”时代的诞生，并使有关新闻媒介的信念遍布世界天涯海角。

第 三 章

商业报刊，1833—1917：赢利的机构

山巅上的圣城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报刊是传播信息的一种工具，尽管它对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心中无数，不甚了了。在美国早期的报刊中，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信息：（1）宣扬宗教教义；（2）告知商业市场；（3）劝说读者接受某一种政治主张；（4）普及教育。虽然报刊的编辑人员与消费者都确信报刊的目的是提供信息，但那时人们（更甚于现在）对究竟什么是信息却茫然无知。19世纪识字人数的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市场的增加都使新闻编辑人员与消费者对新闻媒介有更大的期望，报刊的商业和政治作用日趋突出。于是，早期报刊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至少就大众化报刊而言，几乎荡然无存。当四面八方的人们谈及报刊是一个教育工具时，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业政治信息的传递紧密相联。

确定日期是理解历史演变的有益方法，但是必须防止形而上学的做法，因为历史发展的开端几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不过，我们为方便起见，不妨把1833年9月3日这一天定为大众媒介的起始日子。这一天，书版商本杰明·戴创办了一张日报：《纽约太阳报》，获得了很大成功，它的售价如此低廉，以至于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能为这个城市里的任何人所购买。报纸售价只有

一分钱，从此就开创了众所周知的"便士报"时代。戴对他的办报意图直言不讳，他告诉读者《太阳报》力争"照耀普世民众"。他们推断无懈可击：一张纽约报纸的普通售价为六分钱，只有殷实富裕者才有能力购买，因此戴认为，只要降低报价，他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并通过发行量来增加赢利。从经济受益角度推导出来的这个思想在20世纪已被人们认清。于是，戴的便士报大获全胜，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期望，发行量剧烈上升，达到了当时难以想象的程度。不久之后，纽约市的报业竞争者为了与之匹敌，被迫把各自的报价降到一个便士。其他地方上的报纸也纷纷追随这股潮流，于是售价竞争第一次进入报业领域。迅速改善的印刷技术降低了报纸的成本，这样，在新闻栏里就可以增加更多的版面刊登消息，并增加广告的内容。

这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快速致富的时代。广告业与报业并驾齐驱，同步增长，突飞猛进的发展促使两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惊人地汇集溶合，这种汇合恐怕在历史的记载中绝无仅有。

最重大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自身，它于18世纪在英国发端，很快席卷欧洲并进入美洲殖民地。机器的迅速更新换代不仅能使工业不断增长，而且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贸易范围的扩大，以及新兴的现代运输业的发展。乡村农夫和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次有可能迁居各地。大批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促使大西洋沿岸城镇发展成为初期的都市中心，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纽约市。随着识字率的上升，日益增多的人能够阅读并竭力要求获得信息。总之，人们应当牢记大众媒介是与都市中心同步发展的。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难解难分：没有都市中心，大众媒介不可能产生；同样，没有大众媒介，都市中心的发展恐怕也不会成功。

此外，伴随科学、工业、商业、运输及大众媒介在世界上的变化，政治格局经历了重大的更迭。美洲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创建后头半个世纪的领导成员均出自社会上的名流。最初的六位总统都是沿海岸的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达官贵人。然而，就在

本杰明便士报问世之前的四年，这种由社会文化权贵之士统治政治舞台的状况有了彻底的改观，而且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永久地改变了它的面貌。美国大众选举了安德鲁·杰克逊担任总统并把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的政治权力移交给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杰克逊、范布伦及其他们后继者手中。总之，经纪人取代了土豪乡绅；"民主党人"撵走了"达官贵人"。

在这两个词上打上引号是为了强调说明：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并不比杰斐逊的达官贵人更民主，或许更不如一些。然而，历史学家对此宽大为怀，居然接受了他们的这种解释，并接受了他们成功地强加于大众的思想体系。杰克逊及其追随者，尤其是那两位主宰杰克逊"厨房内阁"①的新闻记者②都充分认识到一条虚伪而简单的政治真理：倘若一个社会的男性几乎都有普选权的话，那就必定存在着"普通人"大大超过"高贵者"的情况。正象戴吸取数量重要性的教训一样，杰克逊也做到了这一点。惟有人数众多才能赢得选举，那么，既然普通人的数量多于高贵者，要赢得一次选举归根结蒂必须要赢得普通人。杰克逊毫不谦逊地展示出他以及他的代言人为之定下的各种解释的"普通人时代"和"民主的时代"。1829年，杰克逊的民主党彻底击败了约翰·昆西·亚当斯③的支持者，其中许多人系联邦党④的遗老遗少，由于亚当斯的失利，杰克逊赢得了56%民众的选票，联邦党人作为一个党派从此消失。替代他们的辉格党人⑤从来未能毁坏民主党为普通人谋福利的形象。直至最有能耐的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继杰克逊之后在美国崛起，民主党人遭到失败才成为可能之事。

---

① 厨房内阁指总统私人智囊团，从杰克逊任总统时首创。——译注

② 新闻记者指阿莫斯·肯德尔和弗朗西斯·布莱尔。——译注

③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7—1848.2）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译注

④ 联邦党系美国早期的全国性政党，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联邦党人一名始于1787年，指新宪法的拥护者。

⑤ 辉格党系美国共和党的前身。——译注

"浣熊皮①般的民主"时代过去了，绊倒在一位出身于茅屋的极其"平凡"的人的政治感召力之下。当时，辉格党也已消亡，从此，为了争取获得人所皆知的民主斗士之权，共和党人开始向民主党人发起了挑战。

然而，现实情况却与杰克逊一伙和林肯一伙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相去甚远。权力一如既往地仍然落入名流之手，只是名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汇合问题，这种汇合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而且还扩展到拉丁美洲、欧洲及东方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普通人的意识形态，是民主主义者的形态。当然，它与30多年前法国革命家所设想的民主主义者形象大相径庭。在罗伯斯庇尔及其同胞的理想眼光里，美国的所谓"民主人士"纯属徒有虚名，毫无博爱之感。事实上，这种人就是一个早期的资本家，一个幻想"自力更生、发财升官"以挤进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一个摒弃博爱思想却醉心于平等思想的人。杰克逊派宣称他们要实行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人人相互平等，即使社会条件较优者也不例外。于是，美国社会的那种土地广袤，机会无限的美满前景之梦幻便能够成为现实，在当时充满阶级压迫的欧洲社会中，美国被视为"一块充满无限良机之地，"这种看法至今仍在许多国家盛行。几百万移民在19世纪涌入美国，给美国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活力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有人可能要据此说明新兴大众媒介的作者编辑都是美国之梦的"先驱者"，他们处处传播平等与机会的讯息。在这些媒介巨头中有诸如詹姆斯·戈登·班内特②和普利策那样身无分文起家发迹的欧洲人以及一些主要的政论家们。

然而，事实与梦幻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杰克逊任总统期

① 英语浣熊皮"Coonskin"在这里有虚伪狡猾之意。——译注

② 詹姆斯·戈登·班内特(1795—1872)便士报时期著名报人，以创办《纽约先驱报》著称。——译注

间，美国各个城市中出现了严重经济衰退的现象，① 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城市弥漫着欧洲人已逐渐适应后的绝望悲观情绪。因此，社会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政界和新闻界传播带有乐观主义调子的消息。由于他们也笃信平等博爱之梦，所以这些消息都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没有弄虚作假。肯塔基州的新闻记者阿莫斯·肯德尔（此人是杰克逊"厨房内阁"主要谋士之一）是做这种宣传工作的重要人物，他担任过杰克逊及其继任马丁·范布伦手下的邮政总长。正是这个肯德尔，阐述了杰克逊著名的否决合众国银行特许证延长法案② 的理由。由于他用震撼人心的言辞激烈地反对银行家和其他剥削者的罪恶，才确保了杰克逊充当普通人利益维护者的美名。而对于肯德尔这位从肯塔基凄凉多岩牧区的贫苦农夫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捍卫普通人的利益谴责金融权贵势力并非什么难事。1831年，肯德尔在忙于其它事务时，编辑出版了华盛顿的《国会环球报》，他在报上写道："那些创造所有财富的人，自己却一贫如洗。他们看到四周围一块块土地绵延伸展，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就是没有意识到全部花费都出自于他们自己的纳税。"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另一种场合下，肯德尔作为塞缪尔·莫尔斯同伙人，将莫尔斯发明的电报推广到全国各地，由此财运亨通，成了富豪。有些人称肯德尔为国内第一个成功的公共关系之代理人；不管此话是否可靠，在一长串发财致富的新闻记者当中，肯德尔绝对榜上有名。更可悲的是，肯德尔居然能够找到正当理由去压制他所确认对公众有害的"新闻"。作为废奴论者的对头，肯德尔在任邮政总长期间，成功地使其对头的宣传品从联邦邮件中消逝绝迹。

历史学家对杰克逊时代的评价见仁见智、分歧很大，但毋庸

---

① 指1837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译注

② 指1932年杰克逊连任前否决国会通过的延长合众国银行特许证法案，这次否决给杰克逊带来"反银行斗争"的声誉，当时影响很大。——译注

置疑，杰克逊迎合了民族主义冲动的欲望，因而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拥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杰克逊时代滋生繁衍，从此，它在美国历史中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新闻媒介从杰克逊掌权开始便成为实现扩张主义欲望的强大机构，对此，人们并不感到惊讶；它导致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开战，得到了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还间接地导致了内战，接着又购买了阿拉斯加，一直到19世纪末发动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西班牙那里夺得古巴和菲律宾群岛。总之，美国的新闻媒介在所有这些冒险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求扩张的主张并非什么新东西，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始于美国人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最为牢固的观念，即上帝将一项特殊的使命授予了这个国家幸运的百姓，要他们领导世界各民族在必然产生的民族自决中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这个主张最初萌发于约翰·温思罗普铿锵有力的言辞表达之中，他是“五月花”号轮船登陆的十年期间马萨诸塞殖民地最负盛名的总督。温思罗普声称：“我们要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圣城，让举世仰望。”一个半世纪以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2年高度赞赏了温思罗普的这个比喻，他指出：

在美国缔造自由不仅能使人民幸福，而且有助于减轻在暴政统治下呻吟挣扎的世界人民的痛苦，它将通过更为周密、更为便利的途径发挥这一作用。

佛雷德里克·默克认为这种使命感恰好表达了“民族精神”的真正含义。然而，当林肯总统号召美国人民向长眠于葛底斯堡公墓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以便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之时，这个理想的无私的使命又一次发现它自身已被赋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换言之，一旦联邦遭到毁灭，人民的政府便将绝迹于世，美国的使命就将夭折失败；到那时，不仅给美国人造成痛苦，而且还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于是，美国人就打着这面正义的大旗向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

以及更晚一些的越南人开火宣战。

为了传播这个“使命之道”，美国的新闻媒介不甘心受到政治家的支配。墨西哥战争时期，美国报刊慷慨激昂，发表了许多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开声明，竭力敦促对墨西哥进行圣战。其中便士报首创者《纽约太阳报》1847年10月22日发表的社论颇具代表性。它指出，墨西哥人的种族“完全习惯于被征服，倘若他们十分清楚我们星条旗的出现会使他们受益匪浅的话，那我们教给他们唯一的新东西就是：我们的胜利将给被征服者带来自由、安全和繁荣。一切为了**解放**，为了尊严——而不是**奴役**和**屈辱**——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波士顿时报》在同一时期发表了类似倾向的社论，它断言“征服”墨西哥（为负责起见，在有关地方打上引号）必定要被看作是一次伟大的造福于被征服者的行动。”这篇社论继续写道：

>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大业，只有当这个民族立誓用至高无上的人性去克服世俗命运进而改造世界时，才能担当起这项使命。

美国强权打着“命定说”① 的旗帜从东到西大举扩张其地理疆域，由山巅圣城一直越过格兰得河② 并开进了别国领土之中。“命定说”一词系新闻记者兼政治活动家约翰·奥唐奈在《民主文摘》杂志上首次提出来的。用默克的话来说，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是使“大陆落后民族获得新生。”“命定说”当务之急的目标是要扩大天职使命的范围，正如凯瑟琳·李·贝特在爱国赞美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其使命是“从海洋一直扩展到阳光地带的海洋。”默克认为“命定说”运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是万众一心赞同民族主义主张的结果，而是普遍接受这种使命感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或许正确，但民族主义作为原因则显然是一种民族使

① 命定说流行于19世纪美国，认为某一民族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译注

② 格兰得河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译注

命感产生的必然后果。使命感所具有的十字军讨伐式的热忱是否决定了1846年墨西哥的命运或稍后其他地方的命运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人民聚集在这面大旗下向疆域南部传播自由的福音。

尽管新闻媒介参与——并且常常领导——人民集结在"命定说"的大旗之下，但不应据此认为它就是"命定说"的缘由或倡导者。在每个相似的场合，新闻媒介都为那些企求发动战争的人充当工具：譬如那些迫切要求把国家棉花种植地带扩大到辽阔肥沃的得克萨斯地区的人，以及那些希望得克萨斯成为又一个蓄奴州以对抗新建州要求加入北方联邦的人。无论何种情况，新闻媒介只是为那些人服务的机构而已。事实上，有一些政界人士以及报纸坚决反对向墨西哥开战。1847年，曾任杰斐逊财政部长的85岁的艾伯特·加勒廷断然认定同时代的征服主张大错特错，并指出"你们的使命是改善世界的状况，"因此，"舍弃先父们开创的崇高事业，用古代政治家和英雄们的政治伦理和野蛮的爱国主义取而代之，实在是荒谬绝伦。"然而加勒廷的观点并不占上峰，一些报纸诸如废奴派的《新英格兰人》报也受到冷遇，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这场战争，指责它不仅"糟蹋了憨实的劳工必须付出的数百万金元"，而且还"使一些人滋生一种炫耀富有的贵族派头，俗不可耐，令人作呕。"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它很难抵御住这个激情沸腾的时代，虽然霍勒士·格里利①本人反对这场战争，但在他的《纽约论坛报》上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他对战斗的结局拍手称道，欣喜欢呼。在这紧急关头，新闻媒介发现自己并没有担负起引导的责任，而是卷入了公众的争吵之中，仅有极个别的编辑挺身而出，敢于违抗众人的意志。

在南北双方敌对情绪日益增大之际，新闻媒介故伎重演。南

① 霍勒士·格里利(1811—1872)便士报时期美国著名的报人，《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译注

部的报刊指责北方的主张与做法，北部报刊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历史学家埃弗里·克雷文将这场在报刊上掀起的敌对战役称作最初的冷战。实际上，从内战结束一直到1877年重建这段时期里，南北双方的报纸经常用煽动性的语句继续维护各自地区的利益。由于征服了北美大陆，人民以及他们的领袖和报刊便把视线从阳光地带的海洋移开，人们开始关注起“安全阀”的主张，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主张，他认为“美国民主”的形成可以用边疆影响加以解释。这种“安全阀”对于那些可能厌恶其居住场所或职业工作因而心怀不满的居民来说永远提供了能够去往它处的诱饵。那时候，霍勒士·格里利提出的著名口号“西进吧，小伙子”遍布各地，响彻四方。由于“西进”的结束以及阳光地带的海洋阻止了进一步的移居需求，“南方”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于是，政治领导人在便士报的后继者——黄色报刊的支持下，掀起了长达十年的鼓噪，最终美国部队开进了古巴，使它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当初作为入侵墨西哥动因的使命感如今又用到了入侵古巴上。而且新闻媒介这次的举动比上次墨西哥冒险中更加无所顾忌。《纽约新闻报》的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2]公然宣称是他一手“提供了（对西班牙的）战争。”[3]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荒唐的自称居然被不少历史学家（当然还有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当成历史真相接受下来，还有什么比得上发动一场国家战争更能表明新闻媒介的独立作用呢？

西进殖民史（尤其是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围剿征伐）如同欧

---

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边疆学派"创始人，提出美国人的性格主要由边疆的条件形成的，环境对移民产生影响的理论。——译注

②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阀 黄色新闻业代表人之一。——译注

③ 据说美西战争前夕，赫斯特派记者雷明顿到古巴，雷从古巴打电报给赫斯特，说那里风平浪静，没有战事，赫立即回电，叫雷留在古巴并指示："你提供图片，我来提供战争。"此语即出于此，但未经可靠证实。——译注

洲白人的领土和经济扩张史一样，残忍之至，令人发指。其暴行被便士报，特别是后来的黄色报刊记录了下来。19世纪90年代，赫斯特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约瑟夫·普利策①每日竞相挑战，拚命报道戏剧性最强的各种暴行，于是他们通过报纸发行量的突飞猛增大发横财。总之，美西战争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赫斯特和普利策则抓住了这个良机。狂妄自大令人吃惊的赫斯特不顾一切地租用了一条货船驶向古巴海岸，船上装有印刷机和排字房；赫斯特本人就在那条船上，并且作为一名记者参加报道，他经常上岸观察战况，有时甚至亲自参战。普利策则派出了包括小说家斯蒂芬·克兰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的记者前去采访，对比，他感到颇为自得。

"黄色"这一称呼不仅用来形容19世纪末耸人听闻的报刊，也同样用来说明当今的情况。它起源于普利策的《世界报》发表的"霍极小巷"连环漫画，里面有一个"黄色幼童"，他个头矮小，衣服染上了一些黄颜色。由便士报开创的"人情味"故事被赫斯特和普利策以及他们追随者推向极端，但形式更加新颖多彩，因为《新闻报》和《世界报》都同样热衷于发动社会运动，以改善许多"普通人"的命运。简而言之，这是煽情性的讨伐战役，或许又称讨伐性的煽情报刊。无论何种情况，其发行量之高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新闻媒介的信条是总体信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被溶入了19世纪人类发展美景的广阔世界中，美景这般昭示人们：前途无量的美国人穿激流攀悬崖登上了一座快乐高原，在那里人人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在那里"美国式的道路"成为"太平富裕之路"的样板被人接受采纳。高原上的每个人（有一些妇女，但并不很多）将受到教育，并获悉远近之事，他们随时准备为了最大

① 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美国著名报人，新闻事业代表人物，普利策奖设立人。——译注

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去参加民主实践。这高原同样也是基督之父所盼望看到的前景，他老人家格外慈祥地重视着他的美国孩子，这位上帝的选民将要带领众人登上那个高原。这就是19世纪进步历史学家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朋友所向往的境界。19世纪是一个无限乐观的年代，大家都相信男子汉（或许还有妇女）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发财致富，最终得到安宁、繁荣的生活。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这种想法虚无缥缈，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个天堂般的伟大高原之梦。但是这信条依然存在，象恐龙或尼安德特尔人[1]古怪的残骸，要么无法生存下去，要么无法克服进化中的障碍而绝迹于世。

不管怎样，19世纪的这种世界观使美国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进步，它于19世纪上半叶普通人获得新闻之时开始，随后在1859年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惊人消息（即人类是进化生物，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传出之后，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世纪后30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获得了狂热的拥护，马克·吐温绝妙地形容那个时期是"镀金时代"，其特征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巨头为了追求财富而展开激烈的吞并竞争。滥觞于杰克逊一伙的民族主义冲动和富有魅力的"命定说"如今已日臻成熟，变为一整套学说，它宣扬财富就是幸福，而美国人的财富则最最幸福。美国各种机构（其中当然包括新闻媒介）的神圣使命就是运用语言和刀剑文武两手传播这个"神圣之道"。进步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而新闻媒介则是它的预示者。新闻史学者似乎易受这种高原病毒的感染，他们用明亮的颜色描绘历史。在富兰克林与格里利，达纳[2]与普利策以及各大报的先驱者这一类名人的历史画布上挥洒重彩，以为提高知识，了解人民就可以把他们带到那座高原上去，这或许是温思

---

① 尼安德特尔人系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其绝灭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名称来源于德国的尼安德特尔峡谷。——译注

② 达纳（1819——1897），美国便士报时期著名报人，《太阳报》在其接办期间享有盛誉。——译注

罗普在新大陆曾经展望过的“山巅圣城”的另一种情景。

正如美国之外的人所认识的那样，这是一幅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景象；腐朽垂死的欧洲帝国早已落伍衰败，甚至可以对之不屑一顾，有待征服的世界就是美洲大陆，必须积聚起19世纪旺盛的精力，朝那座高原的方向进军。于是，这种19世纪的景象便构成了最早的美国新闻史著作的基本框架，《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弗雷德里克·赫德森[①]撰写的一本就是其中的代表作。20世纪的主要新闻史学家威廉·G·布莱耶、弗兰克·莫特、埃德温·埃默里也是以这种角度研究新闻事业史，把它看成是报刊伟人的故事，“媒介中心”(mediocentric)这个词恰当地形容了他们的这种看法。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比它更错误的是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目光短浅，眼睛只盯着他们狭窄的目标而不能自拔。事实上，尽管这种进步的形象自50年代以来就受到了成功的挑战，但在它威信扫地之前却久久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并将继续影响美国人对历史的认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通过了解关于城市与观念的发展，黑人、妇女、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及“进步”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其它团体的情况，进而提出一整套全新的综合思想。赫伯特·古特曼称之为“深奥复杂与简单天真并列的不断进步的‘理论’”。欧洲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弗兰克·爱纽尔指出：“19世纪大部分美国历史完全陷入了人类无法容忍的正统乐观主义的冲天臭气之中。”这种关于新闻媒介发展的简单化观点直到20世纪仍然根深蒂固。

便士报

无疑，人类的本性需要信息。因为人人都想了解有关外界的情况。但对于我们所想知道的究竟是什么，人们却不甚了了。人

① 弗雷德里克·赫德森(1819——1875)，曾任职于《纽约先驱报》30年之久，撰写了第一部综合性的美国新闻史著作，《1690年至1872年的美国新闻史》(1873年)。——译注

们需要信息，但是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信息？便士报创办人得出结论认为一个普通读者所需求的就是刺激和闲言，于是他们给新闻机构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新闻"定义(也许存有疑问)，虽然这个定义并不绝对正确，但却已传遍全球。

考察一下本杰明·戴的《太阳报》创刊号不无启发。戴告诉读者该报的使命就是照耀普世众人，然而《太阳报》的创刊号却把光线照射到无关宏旨的事情上：一个爱尔兰船长的故事，一首题为"八月午夜"的小诗，一段有关区区琐事的趣闻，有关警事法庭的诉讼案件，还有广告以及其他几条小东西。对于里面任何一条内容，读者不用片刻就能看完。它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毫不关心。戴在发刊词里写道，《太阳报》的宗旨"是在每个人都能支付的价钱下，将一天中发生的所有的新闻奉献在公众面前，同时也给刊登广告提供一个便利的工具。"为了提供"所有的新闻"，他在篇幅很小的行栏里塞进了为数众多的条目，其中大多数内容便是后来新闻界众所周知的"人情味故事"。显然，《太阳报》以及随后作为其竞争对手出现的报纸几乎立即拥有了新的读者群体，即实际上被旧有的商业报刊所忽视的工人群众。他们是一些"民主人士"，杰克逊曾迎合过他们的需要，如今他们已在美国的民主实验中产生了公民意识；这是一些城市无产者，如今他们成了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内行取代了外行。总之，人们确信他们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关系重大。便士报作为控制社会的绝妙工具具有多种用途。对于印刷商而言，它是一棵潜在的摇钱树；对于工人阶级读者而言，它是娱乐的源泉，使他们能瞥一眼达官贵人的家私，调剂一下新兴都市中心艰难枯燥的生活；对政治领导人而言，它是一个潜在的宣传工具，可以用来操纵读者效忠于他或者用来反对他的敌人；对工商业企业主而言，它又是一种获取大批潜在买主的手段。1838年，本杰明·戴将《太阳报》卖给了他的内弟，价格达到四万美元；而在他创办这份报纸的时候，几乎白手起家，不名分文。他是大大小小依靠办报发财致富者中的第一人。当这位

20岁的排字工人来到纽约时，他实际上一贫如洗。那些随即仿效戴的报纸模式的人，例如霍勒士·格里利和詹姆斯·戈登·班内特也赚到了惊人的钱财。半个世纪之后的约瑟夫、普利策甚至创造了更有戏剧性的奇迹；1896年创立《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①的情形同样如此。然而，来自匈牙利的移民普利策由于吸收并改造了戴以及他同时代人创立的便士报模式，因而功绩卓著，使早期出版商中没有一人能在声誉和财富上与他媲美。

注重"人情味"并不是美国的一项发明，早在19世纪初，英国的期刊就开始了廉价出版物的试验。这些期刊既有通俗的文学作品又有短小的新闻报道，每份售价一个便士；它的成功主要建立在报道鲍尔街警事法庭犯罪案件的小文章上面。这种犯罪案件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而且也在"新闻"报道中占据关键地位。新英格兰报刊就是以"故事"报纸起家，毫无疑问，生长于康坚狄格的戴早在来到纽约之前就已经对此心领神会。当然纽约其他日报的编辑也深谙这点，但是他们的时机选择不如戴，而且也没有乔治·威斯纳那样的才华，戴在《太阳报》创办不久就雇用了威斯纳作他的报纸编辑。威斯纳文笔犀利，生动活泼，他笔下的世界是用街巷土话、犯罪和闲言组成的世界。威斯纳大胆指责旧式报刊见长唠叨，枯燥无味，并公然拒绝去迎合那些文化精英们的兴趣爱好，于是，旧的商业报刊编辑纷纷对《太阳报》冷嘲热讽，斥之为粗俗、堕落。但时隔不久，这些编辑也认可了这些粗俗化的东西，并且加以采用。

美国初期的报刊中，《纽约晚邮报》的文学色彩最浓，它的主编兼出版商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1829年，布赖恩特掌管了这家报纸时正值杰克逊上台；这张报纸除了有关

① 阿道夫·奥克斯（1858——1935），他在1896年《纽约时报》濒临破产之际设法挽救了它，并使这张报纸逐步变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第一流大报。故有1896年创立之说。——译注

船运消息，商业行情及国会报道之外，几乎没有新闻可言。它也并不想给大众提供什么新闻。布赖恩特挑选了浪漫派诗人兼散文家威廉·莱格特作他的编辑(莱格特的经历已被戈尔·维达尔写入了其历史小说《月晕》之中)。不久，莱格特就撰文坚决支持便士报，因为便士报"为那些穷人百姓传播了知识，使人深感报纸在成为废纸以前已被充分阅读使用。"格莱特多少带有一点儿社会改革家气质，他指出，一个为大众写作的人拥有读者，这些读者的看法并不固定，他们"可塑性强，乐意接受新观念，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写作者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征。"

此后年间，这种思想(即编辑记者具有塑造读者灵魂的巨大能力)一直激励着成千上万名新闻工作者为之尽力，激发了新闻界无数男男女女的年轻人改造社会，参加社会变革的强烈欲望。虽然据历史记载，其中许许多多人确实最后陷入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之中，但是这种思想的火花继续在全世界男男女女的头脑中闪闪发光。正如利奥·罗斯腾在他杰出的《华盛顿记者》研究中挑明的那样："只要扒掉记者的外衣，你就会发现一位改革家。"

那个时候，大众还是文盲，普及教育在美国广泛实行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早在1837年，负责马萨诸塞州教育的长官霍勒斯·曼就宣布了普及教育这条原则。当"被压迫的大众向往自由，"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潮水般地涌到这块充满"无限机会的土地"上以求发财致富之时，大众阶层便急剧膨胀，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有一项估计认为，1821年至1850年之间有250万人移居美国，其中许多人在英国没有受过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定居在众多的城市中心，他们成了第一批美国本土上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便士报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适应新大陆的生活，也可以抬高或贬低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形象，然后这些移民又会依次将这种观念世代相传下去。为了开发西部地区许多移民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西进蓬车行列，结果沿途建起了数千个村庄和城镇。不少大胆进取的印刷商和编辑在那里创办了报纸，刊登有关政治

和经济活动的消息，并且宣扬联盟与社区带来的福音。这种福音传遍整个大陆，响彻一个世纪，不久又在新兴的亚非国家里到处传播。

美国的发展时期是一个激荡的年代。这不仅是移民到来的年代，也不仅是工厂林立以及"普通人"新型政治逐步形成的年代，而且是一个贯穿民主热情精神的浪漫主义的改革年代。多萝西娅·迪克斯开展了帮助罪犯与疯子的活动；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提倡建立一种社区的理想主张——在这种社区中，残疾人、罪犯、智能缺陷者能够避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状况，使他们通过不断的交往变得完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亨利·戴维·索罗以及其他许多人梦想实现他们全盘个人主义的理想，废奴运动后面聚集着一批改革者，其中颇具影响的唯一神教派牧师①西奥多·帕克号召人们进行道德革命(即使它意味着政治叛逆)；沃尔特·惠特曼编织着他的普通人之梦并盼望美国在芸芸众生中能成为一名姣姣者。凡此种种，便士报都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将这些思想主张传遍各地。

杰克逊以及他的谋士大肆颂扬普通人并在普通人身上冠以无穷无尽的美名。这些赞誉之词与19世纪中叶美国改革家同时代人的卡尔·马克思写下的颂扬无产阶级的文章具有惊人相似之处。那时马克思从国外给霍勒士·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撰写稿件。在这股赞扬美国普通人的潮流中，杰克逊的亲密助手，对被封为美国第一位历史学家的乔治·班克罗夫特② 影响最大。他无限推崇普通人的美德与力量，说：

如果说人人心中怀有真理、正义，爱情、美好感情的话，那么其结果

---

① 唯一神教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它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的教义，——译注

② 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 美国历史学家，他对美国的起源和发展写了一部内容广泛的10卷本巨著，因而被称为"美国历史之父"，——译注

必然会是：情趣、政治和宗教上的共同看法将成为人世间的最高准则。

城市激进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掌握在一个纽约工人团体，即众所周知的罗克福克党人① 手里(这是他们在1835年塔曼尼大厅集会上使用"罗克福克"火柴和蜡烛之缘故)，后来这个团体组织被杰克逊当局的继任人马丁·范布伦同化到民主党之中。曾经给最成功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主编詹姆斯·戈登·班内特撰写过传记的作者艾萨克·普雷对此作了一番透彻的评价：

罗克福克火柴与便士报同时为人使用，事实上，火柴和报纸的进步发展都有某些类似之处。某件东西的改进都会带来其它的用途……价廉的火柴和价廉的报纸在大街小巷中出售，而在这之前，无数家庭只得从比他们阔绰有钱的邻居那里借火燃烛，借报阅读。随着价格的降低，家家户户有了自家的火柴盒，能够阅读自己喜爱的日刊，对此，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美国的史学家、作家、编辑可能对普通人年代和便士报时期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但是，外国来客却不以为然。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就对此十分厌恶。1842年，当狄更斯抵达波士顿时，他只不过同许多有名望的欧洲人一样，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新兴共和国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是来访者中大名鼎鼎、声誉最高的作家，结果却成了对美国抨击最激烈的人。在美国的一切机构中最令狄更斯沮丧忧虑的莫过于新闻媒介了。他发现美国的报刊"是一架毒害美国社会的可怕机器。"它狂妄自大，充满流言，一面戒备政府的书报检查，一面又扮演事实上的自我检查官角色，把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统统从报上删去。狄更斯在其被人广泛阅读的《旅美札记》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下贱的报刊检查无关"而享受到观点自由或思想自由的权利，"由于报刊无知愚昧的泛滥和卑鄙欺诈勾当的盛行，人们的内心充满了憎恶与蔑视。"总

① 罗克福克党1835年在纽约市组成的民主党激进派，主要由工人和改良派组成，以反对银行、垄断、关税、特权为宗旨。民主党正统派在纽约塔曼尼大厅举行的一次提名大会上熄灭煤气灯以驱逐这些激进派，后者即用新产的自擦火柴（人称罗克福克）点燃蜡烛，并提名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党名也由此而得。——译注

之，狄更斯抨击了美国的报刊，并且用一种奇特新颖的形象化笔调痛斥了美国报刊仅仅描述生活中的丑态，而没有报道推动美国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他为煽情性报刊刻划了一幅肖像，认为它们提供更多的是愚昧和无知，而不是知识和理解，他说：

……报刊用恶眼窥视每一户人家，用黑手干涉上至总统下至邮差的国家的每一项任务；下流无耻的诽谤成为这个行业唯一的资本；于是，这种报纸成了广大群众的标准文学，他们要么只能读这些东西，要么一无所读；长此以往，它必将激起全国百姓的同声愤慨，它所干的勾当也必将在共和国昭然若揭。

倘若读者继续对狄更斯所反映的美国报刊有兴趣，不妨直接读一读他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该书在1844年狄更斯访美两年之后出版。狄更斯在书中对美国报刊提出了一种令人更感兴趣的观点（也许言过其辞），他认为美国那些报纸粗野喧嚷，放纵不羁、散布流言、造谣中伤，总之，除了最琐碎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尽管狄更斯的描述有所夸张，然而他察觉到便士报公开迎合普通人以及他们迷恋污秽闲言的需要，具有赢利的本性这一点却十分正确。

早一些时候，有一位更见长于分析的欧洲观察家，法国史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威尔发现纽约的报纸（1832年即戴创立便士报的前一年，纽约共有11家日报，总发行量达三万份）75%刊登广告，剩下的25%，德·托克威尔写道，专登“政治消息或轶闻琐事”。他还发现新闻工作者居于“一个非常恭顺的地位，既缺乏教育，又头脑简单。”他进一步说道：

美国记者的特点就是公开而又粗劣地迎合其读者的的激情；他把指责个人的品性、追踪他们的隐私、揭露他们所有的弱点与恶行等职责拱手垂让。

正是这位德·托克威尔贵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他在欢呼民主原则的同时，十分强调在美国实行平等比实行自由更加重要的主张。他认为，新闻媒介在赞颂平等

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当所有的媒介似乎在用一个声音发言时更是如此，因为“从步长远来看，一旦众多的报刊喉舌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的威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势不可挡”。只要宣传没有遭到反对，只要它代表了公正的舆论，那么宣传的潜在作用将强大无比。“由于舆论永远从相同的角度指责非难，它最终必定要陷入这种抨击而不能自拔。在美国，每一家刊物都几乎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其威力仅亚于人民的力量”。

在德·托克威尔的年代里，“社会化”这个词人们尚不熟悉，但至少这位富有思想的来访者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托克威尔发现了一种反映大众价值观的报刊能够强化这种价值观并塑造出一个美国生活中反知识分子倾向的模式来，理查德·霍夫斯塔特[①]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新闻媒介的理论家在探求使用新闻媒介去建立各国众多的不同的道德与宗教过程中，将美国的经验搬到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中。

便士报的编辑记者中，不乏改革家和行骗手，但每一个人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以求成名。格里利就是这样一个如霍雷肖·阿尔杰[②]笔下描绘的由穷变富的英雄典型。格里利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象戴一样从新英格兰来到纽约寻找发财良机。据说格里利1831年到达纽约时年方20，肩上扛着老式的排字托架，一块大手巾包着他的全部发财家当：十块美元。后来，他却成了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编辑，他的声誉如此之高以至于1872年民主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当然，结果被尤利西斯·S·

---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政治传统》、《改革时代》等，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一书中，提出一种引起争论的看法，认为美国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平等民众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译注。

②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末叶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也许还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有社会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内容大致相似，宣讲凭着诚实、刻苦的工作，最终总能由穷变富。——译注

格兰特所击败）。格里利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他在十年印刷雇工期间，赚下了足够的钱，并在1841年买下了《论坛报》。此人有别于戴和威斯纳，他承诺要提高大众阅读的格调；他说他的报纸要“增进人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道德良知、政治素养和社会福利水平”。诚然，格里利的《论坛报》较之其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太阳报》和班内特的《先驱报》来说，确实更加致力于改善精神产品的质量，不过，格里利除了提供大量政治性消息外，也刊登犯罪报道和闲言琐闻。作为早年政治生涯中的一名自由辉格党人，他是一位废奴论者，促使林肯总统解放了奴隶。格里利把专访的做法引进了新闻报道之中，他本人在1859年到盐湖城旅行时采访了摩门教会①会长布里格姆·扬②，向他提了一系列的问题。在那个为所欲为的年代里，格里利既受人尊崇同时又遭到公众的辱骂，为此而引起的街头殴斗现象在当时并非少见。

随着报刊发行量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读者，报纸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杰克逊所接受的教训以及他在政治上成功所采用的方法都被他的追随者所继承；所有政治集团的领导人都利用报纸和编辑记者为其选举目的服务。政府公开出钱奖赏以便赢得支持。偶尔也象《加图通信》的作者戈登的情形一样，用高官爵位引人上钩。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下，并不需要这种直接的奖赏，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记者（他们及他们的报纸很久以前便已声誉卓著）倾心致力于他们特定的政治事业。在其报刊的新闻栏里，大张其鼓地支持这些事业。例如1861年6月的某一天，格里利的《论坛报》用刺激性的言辞在头版大字标题上宣布“进军里士满③”，这个举动肯定使当时读者大吃一惊。然而，

---

① 摩门教系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派宗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译注

② 布里格姆·扬（1801—1877）美国摩门教会第二任会长，对开发美国西部有重大影响。——译注

③ 里士满系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的首府。——译注

这个大标题并不是格里利所做，虽然他是联邦的拥护者，但他还是要尽量避免任何被人称为战争贩子的嫌疑；也不是格氏手下才华横溢的编辑查尔斯·达纳所为，他只有在格里利暂时离开时才能制作大标题。一个月以后，格里利就解雇了达纳，但这并不意味着达纳结束了充当政府代理人的生涯，事实恰好相反，达纳成了陆军部长爱德温·斯坦顿特别代理人，负责监视斯坦顿所怀疑的对象格兰特将军的活动。内战结束三年之后，达纳开始主管《太阳报》，并努力摆脱威纳斯倡导的粗俗化的写作格调，将新闻写作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诚如达纳所说，将之提高到"文学的小姐妹"的地位上来。达纳的《太阳报》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写作标准，诸如马克·吐温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一些著名的写作能手后来也为《太阳报》撰文写稿。然而，它只是在旷野中发出的一个微弱的声音，因为那种粗俗文体已经影响了班内特的《先驱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并使他们追随仿效，成为大众新闻事业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班内特的《先驱报》是一张最典型最成功的便士报。班内特是苏格兰人，1819年来到美国，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纽约当过记者。1835年时，由于未能在戴的《太阳报》谋取一份差使，便投资500元创办了《先驱报》。班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告诉读者说："我们将竭力提供所有与公众有关以及内容适宜的事实，摒弃冗长啰嗦和添油加醋的东西。"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决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他还发誓要抨击"所有的无赖恶棍"，并且把"所有的政客和牧师一脚踢到魔鬼那里去"。正是《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班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他派记者到华尔街去报道有关国家金融机构的"内幕"，设立了报纸编辑部并且调遣记者奔赴远方城市采写新闻；与此同时，他也狂妄至极，在报上公然宣布他决心使其报纸成为一张"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报纸，成为能够支配公众生活的一张报纸。

班内特毫不掩饰他对赢利的兴趣，然而，他也决心拯救灵魂。他写道："一张报纸与纽约所有的大小教堂相比，能够送更多的灵魂升入天堂，也能从地狱中拯救出更多的灵魂。"班内特有一篇文章，对同辈人显得傲慢无礼，然而却表达了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所接受的一种看法，他指出：

书籍有它的全盛时期，戏剧有它的全盛时期，宗教的教堂也有它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伟大的人类思想与人类文明运动中，报纸能够凌驾于这一切之上。

当班内特、戴和格里利公开谈论对办报营利颇有兴趣的时候，是《纽约时报》的奥克斯最清楚地表述了早期报业主追逐营利的这种倾向。19世纪是工业扩张的世界；是商业帝国崭露头角的世界；是人们在谷物、铁路、造船、矿山以及农场等方面发财或破产的世界。它也不是厚颜无耻假装对财富不感兴趣的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在1859年宣布不久之后，美国很快就掀起了一股以强调获取金钱与权力为内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安德鲁·卡内基①欣然称之为"财富的福音"。新闻媒介成为举世无双的社会控制的工具，它在公平地参与其使命过程中，把这个福音传遍大陆各地。

直到1896年，奥克斯才掌管《纽约时报》，而这家报纸早在1851年就进入了纽约报业的竞技场，它是由那个丰富多彩年代里另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亨利·雷蒙德直接领导的，雷蒙德十年前曾任格里利《论坛报》的首席助手。奥克斯在新闻史上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恢复了起始于数世纪前威尼斯手抄新闻信时的原则，即"新闻"自身就是一件十分畅销的商品。盖伊·托尔斯在其《权力与荣耀》一书中，很有见地地指出，《纽约时报》有趣的历史表明："奥克斯要出售的东西正是新闻，他希望公正不偏地出售它并且保证货真价实，不遭曲解和授意"。奥克斯的主

---

①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实业巨子。——译注

张究竟如何不同于便士报的那些巨匠甚至于他自己《时报》的前辈？其原因就在于它摒弃了便士报露骨地迎合工人阶级需求的做法，他不会这样，他坚定地主张决不会出版一份“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他也不在社论中大声鼓噪什么，也不采纳威斯或他的黄色新闻业记者中的后继人所惯用的刺激轰动文体，当奥克斯接下《时报》时，这种文体早已主宰了纽约的报坛。奥克斯的报纸不拥护任何主义，甚至对传统新闻所赞美的地位低下者——杰克逊的普通人也照样无动于衷。他的报纸不搞任何讨伐攻击，但“要用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新闻……不偏不倚，无私无畏，毫不顾及任何政党、派别或利益的牵连。“班内特赞赏的客观性理想，尽管言行不一，现在却已经产生了另一位勇士豪杰，这个人通过鲜明地提出他自己所颁布的“刊登所有适宜刊登的新闻”而图谋营利；这条标语如今继续装饰在《时报》的版面上并延续到20世纪。

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美国新闻史上一种关于“巨人”的理论。戴和格里利，班内特和达纳，布赖恩特与奥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深受国家扩张、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也同样象征了新闻媒介的成长过程，从便士报之前的娇嫩幼弱、鲜为人知的机构发展到20世纪初呈现出无所不在、喧腾热闹的局面；它在内战中激起了联邦军与南部同盟军的忿怒和仇恨；后来又为东部的工业巨头欢呼，为西部奋力搏斗的农场主喝采；即使在那些被人憎恶的思想观点遭受严厉压制的时候，它也坚定地支持言论自由的事业，因为它总是使人类变得富裕殷实。

在19世纪多姿多彩的报人之中，普利策和赫斯特掀起的喧哗最为热闹，他们的声望也最为突出。他俩为了争夺发行量与营利额发动的煽情主义大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正是黄色新闻年代的本质特征。在这英雄与坏人占据的舞台上，普利策通常扮演“正面人物”，由于他性格上的显著缺陷使他更象一名真正的悲剧性的英雄人物。至于赫斯特则明显扮演成戴一顶黑帽子的

无赖，在奥森·韦尔斯①拍的《公民凯恩》电影中，他是一个时时遭到咒骂的形象。事实上，他俩的确极不相似，然而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赫斯特来自西部有钱人家，是一个矿业主兼政治家的儿子，其父曾一度担任选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参议员；普利策则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贫穷的犹太移民，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应征于联邦军队，从此踏上了这块具有“无限机会的大陆”。在来到纽约之前，他俩都在州立的中心地区学会了办报，普利策是在圣路易斯而赫斯特则在旧金山。到1880年时，这些城市的新闻事业发展已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那里的报刊早就采纳了不久便主宰了美国报坛的煽情性模式。普利策于1883年来到纽约，赫斯特则比普利策晚了12年，并在那里挑起了一场新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发行量之战。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纸浆中制作卷筒纸这项革命性发现的生产工艺业已完成，于是就能生产出价廉、简便人们如今称之为新闻纸的那种纸张形式，这样就使追逐巨额发行数成为可能。赫斯特《新闻报》与普利策《世界报》的发行量骤然猛升，超过了100万，甚至高达150万。

黄色新闻的形式就是便士报形式的一种延伸，同时又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普利策引进了星期版，赫斯特则开创了头版通栏大标题占据整整1/4空间的做法，连环漫画与照相复制被大量使用。这期间，美国对西班牙统治下古巴所进行的战争引起了最广大公众的注意力。在那场战争中，赫斯特与普利策齐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行径喝采，为普通人的国家压倒贵族政权的凯旋欢呼。这是一次民主的征伐，它依照乔治·班克罗夫特在安德鲁·杰克逊时代所宣布的信条行事：“大众的声音所向披靡，

---

① 奥森·韦尔斯（1915——）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1941年执导并主演《公民凯恩》获得巨大成功。——译注

这是……上帝的声音"。总之，美国在圣胡安山①的使命及其任务就是发送几百万份从卷筒机上印出来的《新闻报》和《世界报》。

巨大的发行量并不意味着巨额的营利。报纸出号外的开支（《新闻报》一天出的号外曾多达40次）减少了利润收入，另外还有战争的采访所需耗资以及广告费用某种程度的下降都影响了利润的增加。尽管如此，赫斯特与普利策的财富仍然滚滚而来，并且获取了更大的权力和更显赫的声望。不妨说，他俩追求权力与声望的欲念甚于财富。精神分析历史学家会发现赫斯特与普利策身上有许多绝妙突出的地方可供分析，他俩都精力旺盛，势不可挡，驱使他们寻求更新的挑战，征服更新的领域。另一方面，即使为赫斯特辩护的人也发现这位英雄的人格几乎毫无值得夸耀之处，相反，普利策倒颇有吸引力。赫斯特热衷于煽起人们的情感；他的社论版主笔阿瑟·麦克尤恩曾经说过，他的报纸首先是追求"哎呀一声的激情"，重点放在"女人图爱情，男人谋权力"方面。而普利策却不同，他经常诉诸于理智的需要，历史学家乔治·于尔根斯指出，报纸在普利策的领导下变成了"一项高尚的艺术工作"，不仅向大众出售，而且对他们尽责。普利策本人为其疯狂地追求发行量鼓舌辩解，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他想拥有任何影响力的话，如果他想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业的话，就必须有巨大的发行量。"毫无疑问，他坚信其《世界报》永远具有强大的力量，他说：

《世界报》比总统更强大，因为总统要受党派和政策的束缚并且只有四年的任期。

赫斯特至死都是一名黄色报人，而普利策则在他的生命最后十年（1901—1911）清除了煽情主义，使《世界报》或许成为美

① 圣胡安山系古巴境内一座小山。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军在此处击溃了西班牙军队。——译注

国新闻史上最受尊崇的一家报纸，内行人称其为“报人之报”。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普利策死后，在富兰克·科布出任主编直到他1923年去世为止这段时期尤其如此。此后，《世界报》又幸存了八年之久，但是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31年它在黄色报刊最新品种，小报的激烈竞争面前以及《纽约时报》日益强有力的挑战之下，成了一个牺牲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炽热年代里，由于用煽情性形式刺激大众，使报纸发行量的增长遍及全国。据推测，1900年时的全国城市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报刊具有强烈的黄色倾向，其他许多较小的社区报纸也程度不同地依赖于煽情性技巧。发行量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升高，但是新的出版商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广告收入。

第四章

揭丑与赚钱

广告的兴起

新闻媒介的发展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它从为权贵人物提供消息的一种工具演变到为广大读者消费服务的一件物品。人们可以据此认定便士报崛起之前，并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报刊。这不仅是由于“新闻”的形式已变得更富于戏剧性、更迎合了广大读者的要求，也同样由于报纸从经商者的一个消息来源变成了为整个市场所使用的一件商品。商品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买卖和贸易的流通之物。人们最常想到的商品是农产品或矿产品，然而大众化报纸不但提供有关农矿业产品的消息，而且对于市场上所有可购之物的各类消息均能提供。在第六章里，我们将讨论市场模式，这里只需指出这种发展演进的重要意义便已足够，因为伴随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现代广告业也要兴起。

不要认为广告业只是便士报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鲜事物，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出版商只有求助于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商业消息才能中饱私囊。从1833年便士报产生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止，所有工业化社会的新闻媒介都形成了相同的模式。不管新闻媒介是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还是公众教育的一种工具，它首先被看作一个为读者提供有关购物消息的机构，一种商业性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一件商品。

颇为有趣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常常措词激烈地大声反对新闻媒介从一个教育工具堕落到一个纯粹追求赢利的企业。一个记者很难觉察到这种异常情况的背后是追逐赢

利的企业在作怪，并且从那里他还尝到甜头。而同时这个记者转身又对赏给其甜头的人斥之为十足的商业主义。为便于理解商业报刊的性质，人们必须意识到新闻媒介内在固有的两难悖论，即它既是致力于实现第一修正案崇高理想的一个机构，又是市场上的一件商品。在美国掀起的大规模揭丑运动，对金融家与商界人士的腐败秽行痛加斥责，但其结果却促进报业主通过销售他们的商品牟取利。这种并行发展的情况仅仅是新闻史上许多反常现象中的一种而已。

报纸从一开始就被那些与商业利益有关者作为监察环境的一个消息来源加以使用。这样的话，报纸就不但是业主获利的源泉，而且也是新闻工作者取得收入的途径。罗马时代的记者能够用他们赚钱收入购买自由，而威尼斯手抄信的作者能够依靠他们的消息纸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远在本杰明·戴和詹姆斯·戈登·班内特靠便士报发迹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然而，为普通消费所需的产品广告首先要求一种消费型的经济。当消费者人数随着工业革命后在欧美不断增长之时，消费主义的“大跃进”就与便士报的崛起并驾齐驱，同步发展。这些报纸是同一种格局的组成部分，这种格局包括普通人的发迹以及从华盛顿和杰斐逊一伙的权贵领导转换成杰克逊和林肯一类的“浣熊皮”式的民主党人统治。美国国内的民主化运动较晚才波及古老的欧洲和新兴的拉美国家，但是那里也出现了这些情况，于是，越来越多的报纸栏目开始刊登广告消息。

广告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广告媒介分成四个类型，即陈列型（零售商所需要的地方性或全国性的讯息）；分类型（个人所需要的商业讯息）；公共告示型（社会的或法律的通告）和政治型这四种。但是这样一个分类脉络并非总是清晰的，因为其中重合甚多。便士报初期陈列型广告几乎就是现在所知的分类型广告，这些脱胎于分类型的陈列广告是便士报出版商的财源命脉。由于他们把报价降低了六倍，这样就迫使他们或者大量增加订户数量，或者

具有其他收入来源，最好是两全其美。当然，这两项收入来源都提供了所需的资金，同时，公共告示型广告成为较稳重的小城镇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大获成功的煽情性报刊在这方面则不如前者。

在印刷刊物的最初期间，形形色色的广告已经成为印刷刊物的内容之一。在英国，早在1625年报上就刊登了新书出版的告示，然而它遭到了印刷商的猛烈抨击，因为他们对这种消息被当作“新闻”不以为然。直到30多年以后才刊登了第二份有记载的广告，这是一种商品广告：咖啡。1657年的《公共顾问》报敦促其读者购买咖啡，将它形容成一种神乎其神的灵丹妙药；这份广告声称：此物“助消化、提精神……能够有效地防治眼痛、咳嗽、感冒、肺病、头痛、水肿、痛风”及其他小毛病。尽管已有类似这样的广告讯息出现，但其应用的范围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仍然十分狭窄。权贵读者们经常抱怨揉进这些广告挤掉了他们感兴趣的商业与政治消息的栏目，不少出版商也都赞同这个意见。此外，由于早期广告弄虚作假，吹捧劣药，因而遭到人们的严厉谴责。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中，成药一直是美国报纸刊登广告的主要内容。

到18世纪中叶，广告开始成为报纸收入的重要来源，但19世纪末期以前，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订户。1750年的时候，反对广告的势力趋向衰落，这无疑是因为它在有助于确保殖民地独立和幸福的贸易活动中作用日益显著。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开支持这种做法并在每期报纸上固定刊登两栏广告。即使如此，也只有到了19世纪以后，广告才开始成为报纸经营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不少编辑拒绝刊登甚至领取付钱的广告，因为来自读者的批评相当激烈。

早期报刊主要服务于上层阶级利益这一事实引发了那些真正刊登商业告示者的特殊动机，即广告是商界给予私人报纸强有力支持的一种途径，正如早年某些由政府当局发行的报纸冠以堂而

皇之的声明便能使报纸变得确凿可靠一样。便士报前的一家主要传统报纸《纽约信使早报》简明扼要地对此作了总结：

……商业的赞助实属最有益、最可靠、最正当之道，也最少受到偏见、怪念、急躁之影响。对于那些热忱、勤奋、小心谨慎为商人服务并献身于他们利益的人来说，商人们随时都乐意资助他们，并对他们寄予信任。

人们无法确定便士报和广告规模扩大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各自产生的时机都已来临，为了自身的兴旺，彼此都互相需要。在本杰明·戴的《太阳报》出现前的十余年里，报上刊登的商业讯息逐年增多。1829年，《纽约信使早报》与《纽约问询报》合并，这份新的出版物刊登了大量的广告，周末版竟然需要加出四页增刊，其他日子有时也插登两页广告。到1835年的时候，总共20栏的《太阳报》只剩下五栏用来刊登可供阅读的材料，其余都填满了广告。地方小城镇的报刊有过之而无不及。1833年的《匹兹堡公报》74%的版面用于登载广告，到了1860年竟高达83%，这标志着广告进入了兴旺时期。

19世纪30年代之前，当报刊还主要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专为订报的商人、制造主、乡间绅士和政府官员提供所需要的商业告示；如今一种新型的商业机构登台上场，满足了便士报对广告的需求。这个新事物就是：百货公司，它自身就是消费主义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它进入广告目录栏之前，商业告示所占篇幅终究有限，现在亟需更多的版面去宣传数量更多的商品货物，于是，简短的分类广告开始代替较大的陈列广告。

这种变化使得广告商与出版商互惠互利。扩大广告篇幅意味着要用更多的版面适应刊登广告的需要，同时也要为新闻版提供更多的富有戏剧性的文章，由于读者迫不急待地掏钱购买满载煽情新闻和广告消息的日报，因此发行量得到了保障，报业规模由此日渐扩大。出版商再也不必去乞求订户；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或政党资助扶持的欲望也随之消逝。如今报纸已成为有利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途径。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论述早期报刊与

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报刊史显示了在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经济力量越来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新型的经济势力——广告商——瞬间获得了力量。如今，广告商承担了报纸生产成本的最大一部分开支，而新闻媒介自身的盈亏状况突然间主要维系在广告上面了。

“庞大的广告机器”

如果说报纸是一件商品，那么人们会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对公众有益的东西，可以为人们了解政治事务及购买货物提供有关消息正象轮船与火车能够满足人们交通运输需要一样。但是，后来法官们给报纸下了判决，认为它并非对公众有益（因此报纸不可以随意接受来稿对外发表）。不管读者怎样认为，报业主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其报纸要对社会有益。新闻媒介并不是根据读者大众的愿望从事经营，而是依照付给他们欲求的广告收入的商人旨意去行事。尽管如此，倘若以为忽视公众关心的问题是新闻记者的特征，那是粗暴不公的。作者和编辑甚至在被迫将他们的报纸财政大权交给企业经理和广告销售商时，也坚持他们作为人民公仆的独立性。在大众媒介中，新闻工作者与企业经理的争端远远没有平息消除。19世纪霍勒士·格里利那样的编辑对那些甘愿用弄虚作假或胡编乱吹的广告欺骗读者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纽约时报》甚至改变了方针，拒绝刊登成药广告。然而，很难想象有个编辑会崇高无比，以致于错过那时垂手可得的发财红运，有些人干脆利索地公开表示他们对广告商的关注超过了其读者。1836年，《先驱报》的詹姆斯·戈登·班内特为了驳斥公众强热抗议成药广告的恣意吹嘘，在一位读者对某个名叫布兰德斯医生刊登的一种所谓包治百病药物的质量提出抗议时，给予了如下的回答：

请给我们比布兰德斯医生送来的更多的广告——付给我们更高的价钱——我们就会断绝布兰德斯医生的活路——至少将削掉他广告的篇幅。

生意就是生意——钱就是钱……我们决不会让傻瓜来妨碍我们的生意。

班内特认为生意就是生意，因此，按照习俗来讲，货物出门概不负责——得让买主自己留神。然而，《先驱报》在另一个时期里又修正了自己的形象，到了内战临近结束的1865年，它也拒绝刊登成药广告。

从19世纪30年代班内特等人的言辞中显然可以看到，虽然这些编辑们拥护普通人的事业，而且至少在理论上充当着人民的公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行事；相反，他们是人民的教师。早期任何一个编辑几乎从不违忌向读者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他们至多勉强承认读者有资格同记者一样和政府当局进行交谈。虽然那时在报刊言论中那种趾高气昂、目空一切，或对读者意见不屑一顾的情形几乎绝迹，但在信念与理解力之间，记者与读者之间，仍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内在差距。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指出的那样，这种一方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精神状况特征，必定造成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流通”。发展中国家指责工业化国家的新闻媒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们的发展中兄弟发言讲话。于是，很少说话的读者观众则用相同的敌意来回敬那些编辑记者的恩赐态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象威尔·欧文那样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广告商的影响。他是20世纪和揭丑记者行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1911年，欧文在他的15篇连载于《柯里尔杂志》的文章中断言：广告商为权贵利益服务，对“全社会造成了最大的危害”。他在追溯了报纸广告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美国报业发展过程中令人注目的衰退现象和腐败透顶的事例的罪过并不在于广告商方面，而是在贪婪的报纸出版商头上，因为正是他们让其产品纳入了商业轨道。欧文写道，广告“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美国新闻事业探求真理的道路。”欧文深受新闻媒介理想信念的感染，强烈反对编辑部把大权移交给董事会并且指责正在成长的那一群报纸编辑几乎和大企业家们毫无区别。这伙

编辑聚在同一个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他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却和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如出一辙。欧文指出：到了20世纪，广告商们再也不必费力去控制报刊内容，因为他们的报社执行部门的盟友完全会同他们的思路一样去进行工作，并且与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的做法极为相象。在一段时期里，欧文的文章和另一位揭丑者厄普顿·辛克莱[①]写的《大财团的贿赂》一文（此文用写实的手法抨击了报业）共同对美国的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许甚至比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家对美国报刊的剖析更有影响。在文章中，欧文对广告商的作用做了生动的描绘。他说：

广告商起先缓慢，后来迅速地了解了他们自身的威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广告推销员帮助、教会了他们。那些刊登广告不太认真、不太严肃的报纸开始总是奉献一些轻松愉快和免费的东西招徕买主。于是，广告商知道了进一步要求拥有特权的方法。在一个报纸胆怯软弱的所在地区，他们常常要求拥有每一样特权，甚至包括政策支配权。其要求的范围随着这些地区的当地习俗的不同而变化。但归根结底，象费城和波士顿这样一些城市，即使出版者更愿意成为一名编辑而不是一名赚钱人的话，也会碰到不可能的情况。因为这个制度已如此坚固，以至他必须作出让步，否则就得失败。因为他一旦不让步，他的竞争对手就会获得'这项生意'。而一旦他失去了'这项生意'，也就无力支付编辑的高额工资、报社的办公费、电报费、以及机器维修工的大笔工钱，而这些开销都是第一流的新闻行业必不可少的。这样的话，他不作退让的结果定会使他降低报价，减少发行量，进而慢慢衰败。

那些赞同广告作为报刊财源基础的理论家认为（正如欧文所注意到的那样），过去年间从广告收入获得的利润不仅导致了工资和技术设备的大幅度增加，而且也促使了美国报刊质量的显著提高，因为它从薪金优厚的专家和技术进步创造的绝妙良机中得到了好处。也有其他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用某种形式的公共经费

---

① 厄普顿·辛克莱(1878.9—1968.11)美国作家，以长篇小说《屠宰场》(1906)著称于世。作品中多揭露社会上的丑事，故有"丑闻揭发派"作家之称。——译注

来承担报刊费用。

不管是好还是坏，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美国的新闻媒介确实成了大企业。到1879年，印刷业中的广告收入上升到将近4000万美元，紧接着下一个十年中，广告费超过了订阅费并成为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达到总收入的54%以上。到了1919年，这个数字的百分比突破了65%。普利策在19世纪80年代开创的报纸星期日版更是成为刊登商业讯息最赚钱的聚宝盆，其飞速增长的规模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1908年5月10日这个星期天，普利策的《世界报》发行了25周年纪念版，号称200页之多，其中竟有116页以上登的是广告。星期日报的页数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平均达到54页，同时，美国人均新闻纸年消耗量从6磅上升为90年代的16磅直至1910年的25磅之多。于是，一批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不仅有广告代理机构，而且还有专门处理公共关系和塑造企业形象的商业机构。当然，所有这一切机构都在出售商品。社会学家艾尔弗雷德·麦克朗·李在论及"庞大的广告机器"这个问题时，极其委婉地评价道：他们"能将报纸作为稳定的企业来经营，并且彻底改变了编辑内容的性质。"

广告商选用报刊的发行量作为衡量单位，一家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商就越渴望在那里刊登他的商品广告，一旦更多的读者能确保获得这些广告讯息，他就要求更高比率的发行量。显而易见，那些报业经理们如果要保持巨额发行量并以此吸引众多的广告商的话，就必定要在其新闻栏目中提供尽可能迎合最广大公众口味的材料。这样一来，《世界报》、《纽约时报》以及《论坛报》对刊登有份量文章的所有要求已经荡然无存（虽然它们还想努力争取那些上层读者）。总之，新闻媒介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浪潮和巨大的发行数量急剧地增加着财富，他们完全醉心于便士报时代发端的办报程式，即：突出"人情味故事"，突出犯罪与传奇、闲言与娱乐的报道。不断运用照片，革新报纸版面使文章更加"清楚易读"，消息的制作如同百货公司里分门别类的陈列

品，当地新闻另占一个栏目，与州、国家和国际新闻分开；"体育"新闻不同于"商业"新闻，也不同于"妇女"新闻。速度成为关键因素。各种关素因此变得混淆不清，提供的消息零碎分散、彼此割裂，更多的只是用来取悦读者而不是引导人们进行思考。1901年，一本普及性的"入门"书对这种办报程式进行了论述：

报纸作为一个有助于获取广告的形式应当最有效地利用每一个良机来说明它在进步发展：应当是最早告知新闻、最早刊登新闻、并始终不遗余力地保持这么一种形象，即它在不断迅速地发展。

进步发展是自由派的口头禅，在新闻界，它表现为速度的加快，版面的变化，使读者确信报纸在技术和设计上正在更"新"。此外，赫斯特还进一步主张报纸的职责就是要给读者以亲切感，使他们感到报纸的设计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愿望。实际上成为"他的"报纸。根据赫斯特的想法，首先就要"取消报上传统的社论栏"。因为它一味老调重谈，因袭传统，只能成为一桩坏买卖。虽然黄色新闻业招致了否定，但它的许多方面被继续视为优点。报纸和广播电视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依据时效、革新、发行量或视听率来评判新闻媒介的质量水平。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许多编辑总是力图限制商业影响的渗透。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在同夸大其辞、抬高商品质量的吹嘘行为，以及新闻机构公开撒谎和通过新闻界代理人明显控制记者的举动进行不懈的斗争，新闻界代理人通过给记者提供免费旅游、免费车票和免费产品来换取记者撰写有关其商品的文章。许多编辑在演讲中、社论中、有时还在专业刊物中（其中第一本创刊于1884年名为《新闻工作者：一份所有阅读和写作者的杂志》）痛斥这种行径。在1887年的一期《新闻工作者》杂志上，诗人尤金·菲尔德杜撰了一个假想的广告费用帐单，维妙维肖地嘲弄了新闻记者接受铁路的免费车票并用赞扬稿件与之交换的所作所为。他写道：

兹为美言总裁、总经理或董事长之善行（无论虚实与否），率先刊登

广告者，每行字褒奖两块，其后者每行一块……对铁路官员之妻儿恭维有方之广告，我等意欲每行奖励一块五……且又备下1000英里之车票与尔等换上乘七韵吹嘘诗，以及为数有限之十四行诗、两韵八句诗易主交换。叙事诗，内含风景、餐车等描写者容当优价出版之。

新闻机构先驱者的创造力无穷无尽。他们凭借无限的想象力，首创了“购物简讯”的做法，这些简讯是关于销售动态的消息，它免费刊登，文笔常常很漂亮，用来作报纸的补白，有时甚至能在头版刊出。这种东西的吹捧术十分高超以至于广告代理商成功地运用这些诡秘的告示越过了编辑的防线，甚至当这些编辑已经提防隐蔽的讯息渗入报刊的时候也照样无济于事。广告业放肆无度、愈演愈烈的行径最终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抨击，并在进步党人运动全盛期内采取了措施。1912年制定的《联邦邮资法案》规定所有通过邮寄发出的付费材料都必须作为报纸专页广告贴上邮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起初谴责这项法案干涉了新闻自由（“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这个团体成立于1887年，很大一部分力量放在管辖广告机构上）。后来，这个组织便停止了它的反对并且接受了联邦政府使用职权对广告活动施以一定限制的正当做法。从那时至今，政府关于限制广告活动规定的功过是非一直成为出版商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许多新闻工作者继续追随他们自己的明星，继续笃信民主假设所昭示的理想目标，继续抵制新闻媒介代理人和赞助者的引诱奉承，继续坚持报刊摆脱煽情主义泛滥的主张。他们长期不懈地同成药广告的浮夸吹擂进行斗争，终于迫使制造商结束了在报刊上登这些故弄玄虚、包医百病的广告。这场战役中最有力的武器是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于1905年和1906年在《柯里尔》杂志上撰写的一系列揭丑文章。《纽约时报》1910年出版了一份称之为《查禁目录》的材料，用来识别广告商，清除弄虚作假的吹嘘并告诫公众防备其他冒犯者。其他报刊随即纷纷仿效。《纽约先驱报》在1914年的时候，不仅拒登成药广告，而且大言不惭地夸

下海口，说它要绝对保护读者"免遭通过阅读其报栏广告而购买的货物的任何损失或不满。"广告中吹捧造假的鼎盛时期终于消亡，但形式巧妙的浮夸现象仍然顽固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说，受到严肃的编辑记者抨击的不仅仅是骗人的广告，例如霍勒士·格里利早在1850年就敦促他手下的编辑和出版人，不管怎样有利可图，也要自觉地抵制为广告商辩护的特别声明，而且要为他所称之为的"公众幸福"努力进取。《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发誓只刊登那些适宜刊印的新闻和广告。普利策要求人们做到诚实和准确。还有诸如威尔·欧文、厄普顿·辛克莱和林肯·斯蒂芬斯等这样一些揭丑记者写下了上百篇文章，狠狠地鞭挞了新闻界恣意妄为、钻营私利的行径。广泛受人尊敬的《商场报》编辑威廉·艾伦·怀特不断撰文要求美国报刊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这位堪萨斯州的周刊编辑作为诚实正直的代表在新闻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1905年，标准石油公司重金贿赂怀特，要他登载有利于该公司在堪萨斯州发起的反对限制性立法的文章，标准公司还把各种材料、计划发送到各个州的编辑那里，叫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刊登出来，对此，怀特一概拒绝。揭丑杂志《麦克卢尔氏》为这件事写道，该公司给堪萨斯报刊的钱至少有1000美元，而那里的报刊每年全部赢利却不超过2500美元。这篇文章指出怀特的报纸分明拒收了到手的"果实"，然而，"盼望和得到这种果实的人却比比皆是。"对于那些后来宣扬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论"者而言，怀特或许是新闻英雄祠里的一位重要人物。

不管怀特以及其他名气较小但同样德道高尚、不屈不挠者如何可歌可泣，关于19世纪报业的进步提高以及20世纪的继承发展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建国初期充满幻想的岁月中人们憧憬的那种报刊理想与便士报产生之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具有天壤之别。我们在这里论述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广告贬斥为一种邪恶势力，而是要揭示出作为无所畏惧的真理追求者，蔑视那些入迷于

广告的人在新闻媒介信条中所存在的弱点和弊病。

新闻管理者

诱惑编辑与出版人的不仅有商业利益的钱财报酬，还有政治势力。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初，那些当政者就用资助钱财的许洲诺吸引报刊帮助其实现个人的和政治上的欲望。这样一些报刊常常并无奢望。有权者和报刊在这点上都继承了长久以来盛行于欧的传统。马丁·范布伦强调了报刊支持19世纪美国的重要意义，范布伦是纽约的一名政治领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他在1823年给一位政治伙伴的信中指出，假如没有一张报纸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将会乐极生悲”。接着又补充到：“但如果有了的话，党就能安然渡过1000次使你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感到心烦意乱、或许惊恐不安的那种打击震荡。”

新闻媒介用于政治目的的手法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欧美领导人运用技能操纵公众注意力以便促使他们支持其各项政策。在美国，法律建立了新闻媒介替那些当政者辩护说话的一套框框；任职者挥舞手中大权驱使新闻界为其政治利益服务效劳，这显然使那些无权无势者望尘莫及。掌权者不仅能够充分运用直接性的引诱手段，而且还能运用法律机器本身做到这一切。

1789年，甚至当雅各宾党人还在走向巴黎街头的时候，首届美国国会采用了立法的形式，委托联邦政府制定了法令，规定一种对报刊进行财政管理的形式，这种形式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789年9月的法令产生了国务院，①该法令指定国务卿负责选择几家报刊登国会制订的法律和决议。这种职责一直持续到1875年为止，其间美国经历了从东海岸向西海岸的扩张，1812年的对英

① 1789年下半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建立了司法系统、行政部门，国务院这一部门是1789年9月26日杰裴逊被任命国务卿时改称的，在这之前，它被称为外交部。——译注

战争，对墨西哥战争以及南北战争。首任国务卿杰斐逊从五个州挑选了五家具有政治资助身份的报纸，但是需要联邦津贴资助的呼声强烈至极，为数众多，无法仅仅限于几家报纸。于是，国会于1799年修订了这项法律，规定国务卿至少在每个州要选择一家报纸，如果一家报纸不够，可以选择三家。这场角逐继续进行，尤其是麦迪逊成为杰斐逊的国务卿之后，公然采用了一套对那些支持杰斐逊计划的报纸给予奖赏报酬的制度。

事实上，所有的报纸都受过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不管他们提供这笔资金是为了确保一种府首贴耳、吹捧颂扬的报刊需要，还是出于报刊被视作公众服务机构的动机，最终结果都只能是需要仰仗政府的恩惠才能创办一种报刊，财政上的生存与否几乎更要依赖于政府的慷慨解囊。政府对报刊最主要的资助体现在邮费上。1792年至1845年期间，寄信的邮资根据距离远近从 6 便士到25便士不等，但对一份报纸来说，不论距离远近，最高金额只有一便士半。甚至比这更优惠的是，不管报纸重量多少，它只规定了一种固定的价格，但信件的份量超重之后价格就直线上升。同样也在这一年，那个确定邮资的法令正式允许报纸出版人之间可以免费互赠各自的报刊。因此，出版者清楚地知道：一家报纸一旦向政府发起挑战，就无异于在财源上自取灭亡。尽管惧怕失去财政资助并不总能阻止编辑和出版人抨击政府，但竭力企求讨得政府欢心的做法却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尤其在拼命争夺签订承担政府文件官方印刷者的合同中更显突出。

政府印刷局的产生标志着政府给予报业的正式资助即将终结（尽管有些做法仍然残存了15年之久）。当印刷商骤然间大发横财，赚得了几百万美元之后，这种政府资助的体系也随即瓦解消亡。腐败与丑闻普遍盛行，动荡和骚乱开始引起国会对此问题的辩论。

在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当政期间，政府的印刷费开支达到了近400万美元，比以往44年的总和还要高。当然，

扩大奴隶制引起的唇枪舌战是造成开支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运用报刊制造拥护皮尔斯政策的舆论压力所造成的。直到下一届詹姆斯·卜坎南（1857—1861）当政时期（这是内战前的最后一届政府），这种指责与反指责仍然针锋相对，未见平息，于是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在1860年一致断定这种公众印刷资助体制是“所能采纳中最糟糕的一种，它不仅会导致挥霍浪费，而且还有导致腐败的倾向。”到了那年6月正式批准建立印刷总局时，国会终于停止了依靠报纸和私下协议来满足政府印刷需要的做法。

在旧有的印刷资助体制下，为数甚多的报纸资金十分雄厚。在不少例子中（杰克逊当政期格外显著），新闻记者获得了加官晋爵的报答，阿莫斯·肯德尔或许是杰克逊的记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另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记者费朗西斯·布莱尔也同样声誉卓著，他在杰克逊和范布伦手下担任了官方喉舌《国会环球报》的出版人。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有成百上千名记者纷纷弃文从政，但是总统影响新闻界最有效的手段既不是直接的钱财资助，也不是封官许诺，而是起始于杰克逊总统对新闻“管理”的做法。虽然“新闻管理”的概念直到20世纪才被充分地认识，但它早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新闻管理指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即突出地使用一些欺骗性手段，设法使所刊登的东西成为新闻管理者想要登的东西。例如，就象杰克逊做的那样，如果一个总统想要使报纸对他否决1836年第二合众国银行延长期法案进行报道，使其成为站在“普通人”（即下层阶级）立场上反对贪得无厌银行家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项行动的话，那么总统和他的报刊代理机构的任务就是确保做好这个否决消息的报道工作。一旦有关的新闻报道被一种试图压倒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权力的动机所支配，杰克逊想要把他的这项否决“出售”给公众的愿望就会变得困难重重，无法实现，因为比德尔不仅是杰克逊政治上可怕的争夺对手，而且也是

代表东部儒雅的贵族阶层反对杰克逊"民主革命"的主要首领。总而言之，所谓新闻管理就是新闻媒介操纵者运用技巧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并且也是）被善于用心计的政治家如同学识渊博的公共关系专家那样操纵自如、得心应手。

换句话说，新闻管理就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无论总统、广告商、报业竞争倡导者或任何其他人，只要他企求操纵新闻就必然要设法在印刷文字中塑造有利于他的现实图象。总统可能想要赢得公众对他的一项政策的赞同；广告商可能希望售出他的一件商品；报业竞争倡导者可能欲求使读者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他们吃亏受损。总之，新闻管理者都企图操纵新闻媒介使它为其目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介充当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工具，只是有时公开，有时隐秘罢了。权势小于总统、广告商或报业竞争倡导者的其他人也有同样机会可以操纵新闻媒介，但要使它为其私人目的服务，则与总统、广告商或报业竞争倡导者比较起来，难乎其难，因为后者依据其自身的地位或财富拥有引起记者注意力的特别权利。

孤独的记者

根据新闻媒介的信条，新闻传播工具通过揭露营私舞弊和腐败堕落的现象能够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不仅如此，它还把矛头对准要害岗位的丑恶行径，使卑劣者失败垮台，使正义力量占据上峰。这种信念的例证便是有关"水门事件"的大量文章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下台，或者迫使美国结束了对越南的战争。这一点，它被突出地加以宣扬，同时它又和新闻媒介"监督"作用的理论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新闻媒介时刻注视着政府或其他庞大机构的一举一动，以消除滥用权力所产生的弊端。然而，如果新闻媒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自身就不可能去消除这些弊端，它可以参与这种消除，但决不能构成动力。这种信念不仅有利于新

闻记者，使其地位随之提高，而且也有利于那些可能运用新闻媒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掌权者之类人物。那些相信尼克松邪恶卑鄙进而企求推翻他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这种神话并操纵新闻媒介为其效劳。当然这并非说新闻记者毫无权力；事实上，不少记者通过写作名扬天下，权势赫赫，而且还伺机操揽政界大权。但是，这一切只有当记者的目标恰好和他所在社会推行的目标吻合一致的时候，才可能如愿以偿。假如不是国会、总统和一般大众早已准备同西班牙打仗的话，那么，赫斯特为煽动这场战争所进行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乌有，付诸东流。

有关新闻媒介威力的传颂在"揭丑者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我们不可能精确地认定它所出现的日子，不过，它是在人们广泛起来反抗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下的定论[①]情况下掀起的。那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了自然选择的主张并将之与新的职业道德溶为一体，将它应用于社会之中。安得鲁·卡内基宣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利于世界的发展"，他又说，应当欢迎"企业、工业、商业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穷人被指斥为不能适应的弱者，铁路、造船、银行的实业家以及刚铁和石油公司的实力空前膨胀。对此，政府无法限制住他们，而且自由放任的政府管理哲学也不允许进行这种限制。自然选择过程并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因为人们相信既然自然选择是上帝安排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政府企求去管辖或控制工业巨头崛起的话，那便是一种既糟糕又不道德的政治主张。正如一位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约翰·菲斯克[②]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缓慢地演革过程正是'神权意志必然显现'的一部分内容。"

---

① 马克吐温在与人合著的《镀金时代》里认为美国这一时期政治上腐败、经济上投机。——译注

② 约翰·菲斯克（1842—1901）美国历史家，哲学家。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美国历史。——译注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穷人和知识分子团体也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深信不疑，他们拥护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经济的要求，也许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对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进行赞美颂扬。倾泻而来的书籍、戏剧、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地吹捧那些离群索居的开拓英雄，特别是捉捕那些鼎盛时期西部英雄自强奋斗的形象。揭发丑闻的记者自身也在这个相同的模式中扮演了道奇城[①]卢执法官的角色。

最著名的揭丑作者之一雷·斯坦纳德·贝克[②]作为反抗贫富悬殊的孤独斗士被永久地载入史册。1903年他在一期《麦卡卢尔氏》杂志上发表题为"孤独的战士"一文，叙述了一个工会成员通过摆脱老板的操纵，改造了他所在工会的故事，以及一个政治家在重重压力考验下仍然保持正直诚实的故事。贝克写道："这是一声极为零星的呼喊，是一名政治上的英雄，但这正是我们要告诉人们的一种英雄。"贝克还用一句话概括了揭丑者的信仰体系，并且道出了监视者形象的本质特征。他说："如果这个共和国得以拯救，它必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是只身抨击贫富悬殊的新闻记者，是独有抵御暴民歹徒的基层司法官员，是单个反抗强权机器的政治家。

贝克还涉猎诗歌领域。他在诗中以锋利雄浑的诗句勾划出他心中英雄的形象。他在一首名为"孤独骑手"的诗中写道：

仰天烈日当空，
俯首风沙盖地。
灰马背上的孤独骑手——
独与旷野上的灰影相随。

① 道奇城是美国堪萨斯州西南部城市，划分美国中部和山区时间的子午线从这里附近穿过。——译注

② 雷·斯坦纳德·贝克(1870—1946)美国记者，著名随笔作家。曾任《麦克卢尔氏》杂志副主编。——译注

飞奔吧，飞奔，我的野马，
‘留心脚下的靴刺！’——
志当存高远，马当不停蹄。
远大前程展眼前，
今日正值骑马时。

西奥多·罗斯福是揭丑人物中的政治英雄，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象他那样栩栩如生地体现了一名孤独牧士或孤独骑手的形象。他在非洲原野备力狩猎；在圣胡安山同罪恶的西班牙搏斗拼杀；在华盛顿与企业大亨较量抗衡。总之，是西奥多·罗斯福给予揭丑者[①]这个永恒的命名，用以称呼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最初十年里，那些替讨伐性杂志撰稿的新闻工作者。

如果揭发丑闻仅仅意味着运用新闻媒介抗击顽固强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件新事物。出现于美国以及欧洲的这种做法在本书中已被多次提到。一旦这种讨伐违背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信念，它就要招致失败，因为权势者能够运用恐吓、劝导、收买、同化等手段来扼杀对立的新闻媒介。无论何种情况，这种对立的新闻媒介都是由敌视统治者个人所发起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代表官方的新闻媒介则是由那些决意维护当权利益的个人所掌管。一旦反对力量得以推翻当局，这种"看家狗"式的新闻媒介就被赞誉成造成当局垮台的原因，并且常常是自夸自封，就象在水门事件或美国革命情形中所显示的那样。在揭发丑闻的年代，监督性报刊只是一场包括进步党和平民党在内所掀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那个时代的基调充满了改革精神，如同南北战争前的那些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运动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衰落消亡。

① "揭丑者"英文直译是"掏粪者"．罗斯福最先套用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这句话形容1900年前后一些专门揭露丑闻的杂志和作者，此后将就之称为"揭丑者"。——译注

现代德国的主要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① 是19世纪懂得运用亲信报刊为其服务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第一修正案中奉为法典的出版自由那时已在欧洲国家中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连许多处于暴君严密控制下的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已在前面一些章节中看到了出版自由问题在法国如何酿成政治上的骚乱和剧变。在19世纪40年代法家和普鲁士掀起的十年革命中。出版自由成为最激动人心的革命要求之一。1848年在法兰克福起草过一个普鲁士宪法的德意志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通过了一项提议。这项提议对新闻自由问题表述得最为明确清楚。

☆每一个德国人均有用谈话、书写、印刷、照相、书画、刻印艺术的形式自由发表其意见的权利.出版自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受到限制，中止或禁止……

十分遗憾，对于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的人来说，法兰克福法案从来没有变成德国奉行的政策，但它却使反对派的报纸在19世纪中叶遍布全国，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1848年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反对派的报纸一直企求发挥其监督者的作用，并且通过公众印刷文字唤起人民关注普鲁士统治者的专制暴行。1862年，俾斯麦登上了普鲁士首相的宝座，他开始成为历史上最善于操纵新闻媒介的人物之一，时隔一年，他敦促普鲁士国王取消报刊批评政府的权利。英国出生的德皇腓特烈三世的皇后维多利亚以道地的英国方式归纳了俾斯麦关于报刊的主张，说它是“中世纪式”的，这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俾斯麦派兵逮捕了那时还处于奥地利宗主权保护下普鲁士一块领地内的某家报纸的编辑之后。那时期普鲁士正养精蓄锐，准备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因此，俾斯麦不打算对报刊的不同异议加以容忍。

奥地利之战的胜利使俾斯麦得以宣告现代德意志国家的诞生，

---

①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宰相。实行强权政治，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故有“铁血宰相”之称。——译注

威廉一世如今采用了皇帝的称呼。在帝国统治下，俾斯麦改变了对待报刊的手法：他不再将持异议者投入监狱，也不再采取有形的镇压行动，而是施行了更先进高明的“新闻管理”的策略。作为一名新闻管理者，俾斯麦几乎不熟悉同僚的情况。在这过程中，他依仗其独自使用的一大笔金钱（自由派报纸称这笔钱为“卑鄙的基金”）买通报纸替他的各项政策或其他政治目标展开宣传；由于有了这笔卑鄙的资助，一些记者趁机发财变富。俾斯麦毫不犹豫地使用历史学家埃里克·艾克所说的他的“新闻狗们”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某些目的。1875年尽管俾斯麦实际上并不赞成对法国开战，他还是让记者撰文暗示这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文章激起了欧洲局势的动荡不安。1848年，他派记者到英国劝服格拉德斯通[①]承认德国在非洲西南部的殖民化统治，这是俾斯麦一项成功战役的组成部分。虽然俾斯麦小心谦慎，特别在后期的公开言论中从不偏离他所重视的公众舆论过远，但总而言之，他是引导德国人民的一个行家里手。正是在他的经营下，德国的新闻媒介犹如美国早已做的那样，成为权力政治的一个分子。俾斯麦是第一位面临一个反对派通过迎合人民要求压到政府首脑的德国政治领袖。根据他的观点，报刊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由对取得了巨大成就，俾斯麦试图扼杀报刊以达到他的目的。“实力政策”就是他的信条。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俾斯麦的镇压和收买政策不仅遭到鼓吹自由者的抨击，而且也同样受到纳粹理论家的指责。纳粹作家汉斯·明斯特尔坚持认为，俾斯麦力图清除自由派新闻记者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他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因为它是“消极的”。明斯特尔写道，国家社会主义者要采取一种“积极的”手段取而代之，使“现代人民的报刊为国家效劳”。对对纳粹而言，仅仅指责或镇压已无济于事，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报刊体制。

“卑鄙”这一词不胫而走，半个世纪之后，新闻记者兼哲学家

---

① 格拉德斯通英国政治家（1809——1898），在1868——1894年间四任英国首相。——译注

沃尔特·李普曼将之用来形容美国的新闻政策。起因是1926年柯立芝当局威胁要干涉墨西哥，因为那里似乎即将要对美国公司拥有的石油和矿业股份实行国有化。当时任《纽约世界报》社论版主编的李普曼以及其他一些记者坚决反对这种干涉，怒气冲冲的柯立芝总统于是要求记者撰写的有关墨西哥的一切报道都需送交批准；同样愤慨难忍的李普曼则痛斥了政府方面想要控制报纸的任何企图，他说：

柯立芝先生似乎想要获得一种报刊的名称——即卑鄙的报刊。这种报刊从政府官员以及大企业势力那儿接受旨意，它只刊登那些掌权者所希望的东西。它也只删去那些人所要删去的东西。

监督者作用的报刊职责就是要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政策，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李普曼发现自己成了报刊监督理论的忠实信徒，全然忘记了他在前几年的时候未经批评检查就刊登了早期政治英雄们希望他刊登的东西。这是一种引诱记者上当受骗的行为模式，然而他始终贯穿于历史之中。一旦记者被巧妙地加以操纵摆布，他们便时刻准备从政府官员和大企业势力那儿接受旨意。但是只要这种操纵旁于技能或违背新闻界的信念，那记者就要对这些政策群起而攻之。在这个范围里，自相矛盾的情况比比皆是。

《纽约时报》甚至在阿道夫·奥克斯还未掌管的多年前就已成为一张稳健持重的报纸。1870年，它发起了一场勇敢的战役，揭露大名鼎鼎的纽约政治魁首威廉·马西·特威德①的贪污腐败行径。这是揭丑运动掀起之前报刊发挥监督作用最为著称的事例。传统说法认为正是《时报》发表的社论，才使特威德的统治遭到灭顶之灾，并将他关进监狱。这场战役以浓厚的戏剧色彩详细披露了头领人物特威德的罪恶勾当，因而激发了公众的兴趣。在1870年9月整整一个月中，《时报》始终把矛头对准特威德及其他的同伙，有时，整个头版几乎都致力于这种攻击。它在社论版上不仅

① 威廉·马西·特威德(1823—1878)，美国政客，"特威德集团"的首领。——译注

狠批特威德一伙人，还痛斥了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和穷苦人。特威德一直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卑鄙报刊，他用成千上万的金钱豢养了它们，使之俯首贴耳。他这次企图通过买下《时报》的控股权①拿钱贿赂和抽回该城市所得的广告收入来进行反击。然而，他的努力徒劳无益，反而给著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帮了一点小小的忙，纳斯特在《哈泼斯周刊》刊载了一幅特威德的漫画像，把他画成"坦慕尼协会②的一只凶恶老虎"。终于，这个协会的成员在1871年选举中遭到失败（首领特威德除外，他本人又一次在州参议院当选），《时报》立即为自己庆贺摆动，喝彩叫好，并指出它为新闻信条补充了新的内容，它说：

近几年来，《时报》一直从事揭露自私政客、道德败坏的阴谋诡计，最近它同坦慕尼民主党人的斗争受到举世赞同……我们赢得的这场胜利珍贵无比，不仅在于它现在所给予我们的胜利成果，而且还在于它将重新使每个人坚定地树立真理和正义最终必胜的信念——因为它告诫玩弄阴谋的政客们，人民的声音至高无上。

无疑，时报和整个新闻界（至少那些没有卖身投靠特威德团伙的报纸）表达了"人民的声音"。特威德本人最终由于私吞公款入狱坐牢，但是后来得到的证据对《纽约时报》的功德和它独自搞倒特威德的宣称提出了怀疑。举例来说，虽然有关坦慕尼组织奸诈勾当的流言盛传已久，但直到一个叫詹姆斯·泰勒的人去世后，《时报》才发动这场战役。担任《时报》董事的泰勒是特威德的一个商业伙伴，到泰勒死的时候，纽约市还拖欠《时报》1.3万元未付的广告帐单。此外，《时报》能够刊登的许多具体材

① 控股权指拥有一家企业的股份最多，从而在选举、表决中占控制地位，能够左右该企业的方针、政策。——译注

② 坦慕尼协会系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由于好施小惠，贿赂敌对政治派别的领导人，致使该名称成为腐败的城市政治的同义语。——译注

料似乎都是由萨缪尔·J·蒂尔登[①]一手提供的，他本人就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此人不仅迷恋于跻身纽约官场，而且还渴望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然而，特威德却支持在职州长约翰·T·霍夫曼，而不是蒂尔登。于是，在这种局势明朗不久，蒂尔登手下某个名叫乔治·奥布赖恩的人便把有关特威德证据的材料交给了《时报》。显然，正是这个在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的蒂尔登，这个担任纽约州州长又在1876年选举中以一票之差负于拉瑟福·B·海斯从而丧失总统职务的蒂尔登帮助组织了抗议贪污腐化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据调查，《时报》虽然充当了特威德垮台的一个工具，但它在这场战役中充当了蒂尔登及其同党的代言人。

揭丑者年代

用新闻媒介讨伐特威德集团可能是《时报》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到了奥克斯以及继任者手下，《时报》坚决反对揭丑事件和煽情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在黄色报刊和揭丑年代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几乎无与伦比。事实上，揭丑者的杂志、书籍就是黄色报刊的翻版，尽管其中一些主要参加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威尔·欧文、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厄普顿·辛克莱、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都是杰出作家和调查能手。他们在"进步党主义"名义下集结行动，反抗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自由竞争经济的所谓福音。进步党人攻击的明显目标是财阀大亨，因为他们在追逐营利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大众甚至政府。大企业得益于无所限制而发达炽盛：毋需所得税、没有劳资合同，也不存在政府管理。对财阀大亨进行批判的人中间，有一些是社会主义者，同他们欧洲的同志在思想上一致，这些人是其精神领袖卡尔·马克思主张的追随者。然而，

① 萨缪尔·J·蒂尔登（1814—1886），曾任纽约州州长，因揭发特威德集团而闻名。——译注

大多数人只是改革者，脱胎于更加实用的美国模式，追求的不是革命，而是希望行之有效的立法。虽然在揭发丑闻记者中既有革命家也有改革家，但革命家在稳健的美国社会中只能吸引一小部分追随者。大部分人的具体要求是对国家垄断进行管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共和党改革派的阵营里，其英雄人物就是以反托拉斯勇士和进步党缔造者闻名于世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位精明圆滑的政治家成功地使揭发丑闻这支奏鸣曲合谐统一。

杂志揭丑者和黄色报刊采用了一套颇为相似的手法。普利策和赫斯特自己就是改革家，到处支持普通人的事业，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事业。例如赫斯特在其竞选公职的过程中，在他的报纸上始终同情劳工并能够依靠劳工的支持。虽然黄色报刊和揭丑作者赞美普通人，但他们也同样是英雄崇拜者，呼唤一个美国的拿破仑出现，以领导人民同垄断巨头及其腐败政客进行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家伙的存在为财阀大亨恣意款行铺平了道路，这同半个世纪前托马斯·卡莱尔① 和英国改革家们期待全能领袖来解救的情形十分相象。哈罗德·拉斯韦尔写道，超人观点的盛行经常是由于"旧有的经济制度发生混乱和危险的集体思想意识兴起高涨"。拉斯韦尔在对英国19世纪60年代人们的态度作了一番深入考察后指出：

新兴企业主趾高气扬，陶醉于白手起家的成功中；而没落的地主则深感个人必须抗议城市和机器时代的到来。

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气氛与此十分相似。工业和银行资本享有过度自由实际上正在消亡，许多人认为集体思想意识试图加速这种消亡。这也是一个追逐个人名利的时代，那些揭丑作家既发财又扬名。难怪罗斯福要在他那篇有关揭丑者的著名言辞中援引《天路历程》中那个掏粪者的形象。

直到1906年，罗福福手将掏粪者这个词套到讨伐性记者头上，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译注

而那时这场运动早已衰落下去。它在四年前处于鼎盛时期，其标志是《麦克卢尔氏》这份刊物到1903年1月这期为止在刊登丑闻、评击财阀为所欲为方面已达十年之久，这家杂志或许堪称出版史上最出色的一份期杂。创办人S·S·麦克卢尔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时刻清醒地注视着政治上和出版上的发展动态，他在1893年创刊这份杂志时运用了本杰明·戴降低售价的绝招，那时杂志一般每份售价25分至35份，而麦克卢尔用每份15分的售价打入市场。赫斯特《世界主义者》杂志为了应付挑战只得削价至12.5分，另一份著名的揭丑刊物《芒西氏》则将售价压低到一角钱。赫斯特与普利策为提高发行量展开的争夺战同样冲击着期刊行业，于是杂志的读者人数急剧增加。《麦克卢尔氏》的发行量从1895年8月的12万份猛然跃至1900年的30.7万份及至1907年揭丑运动衰落前夕的近50万份。其他杂志获得的收益也大同小异。

著名的1903年1月号《麦克卢尔氏》杂志刊登了三篇读者渴望获悉的有关高层人士舞弊残忍、违法乱纪的报道。林肯·斯蒂芬撰写的揭露都市腐败现象的不朽杰作《城市的耻辱》一文排列在杂志第二篇上，讲的是有关明尼阿彼利斯城的事情。这是艾达·塔贝尔公开抨击约翰·D·洛克菲勒而撰写的"标准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战"一文激起了公众更大的兴趣。正是她创造了一个短语使揭丑者的动机引人注目。她说，她是在"义愤填膺"地大声呼喊。那期刊登的三篇著名报道中的第三篇是雷·斯坦纳德·贝克写的《工作的权利》，谴责了在矿工大罢工和组织工会的热闹争论中，煤矿业野蛮残酷的行径。麦克卢尔的这份刊物几乎没有使大众难以理解的东西，他在社论中宣称他的杂志要充当普通人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喉舌，他说：

资本家、工人、政客。公民——所有人都在破坏法律或让它遭到破坏。谁在那儿恪守法律呢？……除了我们大家决无他人。

《麦克卢尔氏》杂志在新闻信念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它是讨伐性期刊的完美典型，致力于运用周密的调查报告形式进行揭露指控。它也有许多失之无度、恣意妄为的错误，但其程度比起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世界主义者》和《芒西氏》来则要轻得多，那两家刊物肆意鞭挞，横扫一切，并且其发行人象麦克卢尔一样财运亨通。反偶像崇拜者威廉·艾伦·怀特在1925年弗兰克·芒西死去的时候发表文章，提请人们注意揭丑者营利的情况：

弗兰克·芒西给他的时代的新闻事业贡献了一位肉类打包商的智慧，一名活生生的货币变换人的道德和一个经营者的风度。他以及他的同类成功地将一度受人尊敬的职业迅速毁灭。愿他在九泉之下得到人们的信任。

尽管如此，也并非所有揭丑作者都富裕起来，社会主义鼓吹者厄普顿·辛克莱就没有变富。他在《大财团的贿赂》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斥责了报业自身，痛骂了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要求报纸生产采取公有制形式并号召新闻机构要在公众的掌管下有益于公众。《大财团的贿赂》和辛克莱其他一些文章显示了列宁分析报刊作用的思想。

揭发丑闻作者中很少有人愿意遵循辛克莱的道路。他们更现实的目标是要求政府尤其对铁路运费和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管理控制。由于1901年威廉·麦金莱①身亡，从副总统升为总统的罗斯福作为一名反托拉斯英雄赢得了新闻媒介的广泛支持，他第一个运用政府大权设法使贪婪的工业巨头在慈善政府的压力下被迫为增进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而经营。罗斯福首要的目标就是铁路运输业，为此他不知疲倦地努力说服国会制订他所需要的法则，控制铁路运输并使其运费隶属于政府管辖之下。那些铁路系统多年来获得了报刊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是对新闻记者及其家人慷慨赏赐的结果，这种赏赐曾遭到尤金·菲尔德和其他人的讽刺嘲笑。1905年12月衣阿华州众议员威廉·P·赫伯恩提出一

① 威廉·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1901年遇刺身亡。——译注

个法案，其内容不仅要求控制铁路运费而且还扩大了联邦管辖权范围，从仓库和终端设备直到卧车快车公司及商品供应线等，法案还迫使铁路系统放弃他们在轮船运输和煤矿公司的利润，并且还要采取一项对新闻记者来说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措施，即除了铁路雇员、教会牧师和某些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以外，废除免费乘车。这项法案成了罗斯福在国会达到目的的工具。《赫伯恩法》是美国打击放任自流经济最有力的法律文件之一，由于揭丑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一直受到极大的信任，特别是由于《麦克卢尔氏》的贝克和《柯里尔》刊登的系列文章支持总统反托拉斯的努力以及揭露铁路歪风邪气所引起的反响。

事实上，由贝克和其他人在报刊上发起的这场战役在罗斯福总统的指挥棒挥动下得到了和谐统一。他在多年前就开始作这种尝试，在担任纽约市警察局长期间，罗斯福就结交记者，成为他们的私人朋友，以此使他们的名字和主张为公众和当政人士所知。在罗斯福要求召开一次专门的国会会议以通过《赫伯恩法》之前，贝克完成了第一篇文章，他把文章中的证据材料送到白宫让罗斯福作出评价。罗斯福为了广泛宣传的需要，写信给贝克，说他对此无可挑剔，并指出，姑且不论所有的形象塑造，事实上，“您还给了我的咨文两三个启示。”当国会于1906年5月18日批准了《赫伯恩法》时，罗斯福并未贬损贝克的一系列文章，然而在这之前一个月，《赫伯恩法》还在争辩之际，罗斯福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公开斥责了改革家们。就是在那次抨击中，罗斯福把“掏粪者”的头衔加到了讨伐性记者身上。他第一次是在格里德雷俱乐部非正式讲话中用这个词指代新闻界人士，但罗斯福又在4月14日众议院第一办公大楼的奠基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借用了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一个手持粪耙者”的人物形象，此人“只能低头向下”，对一切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只是怀着阴暗心理，专门盯住那些卑鄙堕落的事情不放。”根据罗斯

福形象化的描述，用粪耙掏出地上的污秽物是必要的，但认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同样重要。他指出：

☆但是这个人从来就无所事事，除了他的粪耙技能外，从不思考，谈话或写作，于是，他即刻就变成最烈的滋生邪恶的根由之一，而不是成为社会的帮手，善行的鼓舞者，

这样一来，罗斯福自己树立了作为一名总统的完整形象；他喜欢报刊为他的利益服务，唾弃报刊为其敌手效劳，其经验同托马斯·杰斐逊颇为相似，并且就好象杰斐逊就在他跟前一样。罗斯福力图让那些和他见解一致的报界人士放心，他对揭丑者的抨击与他们无关。他在私下同贝克谈话中和另外给林肯·斯蒂芬斯信中说了这番意思。他告诉斯蒂芬斯，是赫斯特的报纸、是那些气焰嚣张的煽情作家占据了他的头脑。显然，占据他头脑的还有那些公开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在关于"掏粪者"的那次演讲中，发誓要特别惩罚"那些制造骚乱和不满的狂热鼓吹手，那些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狂热的煽动家，"他说，这些人是"真正进行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换句话说，一家报刊只要为罗斯福的改革服务，就是一家好报刊，但如果这家报纸做得不够或做得过头则都不会受到信任和委托。几乎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介充当代理人的作用了。而且罗斯福在其私人通信中，甚至比"掏粪者"演讲走得更远。十年以后，他在1915年写给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①的信中承认，即使象贝克和斯蒂芬斯这样一些"更为诚实的揭丑者"所写的事实陈述，他也几乎不能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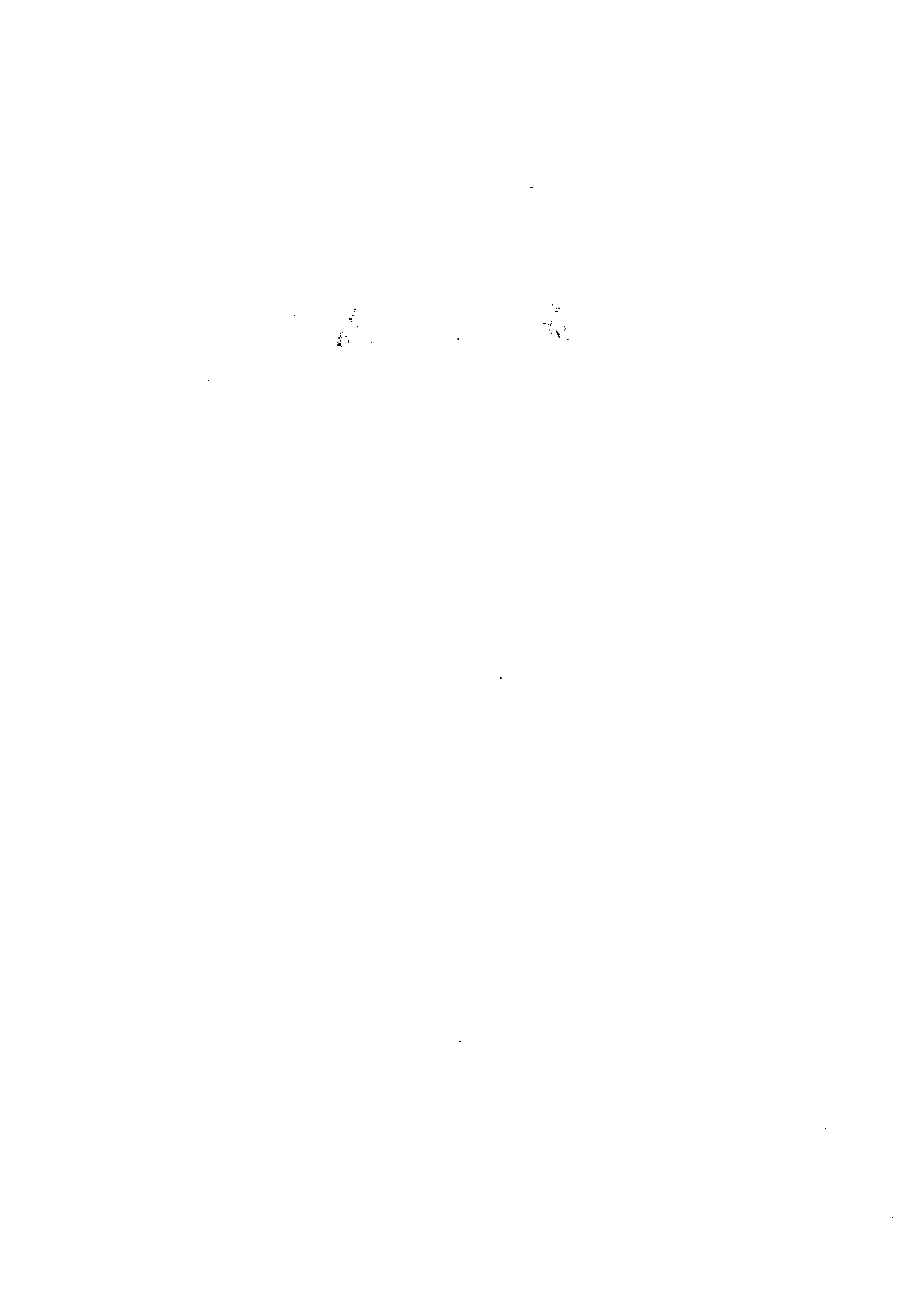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男女女的揭丑者根本就不是那种只看见卑鄙与邪恶、为一己私利的动机张扬家丑的人；他们的目标浪漫崇高，正如贝克在其回忆录中讲道："我们'揭发丑闻'不仅仅

① 温斯顿·丘吉尔(1871—1947)，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理查德·卡维尔》、《危机》等。——译注

是因为我们憤恨我们的世界，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热爱它的缘故。我们并不悲观失望，我们并不玩世不恭，并不怀恨抱怨。”总之，他们所盼望的如西奥多·罗斯福之类的孤独骑手，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际，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新闻媒介都逐渐变得强大有力、赢利丰厚。这是由于广告收入的增加使出版商财运亨通；是由于黄色报纸和揭丑杂志带来发行量的上升使他们大发其财。新闻媒介及其为之写作的记者（其中许多人如今享有很高的个人声誉）在政治进程中正在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然而，其重要意义并不为人所共知。直到发生戏剧性事件的1917这一转折之年，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新闻媒介的重要性。此时出现了新闻媒介思想体系的分裂。自那时起，这种分裂一直占据了世界各地新闻界的论坛。

第 二 篇



第五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

卡尔·马克思的报刊学说

1917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西方开始掀起了更迭政权的浪潮。自从罗马帝国时期以来，这种形式的政权一直统治着西方世界，乃至整个星球。这股浪潮向着东方蔓延，它完全验证了一个多世纪前阿莱克斯·托克威尔提出的一个预言，他写道，所有其它的国家，“似乎已达到它们自然发展的极限”。但是，西方的美国，东方的俄国“则正沿着一条没有极限的道路，轻快地行进着。”按照托克威尔的观点，自由是美国强大的基石，奴役则是俄国强大的基础，“他们的起点就不同，并且各自的路线也不一样，然而，天意似乎注定要他们各自支配半个地球人的命运。”

1917年春，美国不再埋头治家，宣布对德开战，正如常言所云美国“开始介入欧洲”。尽管20年代出现了短暂的孤立主义思潮，但它仍然驻足欧洲，并稳步增加其军事与经济实力，直到美国能够在大西洋两岸充当巨擘为止。美国虽然发展了孤岛文化，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包括新闻界在内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之后，第二件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远在东边，现称列宁格勒的地方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这场革命促使苏俄不仅在军事、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学艺术上象

美国一样登上了统治的舞台。于是，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体系之间展开了一场角逐。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新闻媒介的作用完全不同于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在1917年的时候就已深入人心，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理想模式。随着一战的爆发，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便在西方世界不胫而走，广泛传播。

当然，自由报刊的模式并不万能，但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它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西欧，新闻自由即使受法律保护，报纸照样经常受到压力、控制，有的甚至在现实政治①利益面前被迫进行欺骗。而美国也同样如此；在亚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由于当地固有的报刊模式妨碍了他们接受并仿效殖民统治者带去的报刊体制，在中国，也许是由于复杂的文字缘故，直到20世纪才出现供大众阅读的报纸；在拉丁美洲，早期报刊几乎完全是美国的翻版，而第一批重要的报纸也是由美国印刷商创办的。除美国之外，大不列颠的新闻媒介最少受到官方的控制。英国的新闻体制在欧洲大陆报刊发展过程中比美国更有影响。英国新闻媒介是美国的典范，它建立在法律保障之下。几乎与美国享有同样广泛的权利。这种盎格鲁一萨克逊模式在英国诞生，在美国发展并获得神圣的地位。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为止，这种理想主义的新闻体制几乎遍布全球。

但是，政治反动派总是指责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新闻媒介扮演的是卑劣角色；另一方面，反对派自身拥护的新闻媒介又被它的反对派视为卑鄙。然而，理想的典型处处相同，即按照“第一修正案”设想的一种自由的新闻媒介，尽管路途上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但他仍然永往直前，无所畏惧地探求真理。

争取报刊权利的斗争在1830年查理十世②垮台时就已经存

① 现实政治系德文Realpolitik转化过来，为强权政治的委婉语。——译注

② 查理十世(1757.10——1836.11)，法国国王（1824——1838年在位）——译注

在，即使在路易·菲利浦[①]君王的数十年统治下，报刊权利的争论也从未偃旗息鼓。在现代雅各宾党人发动的1848年2月起义中，革命报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正是这次起义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统治，并为第二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187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瓦解，从此法国终于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共和国。1830年至1848年是狂飚突进的年代，充满着动荡与激情。正是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的便士报开始盛行，它预示着普通人占据报刊历史阶段的出现，并推进了杰克逊民主运动；在英国，大众化报纸受到查尔斯·狄更斯精神的影响，一味醉心于刊载关于"鲍尔街逃亡者"的文章，更多地发掘出英国普通人的欢乐与忧愁；在普鲁士，报刊对盘根错节的军政当局和土地贵族发起了挑战，进而导致了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革命集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诞生了。在一本由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出版的《新闻发展概述》的书中，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新闻系主任弗拉迪迈·胡达克描述了新闻史上新出现的这段主旋律：

☆在1848年至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希·恩格斯在科隆创办并编辑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历史的滥觞实际上起源于这家报纸。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这家报纸成为宣传无产阶级策略方针的论坛。这些策略方针也贯穿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实质部分中。

这个自发开展的无产阶级运动，第一次逐渐从空想走向科学，这个过程也同样完全反映在新闻事业之中。

在苏联的信仰体系中，卡尔·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成为新闻媒介的基本准则。但是，如同美国的政党报刊为了政治上的需求而将原则变成空洞无物的信条一样，苏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将这些原则置于毫无作用的位置上。事实上，马克思与托马斯·杰弗逊一样，很难从哲学角度加以准确断定，因为

---

① 路易·菲利浦（1773.10——1850.8），（法国国王1830——1848在位）——译注

他不可能在一生的各个时期里涉及新闻自由争端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自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时，并非只在说笑话而已。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宣传工具的主张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当马克思于1818年诞生时，它就已经成为源远流长的理性河畔的一股主流。新闻媒介使公众的观点、信仰得以传播、沟通；同时它又提供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信息。因此，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介同样处于核心地位。令人惊讶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甚至斯大林都是新闻工作者。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思想运动首屈一指的人物，正是这个主要的理论家创立了一整套学说，向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并且改变了世界及其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种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决不意味着应当受到谴责。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危险性是历史诸因素中必然产生的结果，为了保持自己的长期统治，惊恐万状的资本主义必定会无情地发起进攻，以击溃新兴工人阶级的挑战。因此，资产者从资本主义卫士的角度出发，指责社会主义者不顾一切地掀起冒险性的战争，企图夺取对世界的统治权。

较之许多理论而言，马克思的学说不尽完善。与其说他是一个炽热的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博学的分析家。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发展期，他所作的工作就是透彻地研究历史，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正是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用它建立了一个革命的社会政治制度。即使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完善，但人们还是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许多阐明革命社会政治制度的线索，这个制度至今仍以其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名义发展着。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完善这一事实使得后人对他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众多的不同解释。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在许多哲学家眼中，它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种哲学，而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闻媒介就象交响乐那样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变奏曲；在本书分类体系的结尾部分将要详细讨论，仅仅探讨这个问题里面的变奏曲，就足以另外再写一本书了。马克思的新闻哲学(或许最好称之为思想体系)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即这个制度的中心，被当作主旋律加以讲授、传播。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哲学的发展过程。

1842年马克思开始成为科伦《莱茵报》的特约撰稿人，这是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后所获得的第一项工作。《莱茵报》是由当时盛行于法国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的信徒莫泽斯·赫斯所创办。[①]十个月之内，赫斯提升马克思为这家报纸的主编。马克思当时早已享有学者兼作家的美名。赫斯对这位年轻的门生怀有很深的敬仰之情，有一次，他这样描绘马克思：

☆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敏锐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这就是马克思博士。

在马克思钢铁般的领导下(他是一个从不掩饰自信心的人)，《莱茵报》全面抨击普鲁士统治者（当时普鲁士君王统辖莱茵地区的工商业，土地贵族——容克则盘踞在东部一带）。在报上，马克思不仅将斗争锋芒指向普鲁士执政者阶层，而且还指向普遍存在的地主阶级。于是乎，报纸发行量大增。普鲁士当局曾一度禁止了这家报纸的发行，暴戾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几乎给当局提供了无数镇压《莱茵报》的良机，然而，由于莱茵省地区刚被普鲁

① 据有关的记载，《莱茵报》系几个股东创办，赫斯只是参加了编辑领导工作。——译注

士吞并不久，因此，当局很难用书报检查来煽起公众对报纸的不满情绪。马克思在报上揭露了政府不给酿造葡萄酒农民改善生活的错误，抨击了他们重税惩罚那些为取暖做饭而偷捡森林枯枝的穷人的行径，因此，马克思在政治上激怒了书报检查官。马克思驾驭文字的能力无比高超，在政论家里，很少有人能同他媲美。他一度用计谋哄过了书报检查官，刊登了隐语双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正好迎合普鲁士君主的胃口，但实际上对那些能够透过字里行间领悟真意的人来说，则得知了各种民主运动的言论和宗旨。后来，一些被哄骗的书报检查官公开受到惩处，并由那些严厉的官员取而代之。然而，马克思显然走得太远，他公开号召普鲁士统治者投入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战争。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尼古拉的注意，他照会普鲁士国王抱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低效无能。于是。《莱茵报》很快遭到镇压，于1843年4月停刊。马克思也随之失业。但他那段经历使他掌握了从事政治新闻活动的娴熟技能。

或许在那段时期，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章并没有发表在《莱茵报》上，而是登在他在巴黎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伴阿诺德·卢格创办的《德法年鉴》上，但是在它第一期问世前，便遭到了法国书报检查官的查封，于是卢格来到瑞士。1843年2月他把马克思那篇关于书报检查制的论文收进了只出版了第一期的《轶文集》①中。同年11月，马克思离开普鲁士，来到当时的激进运动中心地带——巴黎，那里的人们夜晚在寓所和咖啡馆研讨蒲鲁东和圣西门的著作，而警方则时刻提防着革命行动的突发。正是在1843年至1845年这段时间里，马克思成为激进主义者，他从早年鼓吹自由的人道主义立场转到宣传激烈的革命暴力上来，因此，他被戴上“红色恐怖大夫”的帽子。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他从未摒弃在卢格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所阐述过的新闻思想。

① 《轶文集》指1843年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一书。——译注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王室内阁下令，假惺惺地准备取消一部分比较严厉的书报检查规定，这些规定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22年前制订的（他的继承人，威廉四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其后他又扑灭了1848—1849年自由起义的烈火）。对此，马克思写下了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在这篇推理严密的论文里，马克思指出，威廉三世在位时的书报检查制赤裸裸地禁止宗教上的不同见解，而修改过的检查令则偏重外表，并未触及实质，它是用来窒息哲学上各种不同观点的一种手段。在所有这一切中，马克思更关注1841年检查令中引进"有害倾向审查"的规定。这条规定与后来成为美国新闻出版法规的部分内容相似。按照这个检查令，凡是批评政府机关、法律法令、或提出改进办法的作品，"只要它们的叙述合乎礼貌，倾向善良"，即可免于书报检查。良好的倾向是衡量作品是否摆脱敌对和恶意的标准，而且检查官特别要注意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害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

对于这种论调，马克思义愤填膺地痛斥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马克思写道，这些追究倾向的规定不是要惩罚公民的行为，而是要惩罚他们的思想，他们否认公民的自身存在：

☆我可以任意翻转打滚，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体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东西，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

马克思指出，在一个信奉道德的国家里普鲁士当局由于废除了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因而是不会自诩独占了一个社会的理性和道德的。为了透彻地阐述更加令普鲁士统治者恼恨的论点，马克思写道：

“检查令想要保存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的法官是检查官而不是神。”

有害倾向的审查不仅指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包括语调。凡是在报纸上刊登“为了投合读者的好奇心而去转载居心叵测或听信坏话的记者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和耸人听闻的新闻，”书报检查官就要直接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倾向，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评析，将由书报检查官来裁定什么是有益的新闻出版物，什么是合格称职的编辑人员。至此，马克思运用它那杆讽刺嘲笑、挥斥方遒的笔，刺中书报检查官的要害（这些检查官的智力天赋很有限）。在这个检查令里，书报检查官被授权批准为具有“学术才能”的合格编辑。但是，马克思反问道：这批“万能天才”又到哪儿才能获得学术才能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他进一步谴责道：

☆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家的姿态出现呢？要是这些为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声势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自己的才能也未经官方承认的可怜的作家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些老练机智的、象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里山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谦逊了。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但是政府知道他们。

马克思这篇论文的基本前提是：废除审查是正当的，而实行书报检查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的检查制，则不仅恶劣透顶，而且还起相反作用。他指出，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探求真理，一个健全的社会将会更好地进行这种探讨。马克思运用引起2000年来民主自由人士共鸣的亚里斯多德论述过的语言写道：

☆作家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一个一般的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

谈，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

就在为《莱茵报》编辑与撰稿期间，马克思开始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事实上，他只是在《莱茵报》被指控为"与共产主义有暧昧调情"后才对共产主义进行研究。马克思在一个正式回答中进一步写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本人未必能全部懂得傅立叶和蒲鲁东的学说并对共产主义"冒险地作一次独立的判断"。那时，他从事报刊写作（这种写作贯穿他的一生）关心的是具体的问题，其主要论点和法律依据来自于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客观事物之一便是处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葡萄酒的农民处境艰难，生活困苦。而马克思就出生在那个地区的特利尔市。为此，《莱茵报》抨击当局漠不关心摩塞尔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而书报检查制度的法律条文则对此直接加以禁止。由于马克思对摩塞尔农民状况的考察，才促使他终生着魔似地研究人们处于压迫地位的经济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为了支持反抗压迫的行为，自由的报刊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集中论述这个主题。书报检查官反复攻击马克思有关摩塞尔的文章。为了回击这些攻讦，马克思区分了自由报刊外部与内部的限制。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外部的限制，即官方的检查制，事先或事后的实际限制，但是，他写道，内部限制则更复杂，并且从哲学上来讲，问题也更严重。

报刊的内部限制既是历史的又是无形的，它取决于报刊四周的政治、文化氛围。一旦新闻工作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感到绝望；一旦他们确信无论他们写什么都毫无区别；一旦他们写出持不同见解的报道将会遭到惩罚，他们就会丧失信心；就只能满足于仅仅报道"新闻"，也就是当局意下的所谓"正确的事实"。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下一步就是人民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随

之而来的则不仅是失去了“一个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失去了使这种报刊能够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人民信任的唯一先决条件。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换言之，正因为自由的报刊必不可少，所以全体人民肯定渴望得到这种自由报刊，但是那种人民意愿已被报刊的内部限制所扼杀。在那没有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场合中，受压制的人民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并安于贫困潦倒；而没有人民的支持，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局面决不可能形成。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报纸不仅要探讨有关摩塞尔农民贫困的“真理”，而且试图消除人民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进而要求改造社会。按照他的观点，报刊永远不能仅仅报道“新闻”。社会主义者对报刊分析的中心思想即来源于这一论断。

“我们的事业是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详尽分析中，把新闻媒介看成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核心部分。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作为他们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形成的。虽然德文überbau这个词总是被翻译成上层建筑，但是当人们试图全面理解马克思原意的时候，这个翻译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们误解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起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就是指商品生产，那些掌握生产商品手段的人组成了统治阶级。这些人就是资本家，他们不仅掌握了物质商品生产手段来维持政权，而且还掌握了“知识商品”的手段。因此，他们不但控制了农场、牧场、工矿企业，而且还控制了政府部门、教堂、学校和新闻媒介。这些机构——政府、教堂、学校、新闻媒介组成上层建筑主干，它们是统治阶级为了能够维护自己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在英语中，上层建筑这个词指的是某种东西竖立在另一些东西的上部，它不包括基础，并非是建筑

物体的必须组成部分，因此是一个附属的东西。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上层建筑不是建立在社会组织上面的某种东西，实际上，它是社会组织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任务、它的功能都是帮助统治阶级保持政权，使得资本家们能够从事剥削工人、剥削无产阶级的活动。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就会由于自身内在的薄弱环节，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崩溃瓦解。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当时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详尽的分析中看到，新闻媒介对于统治阶级维护政权具有利害攸关的作用。虽然马克思到达巴黎后，再也没有进一步写过直接论述新闻媒介的重要文章，但马克思关于新闻媒介的论述及其他的主要思想则无疑贯穿于他的整个著作之中。

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生涯。他和他的朋友兼助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为霍勒士·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十年的稿件。此举不仅给美国读者提供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有关世界政治事务的文章，而且也在生活中帮助马克思解了燃眉之急，为流亡到英国伦敦的马克思和马克思全家提供了生计。正是查尔斯·达纳，当时《论坛报》的编辑主任，给予马克思这个职务。他在一次到科伦旅行时与马克思会过面，马克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傅立叶或曾在印第安那的新哈玛内创办公社的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能够分辨清纷繁复杂的欧洲社会主义派别。在1852年至1862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为《论坛报》写了487篇文章，① 每篇稿酬为一英磅（约合当时的5美元），马克思在《论坛报》一直干到达纳在美国内战时被解雇离任为止。他的所有文章均用英语写成，其中绝大部

① 据苏联与我国有关专家考证，这段时间马恩为该报撰稿达500余篇。——译注

分是对欧洲政治事务的分析，大体上说来，马克思的文章摒弃了他在哲学和社会学写作上常见的痛斥谩骂，因而使他的这些报道林立于分析性新闻年代最佳作品之行列。

那时，新闻媒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军火库中一件不可缺少的武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论点：掌握生产手段的阶级不仅控制了物质产品的制造，而且还控制了"精神生产的手段。"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遭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生活被指责为异化生活，也就是残缺或非人道的生活。因此，对于被异化的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不但要恢复经济上的福利和共享政治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和全面由的发展。到那时，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将重新获得他们自身的"存在"。在这场恢复的整个过程中，新闻媒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们今天在"异化"这个概念的性质和意义上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几乎无与伦比。事实上，对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的阐释方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异化概念本身的解释。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如果不是神秘而难以理解的话，则体现了宗教的性质；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具有经济学上的含义；而对此外的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政治上的意义。所有这三种解释都有某种合理性，既然这个概念在理解社会主义新闻模式中关系重大，那么就值得对它作一番详细的考察。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尤其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作了最充分的考察。那时候，马克思年仅26岁，尚未踏上新闻工作者兼革命家生涯的征途，他仍然深受黑格尔的响影，并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基本的分析方法——辩证法。辩证法宣扬矛盾冲突。它认为，历史就是由对立力量、正反面之间进行斗争的记录。最后综合的结果便是双方在永无止境的周期性冲突中形成了下一个"正"的开端。冲突的结果就是黑格尔笔下绝

对观念的实现。绝对观念也是一个深奥难懂的概念，也许在黑格尔头脑中，它指的是普鲁士国家的实现。马克思将黑格尔这套东西"头足倒立"了过来，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那个社会中，由于所有的阶级都是平等的，因此，不再需要"上层建筑"，也不再需要为统治阶级而存在的政府部门以及各种宣传和剥削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将"衰竭而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异化也同样消除，人的自我实现将变得完美不缺。

有人指责马克思为人类及其各种机构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景象，这种指责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是，马克思却认为他的分析是科学的，并一再表示了他对"空想社会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的蔑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又是解答他所称之为"历史之谜"的归宿，而通过科学唯物主义理论的运用，则可以客观地预言共产主义的到来。当人们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就会消除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是得之于黑格尔。虽然马克思在后期不再使用他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早年为报刊撰文中出现的人道主义语言，但他坚信异化将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消失。

不管马克思曾对异化作过何种解释，这肯定对他有着心理上的现实影响。在普鲁士，在法国，在英国，马克思环顾四周，到处看到工厂里的工人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以及肮脏、简陋的工作条件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拥有工厂和机器的资本家同样拥有工人。在那种情况下，工人彻底地"异化"了，即不仅同世间的东西相疏远，而且还同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潜在能力背道而驰。资本家雇主为了自己谋利将工人当作商品使用。工人这个术语的真实含义不是属于工人自身，而是属于那些资本家，工人甚至也不是他们自己意识中的主人。因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即认识自我，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获得，如果你不能交谈或不能写作，那么你就不能意识到你自身。既然如此，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你并不存在。文字本身以及对它的含义的确定也是"上层建

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的作用就是使下层阶级保持这种状况，并使他们意识不到作为人的存在。那些否定了自身意识的人已明显受到异化。于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将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崩溃标志着人的异化终结的开端。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以列宁为主，争辩道，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应不予理睬。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成熟以后摒弃了许多早期人道主义著作中的浪漫色彩。马克思本人似乎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某些有力的佐证。在他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15年后，他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了他和恩格斯准备"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足以使列宁（还有其他许多人）相信1859年以前马克思所写的著作是不能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对马克思序言中这句话的意思进行任何类似解释都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所做的只是否定了他从前的"哲学信仰"，换言之，他不再缠绵于哲学这块领地。他指出，所有冠之以哲学美名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哲学的语言就是统治阶级的语言，必须用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取而代之。

马克思思想最敏锐的分析家之一卡尔·科西指出，从1859年起，马克思仅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转向哲学话题：或者阐明他自己作出的分析推论，或者抨击社会主义营垒内部的敌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仍然一如既往，这就是：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埃里克·弗罗姆①将马克思视作一位救世主式的幻想家。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就是使人异化，成为物的和环境的奴隶，作为世界的一个软弱无能的附属品，似乎因此丧失了反抗的力量。世俗的价值观念："盈利、工作、节俭、节制"并未能产

① 埃里克·弗罗姆（1900·3-1980·3），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新弗罗伊德学派创始人之一。——译注

生任何诸如良心美德一类的伦理道德；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异化者将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他们将挣脱锁链，获得世界。

在这个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新闻媒介在上层建筑中与政府、学校、教堂一起肩负着重任，它对人们居住的世界隐瞒真相，对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成员制造假象，使他满足于现状。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长期保持其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机器，政府则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工具。由于19世纪中叶报纸还未被农民、工人广泛阅读，因此马克思是否将新闻媒介的功能置于象政府、学校、教堂那样的主导地位还值得怀疑。然而，不管怎样说，现代"双向交流"的概念已经包含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报刊必然影响知识分子、官员、业主、商人的思想意识，然后再由他们向下层阶级宣传他们在报上所读到的"真理"。马克思没有谈到过宣传，它是半个世纪后当报纸读者数量急剧增加时，由列宁提出来的，并在马克思"上层建筑"领域中赋予新闻媒介以核心主导的位置。但是，即使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已经预见到新闻媒介（它是官方检查官的眼中钉、肉中刺）将成为控制社会的重要机构。然而，它同样也是一个颠覆政权的工具。马克思毕其终生孜孜以求地运用印刷刊物作为自己的手段，向他的资本主义敌人发起挑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工作者本身属于无产阶级成员，但是他们象官吏、教师、牧师一样，通过把他们从游业无产者较低阶层的社会地位提升出来，允许他们进入统治阶级的上流圈子以便在上层建筑中获得补偿；他们在维护现政权中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其最重要的职能便是欺骗人民，使人民不能认识到自身异化的状况。

新闻媒介的这幅肖像与它在资本主义自身土壤上的形象截然相反。在那里，新闻媒介被视作社会的一个监督者，抵抗当局的一股力量或者是提供教育、信息、启发民智的一个机构。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十一个提纲》① 一文的最后一个提纲中，间接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闻事业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即客观性。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这里的哲学家不仅仅指他们本身，而且还指历史学家和一切用文字语言传播他们社会信仰的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我们的事业在于改变世界。"对世界的所有解释，马克思讲道，都是怀有党派偏见的，它们只是站在一方立场上提供一种或另一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包括被当之无愧地视作第一历史见证人的新闻工作者，仅仅挖掘了历史事件的表层。当他们论及"客观"现实时。便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称这种"客观现实"是保守、反动的，因为无论具有怎样的客观现实性，都要为之进行辩护。总之，新闻媒介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控制机构，它可以通过实施客观现实的法则来拒绝任何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行动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信仰。为使言语真实准确，它必须与实际活动发生相互联系，否则言语就是一种谎言。简言之，这只是思想意识，而不是真理或事实。

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恢复人的自身真正的人格，为了使得言语和行动保持一致，新闻媒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肩负着所有这些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要挫败资本家欺骗工人的企图，而且还要使工人意识到自己遭受剥削，处于异化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本人就承担起了这些任务。新闻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革命先锋队的成员或"先进部分"）的职责，就是使得无产阶级了解其被奴役、当商品的地位，了解其处于异化的状态以及逐步丧失自身真实存在的情形。用马克思的话来表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要把虚幻的意识转变为真实的意识，即向人们展示其现实状况以及真实的人的需求。马克思的武器装备是笔墨而不是刀

① 原文如此，和中译本的译名稍有不同。——译注

枪，但是革命家列宁后来修正了马克思的做法，更强调刀枪的作用。马克思本人最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兼教师，他的教学工具是语言。马克思认为，要占领上层建筑，人们就必须擦亮眼睛，必须识清使人容易上当受骗的仅仅是区区几个文字；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按照罗伯特·基尔罗伊—西尔克的观点来看，上层建筑是产生"虚幻意识的源泉"，是阶级斗争的秘密试器。代表统治阶级权力的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现状和现政权的基础。马克思本人也写道：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因此，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新闻媒介，必然要与国家携手合作，以便使产生虚幻的源能够涓涓长流。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能够起来推翻剥削者之前，应当使自己意识到作为这个阶级的存在。马克思称之为"先进部分"即包括工人级阶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人，担负着启发阶级觉悟，最终是革命觉悟的任务。小说家阿瑟·凯斯特[1]确信，当今苏维埃国家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思想。他对上层建筑这个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含混、笼统，可以容纳许多自相矛盾的解释。凯斯特在《瑜伽论者与人民委员》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社会，有一个底层部分，这就是物质生产；有一个尖端部分，这就是知识生产。但是唯独缺少通向顶层的台阶与电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媒介在它能够加入或引导"先进部分"之前，必须首先认识自身的真正性质，它的目标再也不是提供一些说明，客观介绍双方的观点，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去工作。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用这类术语来表述，对于客观性的价值体系的理解也还并不一致，而且也没有人论述过为了追求客观性而介绍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立场。但是，马克思确实在他的分析中清楚地讲了这个论点。

马克思认为，意识本身只能通过传播交流而存在，在它能够传播交流之前，社会是必需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取

---

①阿瑟·凯斯特(1905.9—)，匈牙利出生的小说家，科普作者、新闻记者。——译注

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便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也就控制了社会。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新闻媒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中，都处于中心位置，它同时构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闻交响曲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决不是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有时候倒是需要一个乐感好的耳朵去仔细分辨他们的不同之处。每一段旋律都充满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既来自内部与本身不和谐之对抗，又来自外部的相互抗争。这种斗争常被人们描绘成一场战役或战争，可能还会带来毁灭。

列宁关于报刊三大作用的理论

列宁改造了马克思的理论，他发现有必要将许多马克思的概念进行修改，使之适应俄国的社会现状。马克思确信，在类似俄国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也能够渴望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在这之前，它必须首先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列宁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马克思塑造成一个致力于革命的人，但是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能作出这种断定。事实上，马克思更多地过着从家到图书馆的书斋生活。恰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才展开了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在路障街垒、防护寨里进行抵抗。

马克思的一生中，尤其到了晚年，很少直接撰写有关新闻学方面的文章。然而列宁在这方面却著述甚丰，并且在发展一种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上比起他的导师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苏联及其它一切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里，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视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闻媒介作用的分析也得到了精心的编纂。

当马克思1883年逝世时列宁只有13岁，他曾两次由于参加反抗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转向了报刊工作，作为他鼓动，声援革命的主要手段。这种情况与18世纪美国殖民地造反者的所做所为极为相似。在统治20世纪世界——即意识形态上(而非实际社会中)的两极世界——的冲突的政治模式中，对立双方总认为自身是纯正清白、牢不可破的。一方认为美德善行和资本主义注定要凯旋获胜，另一方则想美德善行和共产主义也同样会出现在斗争胜利的地平线上。然而，新闻媒介主旋律中的两端最为激烈的调子就是相互指责对方的邪恶。实际上，哪一方都不是纯正清白、牢不可破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是一种模式，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共产主义那一方也同样如此。变化是广泛的，也许是无限的。

从马克思到列宁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区分线，同样，也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一致看法。列宁一直反对19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改良派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改良派认为，由工会领导的群众政治运动通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选举程序，就可以获取政治权力。但对列宁来讲，这种途经是无效的并且注定要失败，只有革命才能成功。他蔑视这种群众政治运动，取而代之以另一种方案：一小群领导骨干（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党严密控制的机器下，直接指挥工人群众。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终在俄国取得了成功，但是那种胜利经过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虽然社会主义在苏联高奏凯歌，但这决不意味着世界各地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同西欧国家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为这种选择而斗争。列宁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在《哲学笔记》中声称："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列宁在俄国既是一个著作家，又是一个演说家。他认为，如果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战胜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的话，如果要征服资本家阶级的话，那么新闻媒介的作用将是至关重要

的。在这方面，列宁遵循了马克思恪守的主张。即必须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但是，列宁超过了马克思曾提到过的任何一方面，并且发展了一套关于报刊作用的成熟理论。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火星报》创办者之一，这家报纸在俄国腹地秘密发行。1901年，《火星报》第4号以大字标题发表了列宁撰写的《从何着手》一文，其中有一节被苏联当局奉为神圣经典，就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的情况一样。这段话是：

☆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和同报纸联系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仅从事地方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的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考虑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它们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影响这些事件的适当措施。

列宁认为报纸的集体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三大作用是一致的。因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和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新闻院校里，都将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列入教学中，以培养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显而易见，在完成追求真理和人类自由的过程中，每项宗旨都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但在资本主义眼里这些宗旨似乎与真理和人类自由相悖，只不过是对政治性语言作进一步阐明罢了。

列宁认为，新闻媒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确信为他们而进行写作的报刊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在培养那些能够运用先进方法引导社会、影响事物进程的领导人员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换言之，就是不仅要教育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而且也要教育领导者自身。如果说杰斐逊曾经宁要报纸不要政府的话，那么列宁至少在1901年时的宣告听起来似乎是宁要报纸不要共产党！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他这么说，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动分子，有

时候会情不自禁受到自身激情本能的驱使，制造出夸张的宣言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杰斐逊和列宁对新闻媒介的潜在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各自都确信其追求的目标就是善行美德。

1917年9月，即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前的六个月，列宁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新闻自由问题作了最透彻的分析。于是，这篇文章便被社会主义评论家在分析新闻自由时到处引用。当时，俄国处于亚历山大·渥伦斯基临时政府统治之下，主要的报刊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列宁的《真理报》由于缺少经费，正在想方设法为扩大发行量而努力。当时俄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些报纸板面充满了广告，同欧洲的一些大报极为相似。列宁认为这种情形并不说明什么自由，而正说明了剥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列宁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列宁简洁明了地提出了他的论点：

☆资本家……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这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

列宁愤怒地指出，接受这一"神话"的不仅是资本家，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内部的敌人，即那些因"无知或守旧"而沿袭资本家思想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模式不但是反对革命的，而且事实上是"黄色下流"的。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威力是靠那些富有的资本家刊登的广告得以维持的。那些资本家由此便控制了报刊的内容。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禁止私人操办广告活动，由政府提供津贴，偿付包括《真理报》在内的所有报刊的广告。只有当"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时候，才会产生真正的出版自由。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占有印刷所和纸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要承认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呢？这种公布不真实的消息的"权利"比占有农奴的"权利"好在什么地

方呢？

列宁进一步论述道，如果所有政治组织都能获得印刷所、新闻纸的话，就可能产生真正的出版自由。列宁断言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下，实行这种分配"可以是毫无困难的"。他指出：

☆这个举动就是国家为了教育人民而不是愚弄和欺骗人民所给予的帮助，这就是赋予所有的人而不是赋予富人的真正的出版自由；这就是同迫使我们容忍富人霸占宣传和教育农民的伟大事业的可诅咒和受奴役的过去实行决裂。

然而，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列宁没有将印刷所和新闻纸给予持各种意见者。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同样实行了列宁曾竭力反对的那种类似的垄断。其辩护理由是党并没有压迫和剥削任何人；相反，党是代表贫穷困苦、遭受压迫的人的利益的。诚然，按照列宁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实行垄断是一种善行美德。并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列宁曾为此受过疑虑的折磨。不仅如此，他们会补充道，这种垄断胜过那些相信美德善行存在于私人广告和根据"第一修正案"而建立的新闻自由的人。关键的问题在于，冲突双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家都确信自己信仰体系中的美德善行，并且每一方都声称他们所开创的模式及其实践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都在实践社会责任理论。在苏联，对读者给编辑来信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种来信在苏联出版物中占据了许多栏目。这是报纸的责任，因为它作为"集体的鼓动员"，应当答复来信的作者，因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首要职责是向人民提供"时事性"、"真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即对社会有益、有关的新闻。

资本主义新闻媒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介都声称彼此用一种道德的方法承担其责任。捷克新闻教育者胡达克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要影响舆论，可以在两种态度中选取一种；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一整套独到思想的倡导者，同时力图使他的读

者相信且接受这些思想；或者，他可以将此当作一项"职业"而工作，全然不顾自己对这些思想的看法，而只准备考虑金钱。在第一种情况中，他显示了客观真实性，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他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伪装成公正，平衡的样子，掩盖他实际上作为一名受雇的宣传员为其老板效劳的真面目。在第一种情况中，新闻工作者"发现了自己在社会力量中的位置，他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在自觉推动有益于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中，充当了一股积极的力量"。胡达克和他在东欧的新闻学教师都是马克思、列宁基本思想和路线的遵循者，虽然这些基本思想已被历史的发展所修正。

让我们来考查一下列宁宣布的关于一种自由报刊的三个目标。这些目标并非他最早提出，列宁自己将这一思想归功于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要求报刊喉舌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学习、宣传、组织"。请仔细查看，这个观点能够在象霍勒士·格利里与弗·伊·列宁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的办报模式中找到明显的相似之处。

"学习"和动词"告知"意思密切相关；"宣传"和动词"教诲"意思极为相近；"组织"则有点儿复杂，我们可以先搁一下。剩余的两个作用：告知和教育，似乎已被世界各地所接受。每一个人论及告知与教育概念时，是将它们视为报刊作用来谈的。有时，这两个作用实际上合二为一。于是如何清楚地区分"告知与教育"便成为一个问题。在美国，这种区分是含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告知，对另一个人来说也就是教育。也许老生常谈的意见可以使我们作出区分，这就是"新闻放在新闻版上，社论则放在社论版上"。这样的话，新闻就成为告知，社论就成为教育。或许并非如此，因为两者的区别模棱难分。但在另一方面，法国的报刊理论家则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它紧紧坚持着列宁的模式。如果将"集体"这个词理解为集合或集聚成的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个词就不会引起很大的歧

义。列宁在李卜克内西关于报刊作用的定义前加上了"集体的"一词，这表明他认为报纸不是向作为个别单位的个人提供新闻和教育，而是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即作为"个人的集体"来提供。如此说来，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同样将他们的读者视作集体，视作个人的团体。

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以及苏联其他22所新闻院校里，列宁关于新闻工作者任务的模式被精心教授，集体的鼓动员被解释成"提供每日事件的新闻"。这个解释出自每次招收2500名学生的莫斯科学院院长雅申、查苏尔斯基之口。

至于"提供什么新闻"这个基本问题，查苏尔斯基认为，它必须是符合读者客观需要，提供"任何有助于人们行为和行动的新闻或评论"（查苏尔斯基语），新闻工作者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新闻，至于行为和行动则产生于第三个职责——"集体的组织者"。查苏尔斯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新闻模式不仅强调供给新闻一面，而且还竭力提供市场待售物品——广告。读者受到新闻的诱惑而购买报纸，但实际上，他们却得到了并非需要的东西：多余的产品和无用的闲言。苏联理论家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新闻：首要的和次要的。首要的新闻是符合人们需要的，次要的新闻则涉及不必要的东西：广告、闲言和娱乐。这两种类型都属于集体鼓动员的范围。按照胡达克的观点，提供新闻的职责严格说来是"传播积极的经验，鞭挞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如果仔细从语言上考查，感情上不带政治色彩的话，马克思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在提供新闻这一目的上何其相似！各个社会制度下的新闻媒介都要对一切越轨现象进行批评并为社会的健康发展而工作。事实上，人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报刊分析家也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社会主义关于新闻分成首要、次要类型的观点，即首要的就是读者为了履行其民主的义务而需要得知的，次要的就是读者在好奇心驱使下想要得知的，或者是一种想要得到娱乐的愿望。苏联的

新闻工作者被教导道，包括艺术需要在内的次要功能是与客观需要不一致的。客观需要指的是食物、衣服、房屋及其他必需品。查苏尔斯基指出："这是需要与兴趣的关系"。

报刊的第二个作用，"集体的宣传员"也不存在什么疑难问题。按照查苏尔斯基的说法，它包含"阐明社会变革工程的意义并对事件的原因进行追究"。此外，它还提供"及时的解释"。显然，马克思主义模式以及它的说服职能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编辑部文章、社论、专栏并无多少差异。

对报刊"集体的组织者"作用的理解比较复杂一些。按照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所有想要改变社会制度的人的观点，新闻媒介是驾驭社会舆论、动员人民战斗的工具。查苏尔斯基将这个目标描述为"塑造人的灵魂、改变人的行为"。他用天气预报为基本例子说道，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消息将使读者带上雨伞，因此，"我们谈论的是一件直接诉诸行动的事情"。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中，组织处于中心位置。在这种情形下，新闻媒介与人民群众便合二为一。正如胡达克指出的那样："集体组织者的功能代表了先进的新闻事业的特征。它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扬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他进一步写道：

☆反动派的新闻事业，由于它维护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与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拥护。相反，它瓦解进步运动，试图转移被剥削被压迫人民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的视线。它通过操纵手段来实施这些功能……进步的出版物则运用工人群众的来信，争取作者之外人士的协同合作，使作者自身与群众政治运动溶为一体，组织起来，去努力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先进的新闻事业中，这种群众性的参与活动其价值不在它本身。在铲除历史残余，扫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把集体经验和智慧相结合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新闻工作者与"真理的道路"

要评估苏联新闻媒介究竟如何准确地实践了列宁模式是很困

难的。西方极为普遍采用的民意测验，在苏联则作用十分有限。但他们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些确实存在的民意测验表明：苏联公民认为他的报纸是他能获得的所有工具中最有效、最满意的一种，他可以用它来督促当地行政机关的工作。有一个民意测验更确切地表明，正是报纸首先能够向当局提出“全体人民的要求、评价、建议和需要”。当然，苏联发表读者给编辑来信在出版物中所占比例之高，令人惊叹不已。在《真理报》读者来信部，至少需要45名工作人员筛选来信并刊用发表。据说《消息报》发表的读者来信占它收到来信的四分之一之多。

苏联人是如饥似渴的报纸读者，同时也是热情高涨的电视观众。对苏联公众的研究表明，他们与美国公众甚为相似，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观众看电视的时间越少，并且对新闻和文化节目兴趣较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越迷恋于猜谜和具有人情趣味的节目。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视观众一样，苏联人也说他们更喜欢看娱乐轻松的节目。

根据已得到的民意测验资料，苏联的新闻媒介似乎并没有很成功地发挥其组织的职能。总的说来，苏联的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仿佛对当地的事情不甚关心；相反，对国际新闻，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却兴趣倍增，有多多益善之感。1976年的一次有关苏联问题的研究显示，所有城市报纸的报道中，读者对报道该城市自身的东西最不感兴趣。这可能是由于苏联大众传播媒介强调传播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注重有关是非、合理行为方面报道的结果。甚至连电视上的猜谜节目也要加进一些可怜的说教。举例来说，有一个名为“走吧，姑娘”的电视节目，每月播出一次，它给每位参赛者提供了一次获取微不足道奖励的机会。当然，参赛者的动机并不是想致富，而是有机会去表达如何改进他们的工作，如何论功受奖。显然，这类节目不象那些无内容的娱乐性节目更受到观众的青睐。对苏联观众作过些详细研究的埃论·普罗珀·米基维兹认为，在电视和报纸上所能得到的与观众

苏联报纸的版面数量有限。声称日发行量达1100万份的《真理报》也仅有六个版面，并且它老是遵循着一种固定的格式。第一版通常刊载社论，来自苏共领导人的官方新闻、几条国内外简讯和一些有关国家经济的情况；第二版是有关共产党的报道(《真理报》是党的官方喉舌)；第三版刊登国内新闻、读者来信，并且经常发表一些调查报道的结果；第四版续登头版刊载不了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外国新闻，一般是关于共产主义世界发展变化的消息；国外新闻报道在第五版上，最后一版内容则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体育、人情趣趣、幽默、无线电与电视节目单、有关医疗卫生的实用资料以及其他如杂文一类的东西。照片很少，也没有关于犯罪的报道，只有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例外，难得有什么著名人士或电影明星的报道。时效性对苏联新闻媒介来说并不十分重要。报上的文章通常报道的是好几天前的事情。然而，东欧追求时事性新闻的劲头似乎与美国一样强烈。它们的差异可能是竞争造成的，因为外国的报纸很容易在东欧得到。苏联报刊的内容与资本主义报纸平常的内容相比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参观游客总是抱怨《真理报》和其他苏联报纸枯燥无味；相反，苏联去美国的访问人员则指责美国报纸的耸人听闻且缺乏满足读者需要的东西。

有趣的是，苏联的读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报纸客观真实。资本主义办报的公式——对一个问题提供双方面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中并不认为有什么价值。因为那种模式认为只有一个客观现实，所以提供与现实相反的错误的观点只能起到反作用。在苏联模式中，客观性更与真理而不是与公正紧密相关。

苏联的信仰体系坚持认为美国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被犹太资本家掌握并操纵。许多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似乎至少在表面上也持有这种信念，甚至于连那些去过美国的人也不例外。美国许多报纸办公室杂乱无章的状况使他们惊讶咋舌。因为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真理报》编辑部大楼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办公

室设立于两边。除了开会，编辑们几乎很少串门交流。苏联鼓励刊登调查性报道，报纸，尤其是地方报纸，用固定的版面发表揭丑的文章，揭露地方上贪污腐化、渎职无能的种种情况，并询问为何不采取措施去纠正这些弊端。报刊上还经常公布详尽材料，评击嗜酒如命导致中毒的人。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于1979年将列宁奖授予了《文学报》编辑亚历山大·查考夫斯基。这家报纸是苏联最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的大众报纸。即使如此，它也极少涉及国家和国际间的问题，调查报道的许可范围有着严格的界线，有些主题明显受到禁止。

苏联新闻工作者是否甘愿遵循苏联的准则、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路线工作呢？大体说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苏联一位最主要的电视台记者斯维拉娜·斯特罗达斯卡伽，提出了她自己的关于苏联记者责任的"四种理论"：

☆首先，使你自己满意，力尽所能，做出最好的工作；第二，使你朋友满意，即你所结识的、在你圈子里的那些人；第三，使你的观众满意并感受到你的活力；第四，使你的政府、社会、政治制度满意。

在这四种划分之间，何时会发生冲突？斯特罗达斯卡伽说，"你希望它们没有，但是在所有的划分中，你必须使你自己满意"。这种戒训与波洛尼斯对莱特斯的忠告极为相似："对自己必须真实……"。这样，所有政治制度下的新闻工作者都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实际上，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似乎更关注新闻业务，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当然，在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诸如美国，对新闻媒介的限制要比苏联少一些。一位在苏联曾工作多年的美国记者回忆起他与一位苏联记者的旅行。这位苏联记者不仅谴责了美国的一套东西，并且也抱怨苏联生活费用高，缺乏足够的住房等问题。于是，这位美国人便问那位苏联同行为何不把这些口头指责拿到报上去进行抨击，这位苏联记者喝了许多伏特加酒之后，突然爆发

出一阵抽泣，口口声声重复道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批评苏联社会的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新闻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其它一些国家——是如何经受政治、经济强力集团控制的。然而，在苏联及其它的盟国也同样受到这些压力集团的控制。于是，我们又一次陷入了“语言上的政治问题”的泥潭之中。显而易见，“控制”一词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报刊分析家和理论家来说具有不同含义。

不管怎样，胡达克提到的读者来信和“人民大众参与先进的新闻事业”是极其重要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才对亚洲、非洲的新兴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浪潮。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新闻媒介要取得成功，总的来讲，也要取决于投公众所好的做法。新闻媒介激发起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制度下的人民大众在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冲突框架中去感知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所存在的问题。

1956年，由三位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弗雷德·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韦尔伯·斯拉姆合著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由斯拉姆撰写的一章，题为“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研究社会主义新闻媒介模式中影响最广。但是它是处在政治上动荡不安的紧张时期。也就是人们记忆中带有冷战色彩的时期起草的。自从那时以来。许多考查研究苏联新闻媒介的材料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被发现。然而，正是由于斯拉姆的分析，才使苏联新闻模式成为美国和其他各地的普通常识。

但是斯拉姆的问题出在，他的分析是怀有敌意的，他局限于“我们对他们”的框框中看问题，这种方法使他着魔于美国新闻界对苏联的分析之中。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不用费力就能断定好人与坏人。

这种区别会在以个人观点谈论这个题目时找出分歧并加以强调。这样，斯拉姆便能做出一种荒谬的区分：苏联的新闻媒介是

一种"工具"，而美国的则是一种"服务"。事实上，苏联和美国的传播媒介都是工具，支持那些使它们得以出版的人的利益；同样，对这两个国家的报刊杂志的读者来说，传播媒介又是一项服务，广播与电视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确实看到，苏美大众传播工具就其目的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根本的差异，然而这同样不妨碍它们同时存在着根本的相似之处。"我们对他们"的框框使人缩小了共同点，夸大了分歧点。

斯拉姆用贴标签的制作方法造成了分析上的破绽是显而易见的，他说，"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苏联的制度至少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制度——确实是历史上最受严密控制的制度之一。"另一方面，他提到了在"自由世界"中的报刊结构。我们极有必要指出，因为我们面临着分歧，所以亟需努力以避免造成全球对抗的危险，然而，所有分歧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便是存在于符号和语言中的冲突。

我们用符号指代行为和思想，这促使了误解的生产，同样，也引起了对词义和内容的激烈争论。当甲方称其为恐怖分子之时，也就意味着乙方可称其为争取自由的战士。政治暗杀不等于凶杀，对富人或穷人的抢劫并不等于语义上的"抢劫"。社会学家已经指出，"越轨行为"常取决于按照观察人角度对"越轨"的理解。约翰、伯顿认为，人们在遭受挫折或厌倦其社会环境时，会作出三种可能的反应，"即忍让退却，在合法的范围内寻求刺激，不论法律是否许可进行改革或开展革命活动。"对于苏联的分析家来说，美国的社会环境是越轨的，而对美国的分析家来说，情况则恰好相反。在两极的终端，一方的社会制度被看作是既令人厌烦又挫败累累，因而其老百姓受到了异化，同样，这一方的社会制度的辩护者也被认为他所辩护的东西不是错误就是歪曲。

我们并不打算诋毁斯拉姆和其同事们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上所想得到的之间不够吻合。

所做的工作。他们努力的结果便造成了一种新闻媒介的分类体系，因而值得交口称誉。然而，我们也十分注意它所产生的曲解。许多曲解产生于符号使用的问题。另外，简单化的做法，即试图压缩现实，并将其装进固定的框框的做法，都导致了其它曲解的产生。瑞士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一个时时被重新挖掘、研究的人物，他告诫道，谨防"可怕的简单化"。

我们在沉思关于世界上新闻媒介所传播符号的意义时，注意到布尔克哈特对爱国主义的评论也许是明智有益的，他指出：

☆我们想象的爱国主义常常仅是用来向其他民族炫耀自豪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爱国主义便处在真理道路之外。说得更糟一点，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同伙人之间的党派纷争；事实上，它仅仅是在靠给他人造成创痛的过程中形成。那种历史就是新闻事业史。

我们希望，新闻事业能够比"那种"历史做得更多！

第六章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

新闻教育：社会控制的手段

社会主义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的烈焰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迅速蔓延，但是它们决不仅仅局限于在德国、法国、俄国广泛传播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事实上，这股思潮在美国引起了一阵阵反抗放任不羁的自由企业制度泛滥成灾的进步党人运动。此后，社会主义者林肯·斯蒂芬斯为苏俄的成就欣喜若狂，他的朋友，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投身于十月革命，死后荣获盛誉，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列宁陵墓旁。厄普顿·辛克莱号召人们向罪恶的资本主义庞然大物造反。20世纪初，甚至连沃尔特·李普曼都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换言之，在苏联计划经济土壤上生根开花的种子被移植于美国，但在美苏两国绽开的花朵却有天壤之别。类似苏联的花一旦在美国开放，就将遭到剪除，这就和在太平洋西北地方的贫民一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福音就会遭到执法者严惩一样。匈牙利、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一度夺取了政权，结果遭到了反叛乱的血腥镇压；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盟国（战败的德国也加入进来）纷纷出兵讨伐俄国，试图征服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最后却招致了失败。

西方协约国及德国企图在俄国领土上吞噬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计划付诸东流，但在自己国内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却战果赫赫。

资本主义出兵海外，进行短暂的武力讨伐，造成战火迭起，局势动荡，直到1921年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家园里站稳了脚跟才趋于平静。与此同时，经由列宁修改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苏维埃生活方式，苏联的新闻媒介开始迅速地实践列宁的有关理论，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没有对列宁的理论进行修改。斯大林本人是苏联报刊一位多产的撰稿人，他声称他取得的一切都归功于列宁的报刊学说。于是，苏联的新闻媒介便充当起为苏联领导人及其严密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的首席拉拉队队长。

同时，有别于列宁主义教义的美国新闻媒介也充当了美国领导人的政策，行为及其完整的经济制度的第一号吹鼓手。19世纪末，美国自由竞争的企业制度开始向现代企业工业国转变。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受了脱胎巨变，纯粹的自由竞争在美国内战后不复存在之时，资本主义的信仰体系却几乎完好无缺地延续到20世纪。尽管自由企业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然而本世纪20年代却是印度颂扬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就象美国公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致富计划后面不知疲倦地狂热追逐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已经销声匿迹的自由竞争倒变成了一种成熟的盛行的思想体系，并且为进步党人运动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个运动本身则是公然抵制自由企业的说教。这样，美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西欧不同，至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如此。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经过几十年时间萌芽于美国和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最终，徐徐地扎下根来。

本世纪20年代，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已登记注册，反托拉斯条例也得到贯彻实施，但是这些改革几乎无法压制人们用股票投机、不动产交易或任何商业冒险以便跻身于美国上流阶层的强烈欲望。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去干，因此，美国的无产阶级想过上好日子并不需要新思想，不需要共产党。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要什么党就可以自食其力，过上殷实富足的日子。一个世纪前，欧洲曾

在美国这块大陆上享有无穷无尽的机会，至今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美国仍然不失为一个提供无限机会的乐土园地。

这期间，美国新闻媒介的发展改变了方向，新闻事业出现了新的变化，新闻事业作为一门学科登上了美国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对此，老前辈本杰明·戴和詹姆斯·戈登·班内特曾经嗤之以鼻。普利策于1903年指出新闻教育的建议，不久，新闻学便进入了美国的大学。普利策提供了一批基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一所新闻学研究院，然而，由于细节上的争论不休，该学院终于推迟到普利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才得以创建。在此期间，已有五所院校开设了新闻教育课程。密苏里大学于1908年开始了新闻教育课程，它是公认开设新闻教育课程的第一所大学，同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建立，威拉德·布莱耶创办了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并担任系主任，他写的美国新闻事业史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新闻界人物的肖象，使好几代记者、编辑和学者为之倾倒。

我们在考察新闻媒介在社会制度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问题时，重视新闻院校建立的时间程序，重视那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是极为重要的。到1921年，美国建立了20多个新闻系和新闻学院，整个20年代，全国又有25至30所新闻院系向学生敞开大门。威斯康星大学的布莱耶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任院长沃特·威廉斯是这块新兴园地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当时"密苏里报业联合会"发起要求建立新闻学院的倡议，于是密苏里大学热情认真地推举了老报人威廉斯为首任院长。威廉斯开设的课程重点放在业务知识——报道、特写和广告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要通过办学生报纸《密苏里人》获得实践经验。布莱耶是一位英国教授，他在威斯康星运用的教学方法与威廉斯有些不同，新闻系不办学生报纸；相反，他强调全面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写作和社会科学知识。据校史介绍，在培养新闻工作者方面，他的教育方法比起那种光注重实践业务训练的方法"更管用"。

侧重业务训练还是侧重全面知识？时至今日，围绕培养新闻

工作者的两种方法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即便如此，两者在新闻学基本思想体系上所持的立场大同小异。无论密苏里或威斯康星都是透过资本主义和进步主义这块棱镜去感知世界的。

二三十年代美国新闻院校对学生进行的信仰体系教育几乎与东隅苏联用刻板的意识形态理论教导其新闻系学生一模一样。此后数年，新闻学课程几乎遍及美国各所高等院校，教师和教授们已很少在美国课堂上涉足进步主义或自由竞争那套东西，鼓吹这些东西的人数量很小，当今独霸美国意识形态讲坛的情形与1912年或1921年的形势颇为相似。

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究竟是什么？它由什么组成？无疑，这些问题从未象社会主义世界列宁三大作用理论编纂成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那样被清晰地阐述过。事实上，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常对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表示不同的看法，这里的新闻媒介指广播和印刷媒介。从意识形态上分析，大众媒介之间并无不同。对某些人来说，那个所谓新闻或新闻媒介作用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新闻记者常说："我们的差使就是搞到新闻。"对他们来说，关于媒介作用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政府干涉之味或卖弄社会学行话之嫌。即便如此，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确实存在，它由四条信念构成：（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这些以宣言形式逐条列述的准则也可以被解释成一种道德规范，换言之，他们以宣布新闻媒介**应该**是什么来取代新闻媒介的特征**是什么**。"是"与"应该"混为一谈，"描述"与"指令"张冠李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界论坛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希望摆脱威胁分析家陷入"混淆"泥潭的困境，为此不主张区分新闻媒介"是"和"应该"的问题，并设想资本主义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应该将这两种意思全包含在内。尽管细节的解释各有千秋，"是"与"应该"的问题可能引起龃龉，但这四项信

念却是美国、西欧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工业国解释新闻媒介问题的根本法宝，

大多数资本主义新闻界分析家都对新闻媒介怀有三大期望（有时是四个）。他们一致倾向于媒介应该具有告知、娱乐、监督当局三种作用。还有一些人坚持第四种广告作用，即怎样根据市场情况做广告。在美国，尽管教育作用有时被视作告知的一部分，但一般情况都被人忽视。在法国，教育作用和告知作用区分得一清二楚。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或资本主义国家分析新闻媒介的根基在于第二章论述过的民主假设，即通过新闻媒介提供的消息使得公民能够做出恰当的民主抉择。正是这种假设给予新闻媒介的四项信念及三大期望（或四个）奠定了哲学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以各自教条主义的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来看待新闻学上的问题。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市场（或企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追随人，都同样钻进了各自教条的圈套难以自拔。每一种教条或信念都是虚幻的，尽管如此，报刊、无线电仍旧加以宣扬，而且还用它去培养未来的从业人员。有人可能会指出这种情况在新闻院校普遍存在，并且他们暗指的事实是：只是偶尔出现一两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更多的则是自由企业制度原则的反对者。实际上，确有一些可存异议的安全岛，但几乎没有什么船只能够最终停泊进去，因为接受这些信念的压力不容抗拒，年青的记者如同报界的同仁、坚持信念者以及社会大众中的思考者或思想家一类的人那样，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一切。总之，勇敢的新闻界为了百姓的利益同盛世强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抗争成为一个迷人的神话，这个令人销魂的童话在20世纪的美国，几乎每个投身于新闻事业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接受了它。

虽然童话并不可信，但没有理由抛弃其中的浪漫色彩。当然，新闻媒介可以带来不少益处。但它本身并不独立，而是作为权力的工具进行运转。它是一个机构，但它不是恐怖惊险的秘密谍报

机关，新闻媒介的产品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处于隐蔽之中的则是公众群体而非媒介的负责人。无论何种形式的掌权者当道——政府、政党、团体，都竭力想要掩饰它同新闻界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暧昧，只要新闻界进行幕后操纵，那么新闻媒介就不可能使它成为重要的公众服务机构。新闻媒介唯有在公开的情况下施展力量，发挥作用，才能为所有人的利益进行工作。

美国的新闻院系虽然起步谨慎，但如今已跻身于名流学府之例，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报考入学，并有数以千计的中学生攻读新闻学的课程。孩子们上学第一年就学习有关报纸和无线电台的知识，他们刚学习写作，教师就鼓励他们向校刊投稿。作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他们学到了有关自由报刊作用的知识。因此，到这些青年男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时，他们至少在学校里已经同新闻界的习俗、信念打了12至14年的交道，显然，他们在自命不凡的新闻界鼓吹其威力、影响、价值的报道中被社会融化。这些滔滔不绝的报道材料并不可能都带有讽刺色彩，当所有的教条剔除了难题，去掉了疑问之后，这些信念就自然而然为人相信。即使遭到挑战和质疑，新闻界也已经准备了现成的回答，因为在现代工业国里，每个公民对新闻媒介都有其自已的"观点"并且愿意说出那些"观点"。许多谴责新闻媒介所作所为的人不是出于切肤之恨，而是出于关心热爱，他们希望新闻媒介在名声扫地前"恢复"受人尊敬的地位。由于美国人历史感的不足，因此任何信念就极容易在那些对历史情况一无所知的人的头脑中形成。在这点上，桑塔亚那①是对的，他说应该指责那些不懂历史的人，让他们学习历史。

鼎盛之际的美国进步主义、甚至人民党主义的思想在新闻院校，尤其是在新闻院校发源的中西部地区出现和传播。共和党前

---

① 桑塔亚那(1863.12—1952.9)生于西班牙后移居美国的哲学家，诗人。——译注

身的辉格党人对那段历史的解释获得公认，即，每一天、每一方面，事情都在不断好转。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帆风顺，所以在道义上虽然优越于19世纪欧洲君主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寡头统治，当然它们也有改进与发展的地方。在这过程中，新闻界充当吹鼓手的先头部队，揭发丑闻的斗士成为英雄，监督者的准则成为圣旨。于是，来自新闻院校的学生情不自禁地置身其间，慷慨激昂，挥斥方遒。他们还支持应由广告商而不是政府来提供报刊财源的主张，因为人们认为广告商无缘问津政治争端，也无意控制报章的内容。一旦广告商这样做了，就会被口诛笔伐，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境地，进而提醒他们记住报刊的主人是谁，新闻媒介的使命是什么。威尔·欧文及其同仁的见解已家喻户晓，其尺度就是让那些广告商人，企业经理待在董事会议室而不是新闻编辑室里，不逾雷池一步。新闻院校的护守神约瑟夫·普利策将这一信条阐述得最为清楚。

在这些院校中，泛滥成灾、耸人听闻的小报受到了猛烈抨击。新闻院校毕业的严肃记者避免涉足危言耸听的东西，相反，他们恪守客观性原则，对煽情小报进行了有力的抵制。那些堕落的报纸，犹如亨利·福特[①]年代的廉价小汽车一样，操起了所谓"爵士新闻学"的行当。新闻院校的毕业生以普利策为榜样(普氏至少在后期大力倡导真理和准确高于刺激和利润的思想)自觉抵御了这股煽情主义的行当。这一时期，也是新闻通讯社(或他们称之为"电讯社")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打着客观性招牌鼓吹政治中立的时期。

那时，新闻院校的信仰体系是，展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面前的是长治久安和不断的进步。在实现这个光辉前程的过程中新闻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新闻媒介的财政结构保障报刊经

① 亨利·福特(1863.7—1947.4)美国汽车制造商。1903年创福特汽车公司。首先推行标准化，使用装配线，成为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译注

济上的兴盛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客观性方向是保证未来兴旺发达的前题。新闻教育开创之初，对高等院校的教育成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少数编辑喜欢从新闻院校中招聘人员，更多的则对高校培养出来的记者心存疑虑。许多编辑更愿意要那些如俗语所曰"在艰难挫折学校"中熬出头的毕业生，因为他们从中汲取的经验多于院校的正规教育。

本·赫克特①时期第一流电影《头版新闻》主角，记者希尔德·约翰逊的形象（他曾数百次出现在银幕与小说中）就是这种教育的典型。约翰逊外表上放荡不羁、纸醉金迷，骨子里却正直善良；他不修边幅，入林于蛮荒西部的草莽英雄之列，对这类好汉来说，啃书本的价值是令人怀疑的。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开始从新闻院校中招收人员。偏爱传统、抵制本本的出版商无法抗拒新闻院校给他们经济上带来有利可图的诱惑力。这种好处意义重大，出版商通过招收毕业于新闻院校的学员可以去掉开支巨大的职业培训费用，他们能够——也确实——要求院校毕业生不仅掌握娴熟的采写技巧，而且必须精于制作大字标题，懂得广告和预先销售的原理。面对这样的绝妙良机，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培养这批学员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费用，可以相信这些记者能够接受——事实上能够推动——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这种毕业生既能维护习以为常、讲究效益的社会现状，又无须自己花钱培养，他们实在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最好人才。州立高等院校用公共基金建立了新闻院系，为新闻教育掏了腰包的恰恰是纳税人。私立大学的费用则由学生或他们的家庭以学费，捐款的形式支付。哪一种情况都无须报业主出钱。近年来，许多报社和无线电台更加生财有道，通过见习金计划进一步降低了支出，实习生只

① 本·赫克特(1894.2—1964.6)，出身于俄国犹太移民家庭的美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剧本作者。1931年写剧本《头版新闻》。——译注

是以自己的学术成绩取得一定的见习金，但一般情况下是毫无收入可言的。

虽然美国新闻院校本质上是培养新闻媒介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栋梁之才，但是新闻媒介自身却时常在课堂里、研究中经受批判性的检查。学生要定期评价在新闻媒介的工作情况，经常要检验报纸、尤其是电视新闻是否达到学生或教授的期望。然而，这种活动并未受到新闻界的普遍赞赏，他们争辩道，新闻院校应当集中精力训练学生新闻写作与编辑的业务技能。有一伙倾向保守主义的新闻理论家想效法诸如前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那样的批评家。1969年，阿格纽抨击了首屈一指的全国性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三大电视网，在新闻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阿格纽认为，替这些新闻媒介工作的记者属于东部自由派大本营的人，因此他们的观点不代表中部的美国。

1977年，一批保守主义出版商依照阿格纽的传统思想，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全国新闻出版中心"，设置实习生训练课题，课题是"传统价值观的来龙去脉"。用保守派专栏家、中心主任M·斯坦顿·埃文斯的话来说，"不计其数的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这样的教育，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或者美国是帝国主义，新闻事业应当是一种推行进步政治思想的方法"。美国一些新闻界的批评家认为，新闻院校里的传统教育还不够保守、不够正统。冷静公正的观察家对此感到震惊。然而，新闻学教授和研究生召开的大会和各种会议表明，他们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有关维护、加强包括客观性法则、传统新闻价值观的教育工作在内的信仰体系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新闻院校重视业务实践训练为美国的首创，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新闻院校里，并未将此作为自己牢固的立足之点。西欧高校中几乎没有迹象证明它们开设了新闻业务实践的课程。那里的教员反对这种主张，出版商也对别人来训练其作者、编辑的做法不感兴趣。大西洋两岸的这种

差异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双方新闻媒介政治结构的不同。在美国，广告收入长期以来一直是新闻媒介主要的财源支柱，政治上的"独立"早已被视为美德。广告商们几乎不可能在代表相反政治观点的新闻工具上发表见解，因此，政治上独立促使了最大限度的广告收入。在欧洲，报纸极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倾向色彩，新闻媒介传统上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经常赤裸裸地充当政党的工具。这些党派机关的喉舌更执迷于政治劝服活动，而不是最大限度赚取广告收入。于是，出版商对其成员政治上的要求胜过了对写作、编辑、版面设计及标题制作的技能要求，因为那些东西可以在工作中教会他们。在大不列颠、法国、德国，出版商们一直喜欢从大学里的经济、政治甚至拉丁语和希腊语专业中招雇人员。欧洲的大学很少有学生报纸，多年来，牛津学生主办的学生报纸只是其中少数的一例。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远东的影响甚于欧洲；南美洲、台湾和朝鲜的许多大学纷纷开设新闻学课程，日益增长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非洲及中东。然而，所有这些学校的培养教育都更为重视新闻学的历史和哲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业务技能和实际操作。

近年来，欧洲新闻界似乎不仅领悟了体现第一修正案精神的美国新闻学的奥秘，而且还采纳了它的风格，即：重视句子、段落的简短精练，措辞用语的尖锐跌宕，甚至也接受了其培养记者的方式方法。举例来说，德国的报纸不但开始读起来象美国的报纸，而且它的高等新闻院校也日益重视业务技能的训练课程，比起德国，欧洲其它国家的步伐要缓慢一些，但是，美国新闻学的思想体系和教学方法从西向东不断推进，其结果是，报刊的政党倾向正被其表面上的"客观性"和摆脱党派纷争所取代。

亨利·卢斯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

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成就与通用新闻通讯社、新闻杂志，广

播电视等新的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同步相联。报纸和大众杂志比自由竞争和进步运动的胜利较早一些，此后，每一种更新的大众媒介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企业精神渗透人心、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环境之中，这同样也是一个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敌手与挑战者出现的时代，如果美国意识形态是“好”的话，那么苏联就是“坏的”。

在大型新闻杂志中，再也没有比其“开山鼻祖”更强烈地显示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了，如今这份杂志遍布世界，并处处在大众媒介中力负重任。这份被奉为典范而群起效仿的杂志就是《时代》周刊。它是耶鲁大学两位早慧的年青学生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智慧的产物，这是他们在世界新闻史上创造的一项新的奇迹。这份引人注目的周刊自称（它的销售口号）它将以轻松流畅、易于理解的形式荟萃一周来的新闻，为读者提供令人信服，清楚明了的新闻内容。正是这一思想产生了他们的《时代》。当1923年《时代》杂志诞生时，这两位年轻人年仅24岁，然而，他们在30岁时已经一跃变为百万富翁。卢斯与哈登凭着敏锐的直觉领悟到美国的广大读者并非象普遍以为的那样钟情于“客观性”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读者们急切地渴求矫正新闻社电传机上倾泻而来的枯燥干瘪的词句。他俩好象深谙畅销商品必然居于刺激煽情的小报与苍白无力的新闻短讯中间的诀窍。

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年轻人显然改变了20世纪资本主义新闻体系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正是卢斯在1941年出版的一本著名小册里宣布，20世纪“极大程度上必定是美国世纪”。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就认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将来会兴风作浪。这位虔诚的反法西斯斗士声言，美国世纪将大大超逾德国的任何叫嚣。卢斯说道，在对抗美国霸权的过程中，“纳粹宣传部的嘲讽呻吟、龇牙尖叫、嘶喊咆哮只是短暂瞬间的现象”。大战结束时，卢斯又转换了敌人的目标，他在余生年间率领美国人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竭尽全力反对苏联及其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美国的两位最显赫、最赤裸裸的反共分子——卢斯和“大规模报复”理论创始人、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均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这种情况大概决非偶然。卢斯与杜勒斯追随另一个长老会牧师之子伍德罗·威尔逊兴风作浪。威尔逊提出的道德主张刮起了一阵“十字军东征”式的旋风，开创了一个时代；进入“美国世纪”的新闻界则紧紧响应，成就显著。威尔逊、杜勒斯和卢斯受过严格的道德训练，对纯粹的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笃信不疑，毕生效力于将这种制度通过政治“圣灵”即美国的力量使其推广到世界各地。威尔逊视梅特涅及19世纪鼓吹力量均衡论理论家为魔鬼撒旦的具体化身，到了杜勒斯和卢斯那里，则把他们变成了邪恶的共产主义。

卢斯与哈顿首创的《时代》模式不仅简洁洗练、主观性强，而且质朴坦率、直言不讳。对于《时代》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不能解决的难题，甚至最棘手的问题也不在话下；所有的问题都找得到答案。正和一位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卢斯“反对复杂性”。此外，他俩还推广了群体新闻学的做法。文章不署名，由一群记者编辑采写报道，他们的文笔有棱有角，优美精巧，并注重复合形容词所产生的韵律；文章的主题要高屋建瓴、显得铿锵有力；通过复合形容词的运用，使文章中的人物形象洗练而迅速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总之，《时代》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白璧无瑕、井然有序、清楚明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对美国和它的经济制度进行歌功颂德。它争取读者的目标是中部地区的美国人，或按卢斯说法是“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有知之士”。

哈登于1929年去世，31岁的卢斯独揽大权，在《时代》和《幸福》(1930年创办）及此后的《生活》、《体育画报》等杂志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的所有出版物均效忠自由企业制度，颂扬工商业巨头[①]的美德智慧。正是卢斯将“巨头”这个日本词指代美国

① 英文巨头(tycoon)一词系从日语大君　将军（德川幕府时代的将军）一词转申而来。——译注

的白璧特①。他甚至还自视为辛克莱·刘易斯小说中的人物，竭力鼓动其读者拼命寻求生财之道，并以此为荣。卢斯是一位成就辉煌的企业家，生财有道，他沾手的每样东西几乎都变成了滚滚金元。难怪他相中"巨头"这个日本词，因为卢斯本人就是他的时代最大的报业巨头。

卢斯自封为共产主义敌人的救世主。他既赞美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发展，又从神学上痛恨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苏联和正在涌现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无神论现象，这两者紧密相关，溶为一体。卢斯的对头（他有许多），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拥戴者不无道理地指责他是后来称之为"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头面人物。这群由企业首脑，反共作家、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要求强大的美国插手介入中国，以阻止共产主义的席卷。等到共产党接管之后，他们又不停地攻击罗斯福把中国"出卖"给了共产主义，卢斯不仅竭力为蒋介石歌功颂德，而且也为南越领导人大唱赞歌。他是支持美国干涉远东主张的最坚定的吹鼓手。

卢斯脑中的世界图像既狭窄偏隘又带宗教色彩，他肯定继承了其传教士父亲的性格。他父亲是一位19世纪的沙文主义者，象那些传统的美国爱国分子一样，支持对墨西哥、古巴开战，将美国的道德标准推销到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有色人种国家去。在这种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影响下，美国要把自己一套美德带到亚洲黄种人那里去，于是便发生了对越南的干涉。卢斯的世界观与列宁著作中描绘的帝国主义形象毫无二致。时至今日，苏联的新闻媒介仍继续将此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模式。

《时代》杂志取得的异常成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新闻媒介。短时间里，美国报纸竞相仿效《时代》周刊的语言文体、报道结构；日常报刊日益增多地开辟"分析性"报道的专栏，这些报道

---

① 白璧特系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粗俗实业家，现常用来形容美国工商界企业家。——译注

均师承了《时代》，即：十字军讨伐式的道德说教、大量充塞反共产党事件的解释、现成解答复杂问题的肤浅分析等等。意识形态方面无新东西可言，这是美国报刊的一个特点，所新之处就在于它突出了重点，另一方面，《时代》杂志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对报业不无作用，以致于模仿之举达到令人作呕的地步。此外，报界还发现《时代》的一套格式已被公众广泛接受，特别受到政治上有权有势、地位较高的中产阶级的欢迎。也许当初人们忽略了《时代》杂志字里行间笃信宗教的语气，但如今也被人仿效。从此以后，新闻媒介兴师动众，从道义上对魔鬼恶棍大加鞭挞，约瑟夫·斯大林和理查德·尼克松、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和伯特·兰斯纷纷被新闻界囊入讨伐之网。《时代》杂志也同样影响了欧洲报刊的文体和内容。类似的新闻性杂志犹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横贯大陆，直至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卢斯1967年去世后，《时代》杂志的面貌逐渐改观，署名报道开始出现，不加鉴别地赞美资本主义的现象也随之告终。许多不同意卢斯观点的作者、编辑，如今能够批评自由竞争的泛滥无度，能够摒弃对蒋介石和越南腐败首脑们的拍马奉承。《时代》周刊现在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新闻周刊》大同小异，难以区分，后者目前受《华盛顿邮报》公司管辖。曾几何时，《新闻周刊》的激进自由主义观点遭到卢斯的痛斥。但是，尽管有了种种变化，《时代》（还有《新闻周刊》）仍继续给读者提供“解答”。另一方面，公众问题的复杂性迄今得到某些承认，杂志上不断增辟批评美国领导人的栏目。然而，批评几乎不触及维系经济制度的准则，因为这些东西的价值功效被视为理所当然。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分析采用了更多的平衡性手法，不过，它们仍旧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无论使人多么不安，反对经济萧条和衰退的努力仅仅限于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制度本身则一如既往，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时代》、《幸福》和《体育画报》仍然保持高额利润（《生活》属从于杂志总销

数的命运，在广告收入上竞争不过电视），而且《时代》公司还扩展了新的竞争舞台，那就是闲话录——采取的形式参照巨额赢利的《人民》杂志。当前，新闻的出售已不象较简单的核时期前的20年代，在电视时代的今天，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以销售。

有鉴于此，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到20世纪，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重要的组成部分。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谈到传播过程时说，媒介就是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媒介就是经济。任何迷恋于抽象智力训练的人，一旦对脱离新闻媒介的美国经济体制冥思苦想，那将是一道难以解答的智力题。

就商品销售而言（智力商品和物质商品），新闻媒介在美国制度及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中居于中心地位。广告在美国新闻媒介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所在地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消费者欲购货物必定要知道有关商品的质量、价格及地点，在此情形下，广告就成为主要的因素。经济行为的过程是由制造、销售和消费所组成，因此，现代大众社会中心的新闻媒介较之于其他机构更能有助于商品的推销。早期社会中，顾客就近来到一些临时性的商场对货物挑捡一番，随即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购买或离开。顾客从口中可以得知哪些产品最为可靠，有时制造商会派一些人出去做广告，宣传其产品的精工优质，但是交通不便限制了这些人的活动范围。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农场主可以直接搬进商业中心甚至遥远的都市居住，科学技术拆除了过去社会的经济藩篱，传统的商场被现代的大型市场取而代之。

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如同它的经济制度，都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原理的土壤之上，这种理论认为，追求财富是善行美德。努力工作、赚取大钱是良好的风尚。约翰·加尔文和清教徒的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认为，用你的收入扶贫济困并因此获取你的正当报酬——这是升天之道。虽然不再是所有美国人都信奉新教徒对

工作的道德准则，但是这套价值观念却顽固不化，仍起作用。大众媒介继续根据古典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表彰勤勉工作的人。这种信条认为，人们通过勤勉工作获取报酬的活动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并以此得出有关自己的结论，这样就能使麻木不仁的人变得奋发有为。广告业自然与这个制度息息相关，配合默契，制造商告诉顾客何处可以买到东西，是去商店呢还是通过邮购。买卖双方根据自身需要订出一项双方均能获利的平衡价格，果如卖方订价过高，那买方就会另找人家。所以，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操纵价格的理论最能解释制造商与消费者的相互关系。

为了使这个制度运转自如，人们必须得知何处购买商品，质量怎样、价格多少。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可以最有效地提供这类信息。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广告媒介。如日益增多的主动提供商品目录或信件，还有购物指南、广告栏目以及各种招牌等等。尽管如此，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社会沟通买卖双方过程中，效果最为显著。事实上，媒介已成为市场。所以日报有60%～70%的版面塞满广告，电视节目每隔几分钟就被商业信息隔断。大众媒介如果撵走了广告，就将偃旗息鼓，或至少俯仰由人，听凭政府或大公司的任意摆布。

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坚持认为，追逐广告金钱使得新闻媒介成为制造商控制下的一个简单机构。广告商力图引诱消费者购买他们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而相当多一批经济学家则指出，并非广告沟通了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现行价格的波动，而不是广告传递了市场的信息。他们也许是对的，然而广告体系已深深扎根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且成为对其经济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大众传播媒介也同样是决定性的，没有它们，公众几乎无从得知购物信息。

“市场”一词出现于新闻媒介之中决非偶然，它作为一种市

场观念产生于新闻事业的民主假设中。媒介并不是观念的一个标本、一处源泉或一种冲突。媒介自身就是市场，新闻消费者在那儿获知在何种条件下由何人阐述了何种主张和意见。在电视行业与广播电台相互竞争的地区就被正式称之为“市场”。我们绝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有20个最好的城市，但我们确实听说过有20个最好的市场。1919年，霍姆斯大法官描述了观念市场的情景，恰当地替代了三个多世纪前约翰·弥尔顿制订的自立原则。著名的公共关系学创始人之一爱德华·伯尼斯①通过论证也描绘出同样的情景。伯尼斯在1923年写道：“观念之间的相互斗争，唯一的检验办法只能按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指出的那样——让思想的力量在市场公开竞争中自动得到承认。”

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再替市场放任自流的主张辩护论证了。大公司的崛起和进步党人制定的规定瓦解了19世纪的自由竞争。新政在“科学资本主义”中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造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就如列宁和其他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实际上，新政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因素，联邦政府的干预在抑制资本势力的无限扩张和保护弱小企业方面已经习已为常，这种做法极象马克思当年在报上发起一场声援摩塞尔地区酿葡萄酒农民的战役。在西德，二战后出任经济部长的路德维格·艾哈德②对修正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他论证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对此新闻界勉强默认了这种修正的观点；但在美国，出版商们公开敌视新政的实施。尽管新闻界大拆其台，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是连任了四届总统。于是，出版商们接受教训，放弃赤裸裸地对抗调整后的制度，但是敌视还

① 爱德华.伯尼斯(1891—)美国公共关系学创始人之一，公共关系学专家，主要著作有《舆论之凝结》(1923)《获取赞同》(1956)。——译注

② 路德维格.艾哈德(1897.2—1977.5)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家。1950年用“社会市场制”解决经济迅速复苏问题，效果显著。(1963—1966)任联邦德国总理。——译注

是存在，并多半秘而不宣。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不时传来几声返回到以往自由企业的"美好旧时光去"的呐喊，希望政府不要干预自由的报刊。另一方面，公开对抗的发展不利于政府作出努力以保证电视上公平处理有争论的问题。第一修正案这面大旗一次次被高高举起以捍卫出版商和电台老板的权利，以便使他们不受政府干预地管理自己的行业。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大众媒介可以指望依靠广告业和作为广告业使用的工商界机构的大力支持。

后来的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新政改革通过新闻媒介掀起了狂飚飓风般的变化。不仅整个30年代充满着痛苦和忧患，而且对未来的新的信念也丧失殆尽。不过，只要那个未来的方向是朝着一条公正的科学的道路，或者用新闻学术语来说就是——客观性的发展的方向的话，那么还是有希望的。进步党人重视科学的精神比以往更坚固地凝结于新政的信仰体系里，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警告美国面临的唯一危险是悲观主义情绪，是"恐惧本身"，因此他号召人民重振国威，这便是新政的真谛。不过，新政从未完全治服萧条，但它在抗御畏惧，重振进步党人的乐观主义信心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成功。科学如今成为一种信仰，不仅用来反对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有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氏因宣布人类的动物偶性，无意识状态及大部分的非理性行为，强烈地震撼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按科学的观点认为，人类及其它的各项法规制度，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资料积累才能领悟。旧的价值观受到怀疑(但其基本的假设如今仍然必须肯定)，甚至旧的偶像也受到挑战，世界仿佛不再循规蹈距，这表明人们需要寻求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来摆脱困境，找到出路并恢复井然有序世界的理智状态。对于美国出现的迷恋墨索里尼热，甚至连诸如开明的编辑卢斯所作所为都能加以如此解释(即寻求英雄人物)。对许多人来说，罗斯福被奉若神明，被视作出类拔萃的世人偶像；但对另外许多人来说，他则是反基督的化身，因此必须发现反罗斯福的勇士健将。总而言之，稳固终究是人们所企求的东西。

具有强大威力的新闻媒介自身也同样席卷于这场旋风之中，呼唤新闻界顺应社会变化的鼎革人物降临人间，于是，出版商与大编辑之间、审稿编辑与采写记者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种鸿沟一直存在，日趋深化，最终，新闻行业就象煤矿工、钢铁工一样建立了工会组织。

“客观性”剖析

如果说在第一修正案大旗下，美国及工业化世界新闻学思想体系有了长足发展的话，那么，客观性法则就是它的精神武器。致力于客观性的实践与理论并非在本世纪30年代才达到高潮。事实上，关于新闻工作者公正无私的思想源远流长。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是新闻客观性的第一位发言人，但是人们公认他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并享有广泛的声誉。

客观性这个词犹如鳝鱼一般精明圆滑。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难以把握。同样，这个词在新闻学里也难以把握。在不同人的眼中，它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们已在前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遇到了这个难题，许多人尝试将“客观性”一分为二，即用“客观性”（静态）与“客观化”（动态）来解决这一难题。所谓客观性，就是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而客观化则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虚构。这种区别至少在理论上是有用的。于是，对一条狗定义为四足食肉动物，预计寿命达10至12年就是“客观性”；而把这条狗说成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则是“客观化”了。第一种陈述反映了现实，因而是科学的，而第二种陈述属于宣传，因而是意识形态上的。

绝对客观性不可能达到，只会引起永无休止，徒劳无益的争吵辩论。充其量它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些分析家争辩道，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指望要达到它，而是对现实反映的一个过程、一种态度、一套思维方法。例如迈克尔·舒登声就将新闻学里的

客观性视为信仰体系中确定无疑的那种知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伦理学——“指明人们在道德上作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于是，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问题，而是有益的、应该力求达到的，它是把“是”和“应该”溶为一体的途径。

毫无疑问，客观性思想被蒙上了一块富丽堂皇的面纱，随着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与物质的研究，这个术语便不胫而走，广为人知。公正理智、避免事前判断和错觉幻想，锲而不舍地求得真实与证实——这是探求科学“真理”所必不可少的态度。从培根笛卡尔到瓦特、爱迪生、费米、爱因斯坦，这种方法逐步确立并日趋完善，同时它从自然科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但是海森堡①发现：纯粹的科学“真理”不可能获得，甚至在最精密的仪器测量下，也必定存在容许误差和测不准的区域。这一发现在自然科学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在社会科学家那儿却无动于衷，政治“科学”、经济“科学”以及新兴的“传播科学”似乎仍然继续漠视海森堡的研究结果，即好象只要能够找到精确的测量仪器，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对科技的信仰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方法似乎能够解开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谜。固然，也能揭示新闻媒介和其他传播工具之迷。

研究人员力求摆脱自身的一孔之见，公正理智地进行分析，这是科学方法的特征。换言之，越是接近客观性立场，越是依据实验进行研究，就越有可能获得真实的结论。社会科学家的目标是要在其研究中修改这种方法。他们悲剧性的弱点就在于“狂妄

① 海森堡(1901.12—1976.2)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创立量子力学作出贡献，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阐明由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论局限性，即，某些成对的物理变量，例如位置和动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不可能同时得出精确值，这一原理在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译注

自大"。这种自以为是，傲慢骄横的行径曾经毁灭了阿伽门农①和李尔王②。正是在这样一块土壤中，客观性法则破土而出，开花结果。但是，它何以会成为一种虚假的法则？它的目的是高尚的：提供事实或者进一步提供事实的真相（哈钦斯委员会曾极力主张过），更何况它与科学本身的宗旨相吻合。人们一开始并未认识到它同样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时至今日，它们未被广泛识别。客观性已趋于充当集体组织的机构，在许多方面和列宁要求苏联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甚为相似。

总之，客观性法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为维护其社会制度，为防止背离其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增添了力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客观性法则绝不是科学的东西，而是视偏见为神圣，捍卫这个制度、反对社会的突变。只要"对立双方"表明互不争强，那么，现状社会一如既往得到保障。根据客观性法则，异议允许存在，甚至受到鼓励。然而，异议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抗衡正统观念不能逾越一个范围，即统治阶层所规定的范围，因为统治阶层是正统观念的代表，他们不仅手中掌握财源，而且左右着新闻界的权威人士。

作为进一步的保证，客观性法则要求公开的劝导言论应限制在社论版上，而新闻栏中则免去"观点"。既然极少有人阅读社论版，其影响也就微乎其微。美国的报纸一边在社论版上指责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大搞政治迫害，一边又把他的长篇大论"客观地"登在头版上。只有当麦卡锡滥施淫威，扰乱这个制度而使这个制度的政权直接出面反对他时，麦卡锡的行径才受到制止。因此，客观性法则既可用来伸张正义，也可用来产生邪恶。一个时期内，它可以满足麦卡锡一类人的需求，而另一个时期又可满足那些要毁掉这类人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中，新闻媒介都是强

① 阿伽门农系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王或阿耳戈斯王，是俄瑞斯忒斯的父亲。——译注

② 李尔王系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主人公。——译注

权势力的一种工具，都无独立性可言。在新闻媒介的交响乐中，乐队指挥挥舞着客观性这根指挥棒指挥整个乐队。

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和学生认识到绝对客观不可及之后，便提出用其他词来替换。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客观，总可以做到公正、平衡、真实吧。殊不知这些替换词也解决不了定义上的混乱，因为“公正”“平衡”“真实”的目的犹如“客观性”一样容易引起人们产生同样的偏见。

盖伊·塔奇曼曾试图澄清这种混乱。她认为新闻记者在抵御别人指责其作品歪曲或曲解时，客观性变得极为有用。她说，这里所包含的是“战略上的礼仪”。塔奇曼文章的精神与社会学家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把传播媒介作为社会机构进行研究，这种社会机构与其它专业机构一样，自身具有一套自己的官僚结构和价值体系。沃伦、布里德率先开展这项研究。1955年他第一次讨论了新闻编辑室与社会压力保持一致的问题。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进一步证实在电视网中存在着相似的压力。由布里德、塔奇曼、爱泼斯坦及其他人收集的证据材料丰富且多，它证实了客观性法则适用于大众媒介的价值。

塔奇曼在分析客观性法则时，为了将事实与主观判断区分开来，确定了四项记者需遵从的“战略步骤”：（1）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2）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3）直接用引号指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4）首先依照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此外，塔奇曼还指出，新闻记者在运用客观性法则时，对于事实与那些把解释性材料当作“新闻分析”的言论要仔细加以区分。塔奇曼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写道：

☆ 看来，被当作新闻报道正式标准的新闻步骤，事实上是新闻工作人员用以保护自己免遭批评而提出职业上力争客观真实的战略方针。一旦他们的专业知识得不到新闻消费者的足够重视，并有可能成为遭致激烈抨击的根据时，这种情况尤其如此。

其他人则对崇尚客观性作了一种经济上的解释。他们坚持认为客观性这个观念起源于新闻机构经济上的需要。人们确实常常说（虽然这种说法未能证实），客观性目标是由美联社创造出来的。美联社的一位代表在提出某些有关确实可靠的问题时，首次运用客观性作了解释，尽管如此，历史记载上则是由美联社负责人奥利弗·格拉姆林于1938年在其著作《美联社：新闻的历史》中提出了这个概念。此书出版后，声誉鹊起，经久不衰，格拉姆林在书里引用了内战时的早期美联社作者劳伦斯、戈布赖特的一个说明，戈布赖特说“我的任务就是传播事实，我的机构不允许我就我传播的事实作任何评论”。他继续道：

☆我的电讯稿发往各种政治性报刊，那里的编辑说，他们能够为送来的电讯稿里的事实配上自家的评论，因此我所考虑的是以正统的新闻为界限，我不充当属于任何派别的政治家，但我试图做到真实和公平。我的电讯稿仅仅是一些不加渲染的事实和细节材料。一些特派记者可能会按照其机关报的旨意从事采写。虽然我企求不顾外人或政治进行写作，但我总是不能免遭指责。

曾任美联社总经理达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到处鼓吹客观性法则，他将之解释为“真实而公平的新闻报道，库珀还大胆直言地宣称客观性新闻“作为一种至善至新的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1945年，库珀首次提出了他的“公民知晓权”理论。

库珀1965年去世，六年后由当时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捐款建造的一个以库珀命名的阅览室在库珀的母校印第安那大学落成。加拉格尔在写文章赞颂库珀时同样对客观性法则大加赞扬。他写道：

☆批评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无人能够做到客观性；然而记者职业并不比一名法官或一名医生的职业更容易出错。他可以象法官那样使自己的情感服从于职业的需要，或象治疗病的医生。代理委托人的律师那样去行事。

我们为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必须有某种圣杯① 之物，都必须有

① 圣杯：传说系耶稣最后的晚餐时用的杯或盘，后来约瑟夫用它来盛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的血，比喻盛装神圣之物体。——译注

为之奋斗的某种事业，都必须有即使不能使之完美无缺，但仍须为之竭尽全力的某种东西。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圣杯应当是客观性法则。如果他缺乏这些东西，其身份就会贬低，结果就可能使其职业遭到毁灭之灾。

加拉格尔认为，实行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分清思想与情绪、事实与感觉。他说，一个客观的新闻工作者"决不能让自我压倒良心或理智。他应当试图去拨开笼罩在无数问题上的偏见与结党成派之云雾，揭示严峻的现实与理智之帷幕。对当今盛行的崇拜非理性的热潮决不作出让步。"加拉格尔关于非理性的批评直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那些经营所谓的地下新闻业，大骂客观性法则的人。

美联社成为客观性法则的主要倡导者的事实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它几乎一开始就致力于成倍增加它的订户，即那些使用它的服务项目设施的人。从技术上讲，美联社属各成员合伙拥有，1000家以上的报纸接受它的电讯稿。此外，美联社还直接向用户推销各种服务，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台、杂志、政府部门、大专院校和众多的报纸及国外专线通讯社；另一方面，私营组织的合众社也同样直接对用户做生意。这两家通讯社的服务内容几乎没有区别。美联社与合众社为招揽订户而激烈竞争。此外，他们的竞争对象还有诸如路透社那样的外国通讯社以及由美国首屈一指的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报》所经营的报业辛迪加新闻社。在这种较量场合，任何类型的政治鼓动都会使自己俯就下风，因为它极可能限制订户的数量。任何政治上的宿敌都不会出于同情而考虑同其伙伴结盟合作。换言之，实行客观性法则有利可图，政治上的中立就是商业上的赢利。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订户，就必须避免政治上偏执一方，就必须平等地对待民主党和共和党，拉尔夫·纳德①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实在要求。

---

① 拉尔夫·纳德(1934.2—)美国律师。他为消费者而呐喊辩论，他和同伴被称为"纳德狙击手"，1965年他出版《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文，攻击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柯瓦尔牌汽车。——译注

新闻事业中的客观性目标流传甚广，并被人们首肯采纳，以致于它现在已成为资本主义信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性这个目标不仅在新闻院校中被人们教授、传播，而且在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公民学的课堂上也同样如此。新闻事业中的客观性观念如此深刻地植根于人们脑海中，以致于对于那些公然在新闻栏目中发表意见和劝导言论的新闻社或报社会遭到灭顶之灾。就通用报纸借助广告收入及订户数量图谋赢利而言，客观性意味着赚钱反映争执。"双方"的观点进程中，通讯社和报纸经常免不了发表一些有损于政府官员、广告商、工商界大亨的观点；这样做是许可的，虽然有时候很勉强，但还是被接受下来，因为它是客观性法则的一部分。归根结蒂，它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新闻机构如同所有机构一样，在一套条条框框的支配下出版东西。众所周知，人们经常选择异常的东西进行报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今天的新闻比昨日的旧闻更有新闻价值；靠近本地的新闻比千里之外的新闻更有新闻价值；出自要人、"名人"之口比无名之辈的话更有新闻价值；戏剧性、冲突性愈多的新闻比平谈无奇、一团和气的报道更有新闻价值。所有这一切——反常、时效、接近、名人、冲突——就是新闻界的条条框框，正是这些框框规定了什么是"新闻"。新闻本身没有明确的定义，全靠内行新闻工作者的鼻子去嗅，根据自己的新闻价值加以判断。如此一来，连新闻概念都是主观的了，正如戴维·布林克利所恰当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是新闻的东西就是新闻。"

对于提出批评的个别人来说，客观性法则和新闻的框框限制了大众媒介中发表不同议论，而且批评的范围不能触动根本制度。在所谓的"水门事件"中，新闻界对尼克松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发出了喧嚣尘上的批评，但对根本的制度未有丝毫动摇。事实上，新闻界谴责的是总统，而不是总统制。只要"双方的观点"公布于众，人们便知道冲突双方是反尼克松的人群和尼克松的支持者。反复使用"水门事件"来比喻腐化会使人对情况产生误解，并导

致许多美国人认为尼克松当局的行径与所有其它当局的行径毫无二致。这起发生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事情究竟有多严重呢？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闯入水门大厦”，而在于制度最高层的权力发生了蜕化；在于企图建立保卫总统的秘密警察部队；在于利用国内税务局来搞垮政治对手；在于总统及其顾问们攫取绝对权力，对谁都不负责。邪恶滋生于制度进而引起腐化堕落现象的蔓延，并非理查德·尼克松或H·R·霍尔德曼①本人所致。所以，新闻界的控告只能是：尼克松败坏了制度。

尼克松深谙这种批评的奥妙，他掩饰自己觊觎庄严总统职位的企图，并将他的批评者描绘成是向总统制进行挑战，以寻求安然渡过困境之途。要不是他一时糊涂，愚蠢地保存了白宫谈话的磁带，他的辩解可能会成功。“水门事件”表明，在客观性法则下，基本制度最好不要去触动，同样，也不要去抨击那些基本制度的标志，例如民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总统制等。与这个制度的敌对者会遭到反对，他们的言论、文章均得不到传播。无神论不会得到赞同，宗教信仰自由也不会走向极端，任何对“家庭”怀有敌意的信条不会受到支持，同性恋可能被默认，但不会得到倡导。总之，在制度的界限内，任何对客观性法则的破坏是不能容忍的。

更有甚者，客观性法则似乎仅限于美国本土使用。当美国与它国发生冲突时，就没有必要反映“双方的观点”，平等地对待争执双方，如若那样做的话，就属于不爱国了。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观点与其敌手相提并论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当表述他的立场时，通常用明显的实例来报道他冥顽不化的错误观点。报道有关苏联和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也与这种情形相仿。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扣期间以及之后，美国新闻界就是运用这种手法进行报道，

① 霍尔德曼(1926.10—) 尼克松任职内白宫办公厅主任，因与“水门丑闻”有瓜葛而出名。——译注

使人长期难以搞清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作用。

但是，总有些个别的新闻工作者蔑视客观性法则，逾越意识形态所允许表达的范围，发表自己的主张。当然这只是例外情况。并非一贯如此。美国社会的多元结构允许而且确实鼓励个人发表不同言论，苏联就禁止这一点。但是，各种机构和效忠这个制度的卫士所发出的喧嚷之声足以彻底盖住这些不同的声音。罗伯特•保罗•沃尔夫将美国政治疆域比作一块甚于金字塔的悬崖峭壁之高原。他说，在那块高原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被视作合法。因此，“任何集团在美国政治中掀起的最关键战役都是为了攀登高原之巅所作的拼死搏斗。”

根据民主多元的逻辑，各利益集团的视界取决于新闻媒介的意愿，取决于新闻媒介将他们安置于高原的何处。然而在决定是否授予这种特权时，新闻界的行动却不能独立自主，随心所欲。它受制于无形框框之中的刻板规定。听任当权者的声音代表持异议集团说话吧，美国的政治高原允许这样做；听任人们在信仰体系认可的范围内抓住客观性法则吧，高原的一切对它敞开大门；反之通往高原峰巅的捷径就会堵死，除非这个集团能够呼风唤雨，掀起喧哗之浪，使它的存在不容置疑。60年代，民权活动分子得到了这一教训，于是乎，其他持异议和非法的集团就公然蔑视法律，或者利用新闻界重视反常、冲突行为的特点扰乱社会、无法无天，企图达到支配新闻媒介报道其活动的目的。即使那样，这种集团也不会被称心地披上合法的外衣。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归入了非法行列，被认为性变态的人落入同样的处理。总之，任何威胁社会秩序或政治经济制度的集团都会遭到抛弃，这样，大众媒介完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而起作用。作为这个制度自身的力量而运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客观性法则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

美国的政治激进派频频指责新闻界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当人们提及美国绝大多数报纸支持共和党这一事实时，批评家则指

责这是搞"一党报刊"。作为195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发现，那年83%的报纸都支持他的对手大卫·艾森豪威尔。时隔十几年，新闻界却转而拥护民主党候选人，林顿·约翰逊反对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因为他的右翼主张被认为太极端，可能会扰乱完整坚固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甚至或许会诱发左翼分子掀起破坏运动。1968年尼克松成功地入主白宫，他似乎决心要用"鞭子"使新闻界俯首贴耳，他似乎不甘接受新闻媒介可以作为这个制度机构中的一员发挥作用，并固执地要其成为一名发育成熟的政府奴仆。于是，新闻界理所当然地勃然大怒，断然反对尼克松和副总统斯波罗·阿格纽给新闻媒介强加限制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早先就一直是尼克松对头的自由派人士与新闻界携起手来，而且还有许多保守派同新闻界结为联盟。其中就包括希望恪守现状，维护工商业势力，支配社会、掌握政权的戈德华特。

为了反击尼克松竞选运动，新闻界自然而然地将第一修正案作为自己的后盾。或许使人惊奇的是，它还一再吁求早在1937年就被报界正式肯定的客观性法则。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会刊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华盛顿明星晚报》副主编I·威廉·希尔效仿林肯葛提斯堡演讲词的韵律，表达了他对客观性的誓言：

☆ 185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日报，她孕育于客观性之中，奉行人人享有获得公正事实的原则。现在，我们正进行一场关于传播媒介的重大争辩，以考验这种报纸，或者说，以考验孕育于客观性之中并奉行上述原则的传播媒介能否长久生存。

紧接着下一期的学刊上，《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编辑主任德里克·丹尼尔斯则对历史作了不同的解释：

☆ 如果我对历史的理解是对的话，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报刊诞生于辩护与反对的襁褓之中——观点见解与积极主动正是宪法予以保护的奠基石。

希尔与丹尼尔斯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新闻学信念习俗：一方面，它的使命是公正不偏地提供"事实"，另一方面，它又充当防止

滥用权力的监督人。这两者各自门藏魔令，可以用来启开通往希望之地的金色大门。那时新闻媒介将摆脱政府的束缚，自由地为人类服务。对希尔来说，这句魔令就是客观性；对丹尼尔斯来说，它就是监督人；或用道格拉斯·凯特的精采术语来形容就是"政府第四大部门"。但是，不管是希尔还是丹尼尔斯都未能涉及新闻媒介一个更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充当维护社会制度的一个工具。

电视新闻的"威力"

当今之世，报纸在新闻媒介家族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情况，已被迫让位于后起之秀——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也许是迄今为止所能设想出的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绝大多数人通过电视获取他们所需的绝大部分信息，或曰"新闻"，已成为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头禅。这句话也许不完全正确，因为绝大多数人可能从他人那里获取绝大部分新闻，但是，广播电视主宰人类生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这一事实是无可质疑的。难怪那些掌权者总是力求控制或管理本国的广播媒介；那些希冀登上权力宝座的人们无不首先要奋力拿下广播电视部门；也难怪广告商们要源源不断倾投巨资以便换取电波对其产品进行吹捧。

报纸和杂志尽管发行销路下跌，广告收入减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已到了微不足道、弃若敝屣的地步。那些经过广播电视和自己同行激烈竞争之后幸存下来的报纸都在经济和政治影响两方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广播电视加速了美国、日本、西欧及工业不发达世界中许多前附属国的资本主义的成功。无线电波、图像屏幕授予资本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他们可以用来宣扬对现行信仰体系的支持。

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收音机出现于本世纪初时，西欧几个老牌国家都

将这种新的媒介置于其控制之下。在某些场合，政府官员不仅直接管理财政经费，而且还插手于内容的安排。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大不列颠，这种控制掌握在国营公司手中，虽然它最终还是要对政府尽责，但却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特别是对节目的内容限制很少；在苏联，广播的经费、分配、内容受置于行政管理。相比之下，美国则允许私人商业利益在广播电视业中按其愿望进行发展，赚取利润。

结果，美国的广播电视业成了最能发财致富的领域之一，那些起先在广播，后来在电视方面捷足先登的人们便福星高照，他们创立节目形式的目的就是吸引最大量的观众。广告商招来了广大的观众，促进了商品推销活动，迅速形成全国性的市场。广播电视网是可视性最强的传播工具，同样，也受到最广泛的注意。于是，新闻事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媒介，它包括广播电视网、台站等等。

三大广播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成功地出现于金融摩擦年间。它们不仅把握了节目的绝对统治权，而且还在全国最大、最富的“市场”里拥有一批广播电视台。所有享有电视特权的业主都获利可观，但三大网的老板则堪称巨擘，无人能比。每家广播电视网的业主每年在纳税前一般能净赚美元100万以上。1980年俄亥俄州代顿市三大网之一的一个中型分支机构，以4000万美元拍卖；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有一个比它大一些的分支机构售价达6500万美元。此外，在广播电视业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电视已成了“一张印刷钞票的许可证。”当然，“印制”的钞票得之于滚滚而来的大量广告费用，1983年，在播放“超级木球”节目期间，播入30秒钟广告，要价达40万美元之高。1982年底，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半分钟的商业广告平均要价91000美元，比前些年增加了17%。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国营电视网的操管者对美国广播电视业巨额钱币的易主转手只能发出疑惑的惊叹。因为美国现在所赚的

纯利已超过重工业，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方，广播电视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纳税收入，由接收机所有人付出。为国家支付广播电视费用进行袒护的人经常申辩道，依赖商业广告将使产品创作的文化水准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讲，广播电视的国家所有制符合公众利益。但在70年代末之前，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电视业都发现他们将不得不允许一些商业广告插进电视节目，所弥补收入不足，使他们的节目制作能够继续下去。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电视产品一直遭到无情的抨击。专门负责协调电视业的组织"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位主席嚷道：这是"一片广大的不毛之地"；其他人则认为电视把广播交流降到最低等的粗俗水平。从高中学生学业成绩下降直至犯罪率的上升，几乎事事都可归咎于电视的责任，如今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些结论全是夸大其辞。只有电视业的发财图利，只有这种媒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充当重要角色才是名实相符、毋庸置疑的。

毫不奇怪，观众会抱怨频繁出现的商业广告，并指责电视中许多对青少年有害的节目内容。但是，观众是否会作出消除商业性，赞成政府或国家直接控制这种媒介的选择还是令人感到疑惑。正如媒介经营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要制作出卓越冒尖的产品来，大量的广告收入便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争辩道：没有巨额利润，工资就要打折压低，就雇不起最优秀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就不能购买由摄像机和尖端电子器材所组成的最现代化的设备装置。

批评家们也常常领会这一基本道理，但是，他们又埋怨电视业利润太高，过多的关注利润必然会忽略对公众利益的足够重视。在这点上，已故爱德华·R·默罗①的批评最为辛辣尖锐。这位经常被推崇为最伟大的记者，特别是英勇不屈地揭露参议员

① 爱德华·R·默罗(1908.4—1965.4)美国享有盛誉的广播电视记者，1935年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二战中在英国以出色的战地报道而著称，1954年主持"现在请看"节目，深受欢迎。1961年任美国新闻署署长。——译注

约瑟夫·麦卡锡行径的人，在1958年（那时他正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生龃龉）的一次与"广播电视新闻部主任联合会"谈话中强调：应当把公众利益放在比追求私人赢利更重要的位置上。他说：

☆人们并未要求广播电视网或私人台站象慈善机构那样运行。但是我在"人权法案"或"新闻通讯条例"也未能找到一条关于必须每年增加利润以避免合众国垮台的内容。

默罗的申辩与自由企业制度相悖。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批评家对电视的谴责也与自由企业制度不符。他们倾向于把赚取利润作为一种系统的价值观来接受，他们所反对的是追逐广告金钱的压力驱使无线电媒介去满足消费者并不需要、并不现实的奢望，这种奢求导致了他们去买广告产品。苏联就持这种标准的批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这种观点的美国电视批评家通常并未意识到他们"附和了共产主义的花言巧语。"另一方面，这个制度的辩护者又将广告看作一股强大的民主力量，指引人们奔向一个富裕的社会。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认为正是消费者在发号施令，随心所欲，而广告商和新闻媒介只能根据公众的需要，宣传那些在市场上符合消费者自身利益的、真正需要的商品，这样，消费者就是民主制度的"投票人。"他们除了到选票站投票外，还把票投入了钞票收入记录机中。这种形式的投票体现于A.C.尼尔森[①]和其他人的观众收视率调查体系中。

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关于广播电视业的规定：广播电视执照持有者"要按照公众的利益，便捷和需求"来使用许可证。为了获取经营电台或电视台的许可证，业主必须使"联邦通信委员会"确信其宗旨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当许可证三年到期需要

① A.C.尼尔森(1897—1980)美国商业家，1923年创建尼尔森公司，开展市场调查、无线电收听率调查，1950年，开始进行电视收看率调查。——译注

重新更换之时，业主又必须表明他或者她为公众利益经营的实际情况。"联邦通信委员会"极少拒绝更换许可证的申请，只对那些弄虚作假的申请或罪恶昭彰的做法才予以回绝。最富戏剧性的一次吊销许可证不是"联邦通信委员会"而是联邦法院实施的。由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WLBT——电视台在其播放地区范围里完全忽视黑人观众的利益，所以就取消了它的许可证。至于广播电视节目迎合低级趣味或者提供给观众的不是"大片不毛之地"就是毫无收获的东西等等这类情况，申请一概不予考虑。不过，节目内容不属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内。在第一修正案护佑下，只有许可证持有人才有权控制节目内容。

第一修正案上保障新闻自由的规定，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工作中得到全面的贯彻。根据法律，无线电频率属于公有，因此任何人不得"拥有"一波段的广播电视频率。"联邦通信委员会"建立的初衷就是仲裁广播电视业主可能要求占据同一频率波段而发生的争执。由于广播电视业与报业不同，拥有许可证的是掌握广播电视器材的业主，而不是掌握传播工具的人，所以，他们还不如印刷媒介同行那样，享受同等的新闻自由权利。数十年来，广播电视业主似乎是二等公民，被当作妖魔加以驱赶。他们尤其憎恶1949年提出的"公平经营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每当播放有争议问题的内容时，必须保证对问题的报道公正不偏，尽管广播电视业主在其他方面有权有势，但对公平经营原则的非难抨击却没有奏效。总之，要求他们做到的——某种程度上对印刷媒介都没有这样要求——就是实行客观性法则。这样一来，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允许他们在有争议问题上来个一边倒。

结果，这种要求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广播电视台老是故调重弹、千篇一律，避免涉及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将其绝大部分的评论意见局限于确实牢靠的范围之内，譬如什么敦促高速公路安全保障啦，谴责犯罪分子啦，提倡净化空气、水源啦，等等。当然，电视台也确实经常赞同某些候选人并抨击恶行劣迹，但根

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他们要给予所有这些指责或批评一个公正答复的机会，一个必然要损耗其利润的机会，因为这一节目不能出售。最终结果，正如广播电视业主所指出的那样，电视节目的内容只能变得平淡无奇。因此，广播电视上极少论及政治或经济方面的问题，即使论及，也必定要有“另一方”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有棱有角的电视必然要趋于中庸、平稳、图利。

公平经营的原则确实也有积极的规定，即广播电视台要寻找并播放有争议问题的内容。但是，这个规定几乎无法实施，部分是因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人数太少（诚如他们所云），不能保证规定的实施；更重要的是，“联邦通信委员会”（象大多数政府机构一样）与广播电视业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它更多的是授权进行协调、管理，而不是统治、支配这个行业。专栏作家杰克·安德生在谈到“联邦通信委员会”时说，它“只不过是广播电视网的一个事后补救者而已，那些联播网的总经理一边轻轻地抚摸这只看家狗的卷毛，一边相信国会将保护他们免遭这只狗的撕咬。”

几乎无人怀疑电视网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因为，他们必须定期进行改选，他们在荧光屏上“形象”如何，将直接关系到选民作出的投票决定。如果国会愿意，它可以增加“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权力，使委员会不仅严格实施“公平经营的原则”，而且彻底贯彻广播电视业主须按公众利益行事的要求。但这样做以后那些投票要求扩大“联邦通信委员会”控制广播电视业权力的国会议员将会成为无线电波攻击批评的靶子。于是，几乎没有国会议员敢冒此风险。而国会议员通过有限制的约束广播电视业主则可以合乎人意地指望在电视上获得有益的关注，树立良好的形象。如此一来，一个由广播电视业总经理、“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会产生的压力所形成的三足鼎立控制机构开始运转。公众的利益便放到了第四位。

尽管人们对调查性新闻的兴趣日渐增加，但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情况又使得电视只能充当胆小如鼠、不敢冒险的角色。也有些时候，当广播电视业主行使大权将发财图利抛诸脑后甘冒风险时，他们的行为便有悖于其经济利益。1970年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情。那年全国广播公司选播了一份名为“移居者”的文件，对广播电视网的主要广告商——可口可乐公司进行了抨击。这份文件通过重要的媒介揭露了佛罗里达州可口可乐公司的柠檬园林里，受雇的移居工人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情况。当可口可乐公司刚听说将要播放这个节目时，企图把文件扣压下来，但未能得逞，便又设法要求联播网做一些小小的改动。显然，这些改动并不符合可口可乐公司的心意。所以它在制定1971年一季度广告预算时，对全国广播公司分文不给，却提供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0万美元，美国广播公司120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70年最末一季度里，可口可乐公司花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告费用达250万美元。由于持续不断播放这份文件，全国广播公司丧失了数百万美元的潜在收入。后来，可口可乐公司还是与全国广播公司言归于好，尽管那份文件曾一度使它难堪，但公司仍然强烈感到需要这家联播网。“移居者”的报道并非完全孤立，联播网和广播台偶尔也会过河拆桥，以怨报德。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而且似乎并不十分妨碍广播电视业的发财图利。

广播电视业主享有大部分但还不是全部报刊杂志所享有的自由企业的好处。大体说来，电视联播网和台站的新闻节目受到第一修正案条款的保护。节目类型几乎与报纸雷同。首要的道德标准是客观性法则，反映问题的“双方观点。”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小说的文学风格制作节目，因而比印刷媒介同行更富于戏剧性。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在《处处无新闻》一书中写道，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受到直接教诲，要他们用“虚构的形式”进行宕跌起伏的报道，即，事件的出现，徐徐地展开、戏剧般地达到高潮、入情入理地进入尾声。这种采用传统小说制造悬念的方法

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也仿效"讲故事"的形式，但不如电视报道那样精采之至。《星期六晚邮报》全盛期间，罗伯特·帕克[①]要人们重视运用这种手法。他说：

☆正如《星期六晚邮报》所发现的那样，常人借助于具体的形象、图画、比喻进行思考。阅读长篇大论的文章，他会感到难以胜任，除非具有戏剧性，并采用假称"故事"的形式。"新闻故事"和"虚构故事"是当代文学的两大类型，然而它们现在彼此相象，以致于混淆难分。

爱泼斯坦在研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制作过程中分析出若干电视新闻的"基本假设"。其中主要的三条是：（1）简单易认的图象最能引起观众兴趣。如果图象迷离繁杂，则容易使人不知所措。因此，复杂的问题要用生活感受而不用抽象的概念进行表述；（2）可能引起冲突的场面比平淡无奇更有趣；（3）观众的注意力短暂有限，但可以尽量通过情节或活动着的主体加以延续拉长。这些便成为报业记者长期形成的反常、时效、接近、冲突、权威来源等等信条的补充，并且已被电视记者广为接受。

关于新闻媒介的威力和影响——特别是电视记者——在当代事变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人们讲得和写得都已很多。但是论证中的主要假设在于：新闻媒介的"权力"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可以用它来同政府及操纵政府的政治家和政务活动家进行抗衡对峙。这是一种简单的的假设。实际上，新闻媒介有着巨大的潜在力量，美国的新闻媒介看起来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政府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权贵们向来没有放弃过摆布电视记者的任何良机。

四项关于新闻独立信念（即新闻摆脱外界干涉，为公众的知

---

① 罗伯特·帕克（1864.2—1944.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当过十多年记者。——译注

晓权服务；追求并反映真理，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的任何一项结果都为新闻媒介的操纵者们所利用。其中没有任何一项符合现实情况；然而，相信了这些东西，就会使媒介操纵者的负担减轻不少，并有助于他们维持其执政的意识形态。有关这个主题将在第八章"社会责任论"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第三种新闻学的思想体系。

第 七 章

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媒介

改变旧秩序

给事物命名是人类行为当中最为挑剔的一个方面。我们对某事命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怎样以及如何对该事物进行思考。譬如说，"第三世界"这个术语，或称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我们不管选用哪个术语都会感到一种下等的味道。它甚至还称不上退而求其次，只能算作第三流。这一术语似乎容易让人觉得它的重要性比不上第一或第二世界，使人联想到它仍然在朝着它上面两个世界的地位努力前进。因此，人们认为不发达的总是较低劣的。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命名能够适合这类地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国家呢？难道客观上它们不是比世界强国不发达吗？它们的工业和商业水平以及政治复杂程度当然要低于世界强国。但是，我们在把它们命名为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时不仅仅表达了一个技术发展的现况，而且还反映出我们的价值判断。被称为不发达并不只是根据科学或商业发展水平来进行分门别类，而是被划入一种低等的地位，似乎有欠优和价值不高之感。

不过，上面的划分十分彻底，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连这些国家本身都采用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只是普遍反对

"不发达"这词的命名，，觉得该词用得过份）。于是，这些国家本身就等于接收他们下等的地位，尽管他们向下等的这一观念进行公开的挑战。其地位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鼎盛时期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贫苦人民的状况；当时社会使穷人相信，因为他们无缘致富，所以他们的道德比那些富裕阶层低下。

事实上，说世界贫穷国家并非是对所确定的称呼卑躬屈节，逆来顺受。他们为了获得自尊显然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之一就是取得了"不结盟国家"的尊称。这个称呼是一大进步，因为它含有选择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会选择成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但是可以选择不结盟，这种选择带有一定程度的尊严。当然，不结盟这个词仍十分费解。其含义是，工业化世界可分为两大阵营，方便起见姑且称之为东方和西方，而不结盟国家拒绝选择任何一方。更深的含义是，东西双方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拢不结盟国家以压倒对方，因此其结果总有一方会"赢"。然而，在这种有趣但又绝对可怕的比喻里。人们永远不甚理会输和赢到底意味着什么。

随着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日益显著提高，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不结盟国家中，大众媒介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至关重大。确实如此，如果这种比喻极为恰当的话，我们不妨说大多数战斗是在报纸的版面和广播电视的频谱上进行的，而不是靠大量的武装系统求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殖民世界的分崩离析，而在此前贫穷国家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只要想想中国与厄瓜多尔，古巴与利比里亚，土耳其与阿富汗这些国家就足矣。然而，继英法放弃对亚洲和非洲的控制之后，第三世界这个词才应运而生。世界各地的新兴独立国家开始对大众媒介的作用兴趣倍增。于是乎，亚非国家联合了曾经不受人重视的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他们已就共同的问题斗争了一个多世纪。欧洲殖民大帝国中首先崩溃的是西班牙，它于19世纪初丧失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后来联

合国建立，有关传播媒介的国际间讨论日渐增多，传播媒介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同时还是提高新兴国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一种潜在武器。

我们将会摒弃第三世界作为实际含义的这个词，因为该词语义不清。在美国——包括所有英语国家以及搬用他们思想的国家——第三世界几乎相当于"经济落后"的同义词；在60年代，第三世界常被指为"不发达"的意思。该词来源于法语，起初是政治词语而非经济词语。法语"第三世界"（Tiers—monde）是一个具有革命含义的词语，其内涵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的法语是 Tiers—état，指平民团体，以区别于有权有势的第一、第二等级：贵族与僧侣。这个政治团体决意要从教会和贵族掌握的国家那里夺取权力。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首次就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进行讨论，不久费朗兹·范农在他所著的《人间的不幸》一书中将第三世界翻译成英语，从此该词广为流传。由于该词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具有政治含义，而对另一些则带有经济含义，我们姑且采用语义上更为中性的词"进步中"(advancing)来指代这些民族国家。这里所运用的"进步中"这个词当然也绝不可能不带有政治或社会意义。迄今，还没有任何词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程度。

1945年联合国刚建立时，只有50个成员国。到了1980年，其成员国翻了三倍之多。事实上所有亚洲、非洲前殖民地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那些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工业世界原以为不管出现多少新兴民族国家，他们在联合国中的突出地位不会产生动摇；因为这些主要强国认定，没有他们这"五大强国"的一致表决，联合国就不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这五大强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蒋介石政府原先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获得了原属于蒋家政府的否决权。联合国第一批成员国的名册上差不多都是来自美洲大陆和欧洲的国家。

我们当怎样称呼这些新兴国家？怎样确定他们的新闻媒介体系？1964年在第一次联合国贸发大会上，这些受了感染的国家把自己称作"77国集团"，以此来客观形容在这次贸发大会上已形成一个集体的状况，目的是为了避免诸如第三世界这类词义所包含的价值意义。社会科学家（这些人总喜用首字母缩略词）有时用"LDC"来表示"欠发达国家"。目前还找不出十分满意的词，所沿用的大部分称呼多少都含有贬低的含义。不过，"进步中"这个词既刻划出这些民族国家的新闻体系又表明他们的经济状况。"进步中"是"发展中"的同义词，但这词没有那种使人感到似乎不太发展的贬义之感。任何事物——个人、制度或国家——都可以在进步。连网球赛中的优秀选手也必须通过一场场较量而不断进步。报纸或广播电台也可以在进步，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听众（即传播对象）或提高其道德判断能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事物的进步并不一定要通过输赢的竞赛而取得，当然网球选手的例子表明也未尝不可。不过，个人和国家也可以一起进步；两者可以通过合作或竞赛而获得可喜的进步。实际上，那些身感受到歧视的团体最有可能通过联合其他力量迈开第一步，逐步前进以期达到峰巅。故此，我们就把这些进步中国家的新闻媒介称之为进步中的新闻媒介。

那么，进步中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是否确有这种意识形态？是否这些民族国家相互之间截然不同以致于我们无法正确地讨论进步中的新闻媒介？当然，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进步中的新闻媒介，也不存在这种市场经济的新闻媒介或这种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这三种意识形态结构上的不同之处比比皆是。但人们仍然能够很自信地分清这三种结构的模式。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其信仰体系包含第一修正案的思想，客观性法则，认为独立不倚的新闻媒介可以保护人民，反对滥用权力，总之是实现民主假设的核心力量。在社会主义模式中，其信仰体系包容在列宁关于报刊的三大作用理论之中，坚信他们自己的客观性法则，并认定教

育是该新闻媒介的主要作用。而进步中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后天获取的——即通过学习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模式而得到；其二是先天就有的——即根基于新兴民族国家本身的历史与文化。其中，前者显然是模仿，而后者是自然的。

然而，进步中世界的新闻体系似乎完全是后天学来的。事实上，进步中世界在产生今天意义上的新闻媒介这个词之前殖民统治者就已经来到了这些国家，把他们自己的新闻体系强加于进步中国家。当然，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来到以前，南美洲的山区、非洲的丛林和热带大草原以及亚洲的谷地根本就没有大众媒介。显然，殖民统治以前的通讯方式既原始又狭隘，主要满足于人民的日常需要即可。象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新闻概念，当时是不存在的。因此，进步中世界的所有新闻制度无不是后天获得的，首先从殖民统治国那里学，接着又从后继列强美国和苏联那儿学。过去亚洲发送重要消息的方式类似于古罗马，中世纪教会制社会以及威尼斯商人的做法——即所有消息不在人民中流通，而在权贵之间，教会、政界和商业界首领之间相互流通。对普通百姓来说，通讯手段不是书面文字，而是击鼓和狼烟，总之是通过讲故事、唱歌和吟颂赞美诗而相传下来的口述文字。

新兴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新闻结构彼此迥然各异，就如同他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互不相同一样。然而，从一个特定意义上看，这些国家结构又彼此相近，因为这些结构毫无例外地是后天所得。因此，人们对于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所表达的新闻目的并不会感到惊奇，即其目的是为了自由、为了客观、为了教育，充当反击滥用职权、捍卫人民大众的武器。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些目标都是学来的，没有一个是来自于其本身固有的消息传递体系或在这种体系中自然产生的信仰。过份强调进步中世界里新闻媒介之间的差异只能是吹毛求疵。事实上他们的主要相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介均得之于工业化国家世界——这个世

界，简言之（或许并不确切）被称为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东西方世界的命名本身就容易引起国际间的矛盾，因为这种命名把世界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新闻媒介中反复使用这种命名就更加激化了这种对立分离。同样，把进步中世界划为第三世界也易引起矛盾，因为它将工业国家分成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

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分裂成两大阵营，接踵而来的就是人们经常讲到的通讯革命。进步中世界随着计算机以及传播"科学"而产生。战后最令学者所关心的智力追求莫过于通讯研究了。世界遍地的理论家无不废寝忘食地潜心于控制论，数据流通和计算机模型等领域的研究。1945年末曾出现的学问如今已发展成到处可见的最大的学问之一。这种钻研问题的好奇心不仅引起学者的无比兴趣，对外行也同样具有吸引力，于是未来"科学"应运而生。为了收集数据、了解信息，从人到人，国家到国家之间运行方式以及了解预测未来的方法，人们不知进行了多少实验和研究。

计算机的连接，通讯革命的符号标志以及进步中国家的出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孤立地看待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无法了解当今世界。

具有重大意义的相关现象的新型传播学者极大关注"硬的通讯件"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对通讯硬件的极大关注有时把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研究人员分离开来了。许多传播学学者的研究经常是关于传播交流的更广泛领域而对报纸和广播电视等方面涉及面很有限，好象新闻媒介不存在似的，好象没有新闻媒介，全球性的传播交流仍然可以想象似的。另一方面，许多新闻学学者深受国际论坛上广泛公开的争辩之鼓动，收集了堆积如山的数据以期观察世界各地流通的有关国际事务的新闻报道是否平衡。

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传播学学者一向声称其目的是

为了建立一套传播学理论，可他们的实际研究又如此狭隘，以致连他们自己都摸不清头脑，更别提促进了解了。这些传播学学者借用了哲学家的真理之树，心理学家的刺激—反应图式以及物理学家的数学模型，把这些成果作为他们普遍运用的符号，当作他们到处发出的利箭。其中有些箭笔直向前；有些则弯弯曲曲，甚至还有些反而射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断定通过从消息提供者（刺激）接收者（反应）的途径，通过精心的横向联系方法来说明单一或连锁反馈系统可以描绘出传播流通过程。透过一套描述设计的规划，这种利箭确实具有给同行学者以一种严肃治学态度的那种令人幸运的特征，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对解决实际摆在我们眼前的主要国际（以及国内）问题几乎无能为力。

如果箭矢代表传播学者的工作，那么内容图表则凝聚了新闻学学者的心血，因为他们准备并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书籍，专题论文和学术文章，通过记录和比较报纸与晚间新闻报道节目的内容，从而鉴定新闻媒介是否就所发生的"新闻"提供了平衡的报道。事实上，区区一张内容图表也反映不了平衡状况。即使它正确无疑，靠这些信息也无力解决当今新闻领域中的真正问题。

由于图书馆和研究中心的箭矢和图表的数量不断激增，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上去，如：怎样使得那些民族国家从工业化国家那里学来的新闻体系与其过去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和谐统一。正是这一问题的框架才构成了以后出现的进步中世界的意识形态。

非洲新闻媒介的兴盛之道

在那些于20世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里，竞相争夺领导权的情况不断发生。这种现象在19世纪并不存在，当时西班牙被赶出拉丁美洲，那里的解放者梦想建立现代化社会。发展这个词直到二战后，亚非出现了许多新兴国家时才受到广泛的重

视。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新闻媒介理所当然能够为发展提供一条捷径。支配了两个多世纪的新闻信念使这些领导人确信新闻媒介具有影响人民和说服人民的威力。试想一下，还有什么工具比得上报纸和电台管用——它们可以用来传播政治自由和国家的讯息，提供机会使这些国家在高尚的世界社会舞台上获得尊敬的地位。这种设想是必然的，因为新兴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资本主义的学校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思想来自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及最为强大的政治大国——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中，有关新闻媒介作用的信念都是一致的，即培养公民使他们效忠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原则。在这种民主的设想下，进步中国家的领导者得到了一大批研究学者的支持，这些研究学者把新闻媒介视作他们后来称之为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力量。最后，又一种新兴的新闻学理论萌芽出世，那就是人们后来皆知的发展新闻学。

进一步追究发展新闻学这一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该学说出现时的概念十分清楚，任何细节都不会遭人误解。当然，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如此清楚的学说，发展新闻学自然也无法享受这番荣耀。实际上，发展新闻学的形式形形色色，诸多不同，以致于目前无法给它确定一个有头脑的学者会一致赞同的定义。鉴于此，又加上发展这词含有落后之意，我们就选用进步新闻学这个词语，并探讨它的理论思想，其信仰体系犹如这儿一种布料编织而成——这种衣料编织成发展新闻学身穿的外衣。这些基本信条包括确信新闻媒介具有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作用；确信新闻媒介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益社会变化的手段；并认为新闻媒介应当是作者到读者、电台到听众的双向流通的工具。遗憾的是，大多数进步中世界的实际做法却远远背离他们的信条。压制新闻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进步中世界意识形态的演化过程中，新闻理论家和从业记者大量地沿用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信仰体

系。但是，他们对这些信仰体系作了大量的修改，尽管自己并不清楚所作的修改到底有多大；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发展缓慢，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断地陷于分裂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之中。编织或发展新闻学的每根毛线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政治的牵连。对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刚刚独立国家的记者和编辑不允许独立不倚、摆脱政治的约束；而对另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来说，新闻记者必须联合政治力量以期建立一个地域、种族、语言和部落相统一的国度。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中新闻媒介都无法独立、无力摆脱政治约束，因此他们制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除此之外，新闻媒介也没有能力在一块废墟上建立一个联合体来。

1963年加纳一位素负盛名的总统克威姆·恩克鲁玛在一次新闻会议上向一群非洲记者演讲时表达了非洲人的根本信念。他说："新闻媒介的存在并不仅仅为了使所有者致富，使读者获得娱乐。"他进一步指出：

☆它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必须与社会保持协调一致。它必须有助于建立一个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人民免遭贫困与匮乏……它必须面向群众，教育并鼓励他们为平等和世界各地的人权而奋斗。

在会上新闻记者通过了一项决议，否决了殖民主义的残余思想：即认为新闻媒介必须非政治化。这些记者认为，他们有责任指出非政治化态度"完全是帝国主义政治，它已经引诱我们的大学人员，行政文官以及其它有识之士偏离了革命的方向。"恩克鲁玛后来深感丢脸，（如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指责自己破坏了自由革命的原则，建立了独裁政权使所有自由均遭镇压，其中包括新闻自由。然而，恩克鲁玛所表达的思想绝没有被人们遗弃。迄今，新闻媒介作为整体工具的思想仍然是进步中新闻媒介理论思想的基本信条。

亚洲的情况不同于非洲，英国在那儿建立了一套以英国模式为结构的兴盛的新闻体系，含有实现本国新闻事业的理想，其动

力在于支持搞那种恩克鲁玛所憎恨的非政治化制度。事实上，首先出现在亚洲的发展新闻学这个词在确定时指新闻媒介不受政治支配，它的首要职责是报道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新闻。1967年当这个词深为人知之际，"亚洲报业基金会"宣告成立，该组织由亚洲的报刊和福特基金会联合资助。亚洲报业基金会的主管人员指出，基金会的信誉"建立在专业化、客观性以及完全不受政府或官僚控制和影响的基础之上。"这句话可能同样道出了美国或英国主管人员的心里想法。

时隔不久，发展新闻学这个术语马上遭到猛烈的批评，独裁者趁这个机会把新闻媒介牢牢控制在手并给予严密的审查。这阵批评浪潮主要是由于菲律宾发生的专门事件而掀起的，发展新闻学的思想首创于菲律宾。1973年，在洛斯巴诺斯的菲律宾大学建立了发展传播系。在洛斯巴诺斯，发展新闻学的名称和概念修改成"发展支持性的传播工具"，这一理论认为新闻媒介应当只是发展的工具。政府机构制定发展计划，而新闻媒介只是协助完成既定的发展目标。洛斯巴诺斯大学部的首任主席诺拉·魁北鲁说，她的计划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增长，把人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因为"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以及发挥更大的人类潜力。"在这种制度下，菲律宾新闻记者被剥夺了对他们的独裁总统菲迪南·马科斯和他的家室以及他的政策进行抨击的权利。如同进步中世界的许多亚非拉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在菲律宾，打着发展幌子进行镇压成为该国的生活方式之一。

这一现实并没有使发展新闻学的原则丧失殆尽，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执行主任纳林达·阿加沃拉认为，将发展新闻学转换为镇压性新闻媒介的工具实在是阴差阳错。他指出，发展新闻学的正道应该朝工业化世界"调查性新闻学"的做法看齐。阿加沃拉写道，报道发展的新闻记者的职责是：

仔细检查、评价和报道发展计划对于国家和地方需要的关系，计划指标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以及政府官员的声称与实际情况对人民所产生

的影响之间的差距。

这种定义好象把发展新闻学降到了普通新闻学的地位（至少理论上如此），正如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闻体系中已经做的情况那样。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管如何乔装打扮，发展新闻学定下的调子事实上总是显得理想化。有人可能会说它是乌托邦。但是训诫无处不在，时而隐而不露，时而显而易见。由于发展新闻学务必存在下去，所以它必须满足进步中世界的人民需要。肯尼亚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汤姆·姆博亚在肯尼亚获得独立18个月之前，即1962年5月，栩栩如生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姆博亚在巴黎对一群记者说，非洲的新闻媒介必须为建设国家的大业服务；此外，由于新闻媒介具有提供消息、进行批评和教育的作用，因此必须允许它自由地进行工作。他进一步补充说，在建设国家大业的奋斗过程中，它必须联合非洲领导人的力量，即"必须从该国人民的激情出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处理非洲事务，而不是从外国利益出发，以东西方世界的情况来处理非洲事务。"最后他预言："离开这些内容，新闻媒介将会被指责为大逆不道。"不少编辑和记者将面临这种谴责，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自由决不如工业化国家表现得突出鲜明。

讨论新闻媒介行为与作用的论坛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内部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以及工业化世界和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之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初期的讨论焦点是有关信息流通的主张，后来愈来愈集中地讨论技术发展以及新闻学——即新闻报道——与其它传播工具和提供信息互相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兴民族国家和拉美前殖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新闻院系把重点放在调查研究以及探讨传播模式上，而在美国他们的先驱则主要强调培训记者、编辑和摄影人员方面。那些进步中世界报纸和电台的负责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去那儿学习所谓新闻学的"基本功。"学成后便返回他们的报社和电台，实践从美国学来的技巧以及从前殖民时代长期流通的英法报纸那儿观

察得来的技巧。

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殖民帝国的崩溃和新兴国家的建立被认为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预言，即预言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将会由于其内在固有矛盾的激化而溃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家们认为，刚建立的革命的社会需要按照列宁模式建立一套新闻体系。国家建设正好符合这种集体组织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学者会发现令人激奋的研究课题，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也同样如此。对他们来说，最恰当的术语是"文化帝国主义"。由于资本家放弃了他们对其殖民地的直接政治控制，据说他们正逐步迈向更加微妙的统治范围。资本家通过求助于报纸，特别是电视和广告的帮忙，企图使他们原来的殖民地屈从于其他形式的剥削。他们想抹去新兴民族国家的本土历史，摧毁他们的文化传统，以他们在工业化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机械化消费社会取而代之。这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另一种形式。新闻媒介和信息工业是这种形式的先锋。社会主义分析家不必把这种想法强加于进步中世界。因为亚非拉的许多人早已有了这种思想。对西方意识形态和记者的渗透表示害怕的并不只有恩克鲁玛一人，还有进步中世界中的其他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思想家。其中坦桑尼亚总统米利叶斯·尼雷尔论述的语气最为坚定，最为坦率。他的坚持在国内走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对非洲以及进步中世界的其他领导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作者在最近对坦桑尼亚的访问期间，发现其新闻体系落后不堪、令人心寒；他们力求通过热情和干劲来弥合其技术不足和资金短缺。全国人口1800万，却只有两份日报，且都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其发行量极其有限。其中，英语的《每日新闻》报发行量是 9 万，斯瓦希里语的《自由报》发行量为10万。然而，由于识字率的提高，这两份报纸的编辑人员看到了新闻事业的光明前途。尼雷尔声称要在20年内把15%的识字率提高到70%。《自由报》据

社的一位编辑威尔逊·布克胡里说，"我们的作用是告知人民并使他们获得娱乐。在我国发展一批富有经验的读报者是十分重要的。"对布克胡里和尼雷尔他们而言，避免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方法是培养一大批具有鉴赏力的大众，使他们能够识别任何外来文化暗中渗透进来的行为。

虽然在坦桑尼亚不存在对报纸的官方审查制度，但是，尼雷尔对电视采取强硬措施。为了在坦桑尼亚抵制美国的娱乐性行业，他下令禁止在本国出售电视机。在滨外的桑给巴尔岛(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电视业已有一定的立足点。1973年在桑给巴尔当地政府提供500万美元资助的情况下，该岛勉强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业务机构，名为"桑给巴尔电视台"。1980年，当我们走访该岛期间，由于电视台资金不足又加上受到尼雷尔禁令之阻，桑给巴尔电视台每日才播放3小时。桑给巴尔电视台年轻的工作人员急切地把自己看成是教育的先锋力量。同样大陆报社的编辑也认为其报纸应该是普及大众教育的工具；这同桑给巴尔岛上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认为他们的广播媒介是教育工具的想法一样。于是，他们拒绝播放暴力镜头，并表示凡有威胁他们本土文化结构之嫌的外来文化的东西将不予播放。不难看出，他们的激情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不仅桑给巴尔无力购买电视机，而且权力有限，停电现象无休无止。除此之外，非洲各地电视台还普遍存在一个怎样维持下去的大问题。尽管桑给巴尔最大的布瓦瓦密饭店的每间客房均设有电视机，但是只有酒吧间中的一台电视机还没有坏。

虽然法律禁止对报纸进行审查，但事实上新闻经常遭到压制，坦桑尼亚报社的编辑个个善于察言观色，深谙什么样的新闻内容能够博得尼雷尔以及助手的欢心。尼雷尔曾经多次批评编辑人员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坦桑尼亚的全体人民以及新闻界都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靠本国力量自己制定提高新闻工作者质量的培训计划，也许是为了加强他们的骨干力量。不过这儿依然悬现

实违背了期望。在达累斯萨拉姆，一小群干劲十足的青年想努力在一栋由救国军捐赠的东倒西歪的楼房里建一所新闻学校。31名学生中几乎有一半人在录取以前从未见过打字机。下一步是筹集办学资金；该校校长的主要愿望是去美国新闻院校学习怎样更有效地培养学生。

亚非拉各国学生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的新闻院校，可也有许多留学生到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新闻理论。昔日曾经所指的“思想斗争”如今在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之间已经慢慢展开。但是，进步中世界普遍信奉的信仰体系既不取悦于美国理论家，又不讨好苏联理论家。一方面，他们的信仰体系主张客观、公正与平衡的目标，十分接近美国新闻理论家们的观点；可另一方面，该信仰体系又极其重视新闻媒介作为人民的思想组织者的作用，即苏联分析家所指的政治工具的作用。此时，进步中世界的新闻思想体系远比苏美坚信新闻媒介应当引导各民族反对种族歧视、军国主义或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因此，进步中新闻体系思想理论的关键词是合作，而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闻体系的思想理论则强调对抗。

不过，进步中世界一方面声称合作是他们的理想目标，但其具体实践常常直接与此相反，尤其在大后方。在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尼日利亚，1960年刚获得独立不久便发生了部落纷争，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内战。工业化大国之间避免对抗是一回事；而尼日利亚国内避免敌对种族与经济团体之间的对抗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最终还是取得了统一，一届届国家政府四处奔走，忙于建立一种联邦制度以巩固尼日利亚的国家性质，使之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新闻媒介的作用是主要的，尽管试想通过报刊的版面和电台的广播来建设国家早就注定是异想天开。部落之间，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世袭关系给新兴民族国家的新闻思想理论带来许多不幸，并扰乱该新闻思想的捍卫者努力说服恶意批评者；他们的激情，只不过是“孩子般的痴

心梦想和狂妄自大"罢了。然而，还有许多东西是那些恶意批评者平时无法认识到的。

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以及整个进步中世界，通向一种兴盛新闻体系的道路是迂回坎坷、障碍重重的。记者和编辑不得不从那些曲折的道路中探索新径，尽可能地摒弃殖民传统给他们灌输的一切新闻观念。在尼日利亚，第一家报纸是独立前的一个世纪由传教士所创，在那个世纪中存亡的许多印刷报纸都效仿英国的模式。甚至到1960年之后依然如故。在尼日利亚独立前的十年里，当该国报纸公开发起结束殖民统治的运动之时，仍然模仿伦敦报纸的做法。模仿也许是奉承的最真诚的形式，但它同样导致自我贬低。采用殖民模式等于是接受文化落后的地位。当然，这样做是切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模式可供仿效。

数年过后，注意力主要集中到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现象上了，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将工业化世界的文化规范强加于进步中世界的文化规范上。不仅仅是强加，而且是全盘接受那些规范。过去，伦敦的街头报刊（指英国新闻界常说的相对于"严肃"报刊的"大众"报刊）。数年来在第三版上专辟一个栏目刊登一张袒胸露臂的漂亮妇女的照片。到了本世纪80年代，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拉格斯的报纸第三版上仍然印有袒胸露臂的漂亮妇女的照片，而且大部分妇女为白人。这种做法赤裸裸地体现了接受异国的文化形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太明显、刺激，而是更富有一些意义。

近年来的批评矛头主要针对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引进的广告技术和形式。各大跨国公司利用推销商品和刊登广告以期在进步中世界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使进步中世界成为倾销其产品，达到其目的和愿望以宣传其信仰体系的市场。

尽管普遍接受了消费社会建设者的渗透，在非洲还是很难找到一位官员会公开表示赞同这种文化侵略的特定形式。不过，他

们只能相对默默地容忍引进这种异国的目标和理想，为的是从这些跨国公司那儿得到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利益，他们认为这方面利益对发展他们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的讽刺意义真是再大不过的了。政府官员虽然心中对其前殖民主子倾销过来的产品和模式嗤之以鼻，但实际上他们欢迎这种倾销只不过经常对那些在社会公开场合下的抗议者采取严厉制裁的手段。最终，数以百计的非洲编辑人员身受其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锒铛入狱，历尽折磨甚至遭到杀害。

纵观整个前殖民世界，言论自由的理想到处受到赞颂，然而这一可敬的理想如今更多地体现在宣传上而非行动上。如同托玛斯·杰斐逊以及后任的所有美国总统，亚非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在夺取政权前大肆宣扬自由而开放社会的事业，但掌权后便发现自己不得不指责那些敌对的新闻媒介，更有甚者还要采取镇压的行动。假如说工业化世界还不曾出现过真正独立的新闻媒介，那么期待它会在进步中世界出世，这是荒唐可笑的。进步中世界如同其他一切地方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一样无不充当代理人的角色。二战刚结束不久——即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新闻媒介主要充当了殖民列强敌手们的代言机构，当时他们想把英法驱赶出去。60年代早期，在一片获得自由的欢欣鼓舞下，新闻媒介是庆贺殖民统治结束的、刚刚获得自治权的新领导人的代理机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期，由于反动势力开始蔓延，新闻媒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执政军事领导人的代理机构。到了80年代，新兴民族国家以不同方式取得进步，如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其新闻媒介是政府和工商业利益的伙伴，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事实上，它是通过自我审查制来调整自己的，这种自我审查制在工业化世界并不陌生。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新闻媒介朝着更为严厉强硬的方向发展；同样，在亚洲，必须坚持所确定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某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书报审查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在印度，人们一般认为，自我审查制比较可取，尽管总

统英迪拉·甘地① 曾一度觉得这种做法不合她的心意，并要重新制订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法规。

也许进步中世界以新闻媒介推行政治目标的做法中最为突出的要算苏加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了。在那里，新闻媒介被指定为"革命的工具"以帮助建立苏加诺命名的"指导下的民主"制度。从1959年到1965年，苏加诺政权宣称实行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建立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公开的宣传性新闻机构；在国内建立新的培训学院和造纸厂。报纸属于私人所有，但其内容必须受到政府官员的"指导"。60年代中期，苏加诺罢免之后，代之以新领袖苏哈托所谓的新闻自由制度。然而，这种右翼制度重蹈以前左翼模式的覆辙，下令新闻媒介对任何违背苏哈托政权思想的新闻消息进行压制。

不管进步中世界在特定时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法规，新闻媒介接受了——并促进了——政治和经济领导的模式。极少数的国家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如古巴、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越南——其模式遭到消费社会的激烈批评，其价值观遭到跨国公司的排斥。然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现行价值体系类似资本主义，报纸和广播电视很少对这种价值体系进行批评。即便如此，大多数报刊仍然经常捍卫传统文化价值并对外来思想的渗透进行抨击。在记者与编辑的私下集会中，这种批评外来文化侵入的现象更加普遍。

在非洲最大的城市伊巴丹，一个约有400万人口的尼日利亚城市（该城市是靠本土的力量而非殖民者建立起来的），我们参加了1980年度出版广播新闻工作者会议，其中包括尼日利亚大学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教授。这次会议与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的聚会相似：与会者的思想意识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他们中有许多老练的记者和教授曾在英国或美国求过学，但

① 原文如此，应为总理英迪拉·甘地。——译注

都毫无例外地坚定维护国家广播电视网联系19家国营广播系统的官方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文化传统，不管用现在的目光看这种传统有多么原始。尼日利亚各地的电视节目反映出衣着绚丽的民族歌手和用当地语演唱并伴随礼鼓节拍起舞的舞蹈者的形象。很少出现“星空与茅屋”这种节目——但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包括拉美在内的节目相比较——极少有象在美国看到的喜剧或戏剧性的节目。英语是尼日利亚的普通用语——其新闻节目和广播节目都是英语——但是文化保护却是以非洲语言来衡量的；在有些国家，人们作了极大的努力，补充更多的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节目以集中反映传统的非洲主题。

报纸似乎对此关注甚少；甚至在一些广播电视节目上，这一发展也不够快。关于这个主题曾在伊巴丹召开过会议，会上有一个演讲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演讲题目是“广播领域中的新闻自由流通：尼日利亚的丰饶角①和潘朵拉之盒②，”由拉格斯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奥路夫拉吉·艾吉波拉·费迪毕起草。费迪毕抱怨伊巴丹广播电视过多地播放了英美国家拍摄的电视节目。他集中精力主要抨击一个英国迪斯科节目，该节目“以伦敦苏好区为背景，一帮蓬头垢面、命途多舛的尼日利亚失足青年在外国（肯定是在美国的）音乐伴奏下扭怩抽动——人群当中的痛饮啤酒场面不断被摄入相机中。”说到此笑声掌声不绝于耳，接着他又提出反问：“难道这类节目有半点地方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反映我们的文化传统，促进国家的团结吗？”接着，费迪毕把最精彩的语言安排在演讲的最后，他说：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没有必要在继续保持一种局势的同时又去指责它。如果西方国家不愿意和我们讨论，演奏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文化启迪他们的观众；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谈论他们，演奏他们的音乐，播放

① 丰饶角指希腊神话中哺乳宙斯神之羊的角。——译注

② 潘朵拉系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命火神粘土制成的地上第一位女人，“潘朵拉之盒”指潘朵拉下凡时宙斯神送给她的盒子，她违禁开盒，使一切灾害和罪恶跑散世间，只有希望留在里面。——译注

他们的"柯嘉科"节目。这样，我们将会使我们的文化免于灭绝，并且结束传播新殖民主义。指望西方国家来促进新闻的双向流通无异于指望河水逆流。当然喽，任何流通都无法胜过自由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讲和这次会议发生在非洲的一个也许是最有资本主义气息的国家里，尽管整个非洲所表达的"新闻自由"在各国均受到热烈的拥护，但是蔑视英美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到处可见。人们不知多少次把托玛斯·杰斐逊称作为热爱自由的政治领袖，因为他主张报纸高于政府。尼日利亚新闻记者联合会伊巴丹分会主席，电台的骨干记者博德·奥伊沃拉仿照杰斐逊的主张，宣称新闻记者的使命是教育"他所身处的整个社会。"新闻记者是群众的教育者。他的作用至少比课堂教师的作用更为重要。

电视上娱乐节目的文化渗透与新闻产品中资本主义价值的影响之间的界线比较明显。然而，奥伊沃拉和他的伊巴丹的记者同行，以及整个进步中世界的编辑和记者，似乎都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表达的作为他们信仰体系一部分的目标与他们自己所赞美的思想体系中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同。对于奥伊沃拉下面所说的观点，美国记者不会表示苟同的，奥氏说：

☆只要记者意识到他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是帮助发展的责任——只要他们认识到他的自由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以及任何自由并非毫无限制，那么他们的传统疑虑将会消除。政府和记者将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孪生伙伴。

自由与责任关系的主题经常在讨论新闻事业时出现（我们将在下面章节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然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少提到自由应该受到某种限制，以及认为记者与政府是什么社会经济进步的孪生伙伴之类观点。新闻媒介作为进步工具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现代新闻媒介发展的早期，不过那时候的进步是通过向公民传递消息的方法取得的，换言之，新闻就是报刊的钱财；假如带来了进步，那当然是件大好事，不过新闻的作用在于

告知，而绝不是社会或经济变革的一个动力。

事实上，奥伊沃拉认为，衡量新闻媒介行为的道德价值是看它避免对抗而不是激化对抗。他指出，维持和平是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和平的基础也许就是人民能够相互之间进行很好的交流。他说：

☆如果要避免引起误解的对抗，那么新闻消息必须准确清楚，来不得含混、受审或篡改歪曲。

在尼日利亚的今天，绝大多数新闻报道仍然具有煽情性，但是严肃的记者时常对一些过份的煽情报道感到痛惜，就如在美国的情况一样。博德·奥伊沃拉的论点在整个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中间很有代表性。对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媒介进行一番考查就会发现不少类似的看法和希望；奥伊沃拉的论点特别精彩，我们有幸能够从人们的口中所到他的论述。在伊巴丹会议即将结束时，我们向一位尼日利亚的记者指出，许多——也许大部分——美国记者会嘲笑奥伊沃拉观点的天真，他们会极力主张忠于事实、真实和真理而不应当不切实际地要求新闻媒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代理人。这位记者反问："我们为何要学你们的样？你们的那种论理道德除了给世界带来不公正，残酷和战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好对付，不过他也许同样还会提美国的积极贡献，如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

在尼日利亚中心的乔斯城召开了另一项会议，会上一位曾在美国求学的大学讲师进一步展开了伊巴丹会议的主题。他说，尼日利亚和所有非洲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非洲的新闻政策，这个政策不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那儿借用来的。他指出："凡其新闻媒介受外界支配的国家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其中的支配既是指技术上的又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记者和学者眼睛里，要求制定任何形式的新闻政策都是假大空。对他们来说，制定一项政策有点受到外界控制的感觉，因为在采用政策前需要经过起草并且要经法律通过，最后成为条例由政府执行。整个进步

中世界的国家领导普遍给新闻媒介强加审查制度和严厉的限制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反对。

秘鲁革命性的报刊实验

本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秘鲁进行的报刊实验是独特的，对这一实验过程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查。资本主义新闻界对这一实验存在许多误解，然而尽管它最后失败，但进步中世界的记者和编辑仍然对此深感兴趣。他们从秘鲁计划中认识到新闻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理解，有助于带来更为和平、更为谐调的世界；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报纸出版者却指责秘鲁实验是20世纪最遭人恨的扼杀新闻自由的实验之一，当然，孰是孰非还很难作出定论。

秘鲁发展起来的新闻模式与整个拉美国家相似。秘鲁是19世纪初期推翻西班牙三百多年残酷殖民统治的一批民族国家之一。十五六世纪，除了最大国家巴西由葡萄牙殖民外，西班牙征服了格兰得河以南的所有拉美国家。这些拉美征服者的做法有别于踏入北美洲的英国人。西班牙人并不是先扎根后建家园，而是实行彻底的军事征服和掠夺矿产财富的做法。那些呆在“新世界”后方的西班牙贵族不象北美的自耕农和商人；相反，他们兴建大庄园，过着大公般的生活。当地印第安人如同他们从非洲贩进的黑人一样，成为他们的奴仆。这些贵族几乎没有为奴仆们建立起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设施；既不提供教育又不教他们西班牙语。类似西班牙征服者这样建立的封建社会制度十分落后，权力仅仅掌握在殖民贵族和天主教会手中。1800年拉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与1500年的西班牙相差不远；殖民统治无所不包，直到19世纪美国掀起了革命浪潮以及法国革命的经验席卷了拉丁美洲为止。后来，随着教会、商人和知识分子进入大城市，自由势力的增长，各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削弱，于是教会、商人和知识分子起来反抗西班

牙殖民贵族，最后把他们赶出拉丁美洲。

秘鲁位于南美洲的西北海岸，是个多山国家，秘鲁曾经是印加帝国的中心，1824年驱逐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然而，封建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原封不动；接替殖民征服者的统治领袖与他们以前的西班牙人没什么差别。他们拥有银行、煤矿、大庄园以及报纸。这种情景差不多贯穿于整个拉丁美洲；只有少数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比较突出，其经济发展动摇了封建结构，不象秘鲁的情况。秘鲁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不易于在山区修建公路。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叶秘鲁发展起来的铁路网超过了拉美大陆上其他地区；19世纪后期，从首都利马流入内地的信息列于拉美其它首都城市之首。但是文盲率仍然很高，尤其是占该国一半人口的说凯楚阿语的印第安人，他们提本无法看懂西班牙的利马报纸以及1900年以前创办的其它少量的地区报纸。

试图确认各地第一份报纸总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人们对于报纸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十七八世纪由传教士发送的宣传页不能算是报纸。拉美第一份报纸可能是1790年出现在秘鲁的《利马日报》该报由西班牙人创办，时隔不久便倒闭。翌年，一批秘鲁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份《秘鲁信使周报》作为他们的文学论坛。后来该报成为争取政治独立的工具。比较象样的标准报纸是1808年10月24日创办于委内瑞拉首都的《加拉加斯报》。但由于这份报纸是由美国两位印刷商——马太·加拉格尔和詹姆斯·拉姆所出版的，所以它还算不上真正的拉美产物。这样拉美报刊一开始就受到美国报纸的影响。起初，《加拉加斯报》是皇家统治者的代理人，但革命浪潮的高涨使更多出版物涌现，该报便分别成为亲西班牙派和亲自由派的工具，正如革命时期的美国报刊情形一样，然而，获得独立后的一二十年期间，拉美报刊趋于稳定，成为现状的捍卫者。

19世纪秘鲁出现的报业反映了更为浓厚的封建社会制度。当时的主要报纸——今天仍然如此——是《商报》，是拉美从无停办

过的最古老的大报。《商报》是米罗·克萨达家族创办的；该家族是秘鲁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它贵族家族也拥有了报纸。1905年出现的《新闻报》成为贝尔特伦家族的讲坛；1912年创办的《纪事报》起先为拉科·赫雷拉家族拥有，随后落入普拉多斯家族手中；1960年创刊的《快报》（早上版）与它的姊妹报《号外报》（下午版）成为尤劳家族的出版物。这些家族在秘鲁都很有势力；他们的报纸（都办在利马）只是其金融、商业和工业帝国的一个分支部门。1968年当秘鲁着手进行报刊实验之际，公众——至少是那些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正确地估计到了他们的国家报刊将会代表经济和政治权力。《新闻报》出版者，贝尔特伦曾任总理。《纪事报》的普拉多家族中有四位成员曾任总统。《快报》和《号外报》的所有者尤劳曾是内阁部长和总统候选人，并任洛克菲勒银行的副行长。至少有45名《商报》雇员是米罗·克萨达家族成员，他们对资本主义商业的坚定拥护不亚于总统菲南多·贝朗德·特里的政府。特里总统一马当先并使那些领导秘鲁报刊实验的将军们获得成功。

贝朗德·特里领导了一个温和的民主政府。该政府比起20世纪中期之前主宰秘鲁人民生活的独裁政权自由得多。当然，统治政权能给秘鲁带来稳定的局面并不常见，整个拉美都是这种情况，在那儿宫廷革命频频发生，从未间断。19世纪，玻利维亚至少经历了不下60次这种革命。委内瑞拉50次。1950年，洪都拉斯在整个125年的历史期间就更迭了115次政府。无政府状况（也许可以那么说）是拉美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些统治阶级的不断更替并不影响其人民的生活，同样，也不搅乱新闻界。米罗·克萨达家族成员和尤劳家族成员不管哪派政治家领导国家，都照常经营自己的商业，因为无论谁接任，其政府的思想总是与他们一致的。

北面美国的新闻记者是在促进进步主义的价值体系，奉行客

观性法则以及政治上的廉洁公道，而拉美的伙伴却另辟蹊径，按照自己指引的光明目标努力奋斗。在拉美记者以及诗人和小说作者眼里，美国的文化景象是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的技术知识刮目相看，羡慕不已；但对于他们认为的文化贫乏（如米老鼠和快餐部文化之类）情形则表示痛惜。尽管如此，拉美思想界如同美国和欧洲一样都坚信新闻自由。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无不宣扬自由并要求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和益处。然而，他们各自对这些概念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理解，以致冷静客观的观察者很难明察他们思想之间的联系之处。乔治·安妮·盖耶察觉出北美和南美记者观点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她曾写道，在拉美世界，"事实真相很少单独孤立产生，客观性并不存在。每件事物都带有一种观点。"她进一步指出：

☆每张报纸都是政治运动的喉舌或工具；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位训护者。克莱门特·马罗奎因.罗加斯是位老练的危地马拉新闻记者，曾就任副总统。他评论说："我们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分歧在于你可以认为是消息自由。我们则认为它是心灵自由——即你不能说伤害国家的坏话。"

罗加斯观点与恩克鲁玛和姆博亚观点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整个进步中世界所奉行的那种自由与美国和欧洲的自由大相径庭。甚至连最积极的自由捍卫者——印度的尼赫鲁也拒绝接受自由思想中的主要信条——主张自由表达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尼赫鲁说，光是文字就足以引起严重的国际局势，因此，国家必须"用武装的权威来对付"报刊中的危险语言。他还指出，"我们不能以某种自以为是的自由来摧毁所有的自由，危害整个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尼赫鲁声称：

☆我们并不认为压制思想以及任何形式的表达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恶果，阻碍社会集体的发展（压制特别好的事情除外）。

对于尼赫鲁，罗加斯和拉美以及亚非大多部分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最高的自由是心灵自由。消息不如思想和表达意见重要。

我们必须站在这种角度来观察秘鲁的报刊革命。

在1968年10月3日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从总统贝朗德·特里手中夺取了秘鲁政权。和以往秘鲁传统一样，这次政变未经流血，所不同的是，贝拉斯科和一批参与他一起夺权的"革命军官"都是具有不同军衔的军事领导人，贝拉斯科坚决反对封建贵族，这点不同于那些在整个拉美不断夺权的贵族将领。他父亲是位街道清洁工，是印第安和西班牙的混血种人，属于受封建统治者蔑视的社会阶层。执掌大权者中还有利马报业主。贝拉斯科及其同人（多数是混血种）利用军队作为推进运动的一种形式，因为只有军人和教会才有最大的可能推动社会前进。这批"革命军官"决意使秘鲁现代化，更新国家的社会制度。起初他们的意图很不明确，但是贝拉斯科接管政权并没有半点伪装革命的味道。尤劳的《快报》和《号外报》马上看到自己的地位处于危境并开始极力反对革命；进行反对的还有贝尔特伦的《新闻报》，但激烈程度略低。然而，利马的主要报纸《商报》第一年就支持这个政权。用罗勃特·皮尔斯的话说，"编辑从大理石砌成的金碧辉煌的总社楼里发表要求重新组阁政府的文章。"皮尔斯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对贝拉斯科的目标表示勉强的支持，同时又对贝拉斯科的许多措施进行攻击；皮尔斯的评述最彻底地代表了一个北美人评价的秘鲁实验。美国的新闻报道一般是对抗性的，许多报刊对抗得十分激烈。1982年乔治·库里安在《世界新闻界百科》一书中声称，秘鲁的报刊在将领的统治下已经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们"实际上彻底摧毁了新闻自由。"库里安在论述了秘鲁实验反对者的激情之后说，秘鲁的新闻史不愧是"研究存亡的一个实例。"他进一步指出："在与专制政府的长期艰辛的对抗中，其报纸最后证明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其新闻界受到了威胁，因而秘鲁实验应当是一次有益的教训。"在进步中世界里，还有远比皮尔斯对此写得更友好的评述。其中写得最详细的是国内的卡洛斯·奥特加，他参加了秘

鲁计划的进程；还有胡安·加格里维奇，对这次实验失败深感惋惜的秘鲁人，以及拉奎尔·萨利纳斯，详细提供一位贵族情况，但动机不清的智利人。

秘鲁报刊实验的历史实在复杂，这里无法深入论述。秘鲁计划本身进展得较为缓慢，持续了八年之久，1975年8月19日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伯默德兹将军推翻了贝拉斯科政权，该计划随之结束。伯默德兹曾担任总理之职，在贝拉斯科病重之后积蓄了权力。贝拉斯科交权后两年就去世了。曾经与贝拉斯科政权工作过或为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们称他们的运动是一场“革命人道主义”的运动，把非教条主义和非集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此外，他们的运动还“受到基督教思想的鼓舞。”这样，他们明显地拒绝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一切教条主义，“拒绝暴力制度。”就此，他们确立了三项“最终客观的”原则：(a)在群众中建立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制度；(b)在社会所有制优先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多元化的经济制度；(c)建立一种由各个部分和道德价值所组成的社会制度，强调公正、自由、劳动、参与、团结、创造、统一和尊重人格。在这一崇高的情景中，新闻媒介的作用至关重大，事实上，许多贝拉斯科支持者都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位新闻理论家。但只有少数人是新闻记者且都不是职业行家，这一事实在秘鲁记者与编辑以及出版者那里遭到了广泛的轻蔑。

贝拉斯科的支持者们一直坚持认为他们发起的革命中具有一项成熟的报刊计划，但是他们只是按步就班地进行而不是立刻强制执行。另一方面，贝拉斯科的反对者认为从未有过一项清楚的计划，结果只是为了便于应付日益激烈的批评而采取一些措施。不管孰是孰非，有一点很清楚，即该计划没有确立富有吸引力的基本思想理论。印刷广播新闻媒介本来可以摆脱贵族的统治，由从业新闻记者和社会上重要的利益集团来领导。这项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墨索里尼和本世纪20年代其他社会阴谋家所惯用

的工联主义手法。还有其它明显的差别，特别在于国际主义者坚持为国家间的合作而奋斗——以期建立一个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自由和主权的国家。

贝拉斯科最初的新闻法令是1969年10月30日发布的《新闻自由法》。以后五年间，位于利马的总统邸宅里又经常颁布新的条例和法令。然而，第一项法令便引起了政府与整个秘鲁新闻界（包括《商报》）之间的文字战，因为该法令规定，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事实、道德因素、国家安全和个人与家庭尊严方面的限制。但是，除了战争时期之外，当局被驳回了书报审查的权利。此外，该法令大大限制了外国人参与拥有报刊所有权，事实上限制了不在所有权（absentee ownership）。对此，人们就无法区分秘鲁法令与智利埃达多·弗赖自由派政权所颁布的类似法令，但是拉美报界人士及其美国出版商中的盟友普遍毫无怨言地接受智利的法令，而整个大陆对贝拉斯科法令的反应则是持尖锐而激烈的批评态度。

随着法令的增多，反对势力也同时增长。其中尤劳的《快报》和《号外报》的抨击最为猛烈，最后贝拉斯科于1970年3月没收了尤劳的报纸，把这两份报纸用于公用事业，把报权交给倾向其政府的工会团体。毫无疑问，尤劳的报纸于是成为该政权的坚强支持者。贝拉斯科称《快报》为"我推动大报的一条猛犬。""泛美报业协会"的一批美洲出版者在迈阿密提出了挑战，有条有理地指责秘鲁实验。当秘鲁实验于1974年结束随后又提出"印加计划"剥夺该国大报继承权的时候，泛美报业协会的批评日渐其盛。也许街道清洁工的儿子（指贝拉斯科）会欣然回击泛美报业协会的批评，说："美洲大陆的报业组织如今该知道，他们的意见在秘鲁的今天不起作用，协会成员不要再对这里发布命令。"

然而，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国有化本身还没有结束，接着就宣布新闻媒介为"社会财产"，属于全体人民。由于广播电视以及电信体系中的其它媒介，如电话、电传和微型计算机工业，都

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节目的编排制作会倾向于提供"一定的人情，文化和社会教育，以支持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教育改革和体制变革。"实验结束时几家日报变化很大，但据贝拉斯科的支持者反映，广播领域毫无进展，原因是没有足够时间培训广播电视的工作人员，缺少机会增拨所需的资金用来培训和发展本国的制片队伍以推出更好的节目与来自美国和其它工业国的进口节目相抗衡。西德和法国政府为秘鲁广播事业提供了资金和培训，而贝拉斯科的支持者们声称他们在遭到经费大削减之际仍然顺利地在进行广播工业的重建。秘鲁改革者还有一个尚未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将广播工业从主要广播电视设备的集中地——利马——扩展到农村，作为争取国家一体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它很象非洲所热切向往的做法一样。

"印加计划"中有关社会财产的条文规定，取消主要日报的所有权，把日报转交给能够组成统一利益集团的人口地区。这些地区负责出版报纸为其读者提供娱乐和消息，同时监督政府看它是否偏离争取革命人道主义的运动航向。不管他们具有何种意识形态或即便没有授予所有权，所有公民和组织都得到保障，能够获得这些报纸的版面。谁都不会怀疑制订印加计划的知识分子是幻想家；他们盼望报刊不再代表少数人利益或国外所有者的观点，而使之掌握在代表团体组织的手中，让这些团体来密切监督政府，看它是否正确明智地贯彻"革命人道主义"的目标。

在关键的两点上，贝拉斯科的支持者判断严重失误。第一，支持者们以为新型的"秘鲁报刊"由工人而不是贵族操办就会自然而然地支持他们的全部目标。当新闻记者最后辜负了这些期望时，那些计划制定者才发现他们自己期望过高，只好发布强行规定。更加严重的失策在于他们过于相信那些组织起来的地区，把办报权授予了它们。而实际上，这些地区毫无组织性，充其量这些地区只能算是具有良好的愿望。它们可能有朝一日成为统一的组织，但1974年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二，贝拉斯科的支持者忽视

了报纸的传统。《商报》的对象原来主要针对城市及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但却被指定发放到农村地区。而原来针对农村读者的《新闻报》却转向城市工人。大量刊登色情和暴力的《观察》杂志则面向文艺工作者。皮尔斯认为，制定这些指令性措施"不是恶作剧就是愚不可及。"奥持加承认了失误并责怪没有对读者对象做足够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被派去负责新版《商业》刊物的贾沃斯基沮丧地承认，"尽管我们在理论方法上大胆创新，"但其实践十分不切实际。事实上，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秘鲁实验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批生活在非现实世界中的业余理论家所制定的一个空中楼阁般的计划。这个估计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在进步世界中，印办计划和秘鲁实验的全部内容已经成为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分析研究之课题。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并不是抛弃这种实验，而是问："错误何在？"或"为何失败？"

另一部分人，其中有库里安和泛美报业协会，则指责该计划只不过是企图通过堵住报刊的对抗言论来巩固专制政权。库里安在一篇讽刺文章中总结了这个观点，他说：

☆这套至高无上的基本理论是自古以来认为新闻媒介当作为"公共事业"的思想产物。这种公共事业理所当然必须由所有机构中代表最广的公众的政府本身来控制，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贝拉斯科则步子迈得更远，声称秘鲁从来就不存在言论自由，因此无须取消它。他说，新闻自由只是拥有它的商人和家族的自由罢了。

当贝拉斯科制定的新闻法则最后于1980年被贝朗德·特里政权取消时，泛美报业协会对此回敬说，"这是近年来新闻自由在该区域所发生的最好兆头。"贝朗德·特里不仅废除了过去的法规，而且还任命《快报》和《号外报》的所有者曼纽尔·尤劳为他的总理，贝拉斯科最先没收的就是这两份报纸。

莫拉莱斯·伯默德兹将军的四年统治是转折年代。他取消了一部分贝拉斯科的法规，也修改了一部分；报纸重归原主但不准

谩骂政府或政府的愿望；报刊不得"以煽情，离间和贿赂作为报道特点……（或成为）真理的歪曲者和分裂秘鲁人民的煽动者。"尽管如此，曾在贝拉斯科手下担任过编辑的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被离职，代之以保守的新闻工作者。有上百位职员遭到解雇。旧的新闻法取消之后，新闻媒介的方向转为提供大量的国内和国际新闻，其目的是为了向读者和观众提供客观的消息。大型报业获得税务优惠，以刺激它们的发展；在社会财产计划期间发放给工人的报纸股券宣布作废。报职人员有权持有企业股票，不过他们得购买。

那些关心新闻实验的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所无法了解的是，那次实验是一次失误，是新闻史上的一段奇闻呢；还是如果实践更为行之有方，这一实验可能会产生重大意义，对今后的发展是一个吉兆？而事实是，那些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目标全然没有达到，贝拉斯科政权自己发现他们的做法与夺取政权以前掌握报刊的贵族做法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不同。一旦遇到来自出版界以及许多他们的职员的反对和抵抗，他们就会辞掉大批人员。由于他们需要新闻界支持他们的想法，但结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就颁布条令，规定理解新闻的方法。他们并不逮捕出版者和编辑，使他们坐牢——这会太过份——不过他们也确实流放过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与国外有牵连的人。一部分外国记者被驱逐，还有一部分则主要被拘留。贝拉斯科政府不是采用审查制度，而是采用增加报职人员，安插忠于其革命的亲信的手法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发行量很快大幅度下降，以至政府只能靠提高报价来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那些授予办报权的公共地区；这些地区自身既软弱无力，又组织混乱，因而无法执行为它们指定的任务。实践使理论受挫，这已司空见惯。但是，留待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

记者是写作者……而不是政治家

南美洲、北美洲的出版者对秘鲁实验提了许多反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许是它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客观性被一套政治目标和价值所替代。"新闻"被用来教育和引导读者达到具有特殊含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目标。在这一点上，贝拉斯科的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标与恩克鲁玛和尼雷尔，甚至与霍勒士·格里利和约瑟夫·普利策所追求的目标没有明显的区别。然而，那些美国出版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在非政治价值体系彻底溶入资本主义的新闻思想理论之前。把那种价值体系输送到进步中世界显然意义极大，不仅对于工业化国家的新闻界而且对于在那些国家中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也是如此。事实上，支持一种倾向自己的新闻思想理论只是几十年出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冷战计划的一块跳板。

在这种对抗中，培训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意义变得十分重大。对英法而言，这类培训长期以来一直不失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这场特殊的角逐中，美苏两国是后来者，然而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把它们推向统治地位。但是，在工业化世界的所有新闻工具中，英国广播公司在输送意识形态方面最具影响力。长期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对提高技巧漠不关心。公司的领导和职员对于他们公正地报道富有戏剧性、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深感自豪。在这方面，他们有意识地追求节目为公众服务的目标，由不得他们左右听众的想法，他们只是为其听众提供"事实"并冷静地对那些事实的含义进行合理的解释。

英国广播公司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在广播电视领域（姑且不说在所有新闻记者眼里），它被誉为报道国际新闻中最为详尽，最为客观的广播公司。在前英国殖民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其声誉尤高，因为在殖民势力被撵走的革命年代里，英国广播公司在广

播节目中谨慎地避免了明显的报道偏见。除此之外，英国广播公司还通过培训和教育使其节目标准在进步中世界里得到推广。该公司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自从1957年开始便向进步中世界的广播新闻工作者提供培训课程。20多年间，参加英国广播公司课程的有50多位广播员，其中一半来自非洲。1965年，该计划又补充了电视培训，前五年间有165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电视课程的学习。这些新闻人员学成后返回本地动手推广业已兴盛的BBC模式。甚至在伦敦开设这种培训课程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就已经把专家派遣到整个大英帝国，以帮助那些刚刚兴办广播企业的国家。

在讲法语的殖民帝国里，法国也制定了类似的计划，把非洲广播人员带到巴黎进行培训、法国广播公司更胜英国一筹，他们直接负责发展非洲领地的电视业，最后把这些新型团体纳入法国自己的广播电视体系之中。在前法属殖民地区，法国模式并非不遍及，但从未享有英国广播公司那么高的声望。其原因之一是，非洲国家不是不知道法国广播业受到巴黎政府的严密控制，远比伦敦控制英国广播公司厉害。因此，法国广播体系从来不能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公众服务形象相匹敌。英国广播公司不仅在英国前殖民地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西欧、日本、美国、甚至苏联和中国也素负盛名。有人会说，长年来英国广播公司一直是英国最有价值的出口机构，因为它不仅“输出”独特的广播风格，而且又“输出”了一整套政治和文化价值，使它们扎根于天涯海角。

尽管英国广播公司享有为公众服务的良好声誉并显示出公正的面目，但与其它传播媒介比已不再能够客观地报道新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工作者本身就是上层阶级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具有该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观念；他们很可能认为进步中世界的人民是一些需要携手领路的孩子，象他们阶层的其它成员一样需要把他们带进文明社会。这些新闻工作者尽管力尽所能但还是无法使进步中世界的人民相信他们不是以某种轻视的态度来帮助他们的。这样一来结局是混乱的。因为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的

风格广泛受到赞扬，但另一方面其新闻节目的内容又常遭指责。

然而，在美国就学的亚洲广播新闻人员面对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即商业广播模式。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人员中几乎没有人仿效英国广播公司人员的做法。因为以冷静而不动感情的方式报道新闻是遭人讨厌的。贤哲们认为如果观众看的新闻没有戏剧色彩，他们就会转而收看另外一个与对手竞争的节目。对于不少来自于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来说，美国风格显得更为适宜，因为这种风格更容易适应政治目的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电视的商业化则令进步世界的新闻人员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已长期习惯了仿效英国广播公司的做法，习惯于“严肃”新闻而不是闲言和琐闻。令他们兴奋和着迷的是美国广播(以及报纸)的技术质量。他们想在本国能够运用这些技术创新，使他们既能制作更有趣味的节目，又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最终大大有助于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取得技术并非不花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伴随技术而来的价值体系。而美国输出的价值体系与英法两国的培训课程所输出的价值体系是相互一致的。无论什么职业特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或她只有在该信仰体系中工作，其职业才能获得地位，也就是说要维持现状。不管是追求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传统的为公众服务姿态还是追求美国广播电台的那种迎合公众趣味的戏剧性态度，新闻从业人员都起着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的作用，只有极个别例外。彼德·戈尔丁正确地指出，职业特性不仅维持现状，而且还赞赏效率高于意识形态、实用高于乌托邦。尽管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不会有人赞誉乌托邦式的新闻自由形象犹如人类自由的灯塔，但乌托邦式记者的美梦不时受到嘲笑讽刺。

传播技术和传播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强大武器。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同样致力于输出他们的技术和价值体系。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经常获得全部经费资助到莫斯科、布拉格和东柏林的新闻院校进行学习。苏联新闻学

教员定期前往亚洲和非洲，以帮助进步中世界的新闻人员并使他们转向苏联的意识形态。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都不曾取得成功。进步中世界却建立出一套他们自己的新闻思想体系。当然，现在说这套信仰体系已经定型持久还为时过早。因为所谓的第一、第二世界想支配并最终使进步中世界意识形态解体的努力仍然继续着，而且愈发厉害，这一现象我们将在讨论关键的经济问题的第十章中进行更加深入的论述。

进步中世界的新闻人员对资本主义传播媒介的客观性模式和社会主义传播媒介的政治性模式的矛盾感到困惑迷茫。他们既非羡慕客观性模式的技术和技能，又感到政治性模式更接近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矛盾心态在富朗克·巴东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了说明。巴东在60年代曾负责“国际新闻学会的非洲计划”巴东在报告中说，他的学员对“新闻理论与所谓的非洲主张之间的矛盾选择”感到苦恼。“国际新闻学会”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和进步中世界的出版者所组成的国际性协会，该新闻学会极力推崇美国模式。即要求新闻记者观察和报道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要极其耐心地避免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个观点在一本国际新闻学会发给非洲新闻人员的主要培训教本中阐述得很生动，书中指出“记者就是记者。他不是作家……最重要的是，他不是政治家。”彼德·戈尔丁说这种苦恼是进步中世界新闻人员头脑中所具有的一种犯罪情结的反映，这种情结是他们受到欧美传播媒介所宣扬和推广的客观报道的理论与实践的培训而产生的。

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广播（包括报纸）模式在亚非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拉美深远一些，拉美主要受美国模式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广告在拉美传播媒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胜过亚洲、非洲，甚至胜过西欧。而且拉美的广播电视业比亚非先进，它的运转资金几乎完全靠大广告公司带来的广告收入。贝拉斯科的秘鲁实验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消除了广告商的影响。

对资本主义新闻制度的支持者们来说，广泛运用做广告作为

一种财源代理机构消除了政府直接控制传播媒介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在那里广告收入为广播事业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但政府仍然对传播媒介的那种形式施加控制，通常是间接的，如西欧、日本以及美国；但有时是直接而强制性的，如亚非拉国家。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告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但是广告商与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双方一般都配合的十分和谐。譬如在拉美，宫廷革命时有发生，出版和广告商业消息则一直没有受到一届届政府的干预。换句话说，这说明传播新闻的经济来源依靠商业利润的事实似乎对专制政府产生不了影响。

在贝拉斯科统治下的秘鲁，商业失去了他们对日常报刊的控制，但广播电视中不停地做着商业消息的广告，甚至在这些传播媒介被置于政府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如此。贝拉斯科政权确实对新闻记者的行动自由施加了大量的限制。后任的贝朗德·特里政府废除了那些限制。雇用之后的秘鲁新闻受到了贝拉斯科报纸人员的拍手称道。《商报》的一位社论撰写人在贝朗德·特里当选两年后兴高采烈地说，"如今我们拥有了完整的新闻自由。"不过，经过人们的追问，他也承认这种自由事实上是不完整的。人们可以对国外事物进行任何评论——连共产党新闻记者也拥有这一特许——但是不能评论秘鲁本身的某些政治和经济情况。不过，这种限制并没有使编辑感到遗憾，我们为何要冒犯自己的读者呢？不管怎样，《商报》拥护总统及其总理——《快报》和《号外报》的所有人。

世界各国政府当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都会对编辑和出版者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这些政府经常严厉限制新闻界有权发表的言论。有时这类压制是残酷的。历史处处记载着为捍卫言论自由权而殉难的新闻记者的事迹，以及由于政府新闻的政策引起民愤而被推翻的事例。言论自由的信仰确实扎根于世界各地。然而，在进步中世界里，新闻工作者为了确保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而硬行采取自我限制的做法。

暴虐专横的统治者利用这种信仰来操纵新闻界，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进步中世界的专制政权针对传播媒介采取的压制和官员恐怖行径固定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进步中新闻媒介表示轻蔑的态度。对美国和西欧的新闻分析理论家来说，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媒介抱负(如秘鲁的情况)是虚伪的，人们开始认清发展新闻事业无异于政府在崇高目标的幌子下施加严密控制，阻止言论自由。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有时候也同意这种看法，特别当其政府忙于颁布意想不到的压制性法令时。毫不奇怪，当英迪拉，甘地于1975年实行审查制度时，人们对尼赫鲁以及其他民主政治家所制定目标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事实上，进步中报纸受到触动的不只是印度一个国家；假如对进步中世界里的最现代化的新闻制度实行审查制，那么谁能逃脱呢？即便两年后废除了这种“应急”审查制，进步中世界的新闻理论家在谈到未来时仍然谨小慎微。

尽管实行审查制，但许多印度新闻工作者还是在他们的新闻栏目里偷偷写进一些避开审查官员注意的字眼、短语、甚至句子，通过字里行间向有头脑的读者透露隐蔽的含义。这方面，他们效法一个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用来瞒过普鲁士书报审查官检查的做法。这种运用隐意和双关含义短语的能力似乎是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都掌握了的技巧之一。新闻工作者随意发表言论的自由可能会遭到剥夺，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报刊和公众在传播消息中利益一致，那么这种消息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

南美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巴西在几十年军事专制的统治年代里，这种传播已被提高到一种艺术形式。军人书报审查官出现于巴西报纸编辑室里。监督所发表的消息是否偏离政府的允许范围。每当文章最后定稿、准备付印之际，审查官会通篇阅读这些编稿，其中一部分文章允许发表，还有一些则被取缔。对审查制

抱敌视态度的编辑除了偷偷塞进一些遭到否定的材料外，还企图回击那些审查官员。在审查制度实行的初期阶段，编辑把他们的稿子编排在白色篇幅的栏目里，明确指出文章已通过审查。当这种做法遭到政府严厉制裁后，编辑们则把审查通过的栏目安排在头版，上面刊登食谱和失恋信箱等内容。在巴西运用最独特的绝招是幽默杂志《帕斯昆》。该杂志找到了一种批评政府但隐而不露的招法。这份杂志在谴责巴西军队时，只用“希腊”这词来指代“巴西。”本世纪60年代末期，右翼军事领袖夺取希腊时，《帕斯昆》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它不断发表文章谴责“希腊军事政府”采取暴力行为破坏民主原则、人类正义和新闻自由。其读者马上意会希腊是隐指巴西，然而这种情况当局花了一年有余才觉察出来。最后这份杂志遭禁，其编辑人员被捕入狱，受尽折磨，然而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巴西的审查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有一段时期招用了不下90位审查人员，但这些人依然不够审查全部报刊。惩罚是残酷的，一般来说，编辑人员谨慎行事，避免发表反对领导人的言论。由于他们安分守己，结果等于自我审查。大部分巴西报刊都没有发表过激的言论。此外，编辑对那种审查计划飘忽不定的特性感到身心交瘁；他们不知何时会被审查，何时能避免欠谨慎的报告。1977年，政府解除了“围攻状态”而代之以“紧急状况”。直接审查制有所松动，但限制绝没有废除。军人领袖们变得更老练了，每当察觉某出版物偏离方向，他们就邀请该出版者喝酒吃饭，趁机好心地提醒他的出版物中含有煽动破坏性言论。他们以社会责任的名义说，这种做法必须停止。这样，巴西的出版者和政权如同秘鲁和整个地区的同仁一样，自己接收了审查制。不过，对审查制怀有敌意的专职新闻人员依然不断地活动。一位巴西编辑透露，“我常常跨出禁区，但并不过分，我一直努力着。”这牵涉到“社会责任”怎么理解的问题。下面我就着手讨论这个问题。

第 三 篇



第八章

社会责任理论：哈钦斯委员会及其结果

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协会和责任性

二战后的几年中，"社会责任"①骤然间在美国的各个大小机构中成为群起而追之的目标，时隔不久便普及世界各国，为人们竞相追求。这条术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新闻界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新闻媒介在美国是唯一的受到第一修正案保障其操办活动免遭政府干预的永久性机构，但作用平平无力所致。"新政"掀起的社会改革极大地限制了商界的行动自由，而新闻界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限制不会扩展到新闻机构，尽管第一修正案没有如此规定。

鉴于出版商一向为共和党撑腰，他们关心的自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政绩，并把目光集中在来自民主党首领们，报业掀起的工会运动以及罗斯福本人对新闻界发表的层出叠起的批评文章上。批评内容有二：其一，新闻界失之公正，政治报道有倾向性；其二，新闻栏目里尽充塞些无稽之谈和区区琐事而没有发表一些对公众有益的消息。假如这些批评说过了头，不少出版商就会相信这很可能引起政府的制约。鉴于此，《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决定开展一场反攻的战略是明智的做法。由他提供资金筹建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研究新闻传播情况，汇总他们的建议，以便改进新闻传播的质量，为消除政府干预献计献策。

① 关于社会责任的起源及哲学意义的论述见本书附录。

1946年，也就是大战结束后一年，这个委员会成立了，主席罗勃特·哈钦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学校中的"传奇人物"，且在一大批自由主义者队伍当中来头非凡。卢斯坚信委员会不会全由他自己政治圈子里的人物组成，在这点上，哈钦斯是理想的选手。其他12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也被选入了这个研究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响当当的哈钦斯委员会。①《时代》周刊专为委员会出资20万美元，《大英百科全书》拨款1.5万美元。

一年后发表的哈钦斯委员会报告不仅把社会责任这一术语写进美国的新闻媒介领域，而且还一直主宰着后来发起的讨论新闻理论与新闻道德的论坛，时至今日。那篇题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的报告措词严谨，短小精悍，解答了新闻自由是否陷入危机的难题。报告的结论表明新闻自由的确陷入困境，原因有三：(1)现代世界中新闻的重要性和能见度增强；(2)一部分新闻媒介操办者提供的服务脱离社会需要；(3)还有一部分，则时而从事一些受社会谴责的勾当，这种行径如果继续下去，必定会引起来自政府的约束和控制。这个委员会宣布的措施是，新闻界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见闻广博的公众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监督新闻传播的责任性。在抨击一些新闻媒介的做法方面，哈钦斯委员会指出：

☆定期的出版物浩如烟海，充塞其间的是一连串繁杂的故事和图片，与各地活生生人们的典型生活毫不相干。其结果不外乎无聊、平淡、曲解和永无休止的误解……

这些出版物强调的是别出心裁，而不是普遍典型，是耸人听闻而不是富有意义，这些刊物只顾忙于刊登这类琐事，以致于公民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时事来表现他们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哈钦斯委员会用概括的笔触给新闻媒介绘制了一幅煽动夸张而不负责的形象，谴责新闻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商界大亨"的手里；

① 哈钦斯委员会，即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译注

他们为了专向垄断而"拼命追求权力和利润"，认为大投资商和雇主怀有"共同的偏见"。哈钦斯委员会不仅就自由的新闻媒介到底应该提供什么内容的问题推荐了一份五点计划，而且还敦促创建其他委员会对新闻媒介的情况进行检控，同时批评了各个新闻院校无力为新闻出版事业提供一些准则。但是委员会对应该授予新闻出版委员会以执行权这一点提得不多，尽管它的确强调了一点，即新闻媒介内部本身应该开展"富有活力的相互批评"。委员会说，如果新闻媒介（包括报纸和电台等）自身不进行改革，那么政府就会说：新闻自由"攸关政治自由"；除非那个自由成为"一种具有责任的自由"即对"良知和社会道德"负责；要不然，那种自由是危险的。

关于当今社会中新闻媒介的作用这一问题，哈钦斯委员会清楚地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认为，公众有权利要求新闻媒介遵循以下基本五点：（1）应该提供翔实、全面的当天新闻；（2）提供一个交流观点的论坛；（3）为沟通群体之间的想法和态度提供一个渠道；（4）提供一套展现并阐明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方法；（5）提供一条接近社会各成员的途径。公众有权不仅要求新闻媒介应在言之有物的文章里反应事实，而且要求阐明"事实真相"，换言之，所要求的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是要加以澄清和解释的客观现实。

假如说卢斯想得到美国新闻界的普遍赞同，那么就是误解他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主席韦伯尔·福里斯特针对哈钦斯委员指出，如果新闻媒介失去自由的话，那不会是因为"一份诸如由哈钦斯委员会自己任命的大陪审团提交的综合控告书，而是因为对读者失去兴趣和信任"。其他编辑的看法也大同小异，新闻学学者的观点亦然。罗勃特·德斯蒙德在一份由新闻教学人员出版的《新闻学季刊》上发表文章，对哈钦斯委员会系统研究的失败，特别是对新闻院校的严厉批评提出了挑战。德斯蒙德认为，哈钦斯委员会整天沉缅于撰写"不负责任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已经使这些学校的建设工作足足缓慢了十年"。《纽约时

报》在一篇措词谨慎、观点公允的评论文章中抱怨，哈钦斯委员会"在新闻媒介还处于演化过程中提出的标准过于完美、理想化。他们太操之过急，殊不知我们还达不到这些标准"。

然而，尽管起初反应显得冷淡(且不说充满敌意)，十年中美国新闻界还是采用了有关社会责任的论文，就象新闻自由和公众有知晓权是从西奈山①那儿流传下来的一样。《幸福》杂志不仅刊登显眼的铅字文章，而且还附上增刊，里面刊有哈钦斯委员会报道的全部内容。《幸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一些保留意见（说报告晦涩难懂，好多处用语"过于尖刻"）但报告的大体内容丰富而有意义。然而，有一点《幸福》杂志指出，哈钦斯委员会在促使新闻事业追求崇高目标的同时，没有在文章中就何以避免无聊的方法提出真知灼见，杂志指出：

☆人们可以希冀哲学家能够告诉新闻工作者何以为之，但是哲学家的任务是从事热爱智慧的工作而非大众传播。这样，只有当每一个哲学家同时是新闻工作者，而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同时又是哲学家的时候，方能最终解答自由、责任和效率的难题。

哈钦斯委员会要求新闻媒介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是基于民主的考虑认为只有在见多识广的公民选举那些能够在政府中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过程中作出正确判断的时候，民主才会得到滋生和发展。力争达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负责。新闻媒介在发挥这项作用时，必须对它所服务的公众和社会负责。这，就是哈钦斯委员会报告的中心意图。委员会给新闻媒介所指定的作用与所有机构给他们自己所指定的作用是一脉相承的。医生职业的法则可以在希波克拉底②的誓言中得到认同。律师、工程师、教师和其它机构的代表人员也同样发展了这类法规。同样，新闻媒介社会责任的法规是由哈钦斯委员会认同后发表提出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

---

① 西奈山，指圣经中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译注

②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希腊医生，有"医药之父"之称。——译注

世界各国这个法规背后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写到过报刊的职责，在马克思之前，还有加图、富兰克林、伏尔泰和密尔顿以及其他名人，的确如此，当普利策建议在哥伦比亚大学内成立一所新闻学院时，他宣称学院的宗旨是帮助新闻工作者在采集和报道新闻过程中变得更富有责任感。新闻学院将"区分出两类人：一类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另一类则是既无需文化又无需信念，只需商业技巧的报人"。到了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的出版，社会责任这条术语才成为代表"民主"报刊的理想目标的一条上口的短语。

施拉姆、彼得森和西伯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在"新闻媒介应该如何工作的种种概念"这个问题上，应该把"社会责任论"列为新闻界和政府或社会两方关系的四种理论当中的一种。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新闻媒介的基本理论从来没有超过两种或四种。所谓两种即"集权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后两种只不过是前两种理论的演化和变形。集权主义理论成为"苏共"信条，而自由主义理论则形成了"社会责任"的概念。

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性。根据报刊四种理论的主张，自由主义理论要求新闻媒介承担两项职责：（1）作为一个"监督者"——"一支独立牵制政府的力量"；（2）作为成人教育的一种工具，因为"民主的成功取决于睿智颖慧、消息灵通的选民"。要完成这些职责，新闻媒介"必须完全摆脱它所谨防的任何因素的控制或制约"。而社会责任学说的发展，如他们所述，是因为看到了自由主义理论中存在着缺陷和矛盾，主要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理论没能"为大众传播的日常工作提出严密的准则。简言之，即区分自由与滥用自由的确定的法则"。不管怎么说，社会责任学说立意高远，因为它"祛除了桎梏人们心灵的紧箍咒"，并"为人类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蓝图"。

显而易见，他们在考察产生社会责任学说的某些历史因素方面，各自理由充分，坚守立场。进步的信念已经衰竭，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搅乱了公众的认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简朴的乡村生活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超大城市的出现而荡然无存。黑格尔和马克思眼中的异化已发展到杜尔克姆① 笔下的“自杀性反常”。对理性的信念也随着对心理和精神病理学探求的深入和发展而不复存在。在遥远而未名的各类公司中，经济权力无端被人授予。大众传播媒介已经变成大企业。如今，报刊杂志与连环漫画、电影和电台竞相争夺观众和读者。电视机和计算机早已遍及天涯海角。

一言以蔽之，对世界的信念——在神的眼里，在人们的心中，在未来——已经四分五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恐惧胜过信赖的世界。各种机构处于守势。在揭丑时代，新闻媒介一直针对所有机关的丑闻作不懈的抨击。欧文、辛克莱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对过去看法的正确性提出了众多质疑，即仅仅地把新闻媒介视为人民的公仆，作为提醒人们注意出现暴政的传话筒这种想法已不再可能了。况且，大众传播的所有权日趋集中。不仅报纸由于人口的增加而在发行量上停止上升，而且实际上报业主的数量也在下降。企业合并和联合股份协定导致竞争的缓和，报纸发行量较小的城市能凑合着维持下降的生活水准。这样，唯有力量雄厚的才得以在大城市站住脚。由不居于产权所在地的雇主主办的报纸就不能指望如同那些彼此利益相一致的小城镇出版者那样，拥有同样忠实的读者。因此，新闻媒介就会极其自然地在它的公众尊容方面错误难防，它不再成为人民的同盟，这样就会涌现一个新词来表达新闻媒介所承需的东西：**可信度**。

假如报纸和电台能够保留其人民的同盟这样的形象，那么，它们就可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确保自己的地位。要想保持这

① 杜尔克姆(1858——1917)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著作主要有《社会劳动分工》《论自杀》等。——译注

样的形象，它们就必须具有可信度，也就是说它们的报道不仅必须正确而公正，还必须支持各地人民的利益。如果新闻媒介没有实践社会责任，没有停止坚决要求不受检查的自由的做法，那么，新闻媒介就不具有可信度。要获得可信度，新闻媒介本身必须谴责那种违法乱纪的行径，且必须声明，倘若它没有把自由与责任相结合来服务于社会全体人民的话，它就不再享有第一宪法修正案上所规定的特许自由。

有趣的是，哈钦斯委员会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指定义含混的责任，更大意义上指的是力求负有责任性。委员会指出，除非自由对"良知和公共道德"负责，要不然自由是危险的。自由如果没有经过法律而推行，其可信度则是在玩弄政治花招，这显然无助于控制对滥用明文规定的自由。对社会责任学说的解释把这个问题引入创立理论的避风港，而把注意力从实践的惊涛骇浪中挪开：那么如何控制并实施这个学说呢？

哈钦斯委员会认为，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必须受"一个就新闻媒介状况进行鉴定，并每年提交报告的新的独立机构"的监督和扶植。委员会警告说，若不选出这样的独立机构，那么很可能政府会插手干预，对新闻媒介的情况进行评定，甚至可能制订一道道法规。后来的"新闻协会"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项关于建立独立机构的提议中发展而来的，它是由一批新闻学领域内外的专家组成。它不仅监督新闻界情况，而且监督政府，以免其干涉新闻自由。尽管哈钦斯委员会久负盛名，尽管许多记者和从事新闻学的教授们一再鼓动，但哈钦斯委员会所构想的新闻协会终究没能在美国建立起来。事实上，1973年出现了一个"全国新闻协会"成立了20多个社团以及由州兴办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新闻协会。

新闻协会在西欧建起了一个强大的滩头堡。英国的协会为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提供了模式，这些国家如西德、瑞典、瑞士、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同样也为美国的新闻协会们树立了榜样。

当时，英国掀起了成立新闻协会的热潮，它是由议会中的社会党成员指控新闻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制造爆炸性新闻的做法“败坏了……新闻这一光荣职业”而引起的。议会社会党人士，记者海登·戴维斯提出疑问：“在报纸合并和垄断的体系里，我们到底能不能拥有真正的新闻自由？”1946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创立了，但直到1964年才出现一家独立的英国协会。协会由20位新闻界人士和5位外界人士组成。委员会目的旨在于确保新闻自由，监督新闻出版制造业，以期保证“最高的职业和商业标准”。委员会没有授予执行权，但报纸发表任何结论必须依据这条理论，即：公众的目光会使那些“越轨者”受到羞愧的刺激而打消做法可疑的念头。曾给协会撰写过历史的作者H·菲力浦·莱维认为，协会的意图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而非调查机构，它所要求的是良知和公正。因为“在自由报刊的制裁中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东西”。莱维认为协会作用非凡，已经为人们所“敬畏和折服”。这个结论看来言过其实，甚至在限制英文报刊范围的时候，报刊靠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来扩大销路的做法仍然比比皆是。

英国或美国的主要问题是提高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在美国要求成立协会的时候，人们察觉到一条“信任鸿沟”。“报刊编辑部负责人联合会”（美）的一份正式刊物《报编会新闻》1959年报道说，鸿沟的确存在，“这是编辑和官员在回答一组专门问题即民意测验时普遍承认的”。《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凯瑟琳·格雷厄姆随声附和地宣称：“美国人民对于手中的报刊好象一点儿都不满意，……全美的出版商们敏感地注意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指控”。那阵子，所有大小机构的可靠性都成问题。1973年，《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劳德尔写道：公众对“清扫垃圾管理人员能力的信任”要胜过对控制电视、报刊、最高法院或国会等头头们的管理能力的信任。特别是在总统尼克松和副总统阿格纽对报刊的做法进行了一次公开抨击之后，强调监督者必须受到监督的想法四处可见。为此，阿格纽副总统受到公众的博采欢

迎，但由于他暗示政府可能采取行动限制新闻的"独立性"而遭到新闻界的猛烈批评。阿格纽论述道，不平衡的权力把持在一小撮电视和报刊记者手中，公众对权力集中到少数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片者手里的现象忍无可忍。他说：

权力集中到特权者的一小帮亲密的心腹手中，他们不经人选却享有经政府许可批准的垄断地位，针对这种集权提出质疑难道是不公正、没关系的吗？

处于如此环境，对从东到西各地社区成立新闻协会以及明尼苏达州建立一个州际范围的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新闻协会的产生都不足为奇了。并非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一致同意支持全国新闻协会；然而，报纸、电台事实上比起可能对自由报刊强行规定的半官方机构有更好的条件来对新闻媒介活动的弊端进行判断。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报社同意与协会合作，约有30多个新闻组织不断地提供财源。协会减少对"全国"新闻报道的检查，即对新闻机构、新闻杂志、电视网和一些主要报刊（如《时代》周刊、《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发出的新闻稿件的检查。它仅仅负责事后的情况，也就是说，仅仅处理人们对于所发表的东西的埋怨，而对于可能发表和未曾发表的东西则概不考虑。

一些美国报纸为了求得更高的可信度，采取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普遍采用的"巡视官手法"，① 在那些国家中，市民控告官员而巡视官为他们调查案件。以1967年《路易斯维尔信使报》，《路易斯维尔时报》为开路先锋的20多家报社采纳了这种做法（即设立了"读者代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华盛顿邮报》的"内部评论家"起了类似的作用，其任务是反对"流散各处的偏见、懒惰、错误和遗漏的过失"。内部评论家在为代表公众、对新闻媒介情况提出挑战的过程中呕心沥血，但这种单枪匹马的

① 巡视官手法，指瑞典、挪威等国专门负责调查人民对政府各部门控告官员的案件处理方法。后在新闻界用来指读者代表。——译注

干法，最终不会有多大起色。“读者代表”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来自他们报刊同仁的敌意。这些人犹如各地记者老是受到事后批评。力图吹嘘其可信度的一种不容易引起麻烦的方法是大多数报刊电台为那些需要专门消息或想抱怨商店服务态度和邮购预定房子的读者们编制几套实地调查节目。这类“实地调查”节目深受公众欢迎，但他们埋头从事的不是新闻工作，而是随心所欲、胡来一通。社会责任论成为新闻界的非官方学说，但与当初开始引用这一理论的时候一样，社会责任论在今天同样是一个含混不清的理想模式——语焉不详，运用时又常被忽视。

“世界历史风云人物”

哈钦斯委员会就新闻自由是否陷入危机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三条理由之一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性日渐增大。有人争辩说，在处理公共事务中，新闻媒介早已是“必不可少的了”；新闻传播的范围与日扩大，新闻的作用也同样在增强，委员会认为当代新闻媒介是“一个新生事物”，可以“便利思想沟通或阻碍社会进步”，也可以在现实中使人类被贬低、庸俗化，使和平遭到危险。委员会指出：

☆假如新闻内容只是一些煽动性的、耸人听闻的、不负责任的东西，那么新闻以及新闻自由就将陷入全面的灾难。另一方面，它倒可以通过为人们传授世界各地的知识，通过提高人们对自由社会目标的理解和认识而创立一个新的世界共同体。

关于大众媒介作用如此论断，如今已广为人知。这些论断流传得相当广泛，可以肯定，世上绝大多数人认为新闻媒介的作用巨大无比。这种想法在新闻界的信条中根深蒂固，人人都确信新闻的这种威力，以及它尊重人民的知晓权利。1972年出版了一本书：《媒介的作用》，作者罗勃特·斯泰恩有着1/4世纪的记者生涯，早先曾任过杂志编辑。斯泰恩写道：

☆经过200多年恒久不变的传统和约定成俗的习惯之后，美国新闻工作者今天正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就不再会集中在有权有势者的手中……新闻媒介几乎分分秒秒都在塑造世界的形象，如今差不多能决定我们对社会政治环境所进行的思考、感受和行为。

记者、政治家、新闻从业人员，学者以及常在民意测验中提出问题的公众，近乎每日通过广播，公开宣称类似的论调。举个例子，明尼苏达州电视台新闻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是世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我很高兴地说，以我之见，从总体来看，我们所发挥的新闻作用是代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这番评论是在一篇关于调查电视台对电视新闻报道"水门事件"中所起作用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的研究报告中说的。这份报告的作者马芬·贝雷特觉得新闻威力这个词同样夸张变形，认为尼克松与新闻界的冲突是自中世纪国王与教皇冲突以来的第一次。那时，国王与教皇的权力"截然不同，但双方势均力敌"。贝雷特写道，在20世纪的美国，"新闻媒介似乎扮演了中世纪教皇的角色"。

新闻媒介巨大威力的假定，主要来源于报纸、杂志，特别是电视，同样也来自于通过新闻媒介的途径接受消息的大部分人。如果问"您知道的大部分新闻来自哪儿"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我们从哪儿接收到大部分新闻。消息，不论是"新闻"或其它什么东西，不是只通过一个渠道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我们平时通过听、说、读各种形式接收消息，其方法都是彼此相关的。譬如说，关于坠机的新闻，可能首先是从和另一个人的对话中得到的，接着，我们有可能打开收音机，翻开晚报、收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节目或从别人那里获取进一步补充的细节。我们是通过设备接收信息的，我们真正所接收到的新闻肯定是通过"一架接收器"，包括我们小时候家里和学校中的所见所闻，即我们以前曾读到的、听到的，事实上通过所有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化力量。因此，说我们接收到的大部分新闻来自电视或报纸等于是在说一种获悉新闻的方式，

说得最好容易引起误解，说得最坏就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新闻“威力”是一种容易引入歧途的威力。如斯泰恩、贝雷特和其他人所认为的，新闻媒介有教育权力就更让人疑心了。因为，我们对我们以往的认识和经历所持的态度早在我们观看电视节目和阅读报刊文章以前就已形成了。毋庸置疑，我们是通过新闻媒介得到新闻并受到教育的，然而，就此给予新闻媒介以特殊权力，甚至是最高的权力，在逻辑上则是荒谬绝伦的。

不管怎么说，坚信新闻媒介享有大权的观念属于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所形成的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苏联和进步中国接受这种信念的程度与美国相同。对新闻媒介展开国际性讨论，使得人们接受如下的信条已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即我们人类过于自信地以为新闻媒介提供消息和教育的作用比起其他机构更为强大。其实，真正含义应该是新闻媒介的职责在于提供消息和教育。正如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那样，新闻媒介的作用在于“或者便利思想沟通，或者阻碍社会进步”。公众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理论和列宁主义模式都有权要求新闻媒介忠实而真切地发挥它的作用。根据哈钦斯委员会的观点，人民有权要求新闻媒介不仅给他们提供事实，而且提供“事实的真相”。

期望如此高远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给新闻媒介和公众双方都施加了不现实的压力，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闻媒介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行事机构。同时，他们还尚未认识到这个现实，即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介是操纵经济和政治命脉的私人营利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志于修正“四种理论”结构的惠廉·赫克登把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归结为他所命名的“西方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传播媒介有明确承担提供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的职责”。他进一步论述道：

……西方理论认为，传播媒介应当承担提供全球性可靠而重要的消息的积极责任。只有这样，新闻工作者才能通过提供民主社会统治所需要的情况来捍卫政治自由。

要求资本主义的传播媒介做到"非营业性"，从逻辑看是可笑的，因为就连最为虔诚的教条主义的出版商也不可能为亏本而出版报纸或刊物。而哈钦斯委员会、四种理论的信奉者、赫克登以及绝大部分新闻工作者所提出的"民主假设的论调同样是滑稽荒唐的。"很久以前沃尔特·李普曼对这一论调展开了争辩，结果他痛心地得出结论：新闻媒介要实现这一民主假设，仅有一根"脆弱的节杆"可作依靠。

哪个新闻工作者也比不上李普曼对社会问题所进行的持久而反复的思考。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萧条时期以及从华仑·哈定到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更迭交替。李普曼是把舆论现象进行仔细探讨的第一批分析家。起初，他采用了搞新闻的学者提出的一套现代思想，认为舆论的力量强大之极，如同二十多年后哈钦斯委员会宣布：民主的未来在于新闻媒介发表真实而精确的消息。李普曼写道，新闻媒介是"关于民主的金科玉律，人们靠它决定所作所为"。可是，李普曼绝对没有肯定新闻媒介实际上的作用是传播翔实而精确的消息。李普曼在一战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为伍德罗·威尔逊效劳，使他有机会研究第一手新闻媒介的活动情况。为了测试它的状况，李普曼和同事查尔斯·梅尔茨一起研究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有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章，在美国，这些文章一直被人们称赞为有关国际事务方面的最可信读的报道。在1917年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后的三年里，李普曼和梅尔茨找到了当时记者误言、误报的原因。他们报道说，这些文章在当时一度危机时刻映入公民的眼帘，"犹如占星书士或炼金书士所玩弄的行当那般管用。"《时代》周刊的记者们只是凭着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象写稿。他们报道的"有关俄国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李普曼所描写的正是现在心理学家所说的"选择性认知"。

这一发现使李普曼欣喜若狂、激动不已。他花了两年时间进

行充分思考，写成了一本薄薄的著作，就是他的最大遗产——《舆论学》一书。李普曼坚决认为，民主假设是错误的，尤其在当今的复杂社会里要求新闻媒介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行为提供翔实而精确的信息是有勇无谋的蛮干。实际上，他对民主社会的原则表示极大的怀疑。哲学家约翰·杜威评论说，《舆论学》一书可能是"目前所得到的对民主的最有力的指责。"李普曼一定是对人们认为他是在指控民主这一点怀有戒心，所以他在书的末尾几页还是表达了尽管他认为是错误的信念：即那些对生活抱有良好期望的男男女女凭借"智慧、勇气和努力"是可以成功地建立美好生活的。

李普曼论证的中心部分是：新闻和真实性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应明显地区别开来。即便新闻工作者怀有崇高的意图，他还是自己那刻板成见和有害偏见的囚徒，是那些力图操纵他对事物理解方向的宣传者手下的牺牲品。曲解在人们头脑里深深地打上烙印；我们所认为的事实经常仅仅是自己的判断。这样，要求新闻媒介为公众提供事实真相未免过分难当。李普曼在书中写道："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地点明某一事件，而真实性的作用是揭示出隐藏的事实。"新闻媒介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说明事件，"象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时地移动，将一个个事件从黑暗之处揭示出来。"李普曼这位新闻工作者不是在论述新闻机构毫无用处，而是认为突出点明事件本身就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他还认为，新闻界和公众不应该要求社会能够依靠"某些事件、风波和事变"来治理。

他与民主假设的主张者的争论点不光是停留在新闻作用上，而且涉及到公众是否会积极主动地寻觅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信息这一问题。他写道，一般人既没时间又没能力理解朝他涌来的信息浪潮。李普曼在写《舆论学》一书时，电视还未问世，收音机还处于襁褓时期。因而，他在书中说，一般人与外界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寡见少闻。"但是，今天视觉和音响把新闻制作者

的图片和文字现成地带入人们家庭这一事实还是未能改变李普曼直接联系的观点，因为就报刊的内容来看，其图片和文字的处理都屈从于"选择性认知"这种心理现象。李普曼认为，唯有当人们摆脱"忍无可忍和毫不中用的编造和谎话，"人人对公共事物都怀有一定的见解时，民主才有戏可唱。就这点而言，李普曼其实无须自讨苦吃，原因是，美国和其它一些多元化国家的人民跟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进步中国家的人民甚为相似，对那些抨击其政府的新闻报道几乎置之不理。看来，他们比起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们更少地拥有关于外部世界不偏不倚的的信息。对此，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认为，这种置之不理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做法，因为靠成本效率而工作的人们所留心注意的，更多的是对他或她掌握直接控制权的事物，而非"新闻"，再说，对绝大多数个人来说，他们在公共政策方面无能为力。

李普曼关于新闻和真实性不是一码事的论点常引起搞实际工作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学者的争论。其中一位叫道格拉斯·卡特提出的观点广为人知。他认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卡特在书中说，新闻和真实性的作用不必象李普曼那样区分得这么仔细。卡特认为，新闻媒介的领导者不"希望放弃这种任务，即揭示出隐藏的事实，使之井然有序，为人们的生活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他实际是说，研究新闻学的主要动力就是要揭示出那些隐藏的事实。卡特主张，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是"挖掘、再挖掘"，而"少去摆弄雕虫小技和花花草草的东西"。这样，卡特通过反驳李普曼的观点断然站在社会责任论的立场上。

今天，新闻学无论在何处运用，人们总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媒介的使命，这似乎已成为事实。然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受到来自激进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的攻击。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他主张，新闻媒介只要在商业体系中进行，就不可能对社会负责。他认为，商业体系较集权主

义或“世袭”体系略胜一筹，同时还论证道，不管如何，最终赚钱的欲望还是胜过发表不失偏颇而有益于社会的消息的意念。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威廉斯视新闻体系为世袭体系，即他所定义的“具有良知的权威体系”，在此体系中“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派操办着传播媒介以保护和指引人民。”这个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派象独裁君王那般彻底而有效地左右着传播媒介，控制闸是由柔线而不是铁链操作的。控制是潜意识进行的。在商业体系中，“只要你有钱说，且说得有利可图”，那么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

在威廉斯的思想体系中，政府与传播媒介的代表会联合起来为出版社、广播媒介、广告、书籍、剧院、电影，也许还有其它媒介建立一系列协会。委员会用来管理传播媒介、制定政策保证各类新闻的质量，让公众直接接近传播媒介并且消除使传播媒介的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情况。简而言之，根据威廉斯的观点，要保证新闻媒介负有真正的责任感，大众传播媒介的机构必须变更，私人所有权必须铲除，私人财产予以废除。他宣称，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介就不能担负责任，而为私人谋利所开办的新闻媒介不会有自由。他说：凡只能由一部分把文化手段视为简单商品的不负责任者所控制的体系就是一种大众体系。在许多重要方面，威廉斯的观点受到秘鲁的贝拉斯科手下人的欢迎，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体系并没有在秘鲁出现。

约翰·梅里尔站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立场上，和威廉斯一样，从左派的立场指责社会责任理论。梅里尔反对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两点：（1）此理论必然导致政府控制；（2）它得根据环境道德需要树立起它的伦理支柱。他写道：

☆使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影响一个国家的唯一途径是让政府的实权人物成为新闻媒介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由于在任何国度里，其社会组织——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媒介（和公民）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内容，因而，每个国家的新闻媒介都自然而然地认为

(或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它们是对社会负责的。

对梅里尔来说，自由比责任更为重要，"任何强使新闻媒介'负责'或'可信'的做法是对自由的否定。"梅里尔对威廉斯所提倡的协会以及秘鲁的社会财产恨之入骨，对哈钦斯委员会、"读者代表"以及政府或私人团体的类似部门所构想的新闻媒介也是如此，因为，最终推荐成立如此机构的唯一途径还得通过政府。所以，任何为社会目的而操办新闻媒介的做法，无不是对新闻工作者自由以及新闻机构自治的否定。况且它还否定了新闻工作响应义务号召的自由。在梅里尔看来，道德是个人问题，只有法律才属于社会。梅里尔式的理想主义新闻工作者抗拒一切形式的控制，他遵纪守法，但道德上，他属于他自己。连他的顶头上司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和康德观点一致，梅里尔反对给道德强加任何法规。也许，每一个受贿行骗的记者 (如为了泄露囚禁生活的真情而佯装混入内部)都会宁愿放弃自己的原则而绝不去冒这个险。梅里尔笔下的理想人物浪漫而孤单，是密尔著作中的个人或勃朗蒂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贝克尔手下孤独的骑士的化身。只有在孤单的新闻工作者得以任凭其自己的"判断、感受和行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唯其如此，他方能对自己而不是社会肩负责任。社会责任论威胁到可能取消个人选择和个人实验，把新闻媒介简单地变成"一个"庞大、老成、古板、单调和唯唯诺诺的传声筒"。威廉斯认为，由于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人们要求解释、分析和调查，今天早已落到这样的地步。那些热爱新闻事业的，包括梅里尔、威廉斯、哈钦斯委员会和四种理论的信奉者们全都强烈要求改革。新闻制度既充满民怨又充满矛盾。

新闻媒介的抗衡、监督和筹划作用

在这个矛盾体中，再没有比"监督原则"的前后矛盾更逗人了。所有研究新闻媒介的人们即刻会碰到信仰体系中的这个问

题。新闻媒介处于此体系中就会被看成这样一个机构——其存在的理由隐蕴着如下的想法，即机构服务于社会时，必须象一位德国牧羊人，炯炯的目光始终落在战神维登和他的心腹（或侍从）身上，以确定他们不会“滥用权力”。在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有时这被认为是抗衡的机构宣布的一条信念，这种作为抗衡的新闻媒介设想认为：新闻媒介可以亵渎法律和道德，履行检查官职责，大权在握，通常视同政府。在这种场合里，权力作为被告，而进行阅读和发表观点的公众则作为法官和陪审团。尽管“监督原则”矛盾百出，但有关新闻方面的文献也多次承认，新闻媒介与权力的共存性大于抗衡性。

这是如此不同、如此荒谬！假如事实上新闻媒介和权力相互需要，相辅相成，那么何以跳出监督原则？何以冒出新闻媒介应授予巨大的独立权这一概念？

近年来，这种权力进一步要求新闻媒介追求一条新的捷径，它援引伯纳德·C·科恩1963年的断言：新闻媒介“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点上大多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科恩的评价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位创建者把它命名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确定议程作用”。卡特在此更进了一步，他宣称：传播媒介通过筛选哪条消息可播报或不可播报的做法“对限制政府具有强大的威力”。他说：“那些无法进行形象化放映的文字事件，还是让它们不发生为好。”斯泰恩在“确定议程”即筹划作用上补充了一点，认为选择播报权赋予传播媒介以“一种涌向我们所有人的力量，”因为此权能够选择哪些东西可以传播于众，哪些东西（仅出于疏忽造成困境）可以进行谴责。的确如此，照斯泰恩的看法，确实是由于这个“权力”造成新闻界与政治家之间对立关系的加剧，政治家们认为传播媒介为控制公共事务而加强了它们的特权。

给新闻媒介所指定的监督、抗衡和确定议程作用集中起来，便成为一种深受欢迎的理论，这一理论宣布社会责任理论是其哲

学上的追求目标。此理论的核心是权力。如果该新闻媒介自己建立起来反对政治（和经济）领导，那么它起的就是抗衡作用。如果它作为抗衡行为的一部分但仍主张进一步监督指导，那么它起的就是监督作用。而如果它让人们了解何为重要的，何为琐事，那么就起到了确定议程之作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威力是牢不可破的。显而易见，新闻媒介是一支作为调查者（监督人）、反对者（抗衡者）和筹划者（议程确定者）而工作的独立力量。

这种作用恰好与公正、客观、旁观者的传统新闻媒介的作用相反，具有抗衡、监督、确定议程作用的新闻媒介比起作为传送带，仅仅为读者和观众反映事件的新闻媒介更拥有无限巨大的威力。新闻媒介在行使抗衡、监督和确定议程作用的过程中，不只是满足于作旁证或局外人。相反，传统的客观的新闻媒介就不会确定议程，而只会记录议程。

然而，这是自相矛盾的——抗衡者、监督人和筹划者提出了客观性的标准。诚然，这是另一种客观性，但是，在这点上，它同样具有一种作为简补而传统模式的基督教信仰。

当人们认识到所有这些理论（或主义）皆为虚假时，矛盾就解除了。因为每种理论假定的东西是不能假定的，如新闻媒介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一旦人们接受新闻媒介是一个有力的工具而非独立力量这个说法，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新闻媒介不再是监督人、战士或筹划者，而仅是一位公正客观的旁观者。不管怎么比喻，新闻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确实是共生共存的。在这个比方中，新闻媒介如同豌豆（或豆类植物）和花粉（如氮制菌）那样的结果植物为食。植物从氮制菌那儿吸收促使它们生长的氮，而氮制菌又从植物那里吸收促使它们生存的养料。双方相互依存，不然，则同归于尽。当今世界也一样，政治（和经济）权力需要传播媒介，正犹如传播媒介需要领导的权力。由于彼此需求，所以它们并不互相对立抗衡。它们可能（也确实）彼此监督，但并非为了插足干涉有益于双方的行为，而是为了避免那种威胁双方所处的生物

体系或总的体系中的异常行为。它们生死与共，所以它们是在共同传播新闻或共同确定议事日程。

权力和传播媒介在维持监督、抗衡和确定议程作用的习俗中彼此受益非浅。这是因为对现实制度生存的任何威胁只来自外界——也就是来自那些并不共享权力者（“或共餐者”）。危及制度的政治或经济势力与制度本身并不搭界，那些势力还尚未攀登到沃尔弗笔下的“合法之高原”。这股力量既包括革命的政治或经济因素，又包括新闻界内部的分野。在其它场合下，这些势力可能实际起监督、抗衡或确定议程之作用。这样，授任新闻媒介以唯一合法的抗衡、监督和确定议程实为权力的共同利益。作为共享权力机构的新闻媒介可以欣然接受并宣传其合法性。实践所谓的新闻媒介这三个作用，就带有赞同社会责任理论的特征。新闻媒介在行使或即将行使“这三种作用”时，是作为一种权力的工具，正如在它行使客观、公正的旁观者作用时一样。

新闻媒介作为客观、公正的旁观者主要是传递消息。作为抗衡、监督、筹划作用时，它不再独立，就象它并不是一位客观的观察员一样。实际上，由于新闻工作者的视线被习俗的乌云所遮挡，他们就很容易被当作抗衡、监督、筹划这三个作用来使用，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无法认识到他们自己正受到控制和欺骗。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和一些进步中国家中新闻媒介受到控制极为公开，但马克思主义型、市场型、进步中国家型的新闻体系以类似的方式运行。尽管如此，没有哪个新闻媒介的模式不正式标榜社会责任论——但是，每一个体系中，新闻媒介又毫无例外地受人摆弄。企图斩断使新闻媒介进入市场体系的无形束缚之线是一件困难的事。有关美国竞选运动的新闻报道可供佐证。

社会责任论指控新闻媒介在实施其抗衡、监督、筹划作用时“监视”人民，去找漏洞和弊端，然后把这些短缺披露于众。对于竞选官职的候选人，其挑战是把握新闻媒介——令新闻媒介监视他们愿意受到监视的内容，并对他们愿意保持秘密的事情视

而不见。有一件难忘的事例幼孺皆知，那就是1972年以理查德·尼克松为首掀起的"肮脏伎俩的竞选"。尽管这一事件十分露骨，但这与那些企图把对手描绘成软弱无能之辈的政治候选人为代表的做法相比较，区别并不明显。有关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炉边会谈"时动用无线电的做法以及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时利用电视"出售总统职位"的做法，不少书中同样都有记载。这些做法绝不别出心裁；事实上，所有那些官迷们如今无不掏出一大批钱用于传播媒介竞选活动，以期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同时在对手脸上抹黑。政治候选人所做的宣传和广告活动今天不仅为新闻界而且为公众广为熟悉. 由于候选人努力想在控制别人形象的同时装得若无其事，所以大部分出卖的节目是被用来隐瞒竞选活动的实际存在。在这些做法里，传播媒介的经理也许是最为强大、牢靠的同盟，坚决维护新闻媒介坚持抗衡、监督和确定议程的新闻信条。

大卫·帕列兹和罗勃特·恩特曼著有一本书，名为《媒介的权力政治》此书十分精彩，它用文字证明了以吉米·卡特为首所发起的成功的竞选运动。卡特利用了新闻媒介的信条和新闻媒介所采用的传统的新闻定义，于1976年赢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卡特的总统竞选之成功与1972年埃德蒙·马斯基和乔治·麦戈文的败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通过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控制新闻界并用金钱掩饰自己的短缺这招上，候选人马斯基的技巧比起卡特实在相去甚远。

马斯基在三人中似乎最有希望取得民主党提名，然而他没有；成功的倒是麦戈文和卡特。马斯基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围绕社会责任理论而产生的习俗力量，尤其是坚持新闻媒介三个作用上面。1972年竞选拉开序幕，大家一致认为马斯基处于"一马当先"的地位，人们到处习惯于把竞选运动比喻为赛马。候选人极不愿在比赛开始之际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在比赛中，没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常在终点线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以少许之

差险胜“一路领先者”。不仅如此，新闻媒介也常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一路领先者而不是无望获胜者，这样，那位领先者不痛不痒的失败自然会通过广播传遍各地，而对那位谦虚的无望当权者则不屑一顾，任其远离观众的视线。对马斯基在新罕布什尔州各地奋力游说以期求得民主党预选获胜的形象，新闻媒介的镜头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他在预选中的目标是防御性的，以保持一开始就占据一马当先的位置。鉴于尼克松的策略家们把马斯基当作他们最主要的顽敌，所以，尼克松在竞选初期主要用意在于破坏马斯基的形象，这种做法不足为奇。摄影者真实地记录了马斯基对于《曼彻斯特联合导报》污辱中伤其妻的做法忿然流泪的情景，这一闻名遐迩的情景成为马斯基自身的“滑铁卢。”注意自己职责的记者们加入了马斯基对手的阵营，就马斯基在关键时刻保持镇静、泰然自若及对副总统竞选挑战的能力进行了提问。流泪事件过后三天，著名作家大卫·布劳德尔的文章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宣布：“新罕布什尔支持马斯基的动摇者”。

除此以外，马斯基还是赛马惯例的牺牲品。他的对手们设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如果马斯基得不到60％或65％的选票以击败四五名对手的话，他就会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置身于如此境地，马斯基只在新罕布什尔州获胜是不够的；正如人们所云，他得赢“大头”。

马斯基的确预选取胜，但只赢得区区46.4％的选票。他的对手和新闻界分析了竞选的结果，说马斯基败北，出人意料支持新闻界的麦戈文却以37.1％的选票排居第二位而获胜。马斯基的地位在预选大赛中大伤元气，其候选人资格渐渐消失，直至退出竞选。他的失败，新闻媒介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因为新闻媒介发挥了独立的作用。新闻媒介作为尼克松竞选的工具，对流泪事件大肆宣扬，它又作为麦戈文势力的工具，通过分析把新罕布什尔预选的胜败颠倒了一下。

时隔不久，就在这次竞选中，新闻媒介同样为麦戈文的失败助了一臂之力。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介的报道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酷似它在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的惨败中所起的同样作用。以往共和党人戈德华特被人们视为右派极端分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人物；而今，民主党人士麦戈文，被视作极左分子，同样危及社会稳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向心力把极端个人和极端思想推向中心。没有必要让个人或集体教导或指导新闻工作者加入这个向心力；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位老资格成员，他或她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其间。

竞选初期，麦戈文由于在国内政界性格突出而居优势。在他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老练的马斯基正受到"监督人"新闻媒介的仔细观察。继马斯基引退、麦戈文民主党提名取胜之后，轮到麦氏屈从于新闻媒介的详究细推了。当时的尼克松却金蝉脱壳，躲避新闻媒介，只派代理发言人替他在电视中露面会见他的支持者。对"监督人"新闻媒介来说，麦戈文是电视中唯一出头露面的人物，尼克松在8月的一次欢迎词中挑出麦戈文于去年1月在衣阿华州所说的一句话进行攻击，新闻媒介就此马上找到了主要线索。新闻媒介求助于社会责任论，发表了无数文章，对麦戈文关于赠送每位美国公民1000美元的计划进行剖析。麦戈文就此被描写成一个狂妄的梦想家。人们还指责他没有后援其原来的被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汤姆逊·伊格尔顿(当伊格尔顿检查证明他患有精神混乱症这一消息披露于新闻界之后）。兴奋时光已付诸东流，麦戈文陷入了穷途末路之境。他大声抗议新闻工作者不持公道，说他不理会他1000美元计划的心意，说他真心支持低税收补助形式。人们认为，伊格尔顿事件的爆发破坏了竞选的平衡。但这并不能推论说，假使新闻媒介的态度发生变化，麦戈文或马斯基就会赢得1976年的大选。实际上，不管是处在马斯基还是麦戈文的情况下，新闻媒介都不能独立自行。尼克松彻悟了新闻媒介的门槛；他先调动新闻媒介监视马斯基，然后监视麦戈文；同时还采取了

维护当前政治—经济制度各项利益的方法在新闻媒介上打主意。1972年的尼克松，1976年的卡特和1980年的里根在大选中获胜概莫能外，他们无不有效地利用了新闻媒介的威力，成功地呈现自己的"形象"，同时败坏竞争对手的形象。

人们在近几年才注意到新闻媒介独立的"作用"。人们一直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应归功于新闻媒介（当然也有人出于不同观点而指责新闻媒介）；归功于新闻媒介的还有暗伤尼克松的总统竞选、除恶利民、改善种族关系、反对强占领地、保护环境等。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政治竞选），经过仔细调查表明，新闻媒介的独立作用形同虚设。直到在越战中美国的死伤人数剧增到使他们开始扪心自问：他们的丈夫，儿子或亲友为何送命这样不同寻常的问题时，越战的继续才受到威胁。新闻界对战争行为的批评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或者说它仅仅是这种不满的反应。造成尼克松失败的不是新闻媒介，而是极力把尼克松丑闻捅向公开法庭和公开委员会办公室的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自便士报时代以来，新闻媒介对犯罪的关注几乎毫无变更，对那些跌宕起伏、刁钻古怪和打动人心的内容大写特写。大部分版面登载的犯人都是那些违犯传统社会秩序而不是以一种为人接受的方式触犯法律者，诸如，那些对其顾客或喝酒就餐的食客索费过高的商人、或是那些答应维修，结果食言的修理工，或是受那些记者、学者在投笔揭丑的同时接受贿赂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报纸或电视报道站在当局一边采取联合行动这类例子并不多见。新闻报道的结果解放了那些由于误告而投入监狱的囚犯，将注意力投向了大公司的轻罪小过上头。诈骗犯原形毕露。新闻媒介遇到这类情况，确实显示了应有的威力，更确切些说，潜在的威力。正由于这种潜力使得那些在任何社会中把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物对新闻界大起疑心，千方百计地拉拢新闻界，同时对新闻界和公众掩盖他们的心机。

近期美国，没有比种族斗争这类事例更富有意义或激动人心

的了。不管是主张种族平等的朋友，还是敌人，统统诘责新闻界，说他们在处理有关种族问题的新闻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实践社会责任理论的新闻媒介应当为白人和黑人的利益而服务。归根结蒂，"社会"当是"色盲"。可是1954年以前，当最高法院拍案决定发动一场争取民权斗争之时，绝大部分美国报刊却将种族问题置身事外。一个黑人新闻机构活动了近一个半世纪，但湮没无闻。白人新闻工作者就种族问题撰文、广播、但极少立足于民权自由。涉及黑人的新闻报道主要局限于犯罪和黑人疾苦，如要求争取福利和失业救济等诸如此类。跻身于主要新闻机构中工作的黑人新闻工作者寥若晨星，少数民族就更不沾边。负责调查1960年种族暴乱起因的克纳委员会得出结论："新闻报道是站在白人世界的立场观点上写成的"。委员会补充说：

贫民窟里的惨状，那里的困苦、黑人的悲天悯人极少见报。脆弱和悲愤构成了黑人的日常生活，其中不少黑人来自他们今天所称呼的"白人新闻界"——一个每每反映美国白人的偏见、专制和冷漠的机构。这点或许还可以谅解，但是新闻媒介处于这样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消息和教育的制度里，是万万不可宽宥的。

还有比克纳委员会的报告更有力的论述，那就是"学生非暴力互助委员会"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一番话。他的观点与社会责任信条相反，那些为白人新闻媒介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从来没有留意代表黑人讲话。他说：

我们与国内新闻界打交道的经验说明，个别记者和评论员在设法逃避"滚开吧，白家伙"这类耸人听闻的话语和种族虐待等俗不可耐的话题同时，受到四面八方袭来的社会种族问题的困扰而无法进行客观观察、对种族事件进行报道，因此更说不上进行思考分析了。然而，这种视觉限制是独断地进行定义解释以及摆布历史的必然结果，最终，社会使黑人受害——也使社会自身受害。

假如卡迈克尔言之正确，那么该新闻媒介自以为对其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的社会，或者是给历史下定义、作解释的那个社会。当然，新闻媒介在处理种族问题的过程中，

没有贯彻它的三个作用，即没有反对种族主义者的行经；没有监督政府的贿赂；也没有就大家共同关心的种族问题确定议程。相反，新闻媒介或以奴隶的形式或以白人社会及其制度所产生的偏见，迎合了长期以来推行种族主义的社会利益。

另一方面，民权运动的敌人却指控新闻界在报道种族问题时制造麻烦，针对那些人写的东西是对社会责任论的背离。同样，新闻界在报道所有持有争议事物的时候，老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因此，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无论何处，当人们问津新闻界，社会责任理论就会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反响。

异议的合理界限

人们不会忘记，新闻媒介承担着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负责的义务。资本主义分析家们，如《四种报刊理论》的作者，指责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介的不负责行为。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则指责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负责任。在进步中世界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指控彼此大众传播媒介的失职。简言之，一方指控另一方不尽职责的弱点，并声嘶力竭地宣称自己对新闻媒介负责的美德。形容词"社会的"并不常用，但这点很明显：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介会对人民、公众和社会增加利益。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费解的词条下定义。最好记住：在巴西实行查禁计划期间，政府要求新闻媒介负有责任，就象智利和缅甸、南非和南也门处于镇压政权时期，如同处在印度尼西亚的受控新闻事业模式时期；处在印度的甘地、秘鲁的贝拉斯统治时期，以及象在苏联和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一样。新闻媒介的形象总是在为社会需要而服务。列宁关于新闻媒介的三大目标的提出是高举着社会责任的招牌，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五个目的也不例外。

然而，还有一个真相是，没有哪个当局会让其新闻媒介担负

任何一种社会责任，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符合特定社会秩序概念的社会责任。换言之，苏联统治者绝不会以美国式的社会责任作为美德。而美国政府也不会接受苏联式的社会责任思想。同样，许多治国有方的领导人对苏美两种模式的社会责任思想都加以拒绝。在每一种制度里，新闻媒介唯独在愿意与政府领导和睦共处时才能得以兴盛。对一国领导来说，看准其新闻媒介的活动是否存在偏差是至关重要的。想保证达到这种效果的顶省事的方法就是左右新闻媒介，使出版者、编辑和记者的努力有助于现状。一旦左右失控，掌权者将被迫采取较缓和的做法，诉诸僵硬的法规和条例；查禁或可能的话就进行镇压、判刑、拷打、处死。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在保护社会、保障新闻媒介的报道对社会负责的名义下进行的。新闻媒介在任何情况下，一概是政治和经济权力工具。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①在20世纪初期就认识到了新闻媒介的作用。他认为，处在当代民主国家之中的所谓舆论"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领导人和新闻界操纵的"。他说，新闻界受政治权力的引诱，煽动群众欣然接受它的社会制度。韦伯在其书中写道，新闻自由可以被一国统治本领超凡的领袖加以利用。由于相信这一点，韦伯渴望当一名政治记者，这样他觉得就可以破坏法纪，对事物的进程施加独立的影响力。自那起，韦伯如同许多记者、作家进行工作，极象卡尔·马克思和沃尔特·李普曼！

比韦伯的思想更加深入的，还有一位颇有影响的德国社会学家菲迪南·托尼斯②他认识到新闻媒介对操纵的敏感性。托尼斯著书时尚未出现电视和当代大众媒介的尖端技术设备。他说，在新闻界，评论和观点象杂货店里的商品包装起来，然后到客观现

---

① 马克斯·韦伯(1864.4—1920.6)，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本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巨大影响的学者。——译注

② 菲迪南·托尼斯(1855.7—1930.4)，德国社会学家，以《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1887年)闻名于世。著有《舆论的批判》等书。——译注

实中销售。"又说，报纸提供"最快成品、最快增殖、最快分配的消息和思想，犹如酒家随时快速提供酒饭"。托尼斯就此写道：

报刊是舆论的真正机关，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且非得利用它的人手中的工具和武器。由于它把持着对社会事变和演化的评判大权，故其权力超凡。相对于国家军队、金库和官吏那儿拥有的物质权力，新闻媒介的权力可以与之等同，某些方面还可能超逾。

根据托尼斯的分析，舆论并非群众的言论而是该社会统治者的言论，因此，新闻媒介在高唱舆论时，实际上是在发表统治阶级的观点。没有哪个政府会反对这种舆论。最终，不发表这类报告就意味着对社会不负责任。

那些拒绝受到操纵，决意独立于当局的可以简单称之为革命思想家兼作家的新闻工作者们，沿袭着自古以来进行地下活动的传统。这种性质的革命报刊带上了许多名称。当今社会我们常听说新新闻学派、地下报刊、选择性报刊、辩论性报刊以及调查性报刊；这些报刊存在性质相当的不同，并非都是革命的，但有一点相似，他们相信报刊的确可以是革命的，并有权对那些一贯控制报刊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权有势者提出挑战。根据印度阿加尔维拉的观点，进步中国家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与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自命的职责十分相象，那就是：可以严格检查著名人士和社会问题，并让公民了解政府官员的口号与行动之间的区别。有趣的是，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不象在要害部门工作的那些人，否认任何一种职业身份，并拒绝他们职业的共生作用。他们宣称：形成真正对社会负责的报刊的是他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

革命报刊的新新闻学和其它当代形式都发端于美国，60年代社会动荡岁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执政者来说，似乎有必要平衡那些新闻工作者，防范他们影响人民、影响统治者所不希冀的变化。所以，尼克松、阿格纽等求助于爱国的人民来调整新闻媒介失控的航向。尽管他们没能进行新的合法控制，但还是成功地对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尤其是触及当权者痛痒的做法，提出

了严肃的疑问。即使电视网和极其得势的报纸指责对他们自由运动的攻击，但全国仍然有许多报纸、电视台半推半就，以示默许。他们说，新闻媒介的某些作用过于厉害，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弦外之音，当然不外乎要求与现状保持一致。甚至尼克松和阿格纽的政治敌手也纠集到他们一边。丹尼·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哈佛大学教授，曾是尼克松手下的一位外交官，后来成为来自纽约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对美国新闻界里存在的所谓"贬损文化"现象表示不满，新闻媒介在这种文化下大有反对和威胁民主制度未来生存的危险。他说，新闻工作者（他指的是华盛顿的主要记者而非革命报刊记者）未能进行严肃的探究，而在"对权力充满敌意"方面深感理亏心虚。

60年代兴盛于全美各地的地下刊物造成的冲击颇有意义。那些编辑和记者既不顾钱财又无视权贵，"浪漫"地启程，开始寻求真理。如他们中的一位领袖雪·芒戈所言："真理较事实重要，两者相去甚远……因为冷冰冰的事实不无枯燥乏味，甚至可能歪曲真理，而真理乃是人类所能表达的最高成就"。大多数主要报刊新闻工作者对这种论调嗤嗤以鼻，斥责芒戈及其同仁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歪曲真理。以他们之见，通往真理的正道是进行不偏不倚的观察和对现实的客观报道这一长久以来的传统方法。新新闻工作者断然排斥客观性这一观点。在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等眼里，真理只有在作家、记者主观地沉缅于自己的研究之中才能发现。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所倡导的原则遭到传统新闻媒介的公开否定，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些做法也竟遭取代。主要报刊的版面设计变得引人注目，文章内容上口易懂，沿用了地下报刊的一些方法。对权力当局的攻击有增无减，有魄力的专栏作家和编辑敢于对政治统治及其工作提出批评。归纳到一点，地下报刊的成员由社会现状的保护者选任，而其做法由主要新闻媒介采纳，尽管形式上穷加变换。

地下报刊销声匿迹，不多久被那群调查记者们替代。寻求真理

成为地下报刊编辑和记者的座右铭，而调查记者则旨在破获上层阶级恶行的证据，并将这些苛刻的指控捅出来见报，把那些恶贯满盈的恶棍绳之以法，押上法庭或送上人们常说的舆论法庭。其寻求的不再是真理，而是战胜邪恶。莫伊尼汉说到的"反文化"随之而来。安东尼·史密斯写道，欧美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他们的作用"是一成不变地、永无休止地反对，老是尖刻地斜视着掌权者的所作所为"。故此，这群调查记者声称他们反对的钟鼓正是为社会利益而敲响的，他们理应是社会责任理论的真正旗手。另一方面，调查记者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容易显眼露脸的电视媒介里的记者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记者与生俱来怀有偏见，所以他们在削弱领导人行之有效的治国能力时不负责任地使用了他们的权力。老资格出版商兼外交家沃尔特·安嫩伯格如是说："区别在于，总统权力在手，责任在心，而新闻界大权在手，责任全无。"

由此，社会责任论成为各党派就新闻媒介与其它机构之间关系问题引起争论的一种理论。设想新闻媒介自由自在，发挥独立作用，那是在说笑话逗乐。应当牢记的一点是，坚持这一设想恰好迎合了真正当权者的利益，因为唯独如此，他们方能操纵新闻界，并使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标。举例来说，《华盛顿邮报》关于披露尼克松"水门丑闻"以及有关事项的调查工作有助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联邦调查局的泄漏，(而不是持不同意见者的泄漏)，给《邮报》提供了有用的线索，进而继续深入调查。在调查马斯基和麦戈文活动的工作中，给新闻界提供暗示和线索的正是尼克松政府本身。当某个革命的新闻媒介步子迈得过大，其活动就会受到限制，步子大小适宜才符合当政者的心愿。在美国，调查性新闻媒介以社会责任的名义被统治者采用，为之工作。

特别基于这一点进行分析，报刊的四种理论显得似是而非，不足为证。他们在研究中认为，社会责任理论应符合"社会"利益，这儿的"社会"指一国的全体人民。我们已经看到，有关种

族问题的报道违背了美国黑人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有关政治和经济领域和形势分析的报道明显迎合了统治阶级而非下层人民的利益。新闻界对那些出格的个别人，包括总统在内提出的挑战经久不息，长此以往，新闻界被冠以反权力腐化的一支忠实力量这样的美名。然而，除了一部分发行量有限、一般非赢利性的刊物之外，这股反对力量的影响仅到此为止。当然其反对意见仍情理可容。个别人可能会遭到主要新闻媒介而非制度的任意攻讦。这些人是需要受到保护的。如果说这种做法说明新闻媒介是在认真负责地发挥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五种作用之中的一项，即呈现并阐明社会目标及其价值的话，那准是冷嘲热讽。社会责任理论实际上排斥了由该社会制度所定，处于意识形态范围之上的目标和价值。调查记者的局限性在允许的范围内恰到好处，未逾越应有的界限。对此印度的内维尔·贾夫维拉提出的建议十分可取。他说道：

> 新闻工作人员能干的最终一件事是，振作起来对待他们所无法摆脱的历史进程，并且自我调节风格和重点。他们的作用以往是、今后还是支持由不得他们自己规定的价值和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的形成是那些比他们作用更强大、更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所致。新闻媒介的自我必须学会怎样得体地缩小。

唯有一点新闻工作者从未受到指责，那就是：谦让。他们倘若通达事理，懂得做什么，怎么做以顺应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那么就有这个必要收起他们的妄自尊大——如贾夫维拉所说的，得体地收敛自我——改掉那种不反省自己，一味责备别人的痼疾。

第九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

“新闻自由流通”之争

随着旧殖民帝国的崩溃以及人们对把新闻视作新兴国家发展工具的兴趣加深，有关大众新闻媒介和新闻流通性质的理论和哲学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政治色彩也日渐浓厚。新闻显然紧伴人类的每个阶段，与此同时，它也一直存在于联合国的文化分支机构内部，那里已发表了有关新闻政策的最令人激荡的宣言。说新闻政策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出现，绝没有夸大其词。

1944年和1945年联合国创建之际，发起国就已经预感到，联合国所面临的棘手的政治问题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人们还预感到，联合国的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赢得如果不是普遍的至少也是广泛的支持。因为它在力求战胜全人类面临的挑战中亟欲建立一套全球性的合作方式。有关新闻，特别是新闻流通的问题，经常在唇枪舌剑中使组织成员之间划地为牢，形成派别；但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出现根本的分裂，尽管偶尔有些心血来潮的官僚和新闻工作者似乎认为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闻问题所投入的注意力还不到5%，它主要涉及科学、文艺和教育方面的活动情况。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官员对新闻媒介特别是美国新闻媒介对教科文组织

的使命及其活动情况明显不负责任的报道开始感到吃惊，甚至恼火。

经过十多年关于世界新闻自由流通日益增多的讨论，70年代，出现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提议。它是不发达国家高举建立“经济新秩序”大旗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财富所发起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流通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列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后，国际组织的成员毫无例外地赞成并提倡新闻自由的理论思想。1948年10月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包括了联合国原则声明之精髓，公开宣布世界人民均享有了解、告知和讨论的权利。其中每一个权利都是自由表达理论的要素，但是，每一个权利都被人们用多种方法进行诠解。糟糕的是，还有些人不知不觉地将其曲解。宣言的宗旨写在条款第19项，条文曰：“人人有权享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传递消息与思想的自由。”

在整个60年代、70年代以至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寻求各种途径以期达到第19条中提出的宗旨；为此召集了学者、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员和传播媒介的权威，举行了无数次会议。教

表格9.1　日报

	报纸数		大约发行量(百万计)		每一千人发行数	
	1959	1979	1959	1979	1959	1979
非洲	220	129	2.9	4.3	12	15
北美	865	2,012	63	71	200	213
拉丁美洲	714	758	14	54	69	71
东亚	280	222	40.1	73	282	319
南亚	1,300	2 812	10	24.7	12	44
欧洲	2,020	2,439	106	122.9	252	318
太平洋岛国	100	111	5	6	311	190
苏联	500	1,782	34	16	162	251
总计	69.99	10,265	275	371.9	122	164

表格9.2　收音机

	收音机总数(百万计)		一千人中拥有收音机数	
	1959	1979	1959	1979
非洲	4	29	18	80
北美	177	506	903	1,437☆
拉丁美洲	18	47	89	259
东亚	16	90	113	326
南亚	8	38	46	167
欧洲	91	172	216	352
太平洋岛国	3	36	186	384
苏联	41	126	194	473
总计	358	1,044	159	448

☆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千人拥有的收音机数"一栏中，美国1959年数字为948，1979年为2,040；加拿大相应为431、1,104；墨西哥为94、288。

表格9.3　电视机

	总电视机数(百万计)		一千人拥有的电视机数	
	1959	1979	1959	1979
非洲	[illegible].04	6.4	0.2	14
北美	56.2	157	287	403☆
拉美	18	26	89	92
东亚	18	37	113	133
南亚	7.5	142	9	84
欧洲	91	127	216	252
太平洋岛国	3	7	186	225
苏联	40.8	80	194	303
总计	234.5	582.4	39	213

☆在"一千人拥有的电视机数"中，美国1959年的数字为294，1979年为635；相应的，加拿大为235、466；墨西哥为14、108。

科文组织在它两年一度的会议上采纳了许多决议，这些决议的内容客观真实，意在提高世界各地的新闻传播质量水平，新闻不仅要增加人们的知识和促进人们的认识，而且应当有助于防止战

争，扩大个人、团体和国家的权利。

尽管全世界的新闻销路稳步增加，识字率也逐渐上升，但迄今为止，新闻传播在世界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并未占有突出的位置，为此，教科文组织确定了一个"适度传播工具"的最低标准，可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议，一国中每百人不能少于十份日报，五架收音机和两台电视机。但据估计，要达到每百人拥有十份日报的最低标准，在亚洲至少要到1992年才能实现，而在非洲则要到2035年。

从表9.1、9.2、9.3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新兴民族国家中大众传播媒介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仍旧继续垄断着这一领域。1979年世界新闻纸的销售总量高达2519万吨，而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几乎占去总量的一半，即1137万吨。除苏联之外的欧洲销售量为607万吨。北美和欧洲占世界销售总量的69%。世界其它地区识字率上升，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纸销售量还略微下降。二十多年前，即1959年，北美和欧洲的新闻纸销售量占世界总数的72%。

上面所列表格的数字只说明大概的情况，不是绝对的。这些数字是由成员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的，用图表来比较以说明20多年来的变化。由于各国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加上在某些时期有些国家根本没有上报统计情况，所以这种比较经常受挫。举例来说，1979年没有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国家的报纸发行额的数字，这样便影响了拉美的统计资料。南亚的千人发行额的数据资料不包括中国。尽管如此，这些数据总体上还是说明了实质上的不平衡状态，并指出了实际数字与教科文组织目标之间的差距。

教科文组织本身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也就是说，它无权擅自独行。如同其它联合国系统的附属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本身一样，教科文组织提供了一个进行讨论和发表建议的讲坛。它可

以采取某些行动，但这些行动只能在其成员国赞同之下付诸实践。出席教科文组织大会和会议的专家，对该组织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建议，这已成为阻碍教科文组织人员开展工作的主要误解。当然，这些建议不会成为教科文组织的政策。

教科文组织的讨论，就象许多意识形态问题的发生一样，起始于具体事件，主要是二战以及后来的美苏两国强权之争，也就是所谓的冷战。对纳粹德国最辛辣的批评出自报纸编辑和一些美国思想家之口，他们断言：如果不是希特勒及其法西斯政权抓住德国报刊和其它传播手段，并将其作为宣传工具的话，他们就永远无望登台执政。新闻工作者以及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论点是，唯有获得“新闻自由流通”的社会才有可能是自由的社会。继战胜德国之后的几年里，围绕“新闻自由流通”而展开的争论成为冷战时期的一项主要内容。

这些讨论几乎没有新东西。言论自由问题早已使得苏格拉底、加里略、密尔顿、伏尔泰伤透脑筋。诚如我们所知，言论自由问题对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起草第一修正案的先辈们来说至关重大。如今，这些讨论又在国家之间展开了。美国国务院声明，新闻的自由流通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亚洲的新兴民族国家相信，新闻的自由流通被他们的殖民主子所否定。通过与美国和他们先前的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的争论，他们发现新闻自由流通是一个用来反对那类国家的一个工具。令人怀疑的是这些新兴国家竟然还需要这些国家的指导，但不管怎样还是给了他们这种指导。早在1944，二战结束前一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理事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赞同政府关于排除政治、法律、经济等一切妨碍新闻自由流通的政策。1945年，战争仍在进行之际，由“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加上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社组成的代表团搭乘美国军用飞机游历22国，广泛传递了自由流通理论的讯息。1945年春召开的一次西方首脑会上确认了自由流通的理论，而当教科文组织成立时，其宪

章（主要由美国代表起草）呼吁，要求促进人们"对客观真理以及……思想和知识的自由交流进行永不停息的追求"。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新兴民族国家相继独立，他们也同样热情洋溢地肯定自由流通这一理论，只是他们的理解与美国及其同盟国的看法相距甚远。

起初，分歧主要是经济上的。对于几年来参加有关自由流通辩论的绝大部分人士，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他们的诚意和良好用心。然而，他们常常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彼此深陷各自意识形态的框框之中，结果使得双方似乎很难甚至无法理解彼此的观点。所有的参加者都深信新闻自由流通的真正价值，但是，在美国及其资本主义盟友眼里，自由流通意味着继续控制传播渠道，而在进步中国家的心里却意味着结束工业化国家对新闻的统治。象民主和人们的知晓权一样，自由流通这一词语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以致于这个词儿在国际对话中失去了其本来价值。我们再次看到，在努力争取国际间的一致看法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就破坏了协调解决国际争端的机会。因此，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尽量缩小语义上的差别，并为富有成效的讨论提供一个框架。

194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大会上，美国代表团提议，教科文组织应该与其它国际团体一起对影响"新闻和思想自由流通"的障碍进行调查和报道。这一建议的提出显然是为了孤立苏联，苏联矢口否认它在内部对新闻传播实行控制的事实。两年过后，在讨论新闻自由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团长清楚地指出，美国人民期望新兴国家起来谴责苏联和那些"其意识形态使人民丧失自由"的国家。美国官员在那次美国的意识形态占优势的会议上宣称，最后结果必定是言论自由的理想取得胜利。而当时西欧的一些代表则是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方面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新闻的自由流通，对美国新闻媒介竭力在进步中国家和西欧推销商品，具有明显的商业利益。美国

新闻工作者由于受到其新闻信条的蒙蔽，未能认识到自由言论和自由市场剥削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有关新闻和新闻媒介的讨论的主要阵地才聚集到教科文组织内部，而美国（不管是否与其欧洲同盟在一块）再也不能随意摆布讨论的方向。随着日益增多的亚非新兴国家的出现，井然有序的世界剧烈变动，结果使得所有国际组织，包括联大，处于进步中世界的控制之下。而在此之前，由于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依靠美国及其盟国，因而不可能支配国际机构组织的进程。所以，美国有必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并且求助于外交劝导，把其意志强加在教科文组织中及其他地方的进步中国家身上。

在差不多整个60年代中，很大程度上由于苏联和其盟国的行为，教科文组织内关于新闻自由流通的讨论经常得不到关注。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进步中国家对资本主义新闻媒介的活动提出反对，给其政治上取得优势提供了一个机会。联合国成立早期，由于进步中国家普遍支持美国所信奉的新闻自由政策，苏联的心理态势受到了损害。现在，苏联联合进步中国家谴责美国新闻自由流通的虚伪立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并为美国公司产品赢得有利可图的市场，从而找到了收复阵地的机会。

1970年召开的第1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进步中世界首次呼吁要求争取“更加公平的新闻流通”。此后两年间，各种专家会议频频不断。1972年教科文组织在大会上听到更多这样的言论，即发达国家新闻媒介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控制世界舆论，并且是道德和文化污染的一大原因。在教科文组织两年一度的大会上，新闻自由流通之争由此而成为最激烈的问题。在美国，它只被视作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另一篇章，而在苏联，则认为是鼓动进步中国家进行抱怨的一个场合。

这类会议和大会连续不停、应接不暇。1973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云集阿尔及尔，呼吁进步中国家采取行动，摆脱对工业发达

国家产品和新闻的依赖。他们说，这是殖民历史的后遗症，袪除这些后遗症，就需要新的结构。当时，谴责文化帝国主义的广播之声响彻全球。

与此同时，来自进步中国家的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也高声反对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宣传工具的做法。在1970年的第16届大会上，代表们重申："决不允许把新闻传播媒介用于战争、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宣传。"一部分发言人敦促教科文组织建立一套行为准则，鼓励新闻媒介在消除民族分歧、争取民族一致方面做些工作。尽管最后没有通过一项决议，不过，教科文组织确实组织了一个专员小组，一年后提交了一份国家、跨国和国际级的大型研究计划。到1974年召开的第18届大会和接着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新闻自由流通的障碍"之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尖锐。

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国家的代表们争论道："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得到保障的唯一途径是必须遵循国家政府建立的一套内容明确的准则。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却反驳道，只有当政府不强加限制时，新闻的自由流通才能实现。其中有些代表认为，主要障碍绝非政府的限制，而是缺乏诸如纸张一类的基本物资。还有些人感到，现实导致了不平衡，即工业发达国，首先是美国，有钱派许多记者前往国外，而进步中国家则无力支付这笔经费。

接着，爆发了一场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通讯社（或称"联营"）的运动。由教科文组织做后盾，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进行挑战。不结盟国家一致同意1976年4月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计划。"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就是在科伦坡召开的那次大会上获得广泛响应的。这一术语最先是在那年早些时候在突尼斯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关于新闻传播讨论会"上提出来的。突尼斯首席代表，马斯塔哈·马斯穆迪一直是这一新秩序口号的主要倡导活动家，他在地区会议和国际大会的发言

中不断地促进这项活动。

在科伦坡，当时提出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与联合国中进步中国家领导人提倡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密切相联。这两个提议之间的联系至关重大，因为调整新闻流通的不平衡，就有必要重新调整世界经济的格局。

不管怎么说，1976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19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代表们通过了建立国际新闻联营的主张。美国和它的盟友对这个由马斯穆迪代表不结盟国家倡导的提议，态度不明，犹豫不决。美国及其盟友觉得"新闻交流应趋向更加平衡和多样化"的倡议一无是处，主要因为马斯穆迪论述说：国际通讯社（主要指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歪曲进步中国家的形象，专门反映落后穷国的"消极面"。

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突尼斯决议的原因有二：（1）为了避免象1974年巴黎会议上出现的恼怒和难堪；（2）为了防止苏联蓄意加深资本主义和进步中国家间的鸿沟，进而准备联合进步中世界的力量在关于新闻自由流通问题上向资本主义阵地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苏联草案不仅斥责国际通讯社的报道歪曲新兴国家的形象，还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尽了责任。草案宣称，"这些国家在开展他们管辖内的国际间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中是负责的。"美国和西欧的代表则意在争取时间以使大会不投苏联草案的票，相反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对草案进行研究，并提交介绍报告。苏联一位代表斥责美国"背离大多数人的意愿"；然而，在1976年的大会上并没有坚持对苏联提案进行正式投票。最终，这一问题引起举世瞩目。美国和西欧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编辑和记者开始拭目以待，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在内罗毕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也许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塞内加尔的阿玛东·马哈达·姆巴尔对当今社会阻碍技术进步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传播交流的全部问题进行核查。姆巴尔组成了一个16人委员会，他称之为"智囊托拉

斯”。在教科文组织代表中它常指“十六精英”，尽管其中一人为女性。委员会主席由曾一度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列宁和平奖的爱尔兰政治家兼记者肖恩·麦克布赖德担任，其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的代表，还有突尼斯的马斯穆迪和来自市场经济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进步中国家的专家。1980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大会上提出了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是近年来有关新闻传播方面唯一的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至少就新闻媒介方面而言，在1978年巴黎召开的大会上，新闻传播问题第一次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新闻工作者们从教科文组织的讨论中找到了值得报道的主题。引人注目的是，新闻传播问题的讨论出现对抗的色彩；苏联提案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眼里被认为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下则被视作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挑战。美国政府、美国新闻媒介以及它的欧洲盟友对召开会议感到惊恐万状。例如，英国社会学教授洛德·麦格雷戈曾三年担任英国皇家新闻委员会主席，他在对日本编辑的一次会议上说，苏联草案在教科文组织面前是“一份可怕的宣言”。他认为，教科文组织在迈向关于新闻媒介国际宣言过程中误入歧途。他指出，进步中国家新闻媒介的缺乏最好通过实际方法加以弥补，如建立广播电台、报业工厂，提供实地培训等。这种技术援助和全面赠款的方式是资本主义国家回答教科文组织日益高昂的挑战激情的真正反应。当时许多美国的报刊对教科文组织及其活动计划吹毛求疵，横加挑剔；甚至态度一向中肯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承认自己“采集国际新闻中……存在明显的缺点”的同时，大嘉赞赏技术援助，提供培训和“实际提高新闻工作作为独立行业地位”的措施和做法。

不少美国新闻组织向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提出正式抗议，对苏联提案大加埋怨。“美国报业主联合会”理事长向代表们提出公开呼吁，要求当场撤回那个威胁到教科文组织开展其余工作的苏联提案。《西雅图时报》在巴黎就这些讨论发表了长篇社论，用

大字标题登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胁世界新闻自由。"对此，苏联从它的立场出发，将草案交给代表们说，唯有国家政府的权力才能发挥"报刊的民主作用。"

双方就这一问题互不相让。鉴于此，总干事姆巴尔达成了一项绝好的妥协：苏联草案未付诸表决，有关新闻的最后宣言由与会全体代表鼓掌通过。苏联草案被一份11点决议取而代之，《曼彻斯特卫报》称此项决议为"自由报刊的世界篇章。"144国代表正式采纳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建议，对此，一部分进步中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庆贺活动。事实上，这个宣言毫无所为。如同国际团体通过的类似信条一样，宣言语焉不清，每个国家可以随意进行解释。决议通过二天后，罗杰·康斯在10月24日的《世界报》撰写文章，评论道：姆巴尔成功地提供了一件五光十色的外罩，使每个国家能在其中某部分发现一些自己同意的内容，而对其余部分则谨慎地加以忽视。代表们一致同意采取一种让全部代表不计票进行表决的方法。只有瑞士和中国的代表公开回避这一决议。瑞士代表认为，这是"企图调解无法调和的东西，谁都不会称心如意"；而中国方面抱怨说，宣言在阻止战争方面，未能区别中国所支持的正义战争和所反对的非正义战争。

决议关于新闻自由流通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它要求"新闻自由流通以及新闻传播的范围更广泛、更协调。"但是，它没有就自由流通下定义，因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宣言明确要求新闻流通需要更好的平衡协调，即需要"新的均衡和更好的互相沟通"。决议的内容还包括：(1)呼请新闻媒介为维护和平、促进人权做出贡献，并为清除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偏见和误解助一臂之力；(2)坚持为新闻工作者和广大公众自由获得新闻，提供一个呈现全部观点的机会；(3)坚持新闻媒介必须"对人民和个人利益负责"，从而促进公众参与"新闻的全部制作过程；(4)敦促所有国家"尊重宪法条例"，保证新闻自由。

美国代表团成员对此结果表示满意。他们把宣言描写成"一

个国际合作、友好和相互了解的胜利"。这一论述，事实上说明了美国对苏联草案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以各种形式折腾八年，最终又未能通过而感到由衷的欣喜。如吉米·布朗宁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所写的那样，美国和它的盟友"在他们认为苏联对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进攻中，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努力取得了胜利。"他补充说，胜利的代价是美国同意为改进进步中国家的通讯工具提供约好几亿美元的资金和援助。在估量美国的成就时，他说，美国运用了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伎俩——即力图松懈苏联和进步中民族国家之间"事实上的盟友"关系。这种评价反映了美国对进步中国家的政治幼稚即刻令人感到一种漏洞百出而又恩赐于人的态度。然而，正如布朗宁指出的那样，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官员暗自嘲笑进步中国家的政府集权独裁、缺乏效率、对新闻自由流通兴趣掺假。然而，这种评估对于新兴民族国家代表们来说，则是徒劳无益的。

通讯社与"文化帝国主义"

了解通讯社是讨论新闻流通不平衡的中心内容。毫无疑问，进步中世界所发生的绝大部分新闻均由通讯社播出。评定通讯社的好坏不仅应从国际情况着眼，而是要把问题放到经济背景中考虑。的确，在提出建立世界新闻秩序之前，进步中国家已经提议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个秩序要求世界财富进行重大的再分配。

联合国及它的附属机构所收集的数据确定了新兴国家低等（甚至更低等）的阶级地位。1964年，新兴民族国家决定成立一个单独的压力集团，重新塑造国际贸易和产品的面貌。1964年他们施加压力，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建立了"77国集团"。十年过后，这个压力集团（如今会员国发展到120个，仍沿用"77国集团"的名称）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调整殖民主义遗留下来

的经济权力的不平衡状况。他们注意到，不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的7%，因而确定一个到本世纪末达到25%的目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在1974年春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来的。在定期召开的秋季会议上，联合国成员国正式通过了“经济权力和国家义务宪章”。宪章没有包括列入世界经济新秩序提案中的全部要求，但很多内容相当接近。总之，不发达国家想建立一套贸易优惠制度，使进步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与工业发达国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他们极力要求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提供他们亟需的贷款、资金和技术转让，使之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77国集团”在初级产品协定和在他们自己跨国公司内部采取全球措施、协调行动方面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尤其想确认工业发达国对新兴民族国家的资源转让最好通过国际协定或多边协定，而不是一国直接支援另一国。美国特别拒绝接收多边援助计划的做法。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关于世界经济新秩序之争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关于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之争的主要绊脚石。

进步中国家要求调整经济权力和新闻控制的全球性不平衡，必然被视作这种斗争的一部分。两种要求不可分离。讨论围绕着通讯社展开，许多进步中国家认为通讯社在维护和加深经济和新闻领域中的权力不均方面举足轻重。人们常言，“新闻就是权力。”通讯社被视为主要的宣传机器，没有反映新兴民族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不利于投资和援助。结果使进步中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姑且不说是奴隶地位。这是强烈的控告，应当引起密切注视。

对“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指责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传播媒介帝国主义”是通讯社批评家竖起的一面旗帜。通讯社是19世纪由法国的查尔斯·哈瓦斯、英国的保尔·朱利叶斯·路透和德国的伯恩哈德·沃尔夫创建的，当时纯粹是商业手段，就象报道古罗马竞技场情况的当地记者一样。哈瓦斯、路透和沃尔

夫手下的记者们在殖民地到处奔波，以满足企业商人为发财致富而对新闻的欲望。当时欧洲政府之间的利害关系至关重大。英国、法国、德国为了防止殊死般的竞争，按照1869年签署的《通讯社联盟条约》，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路透社的势力范围是大英帝国下属的国家和东亚地区；哈瓦斯社负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帝国所属地区；而沃尔夫社则拥有奥地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俄国的地域范围。正是这项协定，结果使得哈瓦斯通讯社在拉美各国占据了主宰地位。

来自"文明世界"的使者四处奔波，这些勇敢的通讯社记者以及为大英帝国报(主要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工作的同仁们，发现值得报道的精彩新闻源源不断。遍地是战争和战役、外教和异俗、深山和丛林、野蛮和恶棍、疾病和革命。19世纪西方出现的广大观众对这些报道津津乐道，并渴求更加奇特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英法殖民地国家从宗主国通过路透社和哈瓦斯社发来的电传稿接收绝大部分新闻，当地人民也由此获知这些新闻。在殖民地国家中，通讯社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社会化的力量。当地人民对外界的了解直接受这些通讯社的影响，至今仍极其深远。这也正是控诉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原因之一。

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直接针对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欧洲通讯社提出最广泛最公开挑战的，正是当今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美联社。1869年当《通讯社联盟条约》签定之际，美国的力量很小。1893年美联社加入了欧洲的通讯社联盟，从而获准美联社在美国领土上播发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的电讯稿。但在美国范围之外，美联社不得另设自己的通讯社。到1912年，美联社企图打入北美人早已认定是美国势力范围的拉丁美洲，但垄断拉美的哈瓦斯社拒绝接收这种做法（尽管有一批南美报纸积极赞成采用美联社的新闻报道）。对此，长期担任美联社总经理的肯特·库珀几年后回忆起这段情景时写道：

哈瓦斯社，一个小小的由政府资助的法国通讯社居然能够阻止庞大的

美联社向南美发稿，这一事实在糟糕透顶。但是，令我震惊的是，美联社不能把我国的新闻发布到世界其它地方。我对美联社竟屈从于如此卑劣的新闻压制这一事实，感到痛恨不已。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发生这一争端之时，正是美联社向进步中国家全面提供新闻稿件之际。那些新生国家所办的通讯社无力支付把自己国家的新闻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费用。1934年，欧洲通讯社之间的联盟分崩离析，这是库珀不断努力的结果，他的行动得到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当时，库珀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路透社，他说：

选从美国发什么新闻都由路透社做主，由它告诉世人西部战争道路上的印第安人、南部的极刑和北部奇形怪状的犯罪。数十年来，人们指责路透社从未发过一篇提高美国信誉的稿件。

库珀批评路透社的语言与半个世纪后进步中国家指斥美联社的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库珀眼里，路透社就是利用新闻报道"把大英帝国的附属国完全投入宗主国的怀抱"的工具。接着，他又更为夸张地补充说，"在这方面，路透社比一度驾驭海洋的英国强大的海军为英国做得更多，也比曾经领导世界商业潮流的英国船只做得更多。"70年代，指责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那些人也运用了类似语言，诘责美联社的新闻报道。当然，必须指出，美联社从来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公开工具。事实上，美联社成立初期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客观地收集新闻和报道新闻的通讯社，正如它到处所宣扬的那样，"眼见为实，绝不杜撰。"这就是，也一直是美联社的信条。然而，它的记者和19世纪路透社、哈瓦斯社的记者毫无二致，完全彻底地被自己国家的信仰体系所溶化。就象安东尼·史密斯所观察的那样：新闻记者老是跟着旗帜后面走。

继库珀挑战得胜之后，美国通讯社迅猛发展，速度之快把美国通讯社推向商业新闻的最前沿。50年代，正当殖民世界纷纷瓦解，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即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美国合众社

与赫斯特的世界新闻社之混合体）与路透社和法新社（哈瓦斯社的后继者）汇成一体，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主宰力量。资本主义“四大通讯社”传播的刻板成见固定了世界各地男男女女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象。正是那些通讯社记者的新闻电讯——有关外部世界最突出的新闻——传到了进步中世界领导人那里。他们对所读的东西并不喜欢。在他们眼中，这些图像既失真又屈尊，描绘图像的是那些目光短浅、怀有种族优越感的一伙傲气十足者，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按他们有钱而贪心的主子的吩咐行事。无须惊奇的是，进步中国家认为新闻媒介改革的头号目标就是资本主义的“四大”通讯社；有时还要加上“塔斯社（但它在进步中世界里的订户发行有限，作用也不十分显著）。进步中世界的领导人很了解通讯社的历史，认为通讯社是作为19世纪帝国主义者工具的观点与进步中国家新闻理论家的思想实在相当接近。

教科文组织讨论当初，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对此抱有很大敌意。他们认为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会议是受克里姆林宫支配的，并站在苏联一边企图在新兴民族国家中争取一批朋友，同时削弱资本主义国家在进步中世界里的势力。编辑和出版者的组织不仅谴责对自由报刊的攻击，而且谴责教科文组织本身。1976年，“泛美报业协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新闻自由在拉美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某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是来自“一个世界组织的威胁，它通过集权政府不断的投票来压倒西方民主。”

（在以上这句话中，“西方”这词儿很有意思。它是指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只是指西方国家，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有时还包括南非。拉美的后西方化国家也包括在内，但排除那些反美及其盟友的国家。人们一旦陷入词义丛林，就会弄得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姑且将它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业化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说得形象些，可以称之为“信息社会”。”）

加入泛美报业协会对教科文组织发出批评的其他组织有：

国际新闻协会”和“自由社团”，后者是由新闻界权威人士自己选出来的一个团体，以监督那些威胁“新闻自由”的因素。报纸也谴责教科文组织，并经常维护通讯社，说它们对进步中国家所作的报道公正而客观。

然而，这种情况到1978年的第12届大会出现了变化。“四大通讯社”的弊端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媒介似乎又开始老调重弹，继续先前的传统做法。正如美国60年代传统报纸采取地下新闻业的形式一样，现在新闻界承认了对通讯社的主要攻击言之有据。没错，通讯社在报道新兴民族国家的新闻中存在不足，过多地报道了战争与革命、瘟疫与饥馑、地震与凶杀。人们极力要求，那些为通讯社苦心劳累的记者们应该更多地把时间和篇幅用于报道事物逐渐发展的趋势，反映现象后面的实质，甚至体现出“发展着的新闻”。人们还要求记者多报道一些居住在进步中国家里的成千上万默口无闻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是的，这些通讯社确有缺点，但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因为通迅社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挖掘真相并将真相报道给那些渴望尽早看到消息的读者。这些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因此，在帮助进步中国家培训年轻的记者、传授新闻写作技巧方面，还有什么人能比他们提供更优的方法呢？技术和培训——这就是对教科文组织提出挑战的应答。

至于许多通讯社提出的对传播媒介帝国主义的指责，已遭到否决。如奥列夫、博伊德·巴雷特记载：很大程度上，着重传播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占据了70年代的讲坛，到了80年代似乎开始消散。但尽管如此，通讯社作为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界图象来源的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既然关于通讯社的争论热点已经过去，那么我们该好好地仔细推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了。

通讯社之争的双方从未在他们分歧的实质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一方面，争论是经济上的，涉及通讯社在为商品开拓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关于这点，双方没有一致看法。对于资本主义的维

护者来说，通讯社是报道新闻的工具，而非经济扩张。他们旨在寻找事物真相并将真相传播给读者。以这种方式提供娱乐和教育，他们遵循了传统的报刊信条。对于他们的反对者来说，通讯社的新闻作用只是掩盖其真正职能的烟幕——即在进步中世界推广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以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产品的购买欲和消费欲。一句话，他们是广告商的先驱。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讯社的辩护者对这方面的争论不太注意。

另一方面，争论是意识形态上的。通讯社批评家们指责他们的报道存有偏见。他们笔下展现的图象并不真实，这是那些新闻工作者本身固守信仰体系的后果。人们认为这些人心里充满了对新奇和时髦事物的崇拜，因而无法认识到传统的价值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产品的差别。不少指责通讯社的人争论道，一部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赤裸裸地抱有种族偏见。这样，凡"白"的就是优良而入时的，而"黑"的（或棕色或黄色的）就成为拙劣而过时的。这种偏见同样在基督教中根深蒂固。在基督教眼中，其它宗教信仰的价值，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得不到承认。对于这些断言，通讯社的辩护者矢口否认，他们从另一方面争辩道，通讯社记者追求的目标是真实和客观。因此，在解决这些意识形态分歧上毫无进展，尽管没有象以往那样如此反复地讨论。

再从另一方面看，这个争论又是专业上的，也就是围绕新闻定义的问题。进步中国家的批评家说，通讯社执迷于报道戏剧性加冲突性的东西，使得新闻严重歪曲，与现实脱节。19世纪路透社、哈瓦斯社的报道特点是煽情主义，20世纪后期的记者在报道亚非，甚至拉美情况时仍然沿续了这一特点。由于大肆渲染进步国家中的冲突和争端以及最新新闻，所以对那里生活方式的逐渐演变大大忽视了。他们说，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在于揭示它的趋向，而不是仅仅报道最新新闻。对于忽视进展过程的指责，工业化国家的新闻工作者表示认罪。不过，他们还是争辩道，他们在寻求戏剧性、冲突性之类的新闻时并没有对进步中世界抱有成见，而是

根据市场情况提供读者所需要的新闻。况且，着眼报道这类新闻也是他们本国新闻报道的特点，这比进步中国家为甚。

尽管从某些地方看来，通讯社的攻击者和维护者两派的观点存在谋合之处，但是两派之间的隔阂是根本的；争端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评价双方时是相当现实的，但这种现实性是基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而形成的。这并不等于说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不注重戏剧性和冲突性的事物。事实上，他们跟美国人和西欧人一样，两眼盯着风起云涌的事件。不同点在于，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在刻画戏剧、冲突事件时不如工业化国家的同行那样强烈而持久。另一方面也并非等于说，美国和西欧的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趋势和逐渐发展的进程不感兴趣。但是，分析性的新闻记者在通讯社要比在高质量报纸中更为少见。人们虽然不太清楚通讯社发送世界新闻稿的确切比例，但大体上，人们从新闻媒介那儿得到的消息基本来自通讯社，尤其是"四大通讯社"。再则，尽管那些大报、新闻杂志、广播电视网也派些记者前往国外，但比起通讯社驻外记者来则是区区小数。

据最近一份联合国汇集统计，美联社有驻外记者559名，合众国际社578名，法新社171名（有特约记者1200名），路透社350名(特约记者800名)。美联社和合众社都没有列出其特约记者的数目，但这两家加起来也已上千。所谓特约记者就是出售文章，按篇幅计算稿酬的业余雇员；许多特约记者是报道该国情况的国民，但他们所学的是自己受雇组织的新闻风格和新闻信条。总之，特约记者和记者所写的文章内容是难以辨别的。另外，记者通常有权修改特约记者发来的原稿。每日播发稿件的数字很大：美联社每日1700万字；合众社为1100万；法新社为335万；路透社为115万。预订路透社的稿件的报纸订户高达1.2万家。尽管这些原始材料数字给我们许多启迪，但它们还是无法统计出通讯社发到世界各地的图像覆盖面有多大。在这些广大订户中，包括每家大报、所有的广播电视和地球上差不多每个国家的政府。除此以外，

四大通讯社每天提供数以百计的摄影图片，这些图片的取舍和新闻报道一样，重点突出戏剧性、冲突性。我们应该牢记这点，在所有新闻媒介中，通讯社在保持现状方面投资最大。

在承认有关新闻流通不平衡的问题上，合众社前副社长罗杰·塔特里安评论道，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似乎简单地强调没有冷战分裂的国际背景下的美苏冲突。他还进一步说，“西方新闻媒介存在一个公认的倾向……就是当第三世界处于灾害、危机和冲突之际，它们投入了最大的注意。”塔特里安是1978年在开罗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当时他已脱离合众社；在他担任通讯社负责人期间他说的则是另一番话。事实上，一个记者当他在位期间，几乎很难弄清他对新闻定义内涵的理解。这种认识往往过一段时间方能获得。甚至在那段话里，塔特里安还是指出当灾害、危机和冲突在工业化国家内发生时通讯社也会给予同样的关注。这是实情。不过，对于进步中国家批评家指责通讯社在报道工业化世界情况时如何产生可能的歪曲，并未作出区分。

无所不在的通讯社在进步中国家各地制造不快，其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进步中国家接收有关其它进步中国家新闻的绝大部分均来自于四大通讯社。这种情况部分是历史上的原因，但直接原因主要是新兴民族国家的通讯社紧缺所需的财源或技术性机构(这里的技术词语即“基础部分”)派遣记者驻外，然后再播发他们的新闻稿。结果，通常的做法只能这样：即进步中国家的各家通讯社与四大通讯社之中的一家或几家签定合同，仅仅通过他们国内的设备重发美联社或路透社的新闻报道。从乍得获得的一条新闻可能是由法新社报道的，然后将它发送到塞内加尔、上沃尔特和喀麦隆。最后在这些国家见报。目前约有120个国家有国家通讯社，只有40个左右的国家没有，但其中很少几家通讯社直接报道国外新闻。埃及的中东通讯社从“个阿拉伯国家和几个欧洲国家直接发稿，然而这类报道十分有限。绝大部分亚洲国家的通讯社确实也派记者驻外。中国、日本和印度自行经管自家兴旺的通讯

社，但他们记者的活动范围有限，其新闻"食谱上的主食，均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在拉美25个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没有任何种类的通讯社，其中也唯有智利和墨西哥两国在国外设有中小型的分社。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在指出新闻流通的不平衡时常常援引美联社坎特库珀的话，他在抱怨路透社垄断新闻时预言道，"美国人想通过自己的眼光而不是英国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首任不结盟通讯社联营负责人的印度D·R·曼克卡也这样说过："不结盟国家的全部要求是，他们也想用自己的目光取代西方新闻媒介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不结盟通讯社联营是要求四大通讯社调整他们感知到的新闻流通不平衡现象的两大批评力量之一。联营于1975年创建。十年前即1964年，建立了国际新闻处。尽管这两个通讯机构在工业化国家中鲜为人知，但在进步中国家里质量日益提高，威望也随之提高。事实上，发展繁荣兴旺的区域性通讯社运动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亚洲以及中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管处在什么场合，这些通讯社的基本理论是强烈要求推翻四大通讯社的垄断地位。每一个这样的通讯社都是为了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事业。

事实上，这个联营机构，不能算是一个通讯社（至少相对于四大通讯社而言）。它没有预算、没有董事会，甚至也没有一个总部。新闻报道费用一概由发稿单位支付。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联营新闻传送都通过"南通社"（南斯拉夫通讯社）的设备播发，但后来这套制度有了改变，也允许其它国家的通讯社播发，主要有突尼斯、摩洛哥、伊朗、印度和古巴。会员国由原来的26个增加到50个；会员国对联营机构的存在表示满意，并同意扩大规模，提高质量。1978年在雅加达召开的会议上，会员国一致认为联营不会"此一时彼一时"，而是配合不结盟运动的长期打算，有选择地报道进步中国家的情况。

批评家攻击这个通讯社联营只是比进步中国家政府的宣传工

具稍微好一些，可以通过联营网发送新闻稿。其它一些人，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批评家则指出，联营的文章质量华而不实，没有几家报纸或电台来用他们的稿件。

自然，联营发出的新闻显然不同于四大通讯社电传新闻稿。联营对实地新闻进展的情况兴趣索然，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发展，社会变化、贸易和商业方面的报道。另外，文章比起四大通讯社那短小精悍的报道似乎要冗长些。美国及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报纸称联营的新闻为"非新闻"。这又是一个定义上的争论。联营的国家也同样认为四大通讯社的大多数新闻也并非新闻，而只是耸人听闻或资本主义国家为谋取经济利益的诱饵。尽管联营的规模有所扩大，但仍无迹象表明它正在取代四大通讯社成为进步中国家报纸、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我们在游历进步中国家各地并与那里新闻从专人员的攀谈中发现，人们对联营国家播发的新闻没有什么热情，这一态度可能倒反映了工业化国家新闻媒介信条的威力。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界认为，通讯社联营国家以及进步中国家的新闻内容大部分都是枯燥无味的，仅举一例就足说明之。1981年秋，达累斯萨拉姆《每日新闻》前任编辑、当时的坦桑尼亚新闻部部长本·穆卡巴在一所新建的国家新闻学校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敦促学员的报道第一要做到实事求是，第二要生动有趣。他指出，质量低劣的报纸往往既失实又乏味。在适当的时候，穆卡巴的演讲报告被送到西德的新闻编辑室。1982年6月5日这篇演讲刊登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从此以后，人们常摘引穆卡巴的话说："除极个别以外，非洲的报纸枯燥至极连他们自己都要求听众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恩斯特·奥多·梅兹克则用穆卡巴的演讲作为跳板，不仅对非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质量进行攻击，而且同样攻击了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梅兹克承认这些报刊有待改进，但指出从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得利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中国家的集权主义政权的统治。这种统治的后果会导致新闻的"异常枯

乏"，这就会使那些镇压性政府得以垄断新闻。他又说，"而那些国家的人民则几乎无从知道。"

在进步世界中，唯有一家国家通讯社能与四大通讯社匹敌，那就是苏联的塔斯社。但从总体上看，苏联人在其挑战中不能算是成功的。进步中国家的编辑们阅读从塔斯社发来的新闻稿时，常常自然地同美联社或法新社的新闻报道进行核对，但是这些新闻在刊印前均作了修改；他们常常对这些新闻不屑一顾。如达累斯萨拉姆的《每日新闻》编辑主任乌里·马姆布托库拉说，"每当塔斯社的新闻稿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对比之下我看了有关美帝国主义的文章时，就把这些稿件往地上扔。"他说，美国通讯社更为真实些："有一些宣传内容也不错，不过你得善于从中发现。"马姆布托库拉回想起许多非洲编辑的情况时说，他衷心希望美苏停止攻击彼此的通讯社。他说："如果他们打起来，倒霉的是我们。"

工作期限比不结盟通讯社联营长十年之久的"国际新闻处"取得了累累果实，尤其在拉丁美洲——其工作和存在的中心。70年代后期，它开始主动向亚洲扩展，并与30多家国家通讯社取得联系。到了80年代，国际新闻处成为世界第六大通讯机构，其规模范围只有四大跨国通讯社和塔斯社超过它。当初它是作为拉美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合作性机构而建立的，他们极力要求社会变革，但很快就放弃政治转向由其董事长，意大利的罗勃特·萨维欧称之为的"选择性新闻报道"。其方法是横向而不是纵向的，换言之，它弃绝跨国通讯社和塔斯社那种做法，即新闻流通是至上而下的——从记者到读者。相反，萨维欧提议的"横向进程是指个人间、社会团体间以及国家间的新闻交流。"

国际新闻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研究员阿尔·赫斯特对新闻处的报道内容作了详尽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国际新闻处"实际上是一所真正的选择性类型的新闻机构，主要服务于第三世界国家并反映或影响第三世界。"在国际新闻处发出的五分之三篇幅的新闻报道中发现，商业经济类占27%，外交占20%

国内政治占14%。赫斯特几乎没有看到有关灾害、体育或名人方面的报道。

萨维欧身上似乎散发着传教士的味道，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没有饥饿、没有灾荒、风调雨顺的民主世界。他在为筹建一个选择性新闻机构结构的苦心努力中，有些经历使他困扰不绝。比如，他发现传统的新闻定义早已深深地扎入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的心中，所以就很难引导他们（甚至是国际新闻处的记者）摆脱重点报道最新新闻的做法，他所指出的“最新新闻就是那些一旦在市场中打响，就必须具有影响力的新闻。”这等于说该新闻必须异常突出、引人注目。萨维欧1982年夏在荷兰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说，“正如我们平常口头说的黑话：新闻必须具有‘性感’。”以萨氏之见，要确立一套真正的新闻传播新秩序，光纠正新闻流通中的不平衡是不够的。在基础部门做些改良也不足以带来一个新秩序。新秩序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力求在报纸和电视广播台节目的内容方面改变面貌。而内容的改变，需要看护人——即决定发表什么、枪毙什么稿件的编辑——有心改变他们对新闻的定义。萨氏说，传统标准，既和进步中国家的突出困难毫不相关，又不涉及“关系到今天人类的基本问题，如饥饿、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结构或文化。”

这点，萨维欧说得相当正确。

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

毋庸置疑，在教科文组织和其它国际论坛上，就新闻传播展开争辩的岁月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文件，首推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研究成果和主要建议在1980年10月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期间公诸于众。这份报告的内容发表在一本书里，书名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委员会的16名成员中，有

8名（包括突尼斯的马斯穆迪）是进步中世界国家的代表。工业化世界以外的国家有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扎伊尔。马克思主义代表有苏联塔斯社社长谢尔盖·洛谢夫和南斯拉夫的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委员会成员中有6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伊利·艾贝尔，曾任职于《纽约时报》，是著名的新闻学学者。绝大部分成员都懂新闻业务。法国的于贝尔·伯夫——梅里是《世界报》创始人，任法国一个新闻协会的会长。加拿大的贝蒂·齐默尔曼曾任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日本的永进道雄过去是《朝日新闻》社论撰写人，前任日本文部省大臣。荷兰的约翰内斯·皮耶特·普隆克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其中，最令人感到可贵和欣喜之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批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意识形态里的成员竟然能够在一份要求"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文件上达成一致看法。其实，不可能完全达成协议。在这份厚达312页的麦克布赖德报告中加了许多脚注，个别成员在行文中作了特别说明。从总体上看，这些分歧都是可想而知的。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别。然而，有些是本质上的分歧。譬如，洛谢夫对委员会关于"应该废除新闻的审查制和独断控制"的提议表示反对。就塔斯社而言，"新闻的审查制度和独断控制这一整个问题是一国国内立法问题，由该国的立法机关代表本国利益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就是说，对苏联而言，只要这些宣言没有侵犯苏联维护其本国利益的权利，国际宣言要求新闻流通自由而平衡全是有益的。从另一角度看，洛谢夫反对人们要求的获取新闻来源的自由，即应当获取非官方和官方的新闻来源，也就是在任何国家里能够获取整个舆论范围。让外国记者接近个别苏联公民，洛谢夫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再换个角度看，洛谢夫对委员会宣言的"交流权"也表示异议。洛谢夫写道：这种权利"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均未得到接受。"对于苏联官员来说，交流权如果存

在的话，也必须首先考虑各成员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其他代表有可能持类似的观点，一旦确实观点一致，他们也就不必表明了。

艾贝尔的主要异议是关于商业和广告方面的争执。一方面，他大声反对委员会的建议，即承认传播媒介需要收入但要求设法"减少市场和商业因素渗透到本组织和国家以及国际新闻传统流通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艾贝尔反驳道，委员会没有证据表明市场和商业因素必然会对新闻传播流通产生消极作用。他补充说：

相反，委员会在报中称赞了那种需要勇气的调查性新闻业，说这种新闻业只能靠独立的传播媒介来维持工作，而这个媒介的生存依赖于它在市场中的需求状况，而不是政治领导人的口味。委员会同样注意到，当今市场机制甚至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也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

另外，艾贝尔还竭力批判要求采取立法措施的做法，说立法措施是会限制传播媒介的集中和垄断、削弱广告对编辑政策的影响力、限定跨国的行为。艾贝尔明显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新闻政策断言，在那些连新闻竞争也不允许的国度里，讨论传播媒介的集中和垄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在那些其传播媒介本身作为国家垄断部门而建立的国家里，还大谈反对新闻集中和垄断的措施是荒唐可笑的。"艾贝尔同意，有必要深入了解广告商对编辑政策的影响，"然而马上要求削弱这种影响，不分青红皂白，不看具体情况，这种要求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从另一方面来看，艾贝尔反对委员会宣称，"工业化国家差不多垄断了"科技情报、工商情况、卫星传播等等，并宣称这些情报绝大部分"受到政府、大型研究中心或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监控，这些机构可能凭借各种理由限制这些情报的发行和传播。"艾贝尔指出，委员会找不到确凿证据来"自圆其说"。美国对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和提议的反对意见集中在支持市场经济体系，并捍卫新闻工作者的完全的表达自由，以反对苏联模式的政府对新闻的控制。

加拿大的齐默尔曼，委员会中唯一从事电视工作的人，在讨

论中激烈批评电视节目。委员会谨慎地评价了全球对电视节目编制质量的攻击，承认指责在市场中提供过度的娱乐节目是一种无济于事的高声喊叫，并希望不要把新闻变成传播群众文化和消费品的“简单商品”。委员会说它不同意某些国家的夸张言词，说电视是反文化的东西。然而，它还是承认社会制度确实要求节目迎合最多的观众，所以，“节目老是无质量可言。”齐默尔曼提到“加拿大广播公司”时说，节目大众化速度过急，“大众广播电视领域的绝大部分节目编制，甚至在竞争状态下，也是为了迎合不同口味而特别安排的。为‘少数’公众服务也是这类广播公司的一部分内容。”

齐默尔曼还叱责了委员会关于传播媒介的“威力”应该用于建设性目的的提议。委员会在一篇特别有趣的文章要要求人们调查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尤其是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公众对这些内容的态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委员会说，新闻媒介是一所包括教堂、家庭、团体和学校在内的强大的社会化机构。委员会写道，有些涉及环境污染的新闻报道引起巨大的变化，但还有些报道——在某些国家里则被指控为制造恐惧气氛，而引起政府的镇压。委员会提出质疑说，

倘若传播媒介具有传播恐吓的威力，那么它们为什么不发挥同样的威力消除人民的失信感和恐惧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

这个问题提得极有分量，它道出了三种新闻思想体系对新闻媒介作用看法上的分歧焦点之所在。齐默尔曼的回答值得注意，他说：

委员会报告在指责传播媒介发挥过多威力的同时却支持把威力用于其它（有价值的）目的。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是通过“运用”传播媒介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这是无法接受的。

讨论传播媒介的作用时，重点在于对媒介威力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体系和信念常常阻碍人们理解新闻媒介威力的真

实状况。对加拿大的齐默尔曼来讲，运用传播媒介是一个无法接收的概念。然而历史表明，新闻媒介从其发端至今，一直被人们所运用，而且当权的个人和团体常常力图操纵新闻媒介，使之服务于他们的特定目的。新闻媒介是威力强大的工具这一事实无须怀疑，争端要点在于此威力是怎样发挥的，发挥者又是谁？

引人注目的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16名成员一致反对某些特殊领域，并不等于指出了委员会内部存在的主要分歧。相反，这等于强调了肖恩·麦克布赖德及其成员提出报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自然，只能达成某些妥协，而人类迄今还远远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委员会提出的82点建议。然而，目前有一份根本性的文件使世界各国权威们基本上赞同。在这份文件其中不遭异议的一段中，委员会成员特别把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提议同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联系在一起。

委员会指出，有关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一问题的报道存在"许多误传"。此后，有关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及其提议的报道也同样在新闻媒介中遭到误传。关于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新闻报道，如同委员会评价关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新闻报道一样，"一方面堆砌辞藻，另一方面四处是偏见，不是过多的武断就是草草的解释。"委员会把新闻新秩序的"主要论点"浓缩成一小段落。文字如下：

> 南北差异并不只是时间间隔问题。因此，人们不能期待进步中国家通过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而"赶上来"。现实是，南北差别日渐扩大、日趋严重。这表明光靠援助是不足的。需要的是消除不公正和受压迫的结构，改革目前的劳动分工制度，建立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新闻传播能够反映整个国际舞台的主要差异，因此，它也同样能够反映深远的变化。

显而易见，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只通过金钱和技术援助的手段是不够的。需要的远非这一点：委员会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下下列三点：

第一，应该认识到，新闻交流是一项个人权利，属于全体人

民的民主权利，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也不仅仅是握有政治、经济大权的人。

第二，世界各地新闻与传播的不平衡状态必须得到纠正和消除。

第三，为了帮助全人类获得人权，消除暴力和战争的威胁，新闻内容必须进行修正。

尽管苏联成员洛谢夫对无所不包的"交流权"概念提出质疑，但对委员会另外的一个要点没有提出异议，即在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里，新闻传播不能只是一个方向。就这一点，委员会满怀激情地引用了墨西哥的一位研究员卢斯·雷米罗·贝尔特伦的一段话：必须建立"一个新闻传播的新概念，即一个博爱、平等、民主和非营利性的模式。"贝尔特伦说，平常的新闻传播"就好象一个人的独白"。因为一旦传播开始，就需要传播者和公众双方进行对话。贝尔特伦的观点与罗勃特·萨维欧和国际新闻处的看法一致，均要求横向的而非纵向的传播交流方式。委员会承认这个提议的内容带有乌托邦的味道，但仍然认为，"如果公民介入的思想广为人知，"那么新闻工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就会出现；"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进程，达到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关系之目的。"委员会措词讲究地写道，在这种作用分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变化，"其中传播媒介给予，而广大公众接收。"

麦克布赖德委员会建议的第二点也涉及新闻传播的方向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主要涉及新闻以及其它信息从世界甲地流向乙地的道路问题。这就是"自由流通"问题，自由流通起初由美国介绍到联合国，但现在又返回到了美国。委员会简洁而确切地指出，关于新闻流通不平衡状态的承认问题已不再有争议了。市场经济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以及进步中国家无不承认不平衡状态的存在。人们注意到，新闻流向由北到南，也就是从工业化世界流向进步中世界。针对这种情况，委员会引用了世界各国政治和新闻领域中的权威们所说的话，进一步证实对不平衡状态的

注意和关心。其中引用了艾贝尔的话，他说勤于思考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应该承认，为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包括发达国家与进步中国家，目前这种严重单一流向的新闻流通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委员会指出，不能把不平衡现象完全怪罪于工业化国家。委员会发现，在某些新兴民族国家中存在着统治阶层抑制新闻的做法，而老百姓对新闻过程不甚了了。麦克布赖德在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强调说，他坚信，造成新闻流通不平衡状况与整个世界都有关，不仅仅只有工业化世界垄断新闻。他指出，问题出在新闻流向总是由上往下。不管怎么说，委员会还是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不平衡状况的主要因素是经济上的。如果不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上大动干戈，改变现状，那么新闻流通问题就无从解决。委员会说：

可以见得，新闻的单向流通主要反映了世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这些结构就是要让穷国依赖富国。

法国的一位著名新闻理论家，让·德·阿尔西写道：

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人们限制到单一的新闻流向，长此以往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觉得新闻传播就只有那么一种情形：自上而下纵向流通，铁板一块，没有个性、少数人制作，所有人接收。其实，这并不是新闻传播。

这不仅反映了委员会所抱怨的新闻存在的不平衡状况，而且还反映了各种新闻（特别是通过先进技术设备发出的新闻）流通中存在着不平衡。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跨国公司在"促进文化发展而扩充设备"方面作用积极。但他们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激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操纵的"新闻传播的基础部分、新闻发行、文化产品、教育软件、书籍、电影、设备和培训手段"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其目的，按委员会的说法，是"强加一致的趣味、风格和内容"。

委员会建议的第三点涉及报纸的版面内容以及广播电视的报道内容。在世界各国就新闻定义的异议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调查之

后，委员会得出结论说，产生曲解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差错取代了事实真相，或由于新闻报道中渗入作者偏颇的解释，如通过采用些带有贬义的形容词和刻板成见。”委员会经过对定义的精心研究，指出新闻制作过程中的差异远不如第一眼见到新闻所形成的差异来得大。大部分新闻工作者似乎同意这种看法，即“只要新闻内容真实可靠且富有意义，那么好新闻和坏新闻就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情趣。”委员会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传播者的作用不仅包括“客观报道‘硬’新闻，”而且包括那些可能“在全世界推动人类进步中作用至关重要”的评论和分析文章。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喜欢引用1979年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关于美国“新闻理论”的一席批评性的讲话。他说美国的“新闻理论”不能以系统而明智的方式提出新闻传播的问题。重点放在任何一种新奇事物上，放在互不关联的不同事物上：“在谈到对待现实的方法时，很难表达出这种观点，在美国一旦谈到这个问题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真实事情上去，而很少对广泛的历史趋向产生兴趣。”

总之，委员会主张新闻必须重新定义：新闻工作者的正当角色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不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委员会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能力维护和平，加强国防安全，促进合作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新闻界有责任“动员舆论赞成裁军，消除军备竞争。”委员会在它的那份八十二点建议的最后三点中宣称，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新政策应该着重于、“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在促进和平增进国际间的了解、推动人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阻止战争方面作出贡献。”不仅如此，“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需要而且必须成为世界各国之间和平合作的工具。”

委员会针对市场经济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之间展开的不可开交的争辩说，新闻媒介是在加剧而不是缓和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关于这点，委员会在一篇颇有文采的文章中断言：

战争的危险由于偏狭固执、民族沙文主义以及不能理解不同观点而进

一步加剧。这点，对于那些肩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必须铭记在心。在国家政治利益上，还有争取全人类和平的最高利益。

《特鲁尔宣言》

历经了三至四年的讨论、争议，演讲和攻击，才形成了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报告的研究结果和建议中有多处地方意思不清，容易产生不同解释，但这是16位成员真心达成协议的代价。他们愿意付出这一代价证明了他们有诚意争取国际间的和睦相处。不管哪种政治上的分歧使委员会的成员彼此隔离，也不管他们彼此害怕丧失各自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最终，这些政治分歧和恐惧心理都在最后文件中清除了。在新闻方面，几乎没有比这份文件写得更详尽、涉及面更广泛、内容更透彻的了。当第 21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80年10月闭幕之际，代表们为自己完成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而相互庆贺，他们在教科文组织大会过程中共同聚精会神地工作，结果广泛的一致意见远远盖过某些分歧。然而，尽管这样，美国新闻界对这一报告以及大会本身反应不佳，尽管美国代表对会议结果也表示十分满意。他们通过努力阻止了教科文组织采取国际道德守则或决议来要求限制新闻工作者的活动范围。委员会在建议中，用明晰而精确的语言表达了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接近全部新闻来源的自由的信念。此外，代表们一致通过，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国际传播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由美国倡议的，旨在强调对进步中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提供资助和培训，有助于调整全球的不平衡状态。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美国报刊在教科文组织大会召开期间，对大会的进程情况作刻薄的报道，然后到了大会结束，又如此敌意地指斥教科文组织？而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报道都是比较友好的。苏联只是对某些建议表示了中肯的不同看法，但大体上对会

议结果是拍手称道的。进步中国家的总体反应是热情友好的，亲美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新闻媒介对大会也表示赞同。 位于纽约的“全国新闻协会”也注视着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召开情况，但对美国新闻媒介报道批评大会抱有偏见和歪曲事实感到不解。就此，新闻协会出动了一批人员对美国新闻媒介发表的有关教科文组织大会的报道文章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新闻协会的调查结果很有启示。差不多所有美国报刊在报道和评论教科文组织大会进程的文章中都赤裸裸地怀有敌意，对他们感到恐惧的心理大写特写，害 怕 外 国 独裁者和官僚企图破坏——姑且不说摧毁——新闻自由，在美国这种新闻自由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之久。新闻协会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报刊到处采用美联社10月2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上下午版各不相同。下午版的导语是："共产党和第三世界利用他们在教科文组织的多数席位，通过了旨在加强对国际新闻报道控制的决议"，这篇文章以多种标题出现，在蒙大拿洲海伦娜市的《独立新闻报》上制作了这样的标题："教科文投票，压制新闻自由。" 全国新闻协会就教科文组织的所有讨论主题而非新闻政策作了研究。结果发现教科文组织大会全力以赴地讨论新闻问题，以致新闻协会所调研的报纸中找不到一篇有关其他问题的文章。批准有关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几乎“未见报道”。甚至有一位教科文组织的美国代表，惠廉·哈雷，说美国报刊上的文章“带着散光眼镜”。自由社团负责人列拉纳多·苏斯曼尽管一向起劲反对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运动，也认为美国报道有失平衡。苏斯曼亲自作了调查，发现美国报纸中有60%表示反对，5%支持，12%态度持中。

前《纽约时报》评论版副主编A·H·腊斯金曾报道了新闻协会的调查结果，他指责报道有失平衡来源于报道过程的选择。只要报道符合美国报刊的评论文章观点，新闻工作者就此认为它具有新闻价值，值得报道，所以自然就把相反观点排除在外。腊斯金写道，这种做法与“作为评判好新闻标准的如实报道精神是

格格不入的"。他的文章摘引了当时美联社主任斯泰·史运顿的观点，承认对教科文组织的许多活动情况未做报道，但马上解释说是因为活动情况没有新闻价值。正如史运顿所云，假如没有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之争，"新闻界人士就不会在那里（指教科文）"。

其中的冷嘲热讽一目了然。正是这个新闻的评判问题才是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和有关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之争的关键。美国新闻媒介报道教科文组织活动情况的特点是，寻求最新消息、寻求戏剧冲突性消息，对其它问题也是如此，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的通病。而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指出，目前新闻秩序的危险正是由于把目光集中到最新的、冲突性新闻上面。人们所忽视的是有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重大问题。

法国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大致与美国情况相似，只是法国人大提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制定情况，并且有一部分主要是政治上左倾的报纸对教科文组织表示支持。在法国报刊文章中，让人最受启迪的是总干事姆巴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他说，"政府间组织是一个由政治领导参加活动的平等的政治组织。"有一点值得人们稍稍注意，就是那些参加国际组织的代表是其政府的代言人，这些代表是由其领导人委派他们坐在首席上的，因此，不让他反映其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法国报刊就此把姆巴尔的这番讲话当作跳板连续撰写评论，说教科文组织"过于政治化"，对意识形态问题涉及过多，法新社的两篇特稿只援引姆巴尔的"政府间组织是一个平等的政治组织"，而删去了句子的后半部分，这样他便可以把观点阐述得更清楚。

法国新闻报道中流露出来的对"政治化"的害怕是显而易见的，这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前面已经指出，政治化问题是新闻学思想体系引起分裂的最主要因素。对进步中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来讲，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则没有政治性。如腊金斯所写的，新闻媒介应该本着"如

实报道的精神。”这样，留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求缓解这个根本分歧的途径。

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报告在第21届大会上没有正式投票通过，这或许是件好事。要求正式投票无疑会引起各派之间的争辩，而使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毁于空洞冗长的词藻里。相反，代表们投票要求把报告发行到各国政府、新闻工作者、学者和普通公众那里，然后拿到1983年召开的大会上进行审议，届时准备筹划一份新的五年新闻计划（1984—1989）。此外，代表们再次要求维护“意见自由、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并促进各国传播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代表们没有用最明晰的语言阐述这一思想，建立新秩序的提议只是以这样的决定通过的：“大会希望教科文组织表示愿意通过开展短期和中期活动，致力于确定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内涵、外延及运用工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形成。

大会结束前四个月中，各国对新闻政策再次掀起唇枪舌剑般的争论，激烈程度不亚于以往任何一次。这次争论主要围绕道德守则和保护新闻工作者两个问题。会议安排在1982年2月在巴黎教科文组织中心召开，巴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皮尔·盖鲍里特受邀发表他的观点。盖鲍里特提出的计划完全没有得到美国和许多资本主义亲美国家的欢迎。结果表明，争论本身是在小题大作，然而，它催化了各国鼓舌辩论的高涨，也险些造成美国国会要求退出教科文组织的威胁。

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组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目的是让专家们各抒己见。一旦讨论主题是新闻媒介，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常常请教新闻工作者的正规组织，以便选择适当的专家发表观点。这些正规组织中有两个闻名欧洲，欧洲是教科文组织的中心。其中之一是，“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地点设在布拉格，意识形态全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是“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意识形态明显是资本主义的。南辕北辙，很

难相逢。所以，教科文组织邀请这两个组织推荐专家在二月会议上主持讨论。盖鲍里特的名字是由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推荐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没有作出反应，也没有接受邀请，这点是存在争议的。不管情况怎样，到时候就邀请盖鲍里特，也同样按照常规给各新闻组织和有关专家发送了请柬。结果没有几家组织接收邀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原因是盖鲍里特没有知名度，因而此人新闻价值不高。

然而，大会就要召开前几天，某些新闻工作者报道说教科文组织会议召开期间将审议一项限制新闻工作者活动范围的计划，强求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公认"的职业道德。报道说，盖鲍里特的建议将被编入教科文组织计划之中。而且还说，会议将私下秘密进行，而代表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受到邀请。《纽约时报》报道说，"西方"由于教科文组织限制记者活动而感到忿闷不平，尽管如此，"报道说，麦克布赖德委员会决定反对这类做法。

的确，委员会对限制新闻工作者的某些活动范围，并把它作为保护记者免遭生命危险的计划中的一个内容进行了研究。结果作出决定反对这类计划，而麦克布赖德则坚持主张更重要的是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生命而不是坚持新闻工作者在他们的实际工作情况中是否享有特殊"权利或待遇"的抽象原则。美国和其它国家争论说，任何保护新闻工作者的行为都会产生某种限制活动。对此，麦克布赖德说，他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新闻工作者受死亡率最高之害的情况下还强硬坚持这种观点。委员会不顾进步中国家的广泛支持，一味反对正式的道德守则，依据这种守则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但是，委员会确实曾经说过，如果搞得出来一套国际守则是人们向往的，并建议守则应当是自发形成并自愿执行的，哈钦斯委员会也许会称赞这种说法，但加拿大的齐默尔曼坚决反对，说既使那些守则是自发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们肯定也会反对任何正式的守则。鉴于这种分歧局面，委员会谨慎地寻找一条

中间道路。

有关围绕盖鲍里特计划而举行会议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每当教科文组织官员听说他们正在准备闭幕式而没有邀请全体新闻工作者参加时，他们顿时有点恼火，声称请柬早已按时寄发但遭到冷落。会议最后召开时，基本上座无虚席，新闻团体的官员和新闻工作者闻讯云集巴黎，聆听盖鲍里特的发言，并各自发表他们反对限制性计划的讲话。总干事姆巴尔为此出来解围，坚持说限制新闻工作者活动范围的提议只是盖鲍里特的个人意见，它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抱怨者对姆巴尔及其同仁的否认明显感到不满。合众国际社的一篇报道说，"教科文组织感到为难，"认为本想悄悄通过计划的第三世界代表们由于"西方集团未经同意而参加"会议感到大为不满。圭亚那新闻部部长弗朗克·坎贝尔回答道，大家需要的不是不停地争吵而是讨论如何着手解决分歧意见。他强调"教科文组织只是提供方便的助手，而不是企图剥夺人民自由的恶棍。"另一方面，"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财务秘书、前"美国新闻署"署长，列奥那多·H·马克斯说，如果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意味着"政府或教科文组织控制传播媒介，限制记者活动，使他们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且对他们报道的内容进行审查"的话，那么他就会反对这个新秩序。

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思，会议一结束，包括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内的新闻组织又动手组织起另一个会议了。会议最终于五月份在法国的一个旅游胜地特鲁尔召开。会议结果推出了一项为人们所熟悉的《关于新闻自由的特鲁尔宣言》。特鲁尔会议无疑是广大新闻团体、学者和官员商讨新闻媒介的一次最著名的集会。约有60多家组织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四大通讯社。这次会议的领导成员主要由美国代表组成，不过也有西欧大部分国家和亚非、拉美少数国家的权威。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也受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姆巴尔亲自对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发表了讲话。其讲话语调比较缓和，但他对记者的反复提问感到恼火。

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进步中国家的新闻理论家之间所存在的敌意是绝不会烟消云散的。

记者提问指责姆巴尔说，教科文组织支持政府控制新闻媒介，会议秘密进行，而且苏联进行幕后操纵。总干事大怒，回答说指责毫无根据，是对教科文组织形象的歪曲。《国际先驱论坛报》在报道特鲁尔会议时说，姆巴尔的讲话和一些与会者的敌对态度（其中哈雷提出要求把意识形态赶出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使宣言比开始时更为强硬。《纽约时报》赞誉宣言是“第一次西方与其他自由的报刊广播电视网联合采取同一立场反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因为他们授权教科文组织对新闻传播的流通进行控制。”美国国务院新闻司发表新闻报道评价宣言“是抗议建立所谓‘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要举动，新秩序意味着教科文组织准备对传播媒介实行独断的限制。”

特鲁尔宣言理所当然应该采取一定的路线方针。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言的实质与麦克布赖德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和建议大同小异。宣言支持“新闻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反对“国际道德守则”，拒绝接受限制新闻工作者活动范围的任何计划或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任何正式规定。尽管这些建议的确反对盖鲍里特的提议，但没有与麦克布赖德报告不相一致的地方。当然盖鲍里特提议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的建议。话说回来，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和特鲁尔宣言都赞同《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

根本的分歧仍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特鲁尔宣言特别强调广告对于“一个强大而自助的新闻媒介”来说，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服务又能给该新闻媒介提供资助。宣言指出，“经济上无法独立”的新闻媒介是不能独立的。此外，宣言还说，调整世界新闻流通不平衡状况的明智做法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具体就是：“促进技术提高，增进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进行设备更新、减少通讯税收、生产出成本更低的新闻纸以及消除提高新闻媒介能

力的障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产者和进步中世界里的无产者分道扬镳的焦点在于双方对待广告作用持有分歧意见。对于进步中国家来说，如同麦克布赖德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广告是对新闻自由流通的威胁；而工业化国家则认为，广告是独立的新闻媒介摆脱政府控制的基石。

国际合作陷于困境

此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新闻媒介历来没有发挥过独立的作用；也从来没有摆脱权力的操纵，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经济权力。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歧只是暂时的。双方都打着新闻自由流通的旗号派遣新闻代表团；而这些公认的代表团只是摆摆样子罢了。正如W·S·吉尔伯特的妙语：牛奶冒充奶油。

无论如何，特鲁尔宣言还是在新闻界和美国政府的代表那里不胫而走，四处传扬。正如人们所料，苏联谴责这个宣言；塔斯社新闻分析员尤里·考尼诺夫把宣言说成谎言，并指责资本主义新闻媒介打着支持新 闻自由流通的幌子 “对主权国家开展心理战”。进步中国家和教科文组织官员更注重人们对教科文组织的攻击而不是特鲁尔宣言。当时，姆巴尔的新闻发言人，《新闻非殖民化》一书的作者，法国的赫维·鲍格斯抱怨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报刊的一些文章已经把“机枪”对准了教科文组织。姆巴尔在特鲁尔演讲时说，他欢迎对话，而现在再也不如当时那么肯定了。

美国报纸发表社论大肆赞颂《特鲁尔宣言》。类似专栏作家卡尔·罗恩和约翰·罗奇的赞扬文章层出不穷，到处可见。罗奇的专栏文章在《星条旗报》上的标题为：“教科文组织企图压制新闻自由”。尽管美国官方的文章更言之有理，没有某些标题来得具有煽动性，但也加入了批评教科文组织活动的行列。卡特总

统的前助手莎拉·戈达德·鲍威尔曾就她称之为传播革命问题用平缓的语调发表了一次讲话，讲话内容被《新闻妇女报》报道，标题是："世界新闻自由陷入困境。"

1981年的整个春夏，各方对教科文组织的批评与日渐盛。"国际报纸出版者联合会"在马德里举行会议，这个联合会由美国领导的包括25个国家的报业主组成。大会采取了一项决定，一致通过《特鲁尔宣言》，并敦促教科文组织"放弃限定新闻报道的内容以及给新闻媒介制定原则的意图"。同时，"国际报纸出版者联合会"还呼吁进步中国家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途径，如接收直接援助和新闻记者培训计划。与特鲁尔会议的观点一样，出版者们表示关心各国采取措施，把政府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可能有过这样的评价，"国家为个人而存在"，出版商们纷纷对此表示深信无疑。密尔进一步说，"一个报刊最终的限定不在于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动，而在于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派头、活力和勇气，自愿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社会服务，因此，必须通过自由而公开的报道，为全体公民服务。"

自由社团的负责人列奥那多·苏斯曼在六月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特鲁尔宣言大加赞赏，说它是对教科文组织会议所采取的措施的代表"自由报刊的回击"，因为"近六年来，自由报刊的拥护者在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屡遭挫伤，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苏斯曼提醒人们说旨在援助进步中国家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是"惯于制造麻烦的速记文字"，因为它只把资金流入那些对新闻采取抑制政策的国家。他对进步中国家的新闻政策作了总结：刊物出版前后实行审查制度的国家非洲占57%，亚洲占53%，拉丁美洲占38%；对新闻工作者实行预防性监禁的国家非洲占51%，亚洲占89%，拉丁美洲占38%。然而，他指出，这些对新闻实行控制的国家在教科文组织内把握了大部分选票，并在"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中有35位成员。苏斯曼写道，如果这些国家坚持开展活动"威胁新闻自由"，那么美国不管其盟友是否支

持，应当考虑撤回它在教科文组织中的经费。

七月份，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略特·阿伯拉姆斯极力反对教科文组织会议，特别是讨论盖鲍里特计划的那次会议，他指责该会是对“教科文组织必须维护的新闻自由价值的攻击。”但阿伯拉姆斯对退出教科文组织的任何努力表示反对，他论述说，留在组织内部更可取，这样可以为保卫思想的自由流通“以发挥积极进取的领导力量”。“那怕劝导教科文组织回心转意，坚持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仅存一丝希望”，美国也会保留它的教科文组织的成员身份。阿伯拉姆说，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教科文组织的前途，而不仅仅是关系到新闻自由的未来。7月9日，他对美国当时的处境向上作了汇报，当时“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几个小组委员会对有关教科文组织的争论表示极为关切。到了8月，参众两院通过一个法案，此法案攸关教科文组织的沉浮。

在提交国务院的一份正式拨款预算案里附加了教科文组织的议案，该拨款预算案于1981年由参众两院通过，只是形式不同。直到1982年8月，两院才认可教科文组织议案的全部条款（尽管条款用语存在争议）。里根总统于1982年8月24日在那个议案上签了字，使之作为法律生效。在发起此议案的参议院内，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奎利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派特里克·穆尔尼罕联合了一批力量，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国会起来反对教科文组织“企图限定新闻内容”以及某些成员“想控制获取新闻和传播新闻”的做法。除此以外，修正案表达了国会的意愿，即美国给教科文组织的捐款决不能用于限制新闻记者活动、强加规定的道德守则或制约“新闻自由流通”的任何计划。最后，修正案得到一致通过。

1981年9月17日，当此议案提交到众议院时，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宾·L·比尔德更加强了修正案的措词。据比尔德的看法，教科文组织采取限制新闻记者活动范围的计划已希望渺茫，

如今已陷于“危境”。因此，美国应当把住这个关键时刻，威胁教科文组织：如果“教科文”坚持其限制活动的话，那么，美国将停止对教科文组织提供一笔价值约1200万美元的捐款。比尔德把里根总统支持他的观点和同意特鲁尔宣言的信件当作证据。而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米莉森特·芬威克也把宣言当作证据。后来，众议院出现的一批议员加入比尔德和芬威克的队伍，进行一系列热烈的讲演，赞颂美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赞颂第一修正案，甚至赞颂托马斯·杰弗逊的讲演。

这批人在演说中，突出地强调新闻媒介的威力。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弗·雷古拉断言："新闻报道公开和新闻流通公开对我国至关重要"。他指出比尔德修正案的重要性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其他国会要人也以同样口气发表了讲话。其中许多人公然谴责教科文组织。伊里诺斯州共和党众议员爱德华·J·德温斯基对大家说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是“抑制新闻自由”。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克莱伦斯·E·米勒大声反对“联合国组织不断加强控制新闻的做法”。他指出，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要求是“苏联努力的结果……企图拉拢进步中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就象控制本国新闻那样控制……世界的新闻秩序”。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杰里·路易斯演讲时说，采用行动反对“象联合国抑制言论自由的任何世界组织”是当务之急。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杰里德·B·所罗门赞誉美国新闻媒介起到了“消除弊端、根除腐败”的监督作用；并宣称再也没有比新闻自由更令共产党领袖们胆战心惊的了。他说：

因此，这是不足为怪的，苏联傀儡以及世上其它独裁就是要消灭他们国内仍然存在的新闻自由。如果美国默认这种镇压新闻自由的状况，那才会真正令人大吃一惊。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教科文组织，竟然会考虑采取某种新闻限制，实在是荒谬绝伦。

对比尔德修正案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人，他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默尔·M·迪马利。他指出，教科文组织并没有

采取实际行动对新闻媒介进行审查或对记者活动实行限定，对于“我国所认为的审查制度”，教科文组织可以不屑一顾。迪马利还说，这种做法等于投票否定美国传播媒介中的免费节目的做法和首都各处的电话使用，以迫使他们负责而客观地进行。报道尽管迪马利唱反调，最后还是以372票支持众议院通过了比尔德修正案，持反对票的只有九人。

芬威克提出第二修正案，吁请总统里根组织一支长期力量研究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情况。她论述说，美国留在教科文组织更可取，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但美国也应当做好准备，因为也有可能“今后美国发挥不了那么巨大的作用”。芬威克描述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关于新闻思想分歧的问题时断言：

苏联以及世上其它许多国家认为新闻媒介是国家的一个工具，其职责是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稳定。他们不同于我国在第一修正案上所表白的信念：新闻媒介为人民而存在。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在新闻媒介作用上存在的差别，芬威克在上述的话中已归纳得不能再清楚了。对她或对参众两院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界的绝大部分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媒介是国家或共产党的工具。同时，对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和苏联新闻的大多数人来说，市场经济国家的新闻媒介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面对这截然不同的观点，任何人想在国际上就新闻媒介的作用达成某种一致，实在是不容易。事实上，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就新闻问题达成任何国际协定。即便达成某些协定，其措词不是含混不清就是笼统概括，各国可以根据各自情况擅自进行解释。

芬威克和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鲍勃·沙曼斯基提出的第二修正案，由众议院口头表决通过，参议院正式通过，最后与比尔德第一修正案一起定为法律。至于教科文组织是否有能力实施道德守则或限制措施则属另一码事儿。美国大力反对联合国机构所

通过的提议、协定或条文。其实，苏联以及苏美两国的大多数盟友同样持反对态度，只有法国是明显的例外，法国历来喜欢提出并迅速采纳理应如此的原则宣言。一般来说，唯有进步中国家要求重写国际法，一旦政府间组织采纳，各国皆须遵守。联合国以及它的分支机构本身不享有执行其原则或规章的权力。由此，美国参众两院的讨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对美国人来讲，象征性的行动已有悠久光荣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士顿茶党案"。[①] 拒绝参加1980年奥运会也是这一传统的反映。所有这些象征行为不是为了高举红旗就是为了提出警告。议员们一致认为美国要求撤回教科文组织中的捐款对该组织的成员国是个威胁，有助于避免他们采取美国不同意接受的任何行动。

1982年11月，教科文组织代表通过了一项针对该组织管辖之下的13个领域的五年计划。同以往一样，引起新闻媒介注意的还是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这个领域；其它领域好象没有引起什么报刊提及，至少美国如此。许多进步中国家极力要求采取措施限制四大通迅社的权力和跨国公司的介入；美国和它的盟友继续提倡新闻自由流通的原则，并表示对教科文组织可能阻止新闻媒介和跨国公司的自由运动而感到忧心忡忡。苏联则指责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换言之，在教科文组织内部掀起的激烈争辩中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情况，除了一点事实，即尽管美国国会施加压力，但美国仍然尚未采取实际行动退出教科文组织。

1981年在巴黎召开了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首届会议，之后开始了会议的讨论。理事会分别又于1982年1月在墨西哥和1982年11月在巴黎碰头会面；他们打算在80年代保持经常联系（尽管筹措基金活动遭到政治分歧的阻碍）。限制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基金意味着削弱援助进步中国家的能力，而进步中国家需要这种援

① 波士顿茶党案(1773.12.16)，美国独立战争前，波士顿居民为了反对英国国会所通过的征收高额茶税的条例，将英船装载的茶叶倾入海内，又称"波士顿倾茶事件"。——译注

助来赶超工业化国家并纠正传播领域中存在的不均衡状态。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战场，而不是提供援助的真正合理的机构。其实美国的态度很明显，他希望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从教科文组织内脱离出来。美国想进行的这种调整没有在麦克布赖德委员会内得到赞同。委员会不顾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代表的反对意见，通过了它的82点建议中的78点，决定在教科文组织系统内设立"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其宗旨是动员工业化国家主要通过多边关系直接提供资助发展并加强传播媒介的基本设施的建设；改善通迅社、报刊、影视、广播的新闻传递制度；培训新闻工作者和传播规划者；转让技术，即新闻传播设备和卫星及数据库。

1980年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对于政府和私人财业给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捐赠资金应该存入捐款箱呢还是只限于把这批捐款用于捐赠者的个别目的。美国想强调它的捐款应该只用于帮助美国认为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国际发展总署"研究发展部主任克利福德·H·布洛克说，美国政府出资赞助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结果可能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吵，这"实在是无法接收"。所以，任何推进这类计划的做法都会使美国感到害怕支持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布洛克认为，双方提供资金是摆脱僵局的途径，"美国的拨款只能用来发展那些一贯认为新闻自由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国家"。

第二届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议在亚卡布鲁哥市[①]召开，会议结束时达成一项折中方案，该组织排除了没有财源的可能性。这句话虽然并没有得到某些进步中国家的同意，但还是推动了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避免了美国可能退席的做法。折中方案通过之后，美国首次拿出一批10万美金的捐款，这批款是通过国际发展总署的发展传播领域中的专家咨询服务的形

---

① 亚卡布鲁哥市，墨西哥西南部一城市。——译注

式拨出的。

在代表们离开亚卡布鲁哥城市的时候，尽管他们对目前“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捐款基金有限感到深深的遗憾，但从总体面貌来判断，他们对合作气氛还是感到高兴的。布洛克认为，这次会议是各国在意识形态中故作“友好姿态。”他发现代表们在讨论问题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他们的确表示要介绍由墨西哥代表提出的“社会参与”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秘鲁贝拉斯科实验运动的反映，而社会参与的思想必然会导致布洛克所说的“意识形态里的争吵”。

并不是布洛克一人发现代表们在讨论时紧张气氛大大缓和，合作愿望普遍增强。教科文组织内的官员对会议的评价也是如此，并希望通过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活动，国际合作精神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亚卡布鲁哥会议结束之后的七个月便颁布了比尔德修正案，一些进步中国家的代表也不曾放弃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组织通过多边计划开展工作的努力。他们认为，只有当该计划是多边关系时，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才是真正意义上一项国际计划，而不是工业化国家玩弄意识形态里的花招，以提供资助来巩固它们的强权。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流新闻学学者，芬兰的卡尔利·诺登斯特林，觉得美国及其一些盟友拒绝给一个多边援助计划提供捐款不值得大惊小怪，他说：“凭什么他们要掏钱去听那些不合他们口味的音乐呢？”

关于这点，还是“自由社团”的列奥那多·苏斯曼说得明白。他提议美国和其盟友在“新闻情报组织”——资本主义国家支持“新闻自由”的一个非正式组织——中公开直截了当地声明，他们所提出的传播技术援助只针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即它们“必须从根本上接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闻流通自由的思想”。与此同时，当时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委内瑞拉的乔斯·梅奥勃里拒绝接收工业化国家的“家长式劝告”。光靠金钱和技术援助的馈赠是不够的，他说：“我们不愿以高价购买所有那些你们扔掉的过了

时的烂技术，使我们成为这些烂货的仓库”。此外，他还指出进步中国家不愿别人把它们归类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他说：“我们真切想得到的是建立在平等、公正基础之上的坦城、明智和相互尊重的合作”。

在亚卡布鲁哥会议期间，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审议了数以百计的方案。得到最广泛支持的、捐款基金最多的要数地方通讯社和地方广播电视组织机关，这些部门一旦资金充足，人力雄厚，就很可能有朝一日与四大通讯社和塔斯社抗衡。真正答应作出担保还有很大距离，不过，这才刚刚起步。代表们一致同意拨给“泛非新闻社”10万美元；阿拉伯传播规划交流计划5.6万美元；亚太新闻联播网8万美元；加勒比海地区发展广播事业，培训和交流计划4.5万美元；拉丁美洲专题新闻社7万美元。基金总额约有91万美元，但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宣布可以保证募捐基金340万美元。

在1982年10月召开的巴黎会议上，总款额一下高达190万美元；根据提交上来的要求来看，这批数字并不算很可观。因为要求总数是820万美元，这也就算不了什么。譬如说，孟加拉国需要18万美元筹建一座304瓦的发射台使边远村民能接收到无线电广播；国际传播发展计划标准的在新基金74.9万美元中抽出1.5万美元的要求在巴黎得到了批准，这批基金同以往一样主要用于地方通讯社。再如，泛非新闻社另外又得到10万美元。其它新闻机构也同样接收一批可观的款额。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基金首次批准纯粹属于国家的计划，孟加拉国筹建发射台便是一例。共有38项计划得到基金，其中15项是国家项目。剩余基金一律归入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的专用帐户里，用来保护私人财业的捐款和双边援助，后者经常带有政治色彩。特别基金总额已有800万美元。目前很清楚，美国作好准备“留在教科文组织，捐助资金增加到45万美元，其中新增加的35万美元要求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用于允许美国某些直接控制的特别计划”。代表威廉·G·哈雷说，美国新增加的捐赠

资金表明"美国在国际传播发展计划近来工作的鼓舞下，真诚相信该计划的潜在作用，对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继续表示信任"。

人们对于国际传播发展计划和教科文组织的今后发展前景还感到很难预料。姆巴尔承认这两个组织面临的任务重大，不过他还是持乐观态度，说今后措施可以放在以下两个方面：（1）使最贫穷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听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声音，同时也让别国听到他们的声音"，（2）"使社会能够更好地控制和推动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姆巴尔话音刚落，由六位著名的外交事务专家组成的美国小组提问，美国是否应该考虑通过"别的机构或组织"进行活动，而非教科文组织。这批专家中有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赛勒斯·万斯和爱德蒙德·马斯基，他们表示美国愿意留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但指出美国的情况都摆在那儿了，如果工作没做好，美国将考虑撤回教科文组织的基金或直接退出该组织。

看来，人们经常认为争论问题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方面，其实究其根源，争论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

第十章

新闻媒介的内容与财源的关系

新闻工作者的自治范围

新闻媒介信仰体系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金钱的忽视。古代神话把新闻媒介比作雅典娜，生来奇才异能、超尘拔俗。报刊四种理论的作者对新闻媒介筹措资金问题只是偶尔言及，对赢利则只字未提。在哈钦斯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金钱被视作不详的乌云，威胁着新闻媒介，使它背离人民对它要求的职责，而这些人民或许代表宙斯的意志。好些新闻从业人员鄙视钱财的傲慢态度更让人惊诧不已。事实上，他们留心自己的收入和开销，同时也注意到出版和传播的费用，但就是不怎么关心具体财务与他们发出的新闻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许这些新闻工作者毕生致力于细致观察的工作之中，对自己职业的实际情况则一无所知、麻木不仁。广告商时常遭到白眼，新闻编辑室不欢迎这类人，记者或编辑宁愿得意洋洋地锒铛入狱，也不允许自己的新闻判断力受到广告商之流的粗俗的影响。如此牺牲自己，他心甘情愿、在所不惜。然而，一旦越过了现实的表象，他就不情愿了，或者他不允许自己这样干——因为他害怕，在那超越的阴影里存在着某种事实：它的出现必然会摧毁那种令人鼓舞的新闻独立之信念。

美国新闻工作者的生活面貌至少是这种情况，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在不同程度上基本如此。关于新闻媒介资金财源问题，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比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同行更不予以重视。在苏联，代表宙斯意志的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假如苏联新闻工作者受到外界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不会来自于商业广告的卖主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官员。也可以说，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的盟友）的新闻神话都认为压力来自于要求协调的政治家们而非商业利益。

换个角度看，那个现实就是指新闻媒介的内容直接关系到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来源者的利益。新闻媒介好比吹笛手，而给吹笛手乐曲定调的是那些付钱给吹笛手的人。既便付钱的主子身份不清，情况也是这样，实际上，"付钱主子"的目的在于控制事物的局面，因为把握住局面有助于维持新闻独立的信念。吹笛手与其"付钱主子"的关系不外乎四种形式：官方形式、商业形式、利益关系形式和非正式形式。这四种关系通常是混合交叠出现的，没有纯粹单独一种关系。当然，排除某些例外。不管怎样，这四种形式十分清楚。在官方形式里，报刊，电视广播内容是由规定、条例和法令决定的。有些新闻媒介可能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有些可能受政府规定支配，还有些可能被一整套限制措施所操纵。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官方控制，所不同的则是来自于准许范围内的自治程度的差异。在商业形式中，新闻媒介内容反映广告商及其商业伙伴的思想观点，这些人常常本身就是新闻媒介的所有者和出版商。甚至在计划经济中，一些商业影响仍然有所表现（尽管这种影响只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产生）。在利益关系形式里，新闻媒介的内容反映金融企业、或政党、或宗教团体、或追求特殊目标的其它各类组织的利益。在非正式形式中，新闻媒介的内容则以反映亲朋好友的利益为目的，他们或者直接提供资金，或者运用他们的影响来确保人们能聆听到吹笛手演奏的乐曲。

强给新闻媒介分门别类（实际上编入某国制度）是在犯严重

的错误。“自由社团”和别的组织将一国新闻媒介划为自由的，另一国新闻媒介定为受控的，这种简单划分连他们自己都深感疑惑。可以肯定，我们能够摆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观点，即新闻媒介，好比说是在美国，比在苏联、或印度尼西亚、或巴西享有更大的自治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纯粹是政治上的自治，而没有把经济自治，或文化自治问题考虑进去。此外，以上那种划分法造成了这么一种假象，好象每个国家的新闻媒介都是铁板一块。其实，各国内的报刊杂志情况不一。出版物之间的政治自治程度上也存在差别。如看一眼莫斯科《文学报》的内容，我们就能断定它的政治自由程度比《消息报》高一些。同时，翻阅一下《民族》杂志，我们也能判断它的政治自治程度——至少就抨击政治制度的允许范围而言——要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来得高。错误在于他们把政治自治程度与自由等同起来了。

没有哪份报刊杂志或哪家广播电台能够逾越其“付钱主子”所认可的自治范围。必须记住的是，这些界限并不是用大石块砌起的那样难于移动。实际上，这些界限柔韧灵活，它们时过境迁，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用来测分大小强弱的尺度总有误差，因为给尺标统一刻度时就存在偏差。因此，我们力所能及也只能从程度上入手来考虑问题。比方说，我们可以较自信地肯定一国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其经济力量的结构，而该国的新闻媒介在任何时候也必然反映经济管理者的目的。那些目的可能公开声明，也有可能密而不宣。如果目的公开，那么该国新闻媒介就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官方的层层控制。而一旦目的不露，那么新闻媒介不是受到来自于商业渠道的操纵就是受到非正式措施的摆布。以上情况表明，这些利益集团，不管是支持权力目的还是反对那些目的，总是利用新闻媒介为各自的不同需要服务。

在苏联，“付钱主子”的身份一目了然，是共产党作出使用经费的最后决定。在苏联，谁都毫无疑虑地认为其报刊杂志、电视

广播必须在党所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苏联阵营的新闻系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客观”地反映有助于社会目标的情况。如果反映相反的情况，就是符合反动派的利益，因而绝不能容忍。这类情况表明，吹笛手服务于付钱主子的目的，他的乐曲是由付钱主子的利益定调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闻院校里，教师往往不提新闻媒介的财源问题，学生只知道资本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是为他们“付钱主子”的利益服务的。苏联教育认为，公正和平衡只是虚装门面而已，客观性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大旗下才可能达到。

有趣的是，有关苏联新闻媒介财政统计数据很难——也绝非不能——找到。人们对于苏联经营新闻出版体制的费用问题一无所知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拿苏联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来说，报上的通篇大论古怪逆耳，据苏联官方人士透露，《真理报》是一份营利巨大的报纸。《真理报》发行量达1100万，每份售价三戈比，等于五美分。苏联官员说，实际上六个版面的一份报纸还不到一个戈比，除了仅给 200 名工作人员发放薪金外，预订报纸所得的收入大大超过出版该报的成本费。根据苏联自己的统计，发行量超过一万份的报纸便可赢利。苏联官员说，为了保持收入平衡，发行量大而利润高的报纸必须拿出部分收入补贴最小的报纸。由于广播电视是由公职人员经营，所以这个行业完全依靠财政资助，而报刊杂志则没有列入国家企业。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财政帐目遗漏了所有的置产费用（即基本建设费用），设备费用根本没有统计进去；还有报社办公楼的费用以及设备和办公楼的维修费用，甚至发行的成本费都算在其它帐目里边。如果按这种标准计算，恐怕世界上任何一种报纸都可以赢利了。

苏联的会计制度不是特为报纸而制订的。苏联的预算计划中根本就不包括基建费用。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严格地进行分类；工作单位互不沟通，只与上级领导交流。正因为这个原因，难怪苏联的好些建筑楼造了一半就长期搁在一边，有的则停工达数年之久。漆墙工完成漆墙任务后便跑去另一个工地工作，把高高

的吊车留在原地，等待另一个主要部门负责的石工和木匠收拾。所以，要想了解办一份报纸的费用或建一栋楼的成本是何乎其难呵。不管生产报纸的成本怎样，有一点人们可以肯定，当这些报纸出现在大街小巷时，报社领导和克里姆林宫的上级（他们随便在什么预算项目中垫去了基建投资的费用）对报纸内容总是高兴满意的。

然而，在苏联并非只有共产党才是报刊的"付钱主子"。跟《真理报》发行量不相上下的《消息报》是由部长会议筹措资金的。《劳动报》①是由部队出版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办报资金是由军方提供的。《文学报》的财源是由文化组织负责的。在整个苏联，各种利益集团与那些在报纸版面上吹演乐曲的吹笛手的财政家同样突出。在苏联这个实行全面控制的社会里，"付钱主子"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不过，人们还是可以凭想象知道这些人总是假公济私，从他们所处的地位那儿捞上一把，当然主要是在权力上获得好处，金钱利益偶尔也有。从这方面看，他们是在为某种商业投机提供资金。这里头显然掺杂着众多非正式的做法。譬如党的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长期以来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要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存在着吹笛手和付钱主子之间关系的各类形式。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只是着重点有所不同。苏联的关系最主要是以官方形式出现，而在美国，最突出的则是商业形式。当然也有某些例外情况——部分持反对意见不太过分的报刊仍然存在，只是资金和权力有限——但美国新闻媒介的"付钱主子"的两眼紧盯着利润不放，利润多少取决于商业广告收入情况。在苏联，要想发现它出一份报纸的成本费用实在是困难重重，无从下手。欲知利润率如何更是绝无可能的，只能凭推测获得一些情况。

---

① 《劳动报》原文有误，应该是《红星报》。——译注

有利可图的销售途径

在美国的一般报纸上，广告差不多要占去版面的60%，广告收入的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1981年，报业从广告上获得的收入增长到近175亿美元，比二战结束时增长了1508%。而同时期的国民总产值只上升了1403%。对新闻媒介进行投资是一个赚大钱的行当，这一说法已经是广为人们接受的至理名言。甚至一旦赢利下降，报纸或广播电台也可以转卖给那些在新闻广播事业中不断增多、蒸蒸日上的联合企业或混合型企业而照样有利可图。虽然，赢利是工业的目的，但是它代表的常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常见的“殷实富足”短语是赢利的委婉说法，因为它似乎听起来更有利他主义的味道而不象赢利那样只意味着赚钱。“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对以上这种情况作了一个总结：

如今的报纸同往常一样，在我们未来道路的形成过程中将发挥至关重要而又必不可缺的作用。报纸通过报道，揭示、调查、编辑——认真负责地使人们获悉外界动态，并将这些发生的事态用文字转换成富有意义，通俗易懂的表述。报纸可以用来充当政府的监督者、混沌世界的照明灯、商品及服务情况的市场发言人、提供娱乐消息的介绍人、重大事件和不可预测事物的旗手、符合大众趣味的常识传播发源地。为了发挥好以上这些作用，新闻人员必须保持一套强大而独立自由的法则——不仅能够保证他们自由而公开地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而且能够保证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要想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就必须从广告商那里吸收大量的钱财。这样，出版者和广告商的根本利益就在于有一个正当而有利可图的报业——正如他们有一个可以赢利的电视业一样。虽然找不到现存的具体数字，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电视和报纸的利润率要大大超出整个工业的利润率，一些行家认为，要

高出两倍之多。根据保守的数字估计，报纸和电视每年在扣税前的利润率高达20%有余。美国的日报总共约有1700家，相比之下电视台只有800家。即便如此，电视的广告收入却不亚于报纸。据统计，1981年报纸的广告收入占广告总收入的28.4%，电视占20.6%。单单三大电视网就占去了广告总收入的9%。无线电行业占6.9%，杂志占5.8%。据工业部门计算，1970年至1982年期间用于电视上的商业费用增长了230%。1982年，电视网播放了不下22万个广告节目，其中最大的广告客商"代理人与冒险公司"用于电视广告的花费达5.77亿美元之多。众所周知，15家最大的电视广告客户花了近30亿美元购买广告时间，比前年增加了14%以上。电视广告总收入达122亿美元。尽管高利率和销售下跌导致企业的普遍衰退，然而92%的电子媒介大公司收入上升，其中4/5公司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其生活费用指数的增长率。广告商的利益与印刷业和广播媒介拥有者的利益不谋而合。因此，凡有益于发展这个制度的目标和价值观使之两全其美、双双得利的东西，就是正当良好的，相反，凡给该制度带来危险的即为不可取的。这条简单道理是商业性传播媒介体系和它的意识形态两者结构的突出表现。

如果说苏联新闻媒介的内容反映官方目标和价值的话，那么美国则反映商业目标和价值。这两种情况都无须审查制度。对根本目标和价值发出挑战的情况极其罕见。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新闻工作者所处的教育制度使他们本身接受了这些目标和价值观念。第二，在雇用过程中就几乎根除了所有那些潜在的挑战分子。第三，那些叛逆者即便闯进了前二道关口，最终也会由于朋友的影响或自己本身的升官欲而被迫变得稳稳当当。好差使和晋升的机会往往属于那些最少惹是生非的人。部分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通过以上三个过程之后便会忍受什么新闻媒介"真正独立"的说法。其他一部分人，据有关数字证明，则打消了抗争的锐气，改行从事别的职业。

美国、苏联以及各国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是虔诚的信仰者。假如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或是社会主义体系教育下的产物，他们总是赞成并推广他们所学到的观念体系。但一旦他们来自进步中世界，他们就很有可能持不同意见，要求思想自由而且还有可能支持从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那儿学来的一套观念体系。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在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外来先进的教育制度之间经常不断地经历着矛盾和冲突。他们身处进退维谷之境，所以更倾向于探求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此外，在进步中世界流动性较强的办公处里的同事压力没有比在工业化国家新闻编辑室里的同事压力来得持久不变。在新兴民族国家中，非正式的和利益关系形式比官方或商业形式更普遍。

进步中世界革命时期开始的标志是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投身于推翻殖民统治的集团掌握了最有力的武器——新闻媒介。尤其是非洲的新闻媒介，当时是团结革命者起来斗争的强大力量。处于这种形势下，非洲人仿效美国的模式，那时美洲殖民地报刊首先用来反抗英国的统治，其次积极支持起义。非洲革命者代表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报上所倾注的大量资金是为了达到其明确的目的：结束殖民统治，自己上台执政。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也会象秘鲁革命者一样，期望不再置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新闻媒介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然而，一旦这些领导人结束了充当“付钱主子”的角色，那么吹笛手也不再会吹演“付钱主子”所爱听的曲子了，于是对新闻媒介实施压制就不可避免。

除了压制以外，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还有另一条通道。这是一条远比压制更有实效的道路，因为各地新闻工作者无不敌视书报审查制度，违抗官方命令、假制来自商业势力的直接压力。因此，进步中世界的许多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运用非正式形式的方法上，依靠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不易探寻但效果非凡。这种方法就是在暗中拨给津贴。我们知道，这种运用津贴的做法，贯

穿于整个新闻史。在一般情况下，津贴相当于版业主利润与亏损之间的差额。本世纪70年代，当美国取消订阅杂志的特别优惠邮购价时，许多企业不是倒闭就是合并，于是杂志业的面貌便永久改观了。印刷津贴仍然是美国报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些指定发表官方消息的报纸可以肯定保证能得到一份广告收入，而没有受到指令的报纸则没有这笔收入。通常，津贴的实质被蒙上了伪装，如同报业主向来隐瞒其利润和亏损情况一样。

资本主义国家颁布的"公共披露法"迫使报业主绞尽脑汁掩盖他们的赢利情况，他们把一部分利润混入其它帐目，如新设备的再投资，何况越来越多的报业扩展到其它的经济活动领域，渗透到各类企业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家大报纸和电视网以及各报系不仅经营报纸和广播电视，而且还操办图书杂志、录像公司、录音、电缆电视、卫星、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甚至还搞一些汽车出租、消遣娱乐、风景游览和市场分析等项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度还经营了《纽约人》杂志。

直到二战后，绝大多数报纸企业还是属于家族所有权，因此，出版者坚决拒绝将他们的收支情况公布于众，认为尽管公众要求将政府和公司的财政活动情况公诸于民，但这与公众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随着竞争力的下降以及报系所有权的增强，大批报纸走向社会，开始在股票交易所抛售股券。其数目相当可观。据悉，报业所雇用的劳动力是43.2万人，为美国制造业中之最。还有资料表明，1981年六大报系的报纸发行量达1,800万份，占全国日发行量总数的30%。早在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对报刊所有权的集中曾表示较大的关注。到1981年，至少有160个报系活跃于报业。众所周知，混合型大企业拥有3/5的日报、4/5的电视台和1/3以上的广播电台。报系中已有好几家独占鳌头，雄踞美国新闻界。1981年，甘尼特报系是报界最大的业主，它拥有85种日报，22家周刊，7个电视台和13家广播电台，还掌

管了卢·哈里斯民意测验组织、卫星和电影制片单位。1982年的下半年，甘尼特报系雄心勃勃，制定了规模巨大的宏伟计划——创办全国日报，《今日美国报》，该报头版从华盛顿由卫星传播发送到全国15所印刷厂，到1981年9月30日，甘尼特报系的收入超过1650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约14%以上。报系和混合型大企业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改变发表不同观点的做法。事实上，新闻媒介一贯支持该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价值，并且反映"付钱主子"的思想意识。

谁都无从知道报纸确切的赢利情况到底如何，但有一点十分明白，就是美国报业至少在大城市间的竞争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不过，那些没有被竞争挤跨的报纸的情况却相当不错。市场分析家E·F·休顿认为，报纸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之一。比较一下美国报业与整个工业的情况是很受启发的。在1977年到1981年五年期间，工业赢利指数为100的话，报业赢利指数（扣除税收之后)就是167。1981年，出版《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公司股票纯利润为29.1%，居工业界之首；甘尼特报系21.5%，名列第二；《纽约时报》18.1%再次之。整个报业的股票纯利润为18.8%，而当时美国的工业正处在衰退期。

根据E·F·休顿的观点，报纸为最佳投资场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出售途径，"广告商从报纸那儿购买获得了其产品的潜在消费者。然后将其收入的70%—80%分给该报纸。"同时，这位市场分析家说，"读者因为在便利和价廉的报纸版面上获悉新闻、信息、广告且进行娱乐而付钱购买报纸。"休顿提醒人们说，在资本主义这个消费社会里，新的承办者已不会再来，因此应该准许报纸和广播电视上广告率稳步增加；这些报纸和广播电视由于发展成传播工具的联合企业而更具吸引力。休顿对报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对发行量为7.5万份的典型美国报纸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这种典型报纸的总收入达1900万美元，其中广告收入占1480万美元，占总收入的78%。发行收入400万美

元，占总收入的21％。报纸新闻制作费用仅200万美元，占总开支的11％。经营利润是450万美元，经营利润率为24％。据推测，这种典型报纸在牢固的地方性经济中运转，效果甚佳，因为那儿不存在地方报纸的竞争。至于为什么有些报纸分文不赚，没有盈余的势头，休顿指出主要是因为广告商愈来愈精明圆滑，他们认识到在两家互相竞争的报纸中做商业广告无利可图。在华盛顿，《华盛顿明星报》下午版于1981年停办，该报每日销售33.5万份以上。广告商根本不愿在《华盛顿明星报》或《华盛顿邮报》上午版上做广告以赢得同样的消费者。

报纸的生存与广告直接相关是美国报刊的特征，在进步中世界，这种类型并不常见。吹笛手与付钱主子通常是非正式形式的关系；家族和朋友的作用重大。唯有那些财资雄厚的人才有能力设法控制报纸的主要或全部资财，这类人必定有一批在政府部门中身居要职的亲朋至友。报纸所有者尽管手中持有本钱，但他们还是需要某种津贴使资金能够流动，这样他们自然就有求于他们的亲朋至友提供方便，其具体做法示意如下：

在某个北非国家，出版者甲的内兄弟是掌管金钱的财政部长。由于新闻纸的分配额由财政部决定，因而只要他的亲戚仍然在位，他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新闻纸。这样，他的报纸等于是替政府及其财政利益服务的一位非官方代言人，这一事实也就自然而然，无可置疑了。政府控制新闻的权力地位也因此无可否认。这种地位不仅能够保证内兄弟手下报纸发表令人满意的新闻报道，而且它也可以通过新闻纸的分配或勒扣把其他报主纳入自己的轨道或使其破产倒闭。由于这些交易无法归纳成文，公布于众，所以就无从检查。鉴于政府首脑不懂对新闻纸如何处置，因而一旦财政部长欲想篡位夺权，他就有可能利用他对新闻纸的控制权作为手段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而一举推翻其政府首脑。非正式关系做法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他始终在维护一个目的，即保证报纸和电视广播的内容不要与其“付钱主子”的许可范围背离过

远。这一必然的事实并不会使全体吹笛手感到蒙受羞辱，我们必须铭记，吹笛手与其付钱主子的利益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不必对他们施加压力。

虽然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友的报纸盈利甚丰，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办报缺少政府提供的津贴变得日益困难了。长期以来，瑞典政府直接支持其新闻出版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支持并不那么直接。在非洲，报纸的生存必须靠政府的津贴补助。在相对富裕的尼日利亚，估计每出一份拉各斯的《每日时报》（该国效益最佳的报纸）成本近达20个考宝（约合55美分）。为了不至于破产，该报必须得到每份报纸近5个考宝(约14美分)的政府津贴。尼日利亚其它报纸就需要更多的津贴了，大概每份报纸得要2奈拉（5美元多）的津贴。在尼日利亚，新闻自由只在官方存在，正如伊巴丹市的《简报》总经理西根·奥瑟巴评论的那样："你一旦申请政府津贴，你就得受到控制。"《简报》在80年代初期没有政府津贴，但逐渐亏损，最后只得投奔到利益集团求援。奥瑟巴指出，要给尼日利亚几百万人民提供足够的新闻和消息，该国还需40家报纸，然而，"任何人都会对如今创办一份报纸的主张感到疯狂愚蠢、不可思议。"也许有人会在这句话后面补充道："除非他能保证得到足够的津贴。"因为在70年代里不仅工资上升，而且原材料、墨水和新闻纸的成本也提高了一倍。

"信息社会"天下不安

把新闻媒介比作吹笛手的形象是再好不过了。这个比喻是由摩拉维亚教派牧师兼教育家约翰·艾英斯·科曼斯基在17世纪初，即报纸在欧洲刚出现不久后偶然想到的。科曼斯基或科曼纽斯（其笔名）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的著作在东欧和西方教育界以外并未得到关注。1956年，当教科文组织发觉科曼

纽斯的观点带有国际意义时，决定出版一本科曼纽斯著作选编并委托瑞士教育家琼•皮盖特为该书作序。有关科曼纽斯著作的完整译本相当罕见。如他的《世界迷宫》一书是最有影响的，英文版由孔特•罗佐翻译，1901年在伦敦出版。《迷宫》一书于1623年出版，当时身为校长和新教牧师的科曼纽斯年仅31，被反改革运动的罗马天主教势力革职流放。绝望之际，科曼纽斯四处寻觅职业，每每落空。《迷宫》有些类似班扬的《天路历程》①。科曼纽斯把书中的清教徒送往世界各地，去考查劳动者及其他们的劳作生活。书第22章里出现清教徒与新闻记者在一块的情景。孔特•罗佐看到当时新闻记者的原始状况之后，把这些记者叫"新闻人员"，而布拉格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胡达克则称之为"新闻工作者"。胡达克在翻译科曼纽斯的术语时用了英语吹笛手这个词语，而孔特•罗佐对于将这个关键词译成吹笛手还是吹哨手这个问题似乎感到困惑，当然其效果是一样的。

书中的那个清教徒不论走到何处，均发现新闻人员在城区的市场一带活动，他们忙于"吹出奇怪的笛声"，使它传入旁观者耳中。一旦笛声悦耳动听，听众就会欢呼雀跃，一旦声音凄楚悲哀，听众就跟着伤心悲恸。吹笛手的曲子是从科曼纽斯称之为叫卖商那儿买来的；科曼纽斯没有告诉我们叫卖者的具体情况，但从获利的观点上看，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叫卖商就是三个半世纪后我们所指的付钱主子。科曼纽斯对这一现象很感兴趣，即吹笛手的笛声竟然能使旁听者时而欣喜若狂、心花怒放，时而又肝肠寸断、缠绵悱恻，似乎"人们任凭一股股阵风的欺骗"。这位17世纪的捷克作家几乎没有预感到世界上新闻工作的真正情况。新闻记者是一个危险的行当。那位清教徒四处观察，发现新闻人员总有罪名背在身上，那些没有听清笛声的旁听者的非难尤其之多。"现在我明白了……没有谁吹演这些曲调是太平无事的。由于曲调对每个

① 《天路历程》系17世纪英国作家班扬讽刺贵族阶级的寓言作品。——译注

个的感受各异，因而免不了产生争执和扭打，清教徒最后认为，扭打结果，牺牲者往往是新闻人员本身。许多作家，包括莎士比亚，都曾经提醒人们注意那些传播不受欢迎的新闻记者之危险。这种情况同样使麦克布赖德感到懊丧。

付钱主子对他认为不适当的行为的容忍必然是有限的。正如把康格里夫的《以爱还爱》一书译成英语时运用了酬劳吹笛手这个比喻的桑普森·莱金德公爵的容忍程度一样。桑普森公爵说，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一家之主，一切听命于他，一旦其子违抗他的愿望或行为他就不给儿子供钱，以示回报。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既使儿子无法无天，他也会想到我是供钱养他的主子。"这就是1695年付钱主子一词出现的雏型，违抗命令将遭到惩罚的做法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仍旧没有好转。尽管事实上吹笛手和付钱主子的形象已大为改观，但情况依旧那样，遗习犹存。如今，吹笛手不再为单个付钱主子效劳了。就新闻记者来说，其雇主很可能就是辛迪加或混合大企业。

革命一词到处运用，太频繁就很可能会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总之，该词不是报象18世纪结束时的法国革命那般殊死的血腥场面，或象1917年俄国革命无情破坏的那种情景。如果沿用T·S·爱略特①的革命定义，即破坏与创新的话，那么当今革命这个词的运用没有几个可以得到公认。为了给科技革命（指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冲击）找个恰当的名词，作家们找出了一大堆革命的词儿。当代社会"主要的创新技术是指微电子、电脑制图、语言合成和声音辨析，数据库管理、数据编码、卫星电视，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革命的其它分支，有时人们将之称为电信革命或信息革命，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王国。

① 爱略特(1888.9.29—1965.1.4)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二战期间发表的《四个四重奏》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确立了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地位。其主要诗歌作品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等。——译注

对于科技发展存在乐观与悲观两种极端的看法，这往往引起人们的嘲弄；当然，随着计算机和微型化设备的增加，有关天堂和地狱的预言家也成倍剧增。这里，摆在我们面前具有意义的问题是：当代技术对新闻媒介的冲击情况，即随着电脑化的继续发展，怎样管理新闻媒介的财务以及怎样改变新闻媒介的内容与形式。毫无疑问，新闻媒介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报纸可以通过电脑传送到家庭。英国最先发明"电视文学广播"系统，人们可以通过在家中的电脑上按一系列键盘来选择自己愿意阅读的材料。传送新闻和广播的其它系统也得到了发展，不仅在工业化国家而且在进步中世界得到运用。发展和销售这类系统耗资巨大，唯独最有财力和势力的国际联合企业方能相互竞争。"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高级官员J·N·佩尔顿预言，在今后的十至十五年间，单单美国的公司在发展电脑和电信技术和设备领域就将投资10000亿美元以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加起来也将倾注10000亿美元以上。这样一来，再没有一个公司会完全在国内进行经营、运转。新的付钱主子已经出现，那就是跨国公司——其势力在信息领域不断扩张。只有诸和苏联那样完全计划经济的政府才能竭力与跨国公司开展竞争。

我们对跨国公司的认识影响了我们关于跨国公司对新闻内容和传播以及全球广告方面的冲击情况的态度。对某些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是冷酷而非人道的最大限度地谋利的工具，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跨国公司祛除了本国自大与陈见，是争取国际间一致的力量。以上两种作用可能兼而有之。至于它们何以影响人类，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但跨国公司的存在并将增强它的势力和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当今，一批跨国公司早已对它们的势力及影响情况进行了研究和调整——姑且不说控制。

计算机和微型技术迅猛发展的铁一般事实标志着信息工业的诞生。该工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公司专门生产新闻媒介的硬件和软件，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

司、施乐公司、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有这些公司不论在财政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与美国的各大广播电视台、报纸和通讯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句话，在这个“信息社会”里，给新闻业付款的那些公司的威力和势力已经得到显著的增加。同时，那些付钱主子的经济力量也有极大的增长。对此，进步中世界不断地抱怨说，那些主要的新闻媒介——即组成世界新闻媒介的通讯社、电视网和一批报纸，首要的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他们不仅维护文化帝国主义，而且通过国际新闻体系加强了歪曲和抱有偏见的报道。进步中国家进一步指出，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为信息跨国公司和它们的合伙企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这样，他们以进步中世界作为代价来提高自己的利润。新闻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达到这些目的情愿或不情愿的工具。

德国社会学家菲迪南·汤尼斯似乎眼力超群，他能预见国际信息社会的发展前景。早在1922年，他就在书中言之有据地推论：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世界——或者至少控制了世界的舆论。汤尼斯同当时一批美国社会学家一样，担心一旦报纸全部落到资本家手中，那么公众利益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略。然而，他还是相当乐观地预言新闻媒介终将作为一支自由的力量出现。他在书中解释说，“这是因为新闻的本质是国际性的，所以它的最终目的必定是消除多元化国家，代之以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汤尼斯笔下所指的世界市场是由“思想家、学者和作家所统治的，它将消除高压统治而不是仅仅免除精神压力的手段。”那时候，新闻媒介将引导世界避开封闭拒外的社会，走向一个没有疆域的全球社会。处于那种社会制度下的权力将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家长制的或仅仅国家性的。以汤尼斯之见，新闻媒介是舆论的工具，而舆论是一种信念，其特点带有宗教色彩；一般情况下，它不能容忍任何人的道德戒律。因此，唯有新闻媒介的财政

受发行量决定，摆脱广告和任何"付钱主子"的控制，它才能指望不受宣传和精神压力的左右。这样看来，跨国公司对新闻媒介进行控制的情形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担忧。

新闻媒介只能反映全世界信息的一小部分。对世上问题能提供无穷信息的是数据库——即储藏信息的计算机记忆库。数据库可以存放储存过的历史事件或数学公式；可以存放工业的机密情报或男女的私情记录；也可以存放人口普查信息或军事秘密。计算机能够在顷刻间将这些信息传映给人们。这些信息既可以保密，也可以让同事们享用，或直接公布于众。跨国公司几乎从来不让新闻媒介享用信息，不过，他们倒很注意报刊上写些什么内容，广播电视播些什么东西。因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和财政上的后台老板十分清楚，能限制其公司自由经营的潜在力量是国家政府。那些政府的领导对新闻媒介的报道内容十分注意。所以，新闻媒介的内容安排对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的根本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这种关系，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便举足轻重。即便国际组织没有军队，但他们有能力唤起民众，以此来影响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

在这场争权夺利的角逐中，新闻媒介的作用非同小可，似有一言九鼎之力。当财政风险渐渐增大，众多的"付钱主子"不断减少时，新闻媒介思想内容的安排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混合型大企业和集团所有者作为新闻媒介的业主正在取代单一企业主和家族公司（尽管跨国公司从那些曾经控制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家族公司和合伙企业那里篡取了财力）。对于新闻业主和那些用广告支撑新闻业财政的工商企业来说，维持现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来是攸关大局的。对于那些无知名度的跨国公司的经理而言，社会安定就更为关键。他们的利益再也无法忍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他们的竞争方式是相互的，与信仰国家的金融界没有关系。大众汽车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之间再也不愿彼此竞争；它们共同关心的是汽车工业的生死存亡。正如汤尼斯所预言的，要求建立

一个全球市场必定要产生一个国际新闻界，以便宣传跨国公司繁荣昌盛的社会秩序。

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本身的发展特点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在不同国家里，报系中早已出现不同的报业集团。大型通讯社在世界大多地方设有附属机构，它们早已成为全球性的实体。电视在一国播放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如今以多种语言进行播放的电视联播节目正在逐渐增多。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权力与差异削弱衰退的世界里，广告商、新闻业主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利益愈加相互接近，紧密相联。众所周知，新闻媒介与电信和信息工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进步中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新闻学者本来未担心技术和工业权力的集中，现在也常常提及这些联系，并要求制定国际条例，采取某些措施。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讨论也必须从这一方面进行审视，人们担心的不仅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有思想控制和某种强求统一的精神压力。60年前汤尼斯就预见了思想控制和精神压力，当今学者如赫伯特·席勒，杰里米·滕斯托尔，切斯·哈梅林克和卡里·诺登斯特伦也看到了这点。

席勒担心的是，技术进步使美国电视节目通过卫星进行直播成为可能；因此，他说，解释“国际传播文化界中存在的焦虑”就很有理由了。他指出，这是因为美国是引起“全球传播污染的主要来源”，因而招致世界别国的仇恨。这类批评在涉及传播和信息方面的国际论坛上占据了好几个年头。在教科文组织和其它国际论坛上出言最辛辣刻薄的一直是冲向美国的电视节目。

通信跨国公司真正的担心是这种批评可能会引起制定一套限制他们活动自由的法规。早在1972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以激烈的语调高声反对教科文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关于通过认可卫星转播可愈越国界的国际协定的提案。福朗克·斯坦顿在一篇标题为“难道他们会阻止我们的卫星？”的文章里写道，达成那种协定是对美国宪法的破坏，对“思想自由流动基本原则”的干涉。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兴趣已不再仅仅围绕转播娱乐节目，而越来越对电脑转播发生兴趣。国际商业公司在1982年的一份出版物中对它的顾客说："利害攸关的是要保证重要人事信息、财务报告、技术说明书更换以及其它数据的流通，使之通过计算机线路进行储存并不断调整更新。这种信息一旦中断，将损失惨重。"

跨国公司的研究和促进公司认为，一些政府设置障碍反对"数据的自由和及时流通，"他们这么说是出于对保护隐私的真正关心，然而，进步中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一心想保护在计算机硬软件领域中新兴而敏感的地方工业，"这么做显然是与跨国公司作对。很清楚，某些国家采取限制数据流通的行为是跨国公司赢利的主要威胁。

安东尼·史密斯提示，由于计算困难，力图控制外界的数据流通很可能失败。他说，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十分可能自身灭亡，那些缺乏技术知识来保证信息跨国流通自治的国家尤其是这样。一旦信息能够跨越国界，在计算机之间自由流通，那么审查制度就找不到其立足之地。如史密斯所观察："对数据流通和信息不实行控制的国家自治这类事不会再出现了。"史密斯敏锐的观察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地位本身。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官员担心要求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有可能反而导致新闻传播的国有化。于是，美国成立了一些工业集团为防止对数据流通的限制施加压力。美国银行电信决策制定主任，高级官员B·C·伯吉斯曾言："事情很简单，如果我们无法使信息流通，我们便只能停业。"然而，1973年在瑞典的带领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各种法规对数据流通进行保护。西德、法国、丹麦和奥地利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其他许多国家也在努力之中。欧洲国家常常担心，如果数据流通不遭限制的话，美国跨国公司就会对其国外附属机构强行实施严厉的控制。法国数据处理和自由权委员会秘书长路易·乔伊纳一言中的，他说：

"信息就是力量，经济信息就是经济力量。" 1981年夏末，《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指明了新闻媒介在多元化社会中发表批评性和挑战性评论的范围。虽然，《华尔街日报》为跨国公司道·琼斯公司所有，但该文章中大部分内容对美国巨头进行尖锐的批评。不过，文章谨慎地反映了"双方观点"，包括信息自由交流必须反映思想美德的正统观点，它特别在报道中表示了要求对信息加税提议的敌视态度，如同对有形进出口加税表示反对一样。反映"双方观点"不会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正统观念代表统治者的意志。

世界信息流通中难解之谜是信息学，这个词出现在1974年，当时联合国大会成立了"政府间情报局"，总部设在罗马。不出十年，"政府间情报局"就成了活动最积极、潜在作用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该组织的信息学概念是指计算机，如同说天文学时指望远镜一样。简而言之，信息学是一门关于研究获取与处理信息等方面的学问，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学问，其目的是为信息管理创造切实可行的构造手段。从政府间情报局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来看，该组织显然站在进步中国家一边，帮助他们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并促使工业化国家在运用信息能力方面调整它与进步中世界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状况。实际上，该情报局在为"采取全球行动把信息学介绍到不发达国家方面"开展积极的活动。情报局指出，倘若没有这种互通有无，结果将混乱不堪。然而，如同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一样，政府间情报局对于工业化世界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方面所采取的小小努力绝不满意。

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理事会的负责人宣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纯洁无邪，并同意避开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而政府间情报局则在这点上只字未提，他们认为世界处于危境，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减少世上的不平等状况，国际间的和睦相处将遭到威胁。政府间情报局多次组织了人们踊跃参加的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信息战略和策略问题(称之"SPIN")，并呼吁采取国际行动保护进步中

世界反对未获准的信息传入其国家。计划于80年代后半期举行更多的会议，80年代是政府间情报局缩小工业化国家与进步中国家信息鸿沟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期。

除进步中国家在信息领域里表现得要求迫切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日本和法国在这场运动中讲话也极其直言不讳。法国人创立了一个世界中心，创始人、记者让一雅克·瑟楚一施赖伯说，世界中心将努力争取使信息学"服务于人类的资源发展"。日本宣布筹备第二个这样的中心。该中心的开幕式那天因法国总统福朗克斯·密特朗的出席而意义深远。1981年的11月份在巴黎举行"国际电力展览会"100周年纪念庆典，该活动大大推动了20世纪电力事业的发展。密特朗对参加这次重要活动的科学家和专家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将信息学变成"攻击个人、产生不安全、不平等、失业和压迫的祸根，"要么则成为"改变工作的固有性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我们制度的分权化和民主化的工具。在文化方面，信息学可能要么导致人类的全面异化，要么产生一个崭新天地，要么奴役人类，要么解放人类。密特朗认为信息学攸关世界发展的前程，他说：

那些在其历史上和本身制度上最有能耐的国家，想最终综合文化与科学，必须具备最佳机会克服今昔之间的困境。最后，每一个国家都有必要成为新技术发展和社会运用的中心。要做到这些，没有意志和行动便不行——靠机遇已成为历史。靠市场的法则也不足以协调一致地达到这种演进。只有对未来变化进行思考、组织和预测，希望才会来临。

奥斯陆信息学院主任克利斯顿·尼加德在回答密特朗的这一席话时表示，他对信息学的未来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他说，"芸芸众生独独被一些大企业的目的所吞湮。"尼加德希望，在巴黎成立的中心会有助于将信息学这门新学科"听命于追求个人幸福。"麻省理工学院信息系教授赛莫尔·帕派特赞赏该中心的成立，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根基于人类自我完善新发展的摇篮，成为社会发展的摇篮。"

包括传播学学者，如席勒在内的代表在巴黎举行的中心成立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关心的问题是，信息学应从数据库那里解放出来，信息学的对象不应该只是那些在新闻媒介传统渠道中传播的新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常常认为，他们痛惜跨国公司对电信息技术的控制，这些公司中最有势力的往往在美国设有自己的总部。他们同样对跨国公司的经营买卖技巧表示担心，并指出跨国公司的暴利使得他们能够向进步中国倾家销其计算机硬件。跨国公司通过支配机器工作所需的替换部件和软件，可以确保技术设备仅用于他们意识形态的目标，主要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保证最大限度地避开政府、国家、区域乃至国际间的控制进行自由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专家既不够重视新闻媒介的内容，又没有认识到新闻媒介的主要作用，而该作用攸关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存亡。与此同时，那些大众文化领域中的学者只顾集中研究电视节目播放的区区小事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忽视了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介报道新闻的重要性。当然，那些诸如“戴拉斯”和“三利公司”等节目展现了美国社会奇特（而非错误的）的面貌，这类节目很可能激起人们不切实际地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不过从总体来看，这些节目在宣扬美国目标和价值观方面，比起由新闻影片发射巨臂，维斯新闻影片社和合众国际社电视新闻部向世界各地转播的电视网新闻广播内容，意义上要欠缺一筹。

维护跨国电信公司的发展比那些通过军火交易牟取暴利的国有和“国家主义”的公司更符合人类的利益，这个论点令人折服。的确，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国际间暴力是该诅咒抛弃的，他们只有在国际和平环境中才能获取最大的利润，因为在国际和平的环境里个人的主要价值就是消费和过美好日子。然而，对于那些工业化程度很高并与跨国公司的目标和价值观休戚相关的社会，合作领域相当狭窄。计算机体系和电信技术的发展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其重要。在遥测技术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居世界领先地位。苏联大力发展空间技术清楚地说

明，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认识到在这个信息社会中抗衡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和重要意义所在。正因如此，国际场合中的讨论争辩自然在反对进步中世界利益的斗争中，愈加趋向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利益与市场经济国家利益的相互联系，用言简意赅的术语表达，就是"南北对峙。"

选择：闲言还是分析

预测未来并非本书的目的。作写此书用意在于审视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出问题。书的主题是新闻，以及它是如何被世界各地理解的。我们觉得新闻内容反映新闻媒介财源提供者的思想体系，并认为不管今后的新闻媒介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式，这种关系将继续到下个世纪。以上这些并不是预言，而是有关新闻性质的陈述。

请好好记住这一点，记者和编辑从来就不曾打住笔，停止反对他们所处的制度。只要没有逾越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持不同意见是允许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鼓励。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持不同意见和抗议社会长期以来均属于许可的行为——当然也不能过头到威胁其"付钱主子"利益的程度。连新闻媒介之间相互攻击对方是政府傀儡也还是可以的。例如，在法国，《世界报》多年来谴责《费加罗报》和其它右翼报纸是工业和商业的传声筒；在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也同样如此指责《世界报》。当然，恭维和责骂是"礼尚往来"的。在英国、美国甚至苏联，新闻媒介经常针对腐败堕落、法官错判、冷酷无情、效率低下等提出批评。主要日报和电视网记者揭露弊端和公布私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也没有比对政权的挑战成功更令新闻记者们感到欣慰了，甚至犹如唐·吉诃德在攻打风车时欣喜若狂一样。新闻学里蕴涵着这样的可能——即能带来变革并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和平的世界，正是这种可能激发了并将继续

激发起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的想象。然而，政治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大大地限制了这种可能性。为了满足新闻记者的意愿政府总有必要允许它的批评者有一定限度的成功。证据表明取得这种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多数新闻媒介中报道有关重大社会问题以及事件的新闻篇幅正在减少。

什么东西发展得如此之慢，慢到对公众几乎失去了吸引力的程度？那就是新闻媒介，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逐渐丧失其作为提供重大消息工具的特点。报业竞争的衰退现象到处可见，也到处引起人们的痛心。日报相互直接竞争的美国城市还不到5%。尽管电视台又开拓了一个竞争的空间，但在新闻报道方面，报纸和电视的竞争往往是蛊惑人心胜于真实可靠。没有哪位购买电视机只是为了看新闻报道，许多人买报主要目的也不在于仅仅阅读新闻。获悉新闻最迅速、最快、最便宜的工具仍然是收音机。将来家庭计算机可能会取代收音机。但是家庭计算机是否能象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那样发挥作用，短时期内还不太可能。

那些作用是什么呢？人们为何观看电视、阅读报纸？对这方面的问题已有不少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要，这并不奇怪。新闻显然只代表这些需要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报纸和电视节目就会将更多的篇幅用于新闻报道。毫无疑问，内容篇幅最大的还是广告。除广告外，报纸和电视上的文字和图片广泛涉及各类信息，新闻篇幅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多。电视屏幕上当然少不了凭想象创作的"节目"；收看电视酷似阅读一部图文并茂的小说。报纸上花样就更多了，么什漫画、体育、食谱，关于园艺、保健和桥牌等等的专栏，失恋者和集邮者信箱，股票市场行情以及道·琼斯索引。就新闻业而言，以上这些都不是新闻。然而所有这些内容迎合了"付钱主子"的口味，因为这些内容有助于买卖销售。

随着电视观众的增加以及单个报业主的减少，报刊杂志的内容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读者看到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普通人”以及“名人”之类的消息，而涉及政治、经济或社会意义重大的事件却不多见。闲言报道日渐增加，取代了新闻报道的地位。闲言碎语的报道比衬衣广告或星占术栏目更不会给社会带来麻烦。

以往西欧的报纸大抵是公开的党派喉舌或至少充当特定政治运动的辩护士，如今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首都以外的城市报纸越来越注意报道地方和本地感兴趣的问题，其结果是要吸引更多的广告商和读者。迄今为止，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要数街头刊物，如西德的《图片报》——斯普林格新闻帝国的主要出版物。《图片报》象英、法、意等国的同类报纸一样，没有号称自己在报道新闻。的确，这类报纸，如美国的《国民问询》，大量篇幅是有关名人隐私以及古怪案例的报道。即使报刊上内容不真实，对于读者来说也似乎无关紧要。的确，报纸这个词的词意延伸了，以上这些出版物也称得上报纸。传统的报刊注意到以上这类出版物的数量正在日渐增加，其发行量一直很高。意味深长的是，传统报刊正在步其后尘，仿效他们的做法，以取得成功。

正如传统报刊在美国曾发展了地下刊物，如今是想争取街头刊物。突出的是，当年卢斯的出版物严词责备街头刊物取得了成功，他办的《人民》杂志无论是广告还是发行量都较成功。甚至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报纸也着手开设有关名人的专栏。昔日在报刊上只占一席之地的闲言碎语，如今可能已成为报刊中最有价值的主题了。这个发展尤其令当局欣喜，因为他们担心新闻界中的吹笛手鼓吹不满情绪。大量篇幅用于闲言和琐事的新闻媒介对当局引起挑战的可能性比那些布满新闻的新闻媒介自然要小得多。

在新闻事业发展中，还有一个侧面值得一提。由于广播电视业的兴起，报纸面临着挑战，它们再也无法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消息，因此，在美国，报纸开始发挥不同于传统的作用了。他们发

表长篇大论，不讲究第一，也不讲究时效，而更深地涉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而言之，他们开始置自己长期信赖的客观性法则于不顾，撰写分析性和解释性报道，常常连篇累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正效法欧洲大报纸长期的做法；此外，他们就地下新闻业以及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所发的牢骚等问题进行解答。这种方法与街头刊物截然不同，它对政权是一大威胁。尼克松当局和维持现状者对新闻界进行尖锐攻击的做法一直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某些报纸和电视网重点转移，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偶尔揭露或发表引起轰动的文件，也会极大地触动权势者的利益。

不过，这种报道也仅仅代表那些从事分析新闻报刊广播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一些较小的地方新闻媒介，不管是报刊还是广播，满足于不揭丑闻、拼命赚钱。审查制度并不需要，自我审查就足以应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雇佣制度和来自同行的压力，确保了美国大多数新闻媒介推动这辆售货车向指定的高速公路驶去。

乔恩·尤德尔在一篇谈及新闻媒介在计算机世界中的前景的选编文章中，并没有认为传统报纸面临灭亡的危险。事实上，他预料到由于技术的发展，准许日报成为“一个愈加复杂而广泛运用的广告工具”，因此，广告商将怀以更大的热忱求助于报纸，通过分割印刷作业，他们为各种广告商达到各不相同的商业目标，这样就提高了商业广告的效益。就此，推出了不少革新，并得到实际运用，加强了报纸的经济生存能力。尤德尔认为，未来的报纸将更迅速地发表更多的新闻。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无法肯定的是更迅速地发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可能是有深度的分析性文章，也可能是名人轶事、闲言碎语，或者是广告。1980年“美国报纸出版者协会”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2/3的人说他们希望增加报纸广告；在所列出的几乎全部报纸的43种消息种类项目的测试中，“对广告的兴趣”列居第二位。

1981年在拉特格斯大学召开的关于2000年电信发展的一次研讨会上，到会的学者和工业界领导一致认为，"旧的传播媒介"不可能衰败或衰亡。相反，这些人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媒介获得了一次改变方向的机会，朝着"有助于世界新闻需要而不是世界新闻权力"的方向发展。朝这一方向发展就需要把重点从赢利那儿抛弃，而致力于同那些争取新闻平等国家进行合作。肯尼斯·爱德华兹以同样庄重的估计对电子新闻传递系统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观察。他说：

☆无须怀疑，电视文字广播将成为国际工具，在大部分西欧大地上用多种语言传递信息。一部分热情洋溢的人相信，通过这种大大改进的通讯工具，电视文字广播将为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他们认为，电视文字广播将是促进谅解与和平的工具。

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报告的希望也正是这样。这样的前景也同样是进步中世界新闻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有先见之明的话，恐怕这样的前景也反映在市场经济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思想体系之中。遗憾的是，只有千里眼借助X-光射线，才能洞察遮挡这一前景的昏暗、恐怖的乌云，这片乌云酝酿着冲突和对抗，人们可以在不远处听到不详的战鼓奏鸣曲。它不是在向谋求最大利润的呼声致意，就是充当历史命运的见证人。领导新闻队伍的将是新闻媒介的"付钱主子"。尽管列宁的回答也许显示出不足和凶兆，但这个问题如20世纪初困扰世界那样，迄今仍然令我们忧虑，那就是"从何着手"（或"怎么办"）？

第 四 篇

第十一章

新闻媒介的交响乐：分类体系

我们可以把新闻媒介的作用比作一部具有综合音响效果的交响乐的几个乐章，其中有许多不同主题、旋律和变奏。假如我们从全体社会、全体国家的角度对新闻媒介进行一番考察的话，我们不免会惊异地发现一个规律，即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的异同常常一样大。在一个相当真实的含义上，我们可以说世上的新闻媒介是一个单独的单位，犹如一首交响乐也是一个单独的单位只是由多种不同主题和旋律组成。交响乐并不要求和谐一致，实际上，它可以是任何音响的交织——充满各种不谐和音以及不谐和音调。也许我们还不习惯于说新闻媒介的交响乐，而倒觉得说新闻媒介的噪音更顺口些。然而，一首交响乐尽管充满不谐和音和不谐和音调，但总体上是统一和谐的。象瓦格纳风格的歌剧，其主旋律在整个结构中始终贯穿如一，全世界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新闻媒介中所统一的部分是它作为教育者作用时能够保持和谐一致。

在新闻媒介的这首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乐章，每一乐章包含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基本主题中又有不少变奏。我们可以给新闻媒介这首交响乐的三个乐章冠以各种不同的名称，但考虑到这一命名最终会确定我们对这些乐章的正确理解，因此当我们进行命名的时候，就很有必要缜密细致，来不得半点粗枝大叶。譬如说，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这种数字方式来划分命名，因为用数字表示人们心中往往有几分安宁和亲

切感。恰巧用数字表示这三个乐章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命名相吻合。或者我们也可以根据经济状况进行划分，如市场经济代表第一乐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世界分别代表第二、第三乐章。或许我们还可以用地理概念来命名，如西方乐章、东方乐章和南方乐章。如果我们想牵强地用一些评价性的术语施加于三个乐章的任何一个，我们就会明显感到困难加重；譬如民主的、自由的或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的等这类词容易妨碍正确的理解。甚至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引起麻烦的词，因为它毕竟一直用来表示第三帝国的强暴政权。事实上，革命这个词也同样如此，因为它既可以代表善行又可以指称邪恶。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分类法中，本人运用了多少加以修饰过的经济状况划分三个乐章，只是用进步中世界取代了发展中世界这个词。当我采用这些专门术语的时候，是完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乐章中各种旋律变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另外，还须铭记一点，尽管各乐章的名称所反映的是经济思想含义，但它们的主题绝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每一乐章包罗了新闻媒介所处环境的全部现实，包括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有(很值得一提的)心理的现实。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条件，进而把新闻媒介交响乐的乐章分别定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乐章和进步中世界乐章。

在所有这三个乐章中，新闻媒介都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教育人民使他们在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在这三个乐章中，教育目的迥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乐章中，教育人民是为帮助他们正确地投票选举，以此来捍卫社会秩序。在美国，人们对于把新闻媒介称为教育的提供者感到某种不安；人们习惯认为新闻媒介是信息的提供者。可是，信息这词儿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因为如果信息没有提高接受者的教育程度，它就毫无用处。除美国之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对信息与教育的区别不甚关注。美国反对教育作用的提法可能是出于教育作用容易使人联想

到宣传的味道，而美国人敌视宣传。因为据说苏联就把新闻媒介用于宣传的目的。

确实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乐章中，新闻媒介公开起着宣传工具的作用。宣传这个词的含义在这儿也同样模棱两可，因为马克思主义主旋律的主题是教育人民，是为了帮助他们正确地为人处事，以此来捍卫社会制度。列宁提出新闻媒介的三大作用，究其根源，无不是教育作用，正如马克思笔下新闻媒介的形象是冲破普鲁士的书报审查，成为教育人民认识现实的工具一样。

第三乐章在全部三个乐章中最公开、最直接地把新闻媒介当作教育的工具。发展中世界的新闻媒介模式既用来作为捍卫社会制度又用来作为教育人民改造社会制度(一旦必要的话）的工具。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给第三乐章的交响乐节奏带来了决定性的变革。第一、第二乐章中的教育旋律主要是静态的，是在保持社会现状，而到了第三乐章，其特点变得雄壮有力，力求变更。但是，新闻媒介作为教育工具的主题，统一了整个交响曲。虽然那些受僵化意识形态蒙蔽的人无法看到这部交响曲的总体统一，但是稍有头脑的观察者都能感觉到整体的统一谐和。这样一来，美国编辑就会放弃苏联新闻媒介是共产党宣传武器的主张，苏联编辑也同样会改变美国的新闻媒介是华尔街工具的说法，而苏美编辑都会放弃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介幼稚、狭窄、排外的观点，而发展中世界的编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可能嘲讽苏美两国新闻媒介是殖民剥削的工具。假如各国编辑都能承认各地的新闻媒介都有相同的地方，那么全人类对世界的理解程度理所当然会得到提高。

有意思的是，那些彼此一直打交道的新闻记者认识新闻媒介共同处的可能性，比起那些潜心新闻理论研究的记者、编辑和学者来，要大得多。新闻记者经常与其同仁亲如手足地打交道，容易产生一种同志般的友爱感，这种友情往往超逾社会、政治和民族间的差异。他们中大多数为比例不高的驻外记者，这些驻外记者正如其职业性质所示，都是巡回流动者，东奔西走，在其驻扎某地度

过大部分时光。这样，大力开展跨国社会接触的机会就比较有限。然而，一旦这种接触得以增多，新闻记者就可能经过思考而发现那种共同处和相当一致的地方，即只有当记者摆脱了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因素限制的重重压力，最佳的新闻事业才有可能产生。至于对那些在遥远地方或者甚至邻近的离群索居处武断地发表新闻理论观点的学者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无法认识这种共同之处，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国际会议上的讨论也被这种失败所困惑。编辑总是最严厉地谴责别国的新闻记者，说他们是从来不置身于交战地带采集新闻故事的宣传手、傀儡或投机分子。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和教育者会议的代表也相互口诛笔伐，指责对方记者不常阅读别国出版的报纸或书籍。如果认为这样的会议是在求同、争取一致显然极其荒谬。相反，他们仅仅是在加强各自意识形态的纯洁清白，增加分歧而已。

前面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内容为本章提出的分类体系提供了背景情况。本人希望通过将这一分类体系比喻为一部交响乐的方法把问题阐述清楚。人们一定还记得，一部交响乐作品是由几个乐章组成的；而这些乐章组成了整部作品的完整和统一。但各个乐章的内部，对主题不同的变奏有时十分突出。举例来说，在市场经济乐章中，结构上就存在着重大的变化。美国广播电视业的组成方式与西欧和日本截然不同。在美国，广播电视业的财政来源几乎全靠广告收入；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广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西欧与日本，经广播电视提供财源的是税收和公共基金。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播内容也常有很大的差异，但根本内容是一致的。所有这些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只是程度上有差异。某些国家可能国营的工业比其他国多一些，不过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国有化。然而，不管允许社会化企业存在的程度如何，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统一起来的是他们的信仰体系和共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新闻媒介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包含了对这种敌视态度的不同程度的变奏。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发

展到能够接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当然其信仰体系仍旧完整无损。新闻媒介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处于不同时期的个别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界限（新闻媒介可能没有冲破）并不一致、统一，但是这种界限确实存在。最终，资金提供者总会发现这些界限并没有被冲破、推翻。

新闻媒介这部交响曲中三个乐章都充满各种不同的旋律，它们时而发生冲突和对抗。三个乐章中并不乏杂乱不一的音符。然而，没人会花九牛二虎之力，通过细心比较欧洲各国的报纸读者或电视观众之间的差异来研究新闻媒介的作用。法国读者可能与荷兰读者有着极大的区别；而比利时的电视观众可能与挪威的观众不同。然而，所有这些读者和观众都以共同一致的角度来看待传播的内容，这一角度植根于共同的信仰体系。因此，虽然存在一些不谐和音，这部交响乐第一乐章宽广音域的乐声却响彻整个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日本还是丹麦或是加拿大。其他两个乐章中也同样能够聆听到类似这种宽广的音域。

在南斯拉夫的带领下，整个东欧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探寻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各国之间和各个时期，对社会制度进行批评的自由范围各不相同。在进步中世界中，乐章中出现众多的变奏，其中有些接近市场经济乐章中出现的主部主题，还有些则类似马克思主义乐章中的主题曲调。有些变奏强调对新闻媒介实行严密的中央控制，另一些则允许新闻媒介决定新闻内容时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变奏确实带来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其音域之宽广犹如马勒的交响乐作品。当然，作品仍然保持了整体的统一和谐。不管我们在聆听哪一乐章，正是这种整体保持统一和谐才激励起我们期望到达一种有益于我们全人类和谐一致的境界。

对于新闻媒介交响乐中三个乐章的区别，人们或许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即国家特征以示三个乐章之间的差别。然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些差别并不完全是国家性质的。这些差别在国家之间存在，在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在肯尼亚和美国，委内瑞拉

和日本均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印度尼西亚和波兰、中国和古巴也同样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同样，在德国和苏联、加拿大和匈牙利也都存在进步中世界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不过，尽管用国家的性质来说明三个不同乐章的方法可能引起某种程度的曲解，但这种方法倒也不失为一条通向全球新闻媒介现实道路的方便之途。

下面，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新闻媒介这部交响乐的三个乐章对新闻事业目的的不同认识。新闻事业为何存在？其任务是什么？图表11-1反映了三种认识的异同点。

有一点十分明显，不管新闻媒介处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之下，其任务均是打着社会责任的旗号追求真理。这一追求是使用新闻媒介的人民通过被告知或受教育的途径进行的。以上这些根本方面到处都是一致的。但问题是，这些词语是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以及同一地点的不同人进行定义的。这张图表

（图表11-1）

	市场经济世界	马克思主义世界	进步中世界
关于新闻事业的目的	追求真理	寻求真理	服务于真理
	尽社会责任	尽社会责任	尽社会责任
	以非政治方式进行告知（或教育）	（以政治方式）教育人民并争取盟友	（以政治方式）进行教育
	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并拥护资本主义学说	通过要求拥护社会主义学说而为人民服务	通过寻求与政府合作为人民服务，为各种有益的目的进行变革
	作为监督政府的工具	统一观点，改变行为	作为争取和平的工具

指出了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世界里，新闻媒介既定的目的之一是政治性的。在市场经济国家，情况则相反；新闻媒介的任务是超脱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报道消息。但是，就这点而论，市场经济旋律的维护者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无论如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脱政治。

正如亚里斯多德很久前所云：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之中，生长于社会制度之外的人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单就新闻工作者是具有人性美德这一点而言，他免不了是一个政治产物。除此之外，当新闻工作者进行工作时，他所享有的政治地位是一般男女无法具有的。新闻工作者笔下的每字每句都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偏袒某一政治观点显然具有政治性；保持中立同样带有政治性，因为如果他不反对社会现状，那就等于表明他心照不宣地拥护现状。现存的一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正。要么你表示支持，成为一名政治上的拥护者，要么你表示反对，成为一名政治上的对手；而保持中立就无异于赞同现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闻媒介忽视了这一条基本的真理，美国尤其如此。只有当新闻工作者能够摆脱其人性这一根本要素时，我们才有理由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说它具有政治化倾向。

当新闻工作者沉思片刻，思考一下人类的本性时，他们也许会看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带有政治性质。然而，几乎没有哪位新闻记者会放下他们繁忙的报道计划和编辑新闻的工作，腾出顷刻时间来考虑这类问题，新闻媒介所固有的信条最终限制了我们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在美国，情况同样如此。这样一来，新闻界里里外外许多明达事理的人便会坚定地声明记者与编辑超脱政治，是公正的观察员和记录者。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和进步中世界鸟瞰美国新闻媒介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有关新闻媒介政治化问题的争论，事实上这些争论徒费口舌。简而言之，新闻媒介就是一个政治机构。

有一部分问题是肯定的，在美国，人们说新闻媒介超脱政治时，其意思常常是说新闻媒介超脱了党派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介确实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它要承担起三大作用——抗衡、监督和确定议程。但是这里的政治性是指非党派性，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既非自由主义，又非保守主义，既非支持民权又非反对民权。简而言之，美国建设中新闻媒介的那种政治作用就是客观地寻求事实和公正地提供消息。

确实如此，典型的美国新闻记者把这一点认为是其至高无上的职业要求：为读者寻求事实和反映事实，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利用或者不利用这些事实。然而，这一追求忽视了一点，就是新闻记者决不是超党派的。客观报道只是确保社会现状的手段，是保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工具。客观报道允许个人提出批评，但并不是允许个人批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本身。实际上，公正不偏这一情况本身就是在维护制度。在这种模式中，新闻媒介对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挑战性这一说法意味着它对掌权人物是一种威胁。只要新闻媒介没有实行这种挑战性，那么它就是在发挥符合掌权者意愿的政治作用。进一步说，即便新闻界同意新闻媒介超脱政治这种观点，它仍然是满足权力需要的工具。

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关于新闻媒介目的的认识中可以发现，新闻媒介给予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坚定不移的拥护。没有这种拥护，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倘若情况极为严重，人们就会指责新闻媒介离经叛道，背叛人民。列宁关于报刊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里被奉为金科玉律。新闻媒介的目的被视为集体的组织者——统一看法，改变作为。这是必须恪守的原则，没有回旋余地，如此信条使他们不会轻易妥协。除非我们找到某种途径能够使马克思主义者信服，人们可以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修改列宁思想的限制，要不然，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制度新闻理论家之间发生的争论就不可能得到平息和解决。不管解决措施如何困难，一旦人们认识到问题的真实本质，那么它也就变得比较容易解决。

在这部交响乐的三个乐章中，新闻媒介的既定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于这个目的，三个乐章分别用不同语言进行描述。对那些信奉市场经济制度为美德的人来说，新闻媒介意味着拥护该制度；而马列主义信奉者认为新闻媒介意味捍卫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市场经济图像中，新闻媒介被视为不受政府控制而进行工作，用来监督政府甚至同政府抗衡。在马克思主义图像中，新闻媒介是政府(或政党)的工具，支持它的行动并且努力说服读者和观众去进行同样的支持。但是，在进步中国家，这种图像就不一样：新闻媒介是作为政府的伙伴，（按博德·奥伊沃洛的说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孪生机构。从这点来说，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从这些方面理解新闻媒介之目的何在。在市场经济模式中，新闻媒介的报道反映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变革的作用力。在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当共产党和政府说变革是人民的愿望时，新闻媒介就拥护这一变革；它本身也并非变革的作用力。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儿讨论的是对新闻媒介目的的不同认识。其实在所有国度，理论与实际总是大大脱节的。

新闻媒介这部交响乐的三个乐章是系统的，也就是说，三乐章包罗了构成这里所描写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世界真实情况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不仅包括政治结构、环境经济力量和新闻媒介提供财源者的情况，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其它情况。这里我们所指的是人类历程的审美部分：指文学、建筑、绘画、雕塑、歌剧，指科学的组成部分，指一切社会规章制度、教堂和院校。社会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就是由这些内容所组成的；这些内容（作为连续描述的部分除外）是相互不可分割的。由于新闻媒介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单独考察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把它放到社会制度中进行，除非它接受这一事实，即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整体内部新闻媒介的作用。我们只有使该制度停止运动，原地不动，才有可能理解该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我们必须牢记这里所划定的三个乐章的分类，其本身是设想出来

的，是把始终运动着的事物固定下来而进行的分类。由于它是动态的静态表现，所以分类本身是虚幻的。但是，考虑到目前这种分类法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该制度，因而它显然有利于我们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把这一道理记在心里，接下来看看第二张图表——关于新闻媒介在这部交响乐三乐章中的几条信念。（见图表11—2）。

（图表11—2）

	市场经济世界	马克思主义世界	进步中世界
关于新闻事业的信条	新闻媒介不受外界干涉	新闻媒介改变错误的意识，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级觉悟	新闻媒介是一支联合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坏力量
	新闻媒介为人民的知晓权服务	新闻媒介满足人民的客观需要	新闻媒介是有益于社会变革的工具
	新闻媒介力求获得真理并反映真理	新闻媒介促进实际变革	新闻媒介是社会公正的工具
	新闻媒介公正，客观地进行报道	新闻媒介客观报道事物的现实	新闻媒介旨在用来沟通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信条就其定义而言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信条是不经推理而得出的。它们往往是虔诚信奉者的满怀热情所达成的一致看法。信条并未遭到批判性的分析。信不信由你。你可以是位信奉者，也可以是旁观者、不信仰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别的地方召开的有关新闻的国际讨论会上所展开的激烈论战，主要是出于信条的冲突，出于坚信者与背信者的相互谴责，坚信者狂热地恪守

自己的信条而背信者则针锋相对，斥之为荒谬。譬如，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理论家铿锵有力地申辩其新闻媒介不受外界的干涉，说没有哪个政府组织或广告公司告诉新闻媒介写什么内容或怎样编写新闻报道。对此，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社会里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理论家则回答道："胡说八道，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在如此这般舌战中双方是不可能和解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记者和新闻理论家认定其报纸是教育的工具，坚持马列主义观点有助于澄清读者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现象的错觉。这样的报纸通过指出资本家或进步中世界官吏把人民引向歧途，并颠倒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所暴露出来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来真正地满足其读者需要。对此，市场经济和进步中国家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理论家也会回答说："纯粹胡扯，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报刊只是在进行宣传，与读者的真正利益相背。"这样，和解又没有指望了。

进步中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新闻理论家提出，他们的新闻媒介避免了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易于引起分裂的报道特征，成为为其读者利益服务的力量。每逢这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回答又会是："胡说八道，情况根本不属实。你们的报道十分容易引起分裂。你们攻击邻国的激烈程度和我们相互攻击差不多。"对于这种难于包容各自相反信条的现象，我们绝不应当掉以轻心。

新闻媒介这部交响乐中的种种信念无不容易遭到激烈的反驳。举例说，在市场经济以外的国家里，许多人并不同意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是在力求为读者提供事实真相并反映事实真相这一观点。相反，可能性更大的倒是人们常批评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介不向读者透露真相，因为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其业主赚取利润。在马克思主义势力范围之外，新闻媒介促进实际变革的马克思主义信条遭到排斥，对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介唯一感兴趣的一种变革就是有助于统治者维护他们对人民的摆布而不是有助于人民得到新闻媒介应该为之服务的利益。对于进

步中世界理论思想家所认为的新闻媒介是社会公正的工具一说，在其他国家也同样被嗤之以鼻，指出进步中世界报上充满谩骂讽刺的憎恨。总之，新闻媒介这部交响乐中每一个乐章关于其新闻媒介坚持客观报道的声明无不遭到其它两个乐章的挖苦嘲弄。

在所列的这些信条中，最易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进步中世界信奉新闻媒介用于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新闻流通的工具，即不是从上到下，从记者到读者的流通过程。根据这一信条，真正的新闻工作当是共同参与的过程。读者不只是净化器，对记者提供的大量涌来的消息进行提炼挑选，而是参与记者决定在消息总体流通之中发表什么样的新闻内容。就此而论，这种新闻流通是水平流向而不是垂直流向。这一信条在新闻媒介交响乐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乐章中是没有的。事实上，参与新闻对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是一个不易演奏的主题乐曲。因为他们不愿被看作是新闻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者，而且自己也不这么认为。市场经济乐章中的一个信条是：新闻媒介为人民的知晓权服务，这是他们得以存在的理由。在美国，不为大众服务就意味着他们不能维护第一宪法修正案给其规定的特殊地位。宪法规定的自由必须以服务于民的思想作为前提。然而，实际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要求独立裁定新闻的权利。这样做就使他们脱离了读者，在某种程度上，留待读者自已就新闻内容进行取舍。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新闻媒介如同所有其它机构均服从于同样的市场规律。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选择：他可以购买也可以不买。他可以购买报纸也可以不买，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关掉电视，从这层意义上讲，他考虑的是如何使用自已的金钱。假如他同意报刊上的内容和看法，他就会掏钱购买；如不同意则不买。在市场经济中，读者和观众是真正的付钱主子(即资金提供者)，而不是报纸和广播电视的所有者。然而，这并不是市场经济中新闻媒介领域的真实情况。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就在于：如果势力阶层想成功地推销其产品，看不见的手就能够对他们的

私欲加以限制。他们必须满足人民的利益，否则将招致钱财损失。斯密所预见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趋善避恶的社会秩序；他当时未能预见会出现企业垄断和商品供应垄断，出现跨国公司。他也没能料到规模巨大的报业帝国和新闻联合企业的产生。相比之下，单个观众面对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要用区区几个金元去作选择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因此，人民知晓权只是新闻媒介有权告知人民它想让人民知晓什么的一种婉转辞令。

新闻工作者——包括新闻媒介的所有者及其记者和编辑人员——很大程度上不失为公民知晓权思想的虔诚信徒。如果我们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将此描述成作为一个整体的兄弟会和姊妹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作为整体的真正美国新闻界确信他们所做所为无不是为了公民的利益，而公民有权知晓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以尽到公民的职责，由此而实现民主的假设。虽然这种信念自欺欺人，但这就是市场经济乐章中的基本信条之一。

马克思主义乐章的信条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新闻媒介是为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服务的。他们声明群众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着重强调读者来信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有效途径。而在美国，这种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市场上。读者一旦觉得手中报纸的内容不合口胃，令人反感，他就不去买它，这样就迫使该报争取改进，为适应市场需要而生存下去。因此，新闻媒介不管在苏联还是在美国都是满足读者愿望和需要的工具。从这层意义上说，读者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明显地看到新闻流向在美苏两国都呈垂直型——从裁定“新闻”内容的新闻记者到常常只是简单接收新闻的读者。

在进步中世界里，为了争取制定一个更为平衡的流向模型，人们作了不少努力。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一位瑞士研究员罗兰·施赖尔，十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在非洲的农村土地上建立一种“乡村报刊”以满足读者的真正需要，其经营方式不是一种传统的权力的媒介，而是如施赖尔所称的“一种对话的工具。”施

赖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工作期间，曾广泛游历了非洲，他经常亲自尽力帮助没有文化的非洲人民拓宽他们对外界的视野，并帮助他们了解他们需要了解的知识，以期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施赖尔指出，"读者对政治争端兴趣索然，其兴趣在于了解文化、他们产品的销路、教育、卫生条件的改善等等。"

以施赖尔的见解，报纸是人类能够争取得到真正对话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说："由于报纸是对话的产物，所以答辩交流就成为可能。"施赖尔于1972年在非洲遥远的内陆国家马里开始了他的事业。马里人口稀疏，700万人民散居在46.5万平方英里的国土上，其主要城市巴马科只有45万人口。施赖尔与马里新闻部的官员通力协作，创办了一份以班巴拉语①印刷的月报《新闻报》。最初目的只是为大众提供一般消息，促进农村发展。但时过数年，《新闻报》扩大了其规模，目前不仅提供最新消息而且旨在改善生活水准和提高公民意识。该报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主编、两名副主编和一名新闻学学者，均未受过正规训练，不过他们都经过短期集训（充其量只受过中等教育）。《新闻报》起初只有四个版面，油印出版，但十年后已发展为8～10个版面的胶印出版物。该报发行量由5000份增至12500份，从读者那儿收到愈来愈多的信件和其他交流物品。

在马里，办报之初就努力深入读者群体，要使他们相信《新闻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为了使之有说服力，施赖尔和他的同事引进了一个施赖尔称之为"乡村传播者"的通讯网络。委员会由各领域内的行家组成，定期商讨《新闻报》读者需要什么新闻和应该需要什么新闻的问题。讨论情况交给编辑成员，由他们轮流审理这些讨论情况，最后制作新闻条目。通过这种途径，规定新闻内容的已不仅是新闻工作者，还包括读者在内。实际上，乡村传播者通讯网中没有一个编辑，但又都

---

① 班巴拉语系马里主要的民族语言，其官方语言为法语。——译注

是称职的特约记者，报上的绝大部分新闻均由这些人撰写。

施赖尔针对一些官员的反对，坚持报纸并非免费发送而需要用钱购买。施赖尔指出，"读者只有付了钱才能真正感到报纸非他莫属。我们告诉他们："这是你的报纸。你也可以给我们撰稿，跟我们进行对话，但是，为了我们把报纸继续办下去，你就得付钱，必须成为报纸的拥有者才是。"从本书的前后内容来看，这种做法使得读者从一个区区消费者上升到付钱主子的地位。

自马里尝试开始后，非洲16个国家先后建立起乡村报刊网点。另外，施赖尔及其同事又着手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乡村报纸网点。这些报刊大部分为月报，有些为周报；其发行量少则有500份，多则达60000份，如象牙海岸著名的农村报《土地与进步》。尽管施赖尔在马里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尝试中看到了一些良好的开端，但他还是承认失败甚于成功。施赖尔及其同事呼吁国家的和国际间的组织、新闻研究机构以及记者和编辑扩大对乡村新闻事业的投资。乡村报纸记者和编辑的工资低微得可怜，新闻院校的研究也主要通过城市新闻中心而得到。此外，还有一些政府企图将其乡村报纸变成宣传工具，为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尽管如此，施赖尔仍然相信乡村报纸在促进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增强人类理解方面提供了机会。施赖尔面对一大堆乡村报纸上刊登的读者来信，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命运是与这批读者的未来系在一起的。

并不是所有进步中世界的理论家象施赖尔那般对发展乡村新闻事业满怀激情。他们指出，那种参与新闻的做法在遥远的农村地区还可行，但在工业化社会中却不行，甚至在非洲的一些大城市里，也无法推行。然而，持发展态度的理论家对乡村新闻业的改进提出了建议，认为乡村新闻事业前途无量。这种改进的思想有时被称为"共同的新闻事业"。在这种思想里，公民可以直接获得新闻媒介并参与编辑的决策过程。这一思想和原来的乡村新闻事业的思想一样，为新闻媒介寻求新的作用，这个新作用既不是作为经济资助者或政权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媒介，是

具有兴趣并有发言权的公民的媒介。

尽管这一思想不易取得成果，但值得人们更广泛地进行探究，按照这一理想，新闻媒介会成为共同团体的工具，而不会成为给或为该共同体传播信息的工具。这样，新闻媒介能够给公民赋予一种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公民与社会之间存在隔阂感。这种无可奈何的病态现象遍及各地。人们感到自己并非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譬如在美国，30多年来参加竞选的情绪一直在下降。更多的人愈加感到他们的投票不起作用，间接作用也微乎其微。在适当的情况下，新闻媒介可以给予他们一种参与感、重要感和期待感。在目前情况下，似乎没有谁相信他们亲自获取其报纸的版面或其广播电视台的节目。然而，共同的新闻事业这种结构给他们提供了那种机会。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面对世界陷入核毁灭的状况下可能会沮丧地坐而观之，而一个积极实际的公民则会感到值得冒险干预。总之，参与新闻的实践能够提供这一机会。

有人提出共同获取和参与新闻将遭到当权者的拒绝，回答是他们没有作出实际努力，只有提出问题，才能得到答案。显然，互为共存的新闻媒介及其付钱主子不太可能轻易放弃他们对规定新闻内容的垄断控制；因为他们在权力和声望下的赌注实在太大。对他们来说，新闻自由就意味着他们有权裁决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向参与的公民屈服这一权利无异于改变这种制度的性质，至少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景下，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观点完全吻合，不少进步世界中的理论家亦然。

然而，变革并非一定要带来累累硕果。公众参与决定新闻内容的程度加深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权力关系在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已经播下了进步的种子。在工业化市场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中，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系列尝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芬兰的尝试。在芬兰，电视节目制作者在编排新闻内容的主题和最新消息节目时，试图以针对观众作为基础，而不是以通常的戏剧性和冲突性

为基础。其中，节目制作者安排了一个叫"蒂托拉"(Tietolaar)的节目，邀请观众就怎样解决当地问题写信提出建议。接着电视台派出摄制组前赴当事地点，和当地人民一起合作报道那儿的情况。最后，播出这个记录片，配上当地居民与当政决策人员处理某些问题的现场问答场面。这样一组节目仅仅是一次尝试，还尚未推广，但它说明了公众参与规定新闻内容并非痴心妄想。芬兰的尝试算不上独特。好些电台和报纸根据人类的需要制作记录片，然而他们很少让其观众获取支配新闻产品的途径。这种做法比较接近施赖尔的目标——通过传播媒介展开对话。

在这种共同的新闻事业的形式里，弗朗西斯·贝里根说，该共同体的成员得到新闻媒介——"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获得消息、教育、娱乐。"这个目标是所有新闻理论家要求达到的，即大众传播媒介旨在作为提供教育的工具。区别只在于谁决定教育的内容。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就教育的内容阐述了真知灼见。他说，

> 教育的目的是把人类从无知和依赖的监禁与约束中解放出来。教育必须促进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自由——提高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生命、控制他们所在环境的能力。因此，教育传递的思想，或人们通过教育头脑中闪现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思想；通过教育获得的能力应该是自由的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教育定义呢？

以上尼雷尔推出的崇高目的是无懈可击的。这一放之四海皆同的教育目的也同样运用于新闻媒介的宗旨；其目的同样为了有助于解除人类的无知和依赖，有助于男男女女提高他们控制自己生命及其环境的能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坦桑尼亚的全体学生将会发现他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新闻制度的具体做法与尼雷尔所宣扬的思想不相一致。理想距离人类还相当遥远；政治与经济上的实际考虑在现实世界中最终会优于个人的需要。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满足每一个人需要的社会公有财产的想法由于背离了人性，所以它是空想

的，可能会起反作用。

即使单个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获得大众传播媒介的范围，也同样是乌托邦的想法，传播媒介会接近全体人民的可能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施赖尔观点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每一个人会要求获得报纸的版面。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男女似乎都想仅仅成为新闻的消费者，犹如他们在学校里是教育的默默吸收者一样。极少有人对参与感兴趣，然而，竟然就有那些不关心参与的人极力赞成参与的原则。

这里，传播媒介的把关人作用是引起争端的关键之所在。在所有的新闻理论中，都认为决定新闻内容的是记者本身。然而，我们发现记者就裁定新闻内容方面屈从于掌权者的操纵。在记者与其新闻来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突出的是观众。通过运用施赖尔参与计划的一些做法以及共同的新闻事业的某些思想，朝着提高公民参与规定新闻内容程度的方向努力，必定会使新闻媒介成为前所未有的更有力量的教育工具。

划分新闻媒介交响乐三乐章的旋律还有第三种方法，即根据各自对新闻自由的不同观点进行划分。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图表11—3）：

（图表11—3）

	市场经济世界	马克思主义世界	进步中世界
关于新闻自由的不同观点	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记者不受外界控制。	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人民的意见得以发表，不仅仅是富者的意见。	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的心灵自由。
	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介不屈从于权力，不受权力操纵。	新闻自由必须反对压迫。	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次于国家存亡之重要性。
	新闻自由不需要国家新闻政策来保证。	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以便保证新闻自由采取正确的形式。	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来对自由提供合法保障。

言论自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都受到推崇。没有哪个国家会公然反对言论自由的理想、没有哪个社会在国内或国外辩驳促进这一总体思想的法律或规定，只要言论不损害他人，人人有权谈他所想的看法，写他所想的观点。在所有社会制度中，主要限制都置于言论自由的权利上面。举例来说，美国社会中，在济济一堂的剧院中大叫"失火"是违法的。在苏联，公开批评当政官员是不合法的。在印度，支持种族歧视也为法律所不容。因此，在所有国家，言论自由不包括倡导通过武力和暴行推翻政府的权利。这里的核心问题和大多数哲学问题一样，是定义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的是信息的自由。他们主张，需要保障的是传递任何人们希望传递的信息之权利。其理论是，信息的接受者能够依据这些信息作出明智的决定。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所谓的民主假设的核心。仔细观察，人们会发觉上述理论尚欠完整。因为信息接受者作决定需要的不只是限于新闻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还需要智慧和背景材料，把这些信息放到便于他们作出决定的具体场合中去。如果缺少智慧和教育，即缺少文化，这些信息对他就毫无用处。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假定认为，印刷出版中的言论自由是社会政治与经济整体制度的一个部分，它为大众教育和公共卫生设施做好了准备。离开学校和医院谈论言论自由是很不切题的。

纵观整体，马克思主义国家和进步中国家新闻媒介所处的社会制度也同样包括致力于大众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一方面。在进步中世界里很多(也许绝大部分)国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钱财的不足同样意味着学校和医疗设备的缺乏。对这些国家中的下层人民来说，享有言论自由可能远比不上学校和医院的存在来得重要。因此，这种社会制度不如美国及其盟国那般潜心于对言论自由抽象原则的研究便不足为奇。尽管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世界各地被视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信息自由流通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被人们视为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社会怀疑美国及其盟国的新闻媒介是否真正不受外界控制。事实上，正如麦克布赖德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新闻媒介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商业势力的影响，充当广告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开路先锋。

列宁宣称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自由只是富人享有的自由。这一思想被马克思主义国家、大部分进步中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不少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团体视作基本真理。马克思曾在19世纪发表热情洋溢的文章，为一种完全自由的报刊制度进行辩护。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巩固政权之前，列宁同样支持报刊完全自由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一旦推翻了压迫，自由报刊必然要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重要工具，指引人民胜利前进。马克思和列宁的这番话在资本主义和进步中社会里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如今马克思主义新闻批评家反而指责苏联新闻媒介的实际情况，他们正确地论证道，马克思主义国家中的新闻媒介并不自由。

在进步中世界里，就新闻媒介自由的含义或甚至就什么是新闻媒介的真正行为这些问题上绝对没有共同一致的看法。由于许多国家尚未完全形成或制度化，因而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达成精确一致的看法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事实上，观点不普遍一致属正常现象，因为思想的开放经常遭到来自规章制度以及根源于传统信念方面的阻碍。对于大多数进步中世界国家，新闻自由并不直接意味着仅仅是信息自由。正如马罗奎因·罗加斯观察了拉丁美洲的讨论情况后提出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个人的心灵自由而不是个人应该得到大堆信息的自由。

为什么有关新闻媒介作用的绝大多数争端总是围绕着信息这个词？如果深入地讨论那种所要求的信息，那么有关新闻媒介作用的讨论肯定会对全社会更有裨益。滔滔不绝地大谈足球赛、银行抢劫、影星、失火、时装，异常的性行为以及种种汽车造型比起讨论崇高的自由和道德似乎显得毫无意义。谈论报刊杂志上的

广告版面和广播电视中的商业广告同样没有意思。人们怀疑第一修正案里或马克思主义国家、进步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保障新闻自由是否意味着保证印刷发行的这类新闻报道或广告讯息仅仅用于商业广告。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新闻媒介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大大招致了国际会议上和世界各地新闻编辑室里有关新闻自由的莫名其妙的讨论。

对于进步中世界那些正在斗争的不安全的国家来说，其国家的生存比研究抽象的新闻自由原则更为重要。这种态度经常遭到资本主义世界新闻记者和新闻理论家的指责。根据美国的新闻信仰，自由的新闻媒介应当揭示“真理”，不管在哪里发现它，也不考虑这种揭示所带来的后果如何。这样，进步中世界以挽救国家沉沦为名压制“新闻”的做法通常被看作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进行的坦率辩护。然而，那些提出批评的记者所忽略的是，他们自己也愿意压制某些消息的发表，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消息提供者）感到这些消息危及自己国家的安全。他们忽视了新闻媒介具有监督的传统作用，因而无法认识到他们自己社会中新闻媒介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共存性质，不过他们也不难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中发现同样的现象。

可以肯定，新闻媒介所规定的作用服从于国家的正当利益，每一个进步中世界的国家都赞成制定国家和国际的新闻政策。秘鲁推行的“印加人计划”就是这类国家新闻政策的一种。在发展中国家，内容各异、结构相同的国家计划遍及各地，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制定这种正式的新闻政策表示怀疑，许多国家公开反对任何正式的政策。然而，事实上所有国家都采用各种新闻政策。分歧点在于市场经济国家对新闻政策的命名不同。新闻委员会、各种出版者、编辑、记者、广播员、摄制者的协会以及新闻学教员无不关心新闻媒介的正确行为，因为不可能不留心政策。不过，对这些个人和团体，他们讨论的是实际做法而不是政策。对他们而言，政策似乎由政府

制定，所以是政治性的东西。这些个人和团体的信仰体系对政治表示怀疑，并觉得政治直接干预新闻行为不得人心，所以他们对于那种政治组织要求在处理新闻时充当主要角色的提议总感到恐慌和憎恶。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发现许多有关这种憎恶感的阐述了。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社会制度的新闻理论家觉得政治干预是自然的，它具有潜在的好处。然而，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中世界新闻理论家在什么样的政府干预切实可行这一问题上意见莫衷一是。最后导致一种新闻的混乱状态。由于在是什么的问题上观点不一，因此更不可能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每一方都依据各自的社会制度信念准备恪守新闻理论的抽象原则。最终，没有哪方新闻记者或新闻理论家能够把握新闻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西赛拉·博克在写作普通伦理学时提出，在大多领域中，应该避免作严格的伦理选择："在存在那么多妨碍人们想象的含义和概念、分类和结构上的抽象问题时，为什么还要进行这种选择呢？"希望本书在这里提出的分类体系将有助于解决新闻学领域中所存在的这些抽象问题，有助于为具体实践扫清道路，正如"印加人计划"那样，人们能够判断它的睿智所在。

为了将书中出现的有关新闻媒介作用的论述以及新闻媒介交响乐比喻中提出的分类体系作一归纳，我们将在这里就新闻事业的发展，归纳为下面七点，想必智者不会不赞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为新闻媒介的发展提供具体方法，奠定基础，使之不再成为分化人类的力量，而逐渐成为有益于解决我们将在20世纪最后一些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推动力。

新闻学的七项归纳

1.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

2. 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3. 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

4. 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5. 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

6. 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

7. 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

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新闻媒介这部交响乐的终尾音符即将拨响。

新闻媒介可以带来三种可能性。第一，它可以在类似瓦格纳震耳欲聋的鼓声和毁灭性的铙钹声中，加速人类的自我消亡；第二，它也可以在类似维尔第[①]恰到好处的音乐处理中，帮助创立一个全球性和谐统一的整体；最后，它可以始终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局外人，被动地聆听跌宕起伏的音乐，象一台没有思维的机器人等待命运的到来而不是自己主宰命运。本书蕴涵着一个不小的

---

① 维尔第（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译注

希望，希望新闻媒介摒弃只是盲目记录冲突的历史作用而应该探求一个新的作用，即冲突的解决作用。和平地解决冲突是世界和睦共处和全球发展的根基。

本章提出的分类体系并没有给人们聊以多少慰籍。冲突多于解答。不管"我们"指谁，好人还是站在"我们"一边。不管"他们"指谁，坏人且站在"他们"一边。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的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异于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

学者们老是认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绝大部分唇枪舌剑的争端无外乎围绕着人格和国格问题，安全问题和认识问题。每一个人和国家都需要有人格和国格。根据约翰·伯顿的观点，一旦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些个人或国家就会采取如掌权者所说的行为不轨的举动。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或那些恪守统治者思想体系的人为好人，而"他们"或那些行为"不轨"者则是坏人。理解人们在现成接受了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外怎样行为和怎样思考，对于能真正告知，或教育，或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只要能真正理解，"坏人"和"好人"都应该获取新闻媒介。无论到哪里，客观性法则都不会被抛弃。

伯顿提到，"第三者"可能在解决冲突中发挥出有价值的作用，他指出"第三者"的作用在于翔实而公正地反映冲突中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保证对立双方不要介入"冲突或争斗、交涉或武力"，而应当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除此以外新闻媒介还能起到什么更强的作用呢？

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艾伯特·加谬在195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我们职业的崇高性将始终根源于不易恪守的两点许诺，绝不对我们所知的东西撒谎和抗拒压迫。"也许他还可以

对新闻记者增加第三条许诺：写作与编辑的目的应该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不是使人类的问题恶化。

附录

析"社会责任论"的荒谬

社会责任这条术语的最初发端是含混不清的，但它似乎与功利主义哲学有关联。这种功利主义哲学19世纪在英美两国拥有大量的信奉者。它的许多观点始于耶利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有关著作。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密尔，则在边沁的功利原则中注入了道德的因素，这一原则认为：美德在于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边沁创立的这种道德原理在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获得了广泛的赞同。边沁认为，事物的好坏是由其结果决定的。一项行为只要结果能使公众幸福（如：降低贫困程度），那么，它就是好的。密尔对边沁这一说法作了重要的增补。他坚决主张，不仅结果必须良好，而且动机也必须纯正。如若不然，始于邪念的行为是不会产生良好结果的。虽然边沁和密尔都不是在声明一种新观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曾一度为类似想法绞尽脑汁），但他们所阐述的思想却恰好适合了19世纪中叶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正是密尔的道德功利主义和让·雅克·卢梭关于"总意志"是最高美德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社会责任论的哲学基础。卢梭同密尔一样反对专制独权。他认为，人民的呼声高于一切，而这种呼声在他所称之为"总意志"概念的神秘表述中得到了反映。

1834年英国制定的《济贫法》是边沁功利主义政治上最重要的贡献。在边沁和辉格党政治家们倡导的社会改革运动过了几年之后，通过了这项法案。这是国家政府第一次承担起关心穷人的责任。而当时的做法一般是委托给教会和地方救济机构照管。《济贫法》是社会责任学说得以运用的一个极好的说明。自那以后的极

短时间里，这一术语便在整个盎格鲁一萨克逊世界中广为运用；在美国，则被废奴论者、监狱改革和义务教育的支持者以及那些要求立法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者普遍使用。1857年，在英国出生而后移居美国的约翰·巴梭罗米·高在伦敦爱塞特大厅发表了一篇演讲，引起了一向有节制的工人和反对贫穷与奴隶制人士的震惊，这篇讲演的题目就是"社会责任"。高认为，我们彼此都是同胞的保护人，且有责任为穷苦人民和受压迫者寻找出路，助一臂之力。他的这一讲演博得众彩。随后十多年间，高经常被邀去作同样题目的讲演。

高的中心思想是个人对社会责任，而这也是密尔思想的实质。但是，密尔超出了要求个人救助的观点，进而提出公共机构要承担责任。在这些机构中新闻界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密尔坚定不移地拥护言论自由和言论公开。当他演讲到言论出版潜在的积极作用时，情绪变得激动万分。他说，指责言论和出版"无异于帮助愚昧无知得以复活，而言论出版是消除愚昧无知的卫士。只要我们想象一下东方暴政统治下的恐怖，我们不难看到，能保护我们的唯有言论和出版。倘若恶势力当道下使言论出版变得较弱无力的限制一旦能够祛除，那么我们就可以接下去想象出另一番情景，不只是目前那种国富民强的状态，而是一种与人性相容的极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有朝一日是可以达到的。这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的万幸了。"

到了哈钦斯委员会使用社会责任这条术语时，他已经在英美两国普遍使用，广为人知了。涉及这一概念的书籍数量逐年增多，其中出版量最大的要算商务、特别是与市场学有关的书，此外还有科学方面的书。1963年全美教育协会出了一本薄薄的书，敦促社会与政府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使各类院校不断教育青年关心国家大事。诸如，"美国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甚至美国的浮沉，要求人民具有高度而不断增长的社会责任感"这类问题。同新闻出版一样，商业与科学方面的书籍文章要求报刊这些机构的人员履

行他们的社会责任。于是，1975年一本刊名为"社会责任"的杂志应运而生。

然而，严酷的现实是：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意思费解，也就是说，这条内容极其含混的术语几乎可以往里加进任何意思。这样，它也服务于社会控制的最终目的，在某些方面会令密尔和卢梭大吃一惊。（也许这就是人们在《牛津英语辞典》或《观念史辞典》中查寻不到社会责任这一术语的缘故。）《牛津英语辞典》有几页是解释带有"社会"的复合词的。在《注释与质疑》丛书里也有许多这类词条。的确，在《注释与质疑》中的一本详尽无遗的密尔思想简编中用了大量篇幅解释带有"社会"的复合词，但绝没有社会责任这一词条。然而，人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两个可供参考的词条，即"社会道德"和"社会义务"。

尽管这个术语毫无意思，并且被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加以使用，但它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首先，它给新闻工作者一种积极的情感，即自己是在为社会作出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操办一项公共事业而工作，比如象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闻工作者避免盲目性，正如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不确定的，模糊的观念总令人感到困惑痛苦，难以忍受。第三，它使新闻工作者不计这门行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去选择报道矛盾冲突，因为社会责任要求他这样做，而不是用闲言，色情和暴力这类东西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这种威胁正是哈钦斯委员会首先关注的问题。

但一旦新闻工作者认清了社会责任的虚伪之后，他会怎么办呢？是否会使他变得玩世不恭，或者为了大肆追求金钱、威望和权势而赤裸裸地屈就于读者卑劣的胃口？他是否会因此而离开新闻工作而另求他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确确实实发生过。美国就有许多新闻工作者放弃本行，转到广告和公共关系领域另谋其职，当一名文职官员、律师、政治家、教师或教授什么的。1971年有一项

著名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在职新闻工作者平均年龄要比其他职业的工作人员小三岁。这似乎说明，不少男女新闻工作者对本行产生了幻灭感而转念在别的领域成就其业。一些深谋远虑，能成大气候的新闻工作者也就这样纷纷转到其他领域力图功成名就。其原因也许就是他们窥见了社会责任论的荒谬虚假。毋庸置疑，要认识到满足公众的需求是何其艰难并伴随痛苦的。因为他会发觉自己根本无力改变社会，这会使谁都深感到伤伤。即便这样，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还是能为公众作出重大贡献的。他很有可能有组织地联系自己的同仁来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们在论述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时所碰到的困境与我们论述自由这一术语时相差不多。因为没有一种统一的方法可以给这两者下定义。这完全需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伦理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理解。除非我们自由，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我们的行为负责。既然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尽责。另一方面，他或许是一个自由的“个体”，理所当然他可以自由选择。他可以选择是否执行出版商给他下达的任务，他还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去留。如果坐牢是一种惩罚的话，他甚至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坐牢。既然他拥有这些个人自由，那么他就可以凭其个人责任感行事。一位叫格林的英国哲学家对义务和责任两个词作了有益的区分。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实行，而责任则不然。这样的话，当一名新闻工作者遵命承担义务，仅仅报道合乎其出版商或政府心意的消息时，他就尽到了责任（也就是尽到了“义务”）。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这位新闻工作者发现这类消息道义上不得人心而拒绝报道的话，他也同样尽到了责任（即尽到了格林所说的“责任”）。而“社会责任”术语中的“责任”一词则既可作“义务”又可作“责任”解释。因此，要想把具有法律意义的责任（即“义务”）与具有道德意义的责任区分开来是永远不可能的事。这样，由于语义学上的困惑所产生的混乱，当人们讨论新闻事业的伦理道德时，也就不免永远茫茫然不知所云。

当人们提到社会责任时，它通常是指道义上的含义，或是指格林所用的"责任"这个词。于是乎，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什么？为了什么？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新闻工作者至少在理论上对自己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归因于谁呢？不可能是消息提供者，因为这与社会不相干。如果这个责任归因于出版者或政府的话，那么，我们所谈的主要是通过私人与雇主或公民与政府的方式而尽责。从表面上看，责任似乎应归于"社会"。因此，这里的责任指的便是约翰·巴梭罗米·高在那次激动人心而扬名的演说中描述的"责任"，或指的是卢梭总意志的责任，或指边沁和密尔企求的最大多数人的责任。

但是，"社会"这个术语终究一个荒谬的概念，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条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与19世纪政治理论家所引用的"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那么自那时以来，这个概念不仅在术语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是引起巨大混乱的根源。有时候"国家"指的是政府，有时指民族，时而又指社会。所有这三个术语：政府、民族、社会都是含混不清的词语。一位在政治哲学方面颇有名气的学生观察到，尽管这些词语的意思模糊不清，但它们之间是决不能相互混用的。事实上，社会这个词似乎具备政府和民族两者之意。按格林的说法，当某人谈论社会的作用时，他就是在使用一个没有意义的复合词。

既然，当新闻工作者说到社会这个术语时，他们头脑中总有所指，那么他们指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就是指那些有文化，能说会道而又关心公共事物的中上阶层的男男女女。他们既有教养又有钱财。麦克·诺法克认为，由于这个原因，工人憎恨新闻媒介，嫉妒从事这门行业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社会利益。历史确实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往往是以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来理解社会责任的。美国少数民族的新闻报道也证实了这种分析。于是，社会责任再次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同时又为那些

自称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正如霍布豪斯[①]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都可能要主张一种道德尊严和权威。否则他就不能证明自己所干的事是正当合理的。这并非意味着新闻机构缺乏道德尊严，而是指出，社会责任论给其实践者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看看这种道德尊严是否肯定现状，是否作用于全体人民的利益。

然而，社会责任可以用来指为那些在社会上流分子统治下的受难者而效劳尽责，而不是为那些社会名流效劳尽责。对于进步中世界来说，这种绝无仅有的社会责任是针对下层人民利益的。在那些获得自由的殖民地尤其如此。纽约的一名犹太神学院的院长露易斯·芬柯斯坦在他的一篇《处于革命年代中的社会责任》文章中用类似的笔调指出，社会责任论是针对所有那些既缺乏生活必需品又缺乏自我价值意识的人而言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失去权利的人需要自尊，需要自信，如果我们不能帮助全世界的所有人重新恢复其做人的尊严与个人价值的意识，我们将会遇到不可预测的失败。"

芬柯斯坦认为，推动人们向这个目标前进，就是享有社会特权者的责任。那些享有特权者自然包括从事新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在进步中世界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就是帮助人们获得人的尊严、个人价值意识。为了这个目的，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要求。

这个新秩序显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它所遵循的政策是圣雄·甘地于1917年在英文报纸《年青的印度》任编辑时制订的。当年，甘地为印度独立而发起了他的运动。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写到，《年轻的印度》报的政策不仅要引起人们注意"对个人不公道"的现象，还要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非暴力的……全民抵抗运动"上来。抵抗成为一项祛除不断恶化的不公道现象的责任。"对不公道的内

① 霍布豪斯（1864—1929），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容，并非人人见解一致。但是，对于为了求得一个暂时摆脱政治色彩的角色而因此忽视这个“不断恶化的不公道现象”的新闻工作者，称他是一位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则是相当困难的。